



拒绝遗忘 正视历史 支持改革 促进民主

“往事微痕”丛书第 23 期电子文本

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

2012 年 8 月 5 日

目 录

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	2
萧功秦：拒绝残酷的美丽	
——评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来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	5
陈 彦：理想是怎样失去的——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来的》	8
中共党史研究新话语系统的兴起——突破意识形态框架的民间话语系统	14
为什么中国会出个毛泽东？	16
瞿 咫：党内一份毛秘密档案否定“辉煌 60 年”	30
王 葆 琛：殃民祸国毛泽东(修订稿)	31
邵正祥：为什么说毛泽东是最大的反革命？	36
余英时：打天下的光棍——毛泽东与中国史	38
毛泽东时代对人进行控制的阴损招数	49
洪 深：南都揭秘:毛派整死高华	55
为什么希特勒不如毛泽东？	57

李国元：我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62

刘兴盛：贵州湄潭事件：一个县饿死 12 万人.....68

贾植芳：六十年代的牢狱往事 饥饿的政治犯.....73

高仕泌：我在夹边沟高台农场的饥饿岁月.....82

亲历夹边沟.....86

动物庄园：专制极权的精髓和不传之秘.....163

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

内容简介

延安整风运动是深刻影响二十世纪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这是由毛泽东亲自领导的中共党内第一次大规模政治运动，也是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的滥觞。毛泽东在延安整风中运用他所创造的思想改造和审干、肃反两种手段，全面清除了中共党内存留的五四自由民主思想的影响，彻底转换了中共的「俄化」气质，重建了以毛泽东为绝对主宰的上层结构，奠定了党的全盘毛泽东化的基础，其间所产生的一系列概念、范式在 1949 年后改变了亿万中国人的生活和命运。本书作者历时十余年，搜寻考辨大量历史资料，在此基础上，从实证研究的角度，详细剖析了延安整风的前因后果及运动所涉及的各个方面，力图再现当年这场运动的历史真貌，是目前海内外唯一一本全面研究延安整风运动的历史著作。

前 言

1942 年冬春之际，在中共战时首府延安，随即在中共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开始了一幕延续多年的大规模政治运动——整风运动，由于这场运动是以延安为中心，又以在延安开展的运动最为典型，史称「延安整风运动」。

延安整风运动是中共历史上进行的第一次全党范围的政治运动，这个运动是和毛泽东的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是一场由毛泽东直接领导，包括诸多方面内容的党内整肃和重建的运动，它包含：党内上层的斗争与党的中央权力机构的改组；

全党的思想改造；
审查干部的历史和「肃反」；
新制度的创设。

在上述几个方面中，党内上层的斗争和领导机构的改组始终处于中心地位。

延安整风运动发端于 1942 年初，但是它的真正起步却在 1942 年以前的很长时间就已经开始。它最初表现为 1935 年遵义会议后至 1937 年间，毛泽东运用其在中共领导层中所获得的相对优势地位对中共政策及领导机构作出的局部调整，这种局部调整在 1938 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后迅速转变为毛泽东对中共政治路线、组织机构、精神气质等方面所进行的一系列重大改变。1938 年秋在延安举行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对于毛泽东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次会议，将毛泽东于 1935 年后在军权、党权方面的权力扩张予以合法化，使毛泽东在中共核心层中的地位得到极大的加强。从 1938 年末至 1941 年秋，是毛泽东操纵局势演变、并使其党内对手日益虚弱的权力再扩张的重要阶段。这个过程在 1941 年 9 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达到高潮，以毛泽东当面向王明发起挑战，并获得全胜而告结束。

在多年精心准备的基础上，延安整风的大幕终于在 1942 年初拉开。延安整风运动是毛泽东运用其政治优势，彻底改组中共上层机构，重建以毛为绝对主宰的上层权力再分配的过程。同时，延安整风运动又是毛泽东以自己的理念和思想，彻底转换中共的「俄化」气质，将中共改造成为毛泽东的中共的过程。

毛泽东在整风中运用他所创造的思想改造和审干、肃反两种手段，沉重打击了党内存留的五四自由民主思想的影响和对苏俄盲目崇拜的气氛，不仅完成了党的全盘毛泽东化的基础工程，而且还建立起一整套烙有毛泽东鲜明个人印记的中共新传统，其一系列概念与范式相沿成习，在 1949 年后改变了几亿中国人的生活和命运。

经过多年的斗争，毛泽东改变了他原先在中共领导层内孤立的处境，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与刘少奇的政治结合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在刘少奇的全力支持下，毛泽东使中共核心层完全接受了他的主张和他的至高无上的个人权威。造成历史上毛泽东一度「孤立」的原因，是他的有别于莫斯科正统理论之「异端」想法和他个人的专断性格，经过实践证明。毛泽东在军事战略方面的「异端」主张，大大有利于中共实力的扩展，这种结果，迫使中共党内的亲莫斯科派向毛泽东输诚，同时，也将中共高级军事将领重新聚集在自己的周围。毛泽东的专断性格最早暴露于 1930—1931

年由他亲自参与领导的「肃 AB 团」大镇压，此事件曾造成江西红色根据地的严重危机和中共力量的削弱。1935 年后，面对复杂多变的严峻形势，毛泽东暂时收敛了他的专断个性，但是随着毛泽东在中共党内控制力的不断加强，其专断个性在 1941 年后又再度复苏，而此时，中共高层已再无可能对毛泽东的专断行为予以有效的约束。

毛泽东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有意放纵其专断的个性，使之有机地配合于自己的政治目的。在上层，毛泽东以我划线，创造并利用一切机会打击异己；在延安和各根据地，毛泽东策动整肃全党干部的「抢救运动」，放任恐怖政治。由毛泽东植入中共肌体的极左的审干、肃反政策，经过整风运动，演化为党的性格的一部分，对 1949 年后的中国带来长期不良的影响。

延安整风为毛泽东显现其复杂诡奇的政治谋略提供了舞台。毛泽东敢于突破中共历史上的常规，其手法深沉老辣，对其对手心境之揣摩和制敌谋略的运用，均达到出神入化、炉火纯青的地步。毛泽东的谋略既来之于他对中国古代政治术的熟练运用，又源之于他对俄共「格伯乌」手段的深刻体会。在毛泽东的强力驱动下，通过 1945 年中共七大，毛将中共所有权力都集中于自己手中。毛泽东的公共关系形象在整风前后也得到充分展现，伴随日益升温的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气氛，毛泽东有意识地在全党和国人面前显现自己的领袖姿态。在公众场合和他与各方人士的会晤中，毛泽东常常扮演礼贤下士、虚怀若谷的「明主」角色，接人待物诚恳、得体，从而赢得中共广大党员和国统区社会各界人士对他个人的普遍好感。但在党内高层，毛泽东放纵其刚愎自负、桀傲不驯的个性，对昔日政敌睚眦必报，对党内同僚峭刻嘲讽，由于毛泽东随时调换他的两副面孔，致使外界对他长期缺乏深切的了解。

发生在 1942—1945 年的延安整风运动，虽然已经过去五十多年，但是在传统意识形态术语的演绎下，其全貌至今尚混沌不明。本书的目的，并不在于对主流话语系统中有关整风运动的论断展开辩驳，而是试图通过对远近各种有关延安整风运动史料的辨析和梳理。对延安整风运动进行新的研究，拂去历史的尘埃，将延安整风运动的真貌显现出来，在官修的历史之外，提供另一种历史叙述和解释，斯是吾愿，是否达到这个目标。还有待读者评判吧！

附录二：有关本书的书评

拒绝残酷的美丽

——评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来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

萧功秦：（上海师大历史系教授）

假如有谁要我用简单的一句话来概括这本书的价值，我会说："你如果要知道什么是二十世纪中国浪漫革命中残酷的美丽，那你只要读一下高华这本书就可以了。"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高华这本史学专著是一部凝聚着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对自己生活于其中的时代进行理性反思与心灵体验的传世之作。它深刻地揭示了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并通过这一揭示回答了一系列发人深思的问题。

本世纪二十年代进入中国的布尔什维克革命，一开始具有苏俄式的罗曼蒂克政治色彩。在经历一场延安整风洗礼之后，中国革命从一个罗曼蒂克的翩翩少年变成更严酷、更冷峻的成年人、他既浪漫又务实，既具有诗人的抒情性格，又具有斯巴达式的坚韧，既充满中国式的大同理想，同时又略带传统农民的偏执气质。从此以后，中国文化发生了一次划时代的转变。在争取新世界的过程中，中国人的政治价值、中国人的思想、生存态度、情感表达方式、思维方式乃至审美情趣，凡此种种可以统称之为文化或民性的东西，均逐渐地、然而却是决定性地发生巨变，如同九曲黄河大转弯一样，这个拐角处，这个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风陵渡"，就是延安整风运动。延安整风是中共发展史上的一个关键性的事件，用高书的话来说，这一政治运动"奠定了中共的全盘毛泽东化的基础"，经由这一整风运动而形成的中共的基本理念，政治和思想斗争的基本范式，对中共革命胜利起了重大作用。1949年后，中共又把这套模式施之于全国，深刻的改变了国人的命运。

然而，这样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政治运动，国内外的研究却相当薄弱。官方几十年来，构筑了对延安整风意识形态的解释话语。对历史真貌大大简化并予以重构，从而与史实有了相当距离。就笔者所知，虽然1980年代以来，就有戴晴、陈永发、杨奎松等人对延安整风历史作了若干局部的研究。然而，完全可以说，高著是迄今为止，在这一研究领域最全面系统并独具

匠心的煌煌大作。

高华所研究的，就是在这个决定中国命运与历史选择的时代，中国共产党的“脱布化”的历史过程。更具体地说，这是一部史诗之作，它述说的正是这样一个从西方工业社会中孕育出来的，作为西方文化异端的革命主义，是如何在中国本土化的，这种革命主义是如何摆脱了布尔什维克文化模式的影响，从而具有了中国坚实的农民革命的特色的。如此宏大的历史问题，这部著作却是娓娓道来，入情入理，如同一个饱经风霜的说故事人，以沉稳的而克制的语调向我们述说着，以历史事实的强烈的自然的逻辑，而不是以空泛的西式的价值理念或什么理论框架。

研究这一重大历史课题，最困难的方面之一是史料问题，众所周知，延安整风涉及许多可以理解的禁忌，有关档案开放极其有限，整风领导机构中央社会部、中央组织部的档案基本未开放。当年政治局和书记处会议记录更无从查阅。所幸的是，近二十年，官方也少量披露了一些档案资料。高华则以其特有的敏锐，充分利用这些资料，甚至可以说，作者几乎穷尽了一切可以查找到的资料。此书所附的三十多页的参考文献就可看出他在史料收集方面的努力。据我所知，为了对极为分散的史料进行收集，作者花了整整十年的工夫。

最为难得的是，高著所用资料几乎都是公开出版，作者能够从大量的不被注意的资料中爬梳鉴别，点滴归拢，并发掘其新意。书中的解释都是建立在严实的资料的基础上。高对史料的真伪也作了大量的考辨工作。高著据事言理，而非凭空想象，对自己所作的论断，他还采用不同的资料加以佐证。可以这么说，经由作者整整十年的如此洗磨，未来公布的档案资料，可能只会进一步证实或补充该书的论断，而难以推翻其整体观点。我深为钦佩的是作者在字里行间所显示出来的极高史学悟性与对史料的独到的穿透力。作者善于捕捉历史进程中的关键性细节，字里行间都能反映出当年氛围，使人们阅读此书时似乎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例如那位当年在延安街头身穿皮夹克溜狗的康生形象，我至今还挥之不去。

本书的作者多次对笔者谈到他治学的风格与原则，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反对过度解释”，在作者看来，治史者对史料固然需要作一定的解释，但国内外历史学中，却存在着在史料并不充分的条件下，以理论解释来填充史料的不足，这种方便做法实际上是阉割了历史学本身。本书正是作者运用这种以事实说话的方式来挑战解释主义的历史学的成功尝试。三年以前，一位研究当代中国史学思潮的学者就把高华的系列论文称之为“新实证主义史学”案例。此说得是否在理，高华是否是史学新方法的探索者，读者

诸君在读完此书后会有自己的体会与判断。

就我所知，不少读过这本书的人都对这本书予以相当高的、甚至是极高的评价。当然，一部深刻的历史著作，必然是具有多义性的，并为不同的读者从不同角度解读提供了充分空间。这是历史本身的具体性与丰富性相结合而形成的。可以预料，读完本书以后，可能会有一些读者以为，这本书对延安整风的考察，对毛泽东本人的研究，会引出要批判或否定共产革命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的观点。

然而，根据我个人的看法，与其说这部著作是要否定中国革命，不如说，是在客观地考察的过程中有意无意中发现了中国革命中的极左思潮的根源。事实上，读者可以惊异地发现，文化革命中那些斗争方式，思想风格与人们的行为态度，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早已经被康生等人驾轻就熟地运用了。

从作者后记中可以看出，作者无疑是支持和拥护中国共产党在这痛定思痛之后进行的二十年的改革开放路线的，就二十世纪中国史而言，作者也充分肯定了中国共产革命运动的重大的正面价值。这可以从作者在后记中自述其对共产革命的深刻同情中看到，在作者看来，基于反抗社会压迫的一切革命都有其历史合理性，然而，另一方面，作者似乎又对革命的悲剧性一面持有强烈的人道主义情怀。正因为如此，本书隐隐透露出作者的某种思想矛盾。正如人类历史上一切复杂而深刻的事件一样，延安整风运动也充满了矛盾的一面，无宁说，作者的思想矛盾正是历史事件本身的内在矛盾的一种映射。

在我个人看来，这本书如果对于延安对于青年人的理想主义的吸引力，能再予以更充分的展示，那么，本书就会更全面一些，并使人们更清楚地理解，为什么那么多优秀的青年人，会以如此强烈的激情，如精卫填海与灯蛾扑火一样，投入到这样一场革命中去。革命有其残酷的一面，但毕竟是美丽的。

二十世纪是理想主义的世纪，是乌托邦主义焕发出无穷魅力与光环的世纪，也是革命以谁也不知道的逻辑来试图改造人性的世纪，是"建构理性主义"给予人们以新生活的意义，同时又摧毁着人们的诗情梦幻与追求的世纪。而高华这部著作在新世纪诞生的这一年得以出版，可以说是对那场逝去了的伟大革命的沉痛的纪念，是对未来人们内心涌动的革命冲动的一种预先的警示，也是新一代的人们，面对这个美丽的反复无常的革命女神的无言的沉思。

走笔至此，笔者想到，前些日子，《切格瓦拉》又在北京火红起来，由

此可见，当人们在世俗化过程中怀念起左派革命的诗情时，千万不要忘记左派革命的本质就是那种“登仙般的飞扬感”中的残酷的美丽。

理想是怎样失去的——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来的》

陈彦：（法国巴黎大学历史学博士）

由高华撰写、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一书，无疑是近年来中国思想界、史学界对中国近代历史尤其是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史反思的一项引起关注的重要成果。此书的标题就点出该书主旨在于回答中国革命的领袖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是如何在中国首先是中国共产党的内获得认可和确立的这样一个关乎中国历史命运的全局性问题。正如该书封底的提要所指出的：「延安整风运动是深刻影响二十世纪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历史事件，这是由毛泽东亲自领导的中共党内第一次大规模政治运动，也是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的滥觞。」

如果说，在读高华此书之前，许多学者已经指出过延安整风作为运动模式对中共的重要影响的话，那么读罢高华此书，读者可以得出结论：延安整风对于中共不仅重要，它实则是中共历史的决定性的转折点。没有延安整风就不会有毛主义的中共，甚至很可能不会有中共的建国。延安整风不仅将中共锻造成为一个统一号令、统一纪律、统一思想的铁的团体，也为中共建国提供了一整套统治方式和动员程序。从中共建国以后多如牛毛的各色政治运动来看，没有这套方式和程序，就不会有中共的执政甚而中共的生存。因之，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不了解延安整风，就不可以真正了解中共的政治运动；不对延安整风作出深入剖析和翔实研究，就无法理解中共政治运动的机制和规律；而不理解中共政治运动，也就无法理解中共的历史、中共的性质。

高华此书分上下两编共十五章：上编探寻整风运动的起源，下编研究整风运动的进程。整风运动发端于 1942 年，但其根源却可追溯至 1927 年始的中共在江西创立根据地的苏维埃运动。前五章是疏理整风运动的「史前史」，将研究的触角一直伸向中共的创始时期。通过对整风运动的「寻根」，读者可以发现，在中共运作的初期就已经隐含着对自己同志残酷斗争的传统。这一传统自然同中共初期的险恶环境相联系，但根源仍然是共产主义

的阶级斗争理论。

高华以十章的篇幅论述了延安整风的全过程。整风运动开始于 1942 年 2 月到 1945 年 4 月中共七大召开，历时三年之多，经历了整风、审干、肃反三个互相衔接又层层推进的阶段。延安整风是中共历史上的重大政治事件，但长期以来由于政治原因，史料缺乏，中共官方党史不仅千篇一律颂扬整风运动的伟大功绩和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而且对整风中的一些重大史实也隐而不报，如将整风后期残酷打击革命同志的长达半年之久的「抢救」运动，说成是整风的插曲并将责任推到康生身上。80 年代以来，一部分文献资料得以出版，尤其是随着大批中共冤案的平反，数量可观、较为真实的个人回忆录得以问世，才使得延安整风的真相有可能重现于世。高华新著是迄今为止资料最为详尽的关于延安整风的著述，作者用了十多年的时间来收集、考辨各种残缺不全的档案材料和零散的个人回忆，他的每一重要论据都有来源引证。用高华本书前言中的话说，此书旨在「拂去历史的尘埃，将延安整风运动的真貌显现出来，在官修的历史之外，提供另一种历史叙述和解释」。这种严肃、实证的学风为此书奠定了信史的基础，「是目前海内外唯一一本全面研究延安整风运动的历史著作」。

仅仅将延安整风的历史清疏整理，已经是一项巨大的学术成就，但高华此著的意义又远在一部实证史学著作之上。因为此书企图寻找事件与事件之间的因果转换，个人行为与时代大势之间的交叉互动，思想体系、意识形态与政治斗争、权势更迭之间的有机联系。通过对整风运动的溯源，对毛泽东审时度势，在理论、韬略、权谋之间纵横捭阖的高度理性策划的内在机理的疏理，对共产国际与中共领导层的微妙关系的分析，作者揭示了以中共领导的中国共产主义革命之所以走上以大规模群众运动作为夺取政权、保持政权的基本手段的深刻的国际根源和中国本土文化根源，也提出了一些发人深思的独到观点。

此书虽然是一部严肃的史学专著，但却具相当的可读性。仅以人物为例，作者善于通过特定的事例，以简练的笔法勾画出历史人物的鲜明个性。项英的刚直不阿，周恩来的忍让练达，任弼时的圆通持重，王明的书生幼稚，张闻天的正直谦让，康生的奸滑阴毒，彭德怀的耿直豁达等等，一代共产党先驱人物形象跃然纸上。毛泽东自然是此书的中心，高华笔下的毛泽东老辣跋扈、纵横捭阖、收放自如，具有鲜明的个性。他相信权力，相信自己的理想，自己的力量。与毛相比，王明虽然是斯大林的学生，他学而且信；毛泽东也学斯大林，但学而不信。信的最终斗不过不信的，这是毛泽东留给中国的遗产。

以下是笔者读完高华此书后的几点较深的感想。

一、毛泽东思想是战争与落后的产物

延安整风是中共决定性的历史转折。这一转折意味着中共的「脱布化」，中共的民族化。这一转变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从思想上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中国化，是共产主义中国形态的确立，是舶来主义与中国土壤的有机结合，中国式的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成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从组织上，是中国共产党的毛泽东化，中共脱出由斯大林掌控的共产国际的指挥，获得相对独立地位。中共七大正式提出毛泽东思想，一方面意味着毛泽东的一系列思想、语汇、战略、策略等成为中共的指导思想 and 行动方针，另一方面意味着毛泽东本人成为中共至高无上的领袖和导师。毛的成功是近代中国时势造成的。毛在中共内部权力斗争中最终占了上风，除了他本人的天赋、谋略、意志等因素外，最重要的因素应该归功于中国的战乱和落后。没有长期的战乱，毛就不可能利用其军事才能压倒众多的知识份子出身的中共前领袖；没有落后的农民国的现实，毛就不可能轻而易举地将其融合中国传统和斯大林极权主义的专制主义强加于 40 年代初仍然充满理想色彩的中国共产党。

高华此书对这一点有充分的展现。如，延安高干供应制的建立，对中共党内知识份子出身的人的打击以及对农民出身的军人干部的迎合，表明毛自觉地利用农民的情感控制军队而将中共的军队改造成一支具有农民起义色彩的红军。正如王实味指出，「食分五等，衣着三色」的等级差序制度。实际就是将「论功行赏」的农民造反原则制度化。同这种根深柢固的农民意识相一致，毛泽东对知识、知识份子（尤其是西方知识、留苏派知识份子）、党内「教条主义」份子切齿痛恨。他曾指斥留苏派为「连猪都不如的蠢货」，批评他们「言必称希腊」，指斥知识「教条」「比屎还没有用」。毛本人在延安曾下功夫读马列的书，即使是如此，他读得最通的书，也就是最合其意的书，是那本由斯大林亲自修订的《联共（布）党史》。原因无他，此书为毛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党内斗争的指南。

二、对五四精神的背弃

如果说毛泽东思想的胜利实际上是共产主义舶来意识形态与中国专制传统的双重胜利的话，那么这个胜利就不仅仅意味着「留苏教条派」的出

局，同时更意味着五四精神的失败。延安精神的确立，正是五四精神被淘汰的产物。高华此书在这一点上有着十分深刻的洞见。作者明确将「全力肃清五四自由：民主、个性解放思想在党内知识份子中的影响，确立『领袖至上』、『集体至上』、『个人渺小』的新观念」（页 304）作为毛泽东思想革命四原则中的第二条。高华对王实味个案作了详尽分析。王实味虽然接受马列主义投奔延安，但他为纯真理想所驱使，思想深处仍受五四民主、科学所激励。他正是以平等、博爱为参照来批评延安的等级制度，并且直接溯源到等级制的专制主义传统，这正是五四精神的强烈闪光。而王实味最后被砍头，是整风运动因言获罪的死囚，成为毛泽东思想确立的祭品。只要王实味所代表的反叛、批判、自由、独立的五四精神还在，就不可能有毛泽东意识形态的一统天下，就不可能有毛泽东个人独裁的党天下。这一认识不仅是对延安整风性质所作出的准确结论，而且应该成为我们今天反思中国近现代史的一个新起点。

三、知识份子的「原罪」

以意识形态作为巩固和强化个人权力的手段并非毛泽东的发明，但将意识形态教化推广至全党每一个干部党员，以大规模的群众动员的方式，要求「人人过关」、个个检讨而达至革面洗心、重作「新人」的目的，应该说是毛泽东对斯大林「大清洗」的创造性发展。

延安整风虽然是以中共全党为对象的，但由于意识形态是其主要武器，因而党内知识份子首当其冲。同时由于毛泽东发动整风的首要政治目标是彻底摧毁王明、张闻天等留苏派的所谓教条主义的影响，因而知识尤其是书本知识便顺理成章地成为批判对象。从这里开始，毛泽东找到了一个屡试不爽的发动意识形态教化运动的操纵杆。这个操纵杆可以概括为某种可以同基督教「原罪」相类比的「知识原罪」概念。可以说，延安整风之后，任何知识，尤其是同人文、社会相关的知识，只要未经过毛泽东意识形态的过滤，就是罪孽，就需要被批判，而掌握这种知识知识份子就应该接受改造，就需要赎罪。同基督教一样，赎罪需要经过一定的仪式，而大规模的群众斗争式的「灵魂革命」就是赎买「知识原罪」的中国仪式。从今以后，不经过这一仪式，就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共产党人。

高华在本书中对知识份子改造运动个案和细节作出生动的描述，充分揭示出这种类宗教「炼狱」仪式的功能及其心理依据。高华指出「随着『发掘本心』的逐步深入，学习者普遍产生了负罪意识（原罪意识——本文作

者按)，知识份子党员更自惭形秽，认为自己确实如毛泽东所言，除了读过一些如同『狗屎』般无用的书之外，对共产党和人民毫无价值，……简直是罪孽深重！」（页 424）从此，「知识原罪」便成为套在中国知识份子头上的紧箍咒。

高华强调延安整风中的中国内圣之学的痕迹，但笔者则更倾向于毛泽东的延安整风的模式借鉴主要来源于苏联。中国儒学的「吾日三省吾身」是一种「慎独」功夫，同基督教的个体忏悔有相通之处，但却不是将个人隐私（家丑）张扬于大庭广众。将这种「涤荡灵魂」的公共忏悔仪式推广至全党范围，表明毛泽东深得斯大林真传。高华以翔实的材料和充分的分析令人信服地展示了整风运动的结果：一方面是毛泽东个人独裁和毛泽东思想独尊在全党范围的确立，另一方面则是党内知识份子包括党内高级干部在内的其他个体的个人尊严、独立全部荡涤一尽，成为革命机器中没有自我意识的「齿轮与螺丝钉」。高华以丁玲为例来说明这一现象也是十分典型的。不过读完此书，掩卷之时，联系到中共建国以后的现实，读者也许会问：当年受到残酷斗争、非人打击的受害者，为甚么对延安整风尤其是整风后期的「抢救」运动三缄其口？当初被整的人何以在今后的运动中又对其他人大打出手，成为残酷的整人者？对于这些问题，结合东欧苏联与中国历次运动的实践，答案是肯定的：被整者同时也是既得利益者，因为只要他们挺过这一关，他们仍然可以在这个机器中占有一席之地。

四、制度与独裁

高华在本书第六章中用了不少篇幅来描述 40 年代初延安的社会生态构成。很显然，当时的延安不仅是一个高度组织化的社会，而且也是一个意识形态化的社会，一个以共产主义作为信仰与行动指南的极权主义的小社会。不过，这是一个初始的极权主义社会，是一个具有真诚信仰、富有朝气的极权社会。王实味、丁玲、萧军等具有自由化倾向的知识份子及更多的向往平等、自由的知识青年大量来到延安，使得延安充满了热情浪漫的气息。可以设想，如果没有延安整风这样的革命洗礼，没有严格的纪律和强有力的领导权威，延安这个小社会可能仅仅是偶尔汇聚的浮云，而难以成为中共今后夺取全中国的革命中坚。

延安整风其实包含着共产主义极权的一个根本趋向。一方面，延安整风是中共由草创走向成熟，是意识形态由思想变为制度，是马列主义由理

论教条变为实践纲领定型阶段；另一方面，延安整风也是毛泽东个人专断的确立，是理想主义让位于政治权谋，是乌托邦走向强制的决定性转折。中共本来没有建立一套有效保证集体决策的制度化机制，延安整风则使个人独裁制度化了。延安整风前的毛泽东虽然同中共中央的关系存在一定的冲突与紧张，但他却必须利用制度规定对付他的政敌，直到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他才可以甩开制度的束缚。延安整风所建立的制度是一个助长专断的制度，自延安整风始，政治运动将成为共产党的传统，成为推动革命向更高阶段发展的制度手段。然而，正是这种「七八年再来一次」的运动，使得毛泽东可以甩开一切制度规定和集体决策框架而另起炉灶。高华对延安整风中中央总学委的论述很具启发意义。由于运动的特殊要求，临时组织就可以压倒常设组织，凌驾于党的法定最高决策机构之上，于是临时制度就可以抛开正规制度，而最终使个人专断成为制度。延安总学委的核心是毛泽东与康生，而实际上由毛泽东一人支配。文革时期的中央文革小组，正是这种以临时机构取代正式机构的做法的重演。

五、功利原则与人道原则

在共产革命中，功利主义往往是重要的行动原则。长期的战乱，帝国主义的侵略，使得中华民族难于从长远思考。尽快获得独立、摆脱落后，使得功利主义成为时代的要求。从功利出发，毛泽东就可以以大局的原则、胜利的原则否决其他的原则，甚至将争取胜利的原则变成压倒一切的原则。高华在此书中详尽地展现了任弼时、周恩来、张闻天等人在同毛泽东发生分歧时所表现出来的忍让妥协精神。在相当多的时候，这种妥协都是以党的利益、大局为重名义作出的。在那种艰苦转战的年代，为达目的，没有妥协是不可想像的。以全局利益、集体利益、人民利益为由，要求个人服从集体，小我服从大我，是理性的一部分。然而，小的妥协导致大的妥协，个体的妥协为个人独裁打开了大门。当毛泽东个人独裁的红太阳升起之时，就是美丽的乌托邦革命理想终结之时。高华此书似有强调毛泽东本人在延安整风惨案中的个人责任的倾向，但这个制度本身没有制约机制似乎是更为根本的原因。不仅延安整风之后党内冤案错案如影随形最终无法避免，而且按高华在本书中的勾勒，1931年邓发在闽西的肃反扩大化，张国焘、夏曦在鄂豫皖的肃反扩大化都可以佐证：残杀和打击同党是攫取和巩固权力的必要和有效手段。不仅如此，这种马基雅维里式的功利主义的权力崇拜还在阶级斗争的理论中获得了科学与道德的论证。

最后，在笔者看来，本书也有某些可完善之处，如对延安时期的大背景交代较少。在当时的战争状况下，毛泽东之所以专横跋扈、置同志于死地，除了他的权谋暴烈之外，应该还有当时中国革命节节成功的大背景，这一背景是毛泽东整风成功的不可或缺的条件。这一条件使得毛更可以同当年的列宁相比，而不是斯大林纯然的屠杀政敌。不过，建国之后的毛泽东则渐渐向斯大林的路上滑行，以加强自己的权势来掩盖自己执政的错误，而不是利用革命实践的成功来巩固自己的权势。

另外一点需要指出的是，本书作者对延安整风惊心动魄的描述，读者可以从中得出的逻辑结论是：中共这架机器从整风开始就已经是以夺取政权作为目的的，意识形态仅仅是夺取政权的工具。不过，高华自己却没有完全走向这个方向，发人深思。笔者以为，共产主义革命作为中国近一个世纪的革命历程，自有其深刻的历史与社会的原因，甚至也应该对此给予充分的同情理解。然而，这种同情理解的目的，是加深对中国共产革命的理性认识，坚决地、义无反顾地告别它。

中共党史研究新话语系统的兴起——突破意识形态框架的民间话语系统 评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

一言（南京）

长期以来，中共党史研究领域，一直由两种主流解释话语居统治地位。在大陆，主流史学家精心建构了一套带有鲜明意识形态色彩的官方解释话语。这套解释话语不仅成功地同化了学者们的研究基调和研究结论，使大陆的中共党史研究长期呈现出单一化的特征，而且它还为学者设置了重重的研究壁垒，严重地禁锢了这一领域的研究深度和广度。在西方，中共党史研究也是中国问题专家的注目焦点之一。但由于他们缺乏在革命中国的生活体验，因此他们的研究方法多以理论分析为主，形成了一种西方解释话语。这种话语的特点是以西方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理论为框架，再辅以常见的史实为佐证，论证偏理论分析而少史实考辨。虽然此种话语在研究方法上多具新颖性，但不免给人以“隔靴搔痒”之感。千禧年之初，南京大学高华教授新著《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问世，全书凡六十万字，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以延安整风运

动为研究主题，利用极为丰富的史料，对 1945 年前的中共发展史作了细致深入的分析。通观全书，得出的一个突出印象是，该书标志着在中共党史研究领域，一个独立的民间话语解释系统的兴起。

作为独立于两种主流解释话语之外的第三种解释系统，这种民间话语集中地体现了中国新一代公共知识分子的诉求，他们强调在中共党史研究中采取客观中立的立场，以对历史的宏观把握为前提，对史料进行广泛的搜集和细心的考辨，以求揭示历史真实，而避免由意识形态而产生的有意或无意的“历史误读”。下面分析此种民间话语的特点：

1) 在《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书中，作者始终秉持据事言理的治学态度，尽量避免主观因素对叙述客观性的影响。例如，作者详细地分析了 30 年代毛泽东主持的“肃 AB 团”运动，考证过程极为仔细，所引史料的来源可信度也极高，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尤为可贵的是，作者在分析毛肃反的原因时，并未象西方话语一样对毛进行猛烈的道德谴责，也未象官方话语一样为毛掩过饰非，而是从当时中共的具体情况出发，对毛的动机作了客观，全面而又可信的解释。这样的例子散见于书中的各个部分，既有强大的说服力，又能使读者有一种真实的设身处地的感觉。作为民间话语的突出特点，这种风格既承接了中国古代史学“秉笔直书”的传统，又凸显了西方史学“客观真实”的神韵。

2) 全书所引证的各类资料极为丰富，体现了作者扎实的史料考辨能力。在中共党史研究中，原始档案公布不多，而大量的二手资料如回忆录等却泥沙渗杂，这给学者的研究造成极大的困难。两种主流解释话语在史料的运用上，有某种相似性，这就是在不同程度上都倾向于根据各自的观点对史料进行取舍，从而影响了可信性和说服力。在高华的书中，所引史料几乎全为公开出版物，但经过作者爬梳鉴别及对不同史料的印证对照，这些常见资料背后的隐蔽意义随之就呈现在读者的面前。该书对 1945 年前的中共发展史作了全面考察，既有微观的考证，又不乏宏观的把握。例如在对延安整风的分析中，作者对中央社会部结构和功能进行了重点分析，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证明了它在延安整风中所起的巨大作用，这在该领域的研究中尚属首次。再如：作者对延安整风中采取的各种审查干部的组织措施也进行了详细考证，如首次对干部个人档案制度的建立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像这样的“首次”在书中也是比比皆是。

3) 作者并未采用一种或多种现成的理论作为该书的论述框架，而是以辨明史实为主要目的，这不仅为检验原有理论的有效性提供了客观标准，也为新理论框架的出现提供了巨大的支持。例如：作者对中共的组织史作

了十分细致的考察，理清了各系统与各部门之间错综复杂的微妙关系，这样的研究方法与西方学者运用“政治系统理论”来考察中共政治的研究方法形成了明显的区别，并具有更强的说服力。勿庸置疑，史实的辨明为学者提供了提炼新理论框架的良机，这种新的理论框架将以缜密的事实为依据，可有效地防止中共党史研究陷入“理论先行”的泥沼。从这一点来说，高华的这部著作是对有关中共党史研究方法论的突破。

作者毕十年之力，成一家之言，其成书风格深刻地反映出作者对中共党史的深邃造诣和敏锐眼光。高华教授在本书付印之前，已在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上发表有关 1949 年后中共研究的论文多篇，引起学术界的重视。笔者希望高华教授继这部力作后，还会有新的论著问世，特别是希望看到作者能在 1949 年后的中共党史研究中有新的收获。

为什么中国会出个毛泽东？

By taosl

为什么“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作者:郭罗基/按：德国第二电视台正在制作一部人物传记片《毛泽东》，德国笔会主席团成员史明先生应邀为顾问兼编导。本文是根据与史明先生的谈话内容以及录像采访整理、扩充而成。

怎样认识毛泽东，可能是几个世纪的课题。

《东方红》的歌词中说：“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是人民大救星”。当时的中国，人民苦难深重，盼望“大救星”。人们没有想到，“大救星”也可以成为“大灾星”。认识毛泽东就是要从根本上研究为什么“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我们不妨作一种设想，假如毛泽东和尼克松互换一下位置，毛泽东到美国当总统，尼克松到中国当“伟大领袖”，结果会怎样呢？在美国当总统的毛泽东，免不了也会像尼克松一样，黯然下台。而在中国当“伟大领袖”的尼克松，不必搞什么水门事件了，可以放手地搞他的天安门事件，那必定又是另一个毛泽东。毛泽东之所以成为毛泽东，并不完全决定于他个人的因素。如果仅仅以性格、心理、道德情操等等解释历史人物，并不能说明为什么“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毛泽东只能出在中国；中国必然出毛泽东。

毛泽东的同时代人以及他身后的两三代人，有些人是他的受益者，有些人是他的受害者，两者都很难平静地谈论毛泽东。一边是毛泽东热，一边是非毛运动。有些人把一切功劳归于毛泽东，有些人把一切罪错归于毛泽东，褒贬两极同样都是夸大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只有在将来，毛泽东和他的受益者、受害者都进入了历史，在那个时候，也许毛泽东才能得到恰当的评价。但就在现在，无论是他的受益者还是受害者，无论是颂扬他的功劳还是谴责他的罪错，都有必要讲出自己所认可的毛泽东。这些对毛泽东的评价，同样也将为后人所评价。已有的关于毛泽东的著作和影视不计其数，它们的价值很不相同。希望德国人比中国人的态度客观，由你们制作的《毛泽东》人物传记片，能够成为传之久远的文献。

认识毛泽东主要是根据千百万人的亲身体验和人所共知的历史事实，不是探寻“不为人所知的故事”。编写“不为人所知的故事”所从何来？既然不为人所知，作者如何得知？事实上，“不为人所知的故事”的材料，都是别人已知的，只是作者自己先前不知。如果老老实实在题为“不为作者所知的故事”，那就失去了卖点。故标榜“不为人所知的故事”，只是满足人们猎奇的爱好，无非是追求商业价值而已。

一、毛泽东在中国扮演了什么角色？

如今，我们还生活在毛泽东的巨大的阴影之中，需要在现实生活中清除他的消极影响。

清算他身后的直接的有害遗产，与评定他的一生，两者虽然相关，并不完全等同。对历史人物的评价需要全面的、系统的分析。

毛泽东自己坦率地说：他是“马克思加秦始皇”。这种说法倒是很形象。认识毛泽东就从这里开始。

毛泽东自称为“马克思加秦始皇”是进了北京坐在中南海的宫殿里的说法，当年住在井冈山的茅棚里、蹲在延安的窑洞里就不会这样说了，应当说是“马克思加陈胜、吴广”。他不是说嘛：“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这就是陈胜、吴广的马克思主义。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包含了“造反有理”，但不能归结为“造反有理”。因为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造反有理”，造反成功，马克思主义就没有剩下什么了。马克思是近代被压迫阶级的代表，陈胜、吴广是古代被压迫阶级的代表，虽然时代不同，在一定程度上总还有某些共同点，勉强可以结合。秦始皇是压迫阶级的代表，与被压迫阶级的代表马克思怎么能结合？准确地说，“马克思加秦始皇”只能是“披上马克思的外衣的秦始皇”。为

什么不说是“披上秦始皇的外衣的马克思”？因为在二十世纪，马克思根本不需要秦始皇的外衣，而秦始皇却需要马克思的外衣。

所以，历史上有两个毛泽东：前一个毛泽东，在发动革命夺取政权的时期是“马克思加陈胜、吴广”；后一个毛泽东，在革命成功运用政权的时期是“披上马克思的外衣的秦始皇”。有人只看到后一个毛泽东，认为他从来就是专制魔王。这不符合事实，前一个宣扬“造反有理”的毛泽东是反对专制魔王的。有人只看到前一个毛泽东，又认为他是革命元勋，无论他后来有多少罪错，总是功大于过等等。在他的身后，遗害犹在，如何体认功大于过？总之，仅仅用一把尺子来衡量毛泽东难以周延。毛泽东矛盾的一生，前后扮演了两个不同的角色，一个反对另一个，一个否定另一个。

中国领导人谈论对毛泽东的评价，总是说三七开，七分功三分过。这是一种不科学的评价方法。有人又提出两个三七开：夺取政权时期是七分功三分过，运用政权时期是三分功七分过。除了不准确的量化比例以外，对前后毛泽东作出不同的评价，还是符合实际的。

认识毛泽东现象，必须把它放在历史的框架中来研究。史明先生，你提出的有关毛泽东的种种问题是经过深入思考的，但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放在一个平面上来考察，还要进行纵向的分析。

比如，你提到毛泽东与群众运动的关系问题。掌控群众运动是他的拿手好戏，群众路线被称作毛泽东思想的三个基本方面之一。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作用 and 意义是不同的。对于前一个毛泽东来说，群众运动是发动下层对抗上层的运动，是发动被压迫者对抗压迫者的运动；对于后一个毛泽东来说，群众运动是从权力中心发出指令运动群众，结果就成了整人运动。两个毛泽东的两种作为，从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变成自上而下的运动群众。基本关系颠倒了，运动的内容也发生了变化。前一个毛泽东的群众运动强调三个要点：第一，一切从群众的利益出发。以满足群众的切身利益来吸引人们跟着共产党走；第二，一切为了群众，仅仅是主观上为了群众还不行；所以第三，要强调一切对群众负责，必须注重客观效果，好心办了坏事也不行。后一个毛泽东的运动群众，与此相反：第一，不是从群众的利益出发，而是从政治的需要出发；第二，不是为了群众，而是为了上级。每次运动都下达指标，以完成上级的指标为任务；第三，最终当然也不会对群众负责，运用政权运动群众，每次都伤害了群众，而且没有一次不死人的。

再举一例。你还提到“洗脑”。西方人叫“洗脑”，毛泽东、共产党叫做思想政治工作。洗脑是否成功，不是取决于洗脑者，而是在于被洗脑者

是否接受；出于自愿，才能接受；符合切身利益，才能自愿。在夺取政权时期，为了团结奋斗，总是从工作对象的切身利益出发，进行思想启蒙，提高阶级觉悟。最突出的是对国民党的俘虏兵的教育。往往在战场上就地召开诉苦大会，诉阶级苦，诉当兵苦。国民党的兵都出身于穷苦人家，是被抓壮丁抓来的，在军队里又受长官的打骂。经过诉苦，认识到为何受苦？为谁当兵？马上掉转枪口去打国民党，甚至制服都没有换，只是摘掉了帽徽。打过长江以后，在新解放区没有搞过参军运动，兵源都是来自俘虏兵。把枪交给原来的敌人，多么危险，战争史上从未有过。而且，当国民党的兵常常打败仗，当共产党的兵就不断打胜仗。你说，是不是神奇的“洗脑”？运用政权的“洗脑”，即改造思想、统一思想，就大不相同了。共产党自以为垄断了真理，强行思想灌输，钳制舆论。所谓“统一思想”，就是精神上的强制。内心实在不服怎么办？只能虚假表态，阳奉阴违。所以运用政权的力量统一思想，实际上是强迫的说谎机制。

为什么会出现两个毛泽东？因为毛泽东的身上体现了两条历史线索的相交。一条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一条是中国的传统在近代的演变，在这两条历史线索的相交点上，同一个人，在夺取政权和运用政权的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就扮演了两个不同的角色。

二、马克思主义分裂为两种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怎样来到中国遇上了秦始皇？马克思主义在传播中发生了问题。

马克思生活在十九世纪的西欧。他的学说——马克思主义反映了十九世纪的时代精神，它包含两个方面：革命精神和人道精神。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马克思主义传遍了全世界。在人类历史上，除了宗教，还没有一种理性的思潮产生过如此广泛的影响。

十九世纪，即使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还是一个需要革命的时代，一八四八年、一八七一年的欧洲都发生了革命。马克思不能不面向自己时代的迫切需要，由研究革命而形成革命的理论，指导革命的运动。但革命不是目的，马克思的终极关怀是人的自由和人类解放，为此目的而研究社会发展的规律，探索走向人的自由和人类解放的途径，提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并不是马克思的创造，自古以来人们就向往大同世界、千年王国，马克思的贡献是在于以唯物主义历史观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作了论证。在马克思主义中，革命精神是短暂的时代的烙印，而基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人道精神才是长远的超

越时代的人类理性。

二十世纪初，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生了分裂，分裂为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第二国际强调人道和民主，第三国际强调革命和专政；第三国际批评第二国际是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第二国际批评第三国际是极权主义、独断主义。组织上的分裂，同时发生思想上的分裂。马克思主义也分裂了。一种硕大的思想体系在它的继承人那里发生分裂，在历史上是常有的事情。孔子的儒家学说在后来分裂为孟子学派和荀子学派。黑格尔的学说在他身后分裂为老年黑格尔学派和青年黑格尔学派。十九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在二十世纪分裂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和人道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为什么会发生分裂？

马克思主义的分裂，与其他思想体系的分裂一样，都是同一思想体系内在矛盾的外在化。在马克思的学说中，人道的方面和革命的方面没有达到有机的统一。二十世纪，马克思主义朝着不同的方向传播，与不同的历史条件相结合，分裂成为事实。

马克思主义从俄国开始向着不发达国家传播，继承了它的革命精神；马克思主义在发达国家的传播，继承了它的人道精神。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还是在列宁之前由普列哈诺夫提出的，后来为第三国际所坚持。人道的马克思主义则为第二国际所坚持。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不人道，人道的马克思主义不革命。两者虽然各自片面地继承了马克思主义，但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是不同的。因为对现代社会来说，革命越来越不需要了。人道的马克思主义不革命正好符合历史发展的方向。他们所主张的“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曾经被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批判为“修正主义”，如今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是鲜明的现实。西欧、北欧和北美等地区的一些资本主义国家比起所谓的“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的因素更多，社会公平、人民福利的程度更高。西方的反共人士不知道，他们自己所生活的社会比“共产主义国家”更接近共产主义。当代世界所盛行的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就是人道的马克思主义的流变。

对于发达国家来说，革命渐渐成为过去；对于不发达国家来说，革命正在发生或将要发生。马克思主义适应了不发达国家的需要，凸显出革命的精神，成为这些国家发动革命、夺取政权的武器。俄国的“十月革命”成功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即使是片面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还不是原版，而是经俄国人转手的，通常叫做“马克思列宁主义”（简称“马列主义”）。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是列宁主义，两者并不完全相同。把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焊接在一起是斯大

林的手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解释实际上是斯大林主义。所以，将毛泽东的“马克思的外衣”揭开来一看，里面藏着斯大林，“马克思加秦始皇”实际是“斯大林加秦始皇”。

马克思主义分裂以后又发生变形。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在两个主要之点上违反了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只能在资本主义的母体内孕育、脱胎，成熟的资本主义才能诞生社会主义。落后国家的人民在被压迫、受奴役走投无路的境况下，革命是有理由的。但这些国家都没有经过发达的资本主义阶段，马克思主义传入之后却立即发动革命、进入社会主义，而且，越是落后进入社会主义的步伐越快。落后的俄国取得政权之后不过十九年，斯大林宣布“建成”社会主义了；中国比俄国更落后，毛泽东取得政权之后不到七年就进入社会主义了；到了最后一个柬埔寨，虽然比其他国家还要落后，波尔布特取得政权之后的第二天就进入社会主义了。二十世纪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这一分支，以为凭借革命的手段，可以超越资本主义阶段实行社会主义，而且把它说成“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这是不以经济的发展为基础，缺乏相应的政治、文化条件的主观社会主义。主观社会主义就是不以客观的必然性为依据人为地制造出来的社会主义。主观社会主义当然是出于空想，但它与马克思以前的空想社会主义又不同；空想社会主义只是停留在空想，而主观社会主义则是运用政权的力量来强制推行一套空想，于是产生了灾难。搞了几十年的主观社会主义，最终不是崩溃就是变质，回过头来还要补上资本主义这一课。所谓“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被证伪了，原来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更显示出它的真理性。

马克思还认为，社会主义必须在先进国家联合的条件下才能实行。在十九世纪直到二十世纪上半叶，人们还很难相信为了边界纠纷连年打仗的欧洲国家会实行联合。现在马克思的预言越来越清晰了，欧洲国家已联合成为欧盟，在欧盟之内社会主义因素正在不断增长。俄国人以“社会主义在一国首先胜利论”取代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在先进国家同时胜利论”，又认为这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列宁主义。实际上是斯大林强加给列宁的。列宁本人认为，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取得政权在先，但进入社会主义可能是德国在先，因为德国比俄国先进。社会主义在一国首先胜利，以后又一国接一国胜利，虽然一度形成了社会主义阵营，并没有出现国家的联合，相反，发生了控制和反控制的斗争，以至兵戎相见。中国又发展了“社会主义在一国首先胜利”，变成“社会主义在一市首先胜利”。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大会，彭真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我

们的伟大首都北京首先进入社会主义了。“社会主义在一国首先胜利”、“社会主义在一市首先胜利”统统都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

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不人道，它的消极作用与历史的发展成正比。戈尔巴乔夫企图将苏联转向人道的马克思主义，为时已经太晚。

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观社会主义终结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因素正在展示蓬勃的生机。历史证明，马克思确实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不因为有人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就能制造一种社会主义，也不因为有人反对马克思主义就能阻止社会主义，这一切都是不依人们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

三、毛泽东将现代的革命接续中国的传统

再说另一条历史线索——中国的传统。自从秦始皇建立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王朝后，两千多年以来就是王朝专制和农民起义交替的历史。在王朝专制的压迫下，被压迫的农民活不下去了，不得不揭竿而起。从陈胜、吴广反对秦始皇开始，中国的农民起义轰轰烈烈、连绵不断，在世界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起义农民推翻了专制王朝后，又建立起新的专制王朝，或者为建立新的专制王朝创造条件。所以，中国的传统就是农民起义的传统和王朝专制的传统，以及两者之间的转换。

历史一轮又一论地循环。到了近代，传统的农民起义也在寻找新的出路。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借鉴西方的基督教，没有成功。毛泽东领导的农民革命，借鉴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成功了。

五四运动时，各种西方的思潮涌入中国，五花八门的主义，什么都有。先进的中国人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救国救民的理论武器，决不是偶然的，因为马克思主义适应了中国社会变革的需要。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催生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早期模仿西方和俄国，主要是从事工人运动，在上海还发生过三次工人武装起义。但都不成气候。毛泽东比其他共产党领导人高明的地方在于，他看准了中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他认为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就因为没有发动农民。现代的中国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因而他专注于农民运动。是他克服了现代的革命与中国的传统的脱节。一九二七年北伐途中，蒋介石翻脸屠杀共产党人。共产党举行南昌起义，进行反抗。稍后，毛泽东发动“秋收起义”。这是与南昌起义不同的典型的农民起义。“秋收起义”的规模比南昌起义小得多，但它上了井冈山，站稳了脚跟。南昌起义失败后的残部，也来投奔毛泽东。到后来中共中央机关在上海都无法待了，迁往江西。从此中国共产党潜心在农村扎根

几十年，才走向胜利。毛泽东最得意的一个口号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革命实际相结合，实际上不过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分支与中国的农民革命相结合。

现代的革命毕竟与传统的农民起义不同。五四时代，人们已经认识到中国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马克思主义传入以后，人们又向往社会主义。某些共产党领导人提出，等待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完成以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另一些共产党领导人又提出，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毕其功于一役，两步并作一步走。这就是历史上发生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两者使共产党遭受惨重的损失，其实背后都是共产国际的瞎指挥。毛泽东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彻底清算了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解决了在落后国家进行人民革命与实行社会主义的衔接问题。

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旧式的民主主义革命已经过时，故应代之以新式的民主主义革命。民主主义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新就新在由无产阶级来领导，完成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革命。革命胜利后，只能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不能立即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向着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社会主义是新民主主义的前途，新民主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准备。新民主主义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他认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既不是资产阶级专政，也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后来毛泽东明确地提出组织联合政府的主张）。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允许资本主义有广大的发展，以弥补中国经济落后的缺陷。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毛泽东解决了一个大问题。既然落后国家的革命是难以避免的，革命胜利后又不能立即进入社会主义，如何从前者过渡到后者？从社会性质来说，只能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无产阶级又必须去领导。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却不是消灭资本主义，相反，还要发展资本主义。这些，都是马克思没有遇到过的问题。从来都是说无产阶级要埋葬资本主义，毛泽东的理论却说无产阶级在一定的历史阶段还要发展资本主义。新民主主义理论确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补充。可是，后来他抛弃了自己的理论。

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革命，以马克思主义改造了传统的农民起义，有如下几个主要的不同点：

第一，提出了新的社会理想，最低纲领是新民主主义，最高纲领是共

产主义。传统的农民起义的政治诉求不过是改朝换代，从来没有追求一个新社会。新民主主义是具体的，而共产主义则是虚无缥缈的。究竟什么是共产主义？中国的农民也不甚了了。后来出现了“窝窝头共产主义”，连赫鲁晓夫的“土豆烧牛肉”的共产主义都不如。

第二，改革土地制度。传统的农民起义从来没有触动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太平天国提出的“天朝田亩制度”是改革土地制度的初次尝试，但流于空想，从未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革命切实进行了土地改革，将地主所有的土地无偿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

第三，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古代还没有工人阶级。毛泽东和共产党虽然以农民为革命的主力军，还是承认近代的工人阶级是先进阶级，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建立工农联盟。由于中国产业工人的弱小，而革命又长期盘踞在农村，工人阶级的领导也只具有理论意义而已。

第四，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建立革命阶级广泛的统一战线。这就与传统的农民起义单打独斗的格局大不相同了。

第五，建立革命根据地。这一点完全不同于农民起义的流寇主义。也不同于俄国的中心城市起义，而是经长期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

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虽然只是理解了马克思主义的初级真理，以此指导中国的农民革命，使得传统的农民起义别开生面，在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问：有人认为，毛泽东和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主要是号召群众报仇雪恨，于是造成不可控制的暴力血腥。您怎样分析这种看法？）

毛泽东和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革命，既继承了农民起义，又改造了农民起义。传统的农民起义主要是依靠勇敢分子打天下。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改造了农民起义，革命的任务是推翻阶级统治，具体来说，就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为了推翻统治阶级，就需要唤起被统治阶级。中国的农民把革命叫做“翻身运动”。追求被压迫阶级的翻身，就不是向某些具体的人报仇雪恨。但在革命中，暴力血腥的行为是难以避免的。法国大革命的暴力血腥比中国革命严重得多。革命群众狂呼“革命不需要科学家”，把伟大的化学家拉瓦锡也送上了断头台。最后，连革命领袖罗伯斯比尔都丢了性命。

说到报仇雪恨，要问仇恨从何而来？有人认为，仇恨是共产党制造出来的。这不符合事实。第一，人与人之间的仇恨是几千年历史积累下来的。首先是掌权者施行暴力血腥，才引起无权者以暴力血腥进行反抗，你来我往，仇恨越来越加深。在没有仇恨的地方，不可能制造出仇恨来；如果能

制造仇恨，等于制造一部产生仇恨的历史。第二，因果关系不可颠倒。国民党以暴力血腥来对付共产党是因，共产党以暴力血腥反抗国民党是果。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并没有立即进行暴力革命。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事变，共产党才被迫拿起枪。第三，近代中国的暴力革命也不是共产党发明的，而是从孙中山开始的。辛亥革命后，一次又一次的革命，没有一次不实行暴力血腥。在这一点上，不能仅仅责备毛泽东和共产党，应当反省一百多年以来中国社会变革的道路。但毛泽东和共产党应当受责备的是掌握政权之后的镇压反革命。镇压反革命不能说完全没有必要，因为国民党留下的几十万特务还在进行破坏捣乱。一九五零年，上海的杨树浦发电厂被炸毁，顿时陷入一片黑暗。另有一些国民党的官僚和军官并没有触犯现行法律，只因为历史上有罪恶，也遭到镇压。这就是狭隘的报复行为，缺乏马克思主义的解放全人类的胸怀。

四、夺取了政权的陈胜、吴广向秦始皇转化

毛泽东和共产党虽然改造了传统的农民起义，但没有触动一个根本问题，那就是“打江山者坐江山”。一旦“坐江山”，又转而继承另一种传统——王朝专制的传统。毛泽东治国的思想资源，不是来自马克思主义，而是来自帝王之术。他自称《资治通鉴》读了十七遍，读过的二十四史写满了批注。这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九四九年以后几乎没有读过马克思的书。

因为政权不是人民授予的，而是用暴力夺取的，于是视政权为己有。稍为有一点变化，不过以“党天下”代替“家天下”，以“指定接班人”代替“传位皇太子”。“党”是扩大了“家”，还是以天下为私。《共产党宣言》是反对“天然首长”的。所谓“天然首长”就是不经选举、毋需授权、无法监督的官僚。掌了权的中国共产党恰恰又成了“天然首长”。所以现代的农民革命最终没有摆脱传统的农民起义的轮回，历史又走了回头路。从夺取政权来说，革命成功了；从实现理想来说，革命失败了。

取得政权以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开始走向反面，而陈胜、吴广又转化为秦始皇了。两条历史线索出现了新的结合。

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只知道革命，革命成功以后还在寻找革命的敌人。毛泽东提出的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被奉为创造性的理论。“文化大革命”就是继续革命的实践，按林彪的说法“革革过命的人的命”，革命者又成了革命的对象。一场吞噬革命者的极端的革命，导致自身走向反革命。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本来就缺乏人道精神，革命趋于极端，走向反面，连革

命精神也没有了。马克思主义徒具躯壳，所以成了秦始皇的外衣。

古代陈胜、吴广的农民起义失败了，亡秦的胜利果实落在刘邦手中。刘邦所建立的汉朝，历史上公认“汉承秦制”。农民起义只为夺取秦始皇的权力，并不改变秦始皇的制度。毛泽东是成功了的陈胜、吴广，权力到手，自身一步一步地转化为秦始皇。因为夺取政权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号下进行的，运用政权仍然不能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旗号。所以，毛泽东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掩盖下，从陈胜、吴广转化为秦始皇。这种转化经历了一个过程。

第一，一九五三年，转化开始了。毛泽东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抛弃了新民主主义。刘少奇等人坚持他自己过去的理论，主张“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却被他批判为右倾机会主义。毛泽东所说的过渡时期“是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还说：走得太快，“左”了；不走，太右了。结果，只过了三年，过渡时期结束，进入社会主义了。按他自己定的时间表也太“左”了。过了两年，又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了。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内容无非是吃大锅饭、平均分配的农业社会主义。一九四八年，毛泽东的《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批评了“农业社会主义思想”。一九六〇年，出版毛选四卷时，把这些话都删去了，回过头去拣起了被自己批评过的思想。更为严重的是，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过渡的手段，这就类似于秦始皇造万里长城了，凡是他认为的好事，就用鞭子把人民赶入天堂。毛泽东所推行的社会主义的内容是陈胜、吴广式的小农空想，推行社会主义的手段是秦始皇式的专制高压。在这一点上，顺利地从前者转化为后者。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带来了祸害。恩格斯在批判蒲鲁东的时候早就说过，厌恶现代工业，热衷公平分配，只能“陷于劳动的奴隶状况”，“饥饿就要成为一种常规”。说得一点不错，毛泽东的农业社会主义饿死的人数以千万计。强制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是中国人民灾难的起点。邓小平只承认一九五七年以后“越来越左”，这是为了维护他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极力保住一个原点。由强制过渡产生的种种问题，毛泽东一再用强力来弭平，于是他越来越像秦始皇了。

第二，人为地消灭资产阶级，消灭了资产阶级还要“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割资本主义尾巴”，实际上是为封建主义招魂。中国的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像样的资本主义，不可能复辟过去没有的东西；如果发生复辟，只能复辟封建主义。所谓“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其实是对未来可能出现的资本主义文明的恐惧。一九五六年的中国还处在工业化社会，在生产落后的条件下，消灭资产阶级是根本不可能的。人为地消灭资产阶级是站在比资本主义更落后的历史阶段上，从背后攻击资产阶级。在一脉相承的邓小

平身上，看得更清楚了。邓小平发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正是提倡封建主义专制化。邓小平就是秦二世。

第三，蔑视知识，打击知识分子，制造舆论一律，实行变相的焚书坑儒。毛泽东强行向社会主义过渡，实在太快了，人们跟不上他的趟。思想不适应，就会有种种议论，知识分子的议论尤其多。彭真批评这些议论，有一个说法：身子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脑袋还留在外面。脑袋没有想进社会主义，身子怎么会进去的？还不是被生拉硬扯拖进去的。为了压制怀疑这种生拉硬扯的社会主义的议论，毛泽东在“经济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完成之后，又发动“政治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这就是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运动。以往公布的数字，被打成右派分子的是五十五万人；最近解密的档案显示，大有出入，实际是三百七十七万人，误差 476%。从此，善意批评和不同意见都噤声了。所以一九五八年，毛泽东在会见埃及副总统沙菲时自称秦始皇，他完全具有秦始皇的自我意识了。之后，又说知识分子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让先进向落后看齐，大力推行秦皇的愚民之术。

第四，发动“文化大革命”，在极端革命的口号下转向反革命。毛泽东从一九五三年开始推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民主革命时期，推行错误路线的共产党领导人，总是被赶下台了事。掌握了政权成为秦始皇的毛泽东，没有人能把他赶下台，也没有人能纠正他的错误。而他自己则是制造一个更大的错误来掩盖已经发生的错误。一九五五年的农业合作化高潮，一九五六年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激起人民的不满情绪。一九五七年他就来一个反右派运动。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造成大损失、大饥荒，遭到以彭德怀为首的共产党上层人士的反对。一九五九年他就来一个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运动。他为了防止在他死后纷纷翻案，消除“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就来一个“文化大革命”运动，以打倒一切来掩盖一切。结果，为了维护他自己的绝对正确，不惜毁了共产党。他认为，一生只做了两件事：一件事是夺取政权，另一件事就是搞了“文化大革命”。前一件事是领导革命，后一件事又将革命引向反革命。他的继承人邓小平，一九八九年出动军队镇压人民，最后完成了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向反革命的转化。

第五，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下实行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取得政权以后，缺乏人道精神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局限性就暴露无遗了。无产阶级专政被以革命的名义歪曲为暴政。按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见，如何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恩格斯说，民主共和国就是无产阶级进行统治的现成的政治形式。如果没有这种现成的政治形式，无产阶级马上要建立，而且必须在二十四小时内完成，可见事情是多么紧迫。所以恩格斯又说，资产阶级

的“民主共和国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毛泽东的说法与此完全相反，他说：“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而且，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从阶级社会到无阶级社会的过渡，也可以叫做“消亡中的国家”。毛泽东却一再加强国家机器，不断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完全背道而驰。秦始皇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创始人。毛泽东所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将地方的权力集中于中央，中央的权力集中于共产党，共产党的权力集中于他本人。“文化大革命”一来，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党都不要了，只要全国人民“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步骤”。所以毛泽东最后回归到古代秦始皇式的中央集权。

（问：毛泽东不仅利用群众运动来整人，而且也利用群众运动来反对他自己建立的体制，还要七八年来一次。这是为什么？利用群众运动反对体制，出现天下大乱。毛泽东认为只有天下大乱才能达到天下大治。怎样看待一九四九年以后产生的这种治乱循环？）

毛泽东对于一九四九年以后形成的体制是不满意的，他还嫌这个体制不大得心应手。他常常痛斥一些干部是“死官僚”、“国民党作风”。但他把自己排除在外，一切问题都是下面造成的。他不知道，官僚主义体制的根子恰恰就在他自己身上。因为他成了至高无上的权威，人们的眼睛都要向上看，揣摩上意，结果是对上负责，对下不负责。解决问题的正确做法是：取消至高无上的权威，实行民主。首先是以权力制约权力；根本上是让人们来制约权力。由人民进行选举，凭选票上台，人们的眼睛就只能向下看，不会向上看了。

毛泽东的做法却是：在维护自己的至高无上的权威的前提下，来改变官僚主义体制。他陷入了无法自拔的矛盾，愈陷愈深。他滥用自己的威望，号召群众，发动群众，冲击权力机构。一九五二年的“三反”（反对贪污、浪费、官僚主义）运动是初次尝试。一九五七年，又发动群众帮助党整风，反对主观主义、命令主义、官僚主义。在“大鸣大放”中，有人认为，对“小和尚”提意见不过瘾，还要对“大和尚”提点意见（储安平）。这就触犯了毛泽东的至高无上的权威，动摇了他所设置的前提。于是，官僚主义不反了，转为反右派。毛泽东说：这是“阳谋”。此乃掩饰之词，好像他自有神机妙算。从此吸取了教训，“文化大革命”首先订下天条，谁反对“大和尚”就是现行反革命，对“小和尚”砸烂狗头都没有关系。利用群众运动冲击权力机构，出现了无政府主义；他又重振权力机构，压制群众运动。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结果，新生的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官僚主义一点也没有减少，反而更加严重。毛泽东交替使

用两手：或者利用群众运动冲击权力机构，或者利用权力机构压制群众运动；七八年来一次反复。目的是使自己成为高踞于两者之上的绝对权威。

毛泽东之后，中国共产党的几代领导人还是同样的思路。虽然他们已经没有毛泽东那样的领袖魅力，总是一再强调加强中央的权威，来消除官僚主义体制所产生的贪污腐败，就是不实行民主。结果是：贪污腐败越来越严重，中央的权威越来越式微。

暴力革命夺取政权之后，必然是暴力统治运用政权。孙中山所说的“还政于民”，他本人和他的后继者都做不到，毛泽东和共产党当然也做不到。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运动中，时任国家副主席的王震说：“我们这个政权是死了两千万人才得来的，你们要？拿脑袋来换！”他说得很明白，暴力夺权和暴力掌权具有相关性。暴力革命需要权威，暴力革命的权威首先是军事强人，夺取政权以后同时又成为政治强人。毛泽东和共产党建立了历史上空前强大的暴力体系，这种暴力体系的强大，不仅仅是指武器，而是以暴力为基础的统治机器。辛亥革命以后，一次又一次的暴力革命，也是一次又一次地加强暴力体系。毛泽东和共产党所建立的空前强大的暴力体系，并不仅仅决定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也是中国近百年的历史运动造成的。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还可以有别样的选择。我们的邻居日本通过明治维新，选择改良的道路，重在改变制度。中国在辛亥革命以后就没有别的选择了，暴力革命的道路，重在夺取权力，至于制度，虽然名目上花样翻新，总是换汤不换药。为什么“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必须反思中国近代化、现代化的道路。

毛泽东之所以能够扮演秦始皇，还因为两千多年来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历史传统没有死亡。五四运动是以激烈的反传统的姿态出现的，中国共产党是五四运动反传统的产物，但终究又落入传统的窠臼。因为简单地否定传统并不能改变传统。改变传统的根本问题是转换制度，建立新制度代替旧制度。而转换制度又必须相应地改造文化背景和民族心理。人们往往谴责“文化大革命”毁灭了传统文化，殊不知毁灭传统文化的手段也是来自传统文化。什么抄家、酷刑、烧书、灭佛、毁洋教，哪一样不是古已有之？至于“万寿无疆”、“三忠于四无限”等等更是中国才有的劣质文化。中国的大地具有滋生专制腐败的土壤。当年国民党统治大陆，共产党局处一隅。共产党是生气勃勃的，国民党则专制腐败。国民党败退台湾，绝处逢生，逐渐转变为民主政党。现在轮到统治大陆的共产党专制腐败了。中国之所以出现毛泽东现象、共产党现象、“文化大革命”现象，值得进行全民的反思。中国人应当共同努力，彻底改造这一片滋生专制腐败的黄土地。

中国人要向德国人学习。德国人是善于反思的民族。德国为什么出纳粹？德国人进行了全民的反思。与纳粹无关的人，甚至当年反纳粹的人，都勇于向受害国和受害者进行道歉。既然把纳粹看作全民族的耻辱，因而纳粹也就成为全民族抵制和反对的对象。

2006 年 4 月于哈佛大学，原载《民主中国》

党内一份毛秘密档案否定“辉煌 60 年”

作者：瞿咫

每个中共的高级干部都希望在生前把自己的经历写成回忆录，留下来。这包括 2004 年九十多名原省部级高干、上将等老干部及其子女，其中包括林彪的女儿林豆豆、黄永胜家属、江青的女儿李讷等。这本来是件很平常的事。但中共非常紧张，最近决定特拨两亿元国库银子，以党的名义收购下来。万里说过，至今党库和国库之间还没有建立一堵墙。如果真建立的话，那党就是赤贫。毛泽东生前机要秘书张玉凤兼「陪床」，历时三年写就的回忆录书稿《回忆在主席身边的岁月》(暂名)，经中宣部、毛泽东思想研究室等单位审核四个月，最后决定：该书极不宜发表，其中某些二人的对话留作研究参阅。据悉，书稿内容涉及毛泽东与林彪、周恩来、江青等人之间不寻常关系的问题。全书八十万字，虽曾通过一审，但却遭到毛泽东后人反对而暂搁。原因是毛泽东的女儿、侄孙坚决反对，指内容有损领袖形象。他们愿出一百万人民币买断版权，阻止出版。

为什么呢？必然是有丑事被抖露，而且符合实际情况。据党内一份秘密档案揭示：文革初期，1966 年 8 月 15 日，江青写信给周恩来，信中提到：毛泽东长期的放荡生活问题，已经给江青从精神、身心上造成创伤，要求组织出面解决。周恩来看后，不做任何表示，写条：「请送林彪同志」。林彪看后，批上：「请退交总理处理」。皮球踢来踢去也没踢出个结果来。那个时刻，毛是「最红最红的红太阳」，这种烫手山芋无人敢碰。一年后，1967 年 8 月 10 日，此次江青同时写信给「永远健康」的林彪和周恩来，再次提到：已经无法忍受毛泽东放荡生活，要求结束与毛的夫妻关系。她不但提出以自杀来表达对毛腐化堕落私生活的抗议，并批评党长期纵容毛泽东放荡生活。林彪在信上批示：「请总理劝导江青同志能顾全大局和主席的声誉。」

两天以后，1967年8月12日，江青以有工作向总理请示的名义，带着两盒点心去中南海西花厅。此时毛正在中南、华东地区「巡视文革运动」。江青一到，就伤心大哭不止，说：「总理、总理，其实我的生活是不愉快的，是很苦闷的、很孤独的。您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我能对谁说、对谁控诉？想一想，在现代社会，哪有领袖不许自己妻子一起居住，不许自己妻子来看望？这简直是伟大领袖的伟大创造，这是什么党的工作需要，党的决定？是他（指毛）数十年放荡生活的需要！总理，您要为我作主，讲讲话。我不能再这样忍受着生活，我想，哪一天就死在中南海。」1968年10月7日晚，江青又去西花厅，向周恩来和邓颖超哭诉：毛不但继续淫乱放荡，而且下命令让她搬出中南海，未经准许，不准进中南海。很快江真的被迫搬出了。1971年9月13日，林彪、叶群和儿子林立果乘飞机失事，死在外蒙。9天之后，9月22日，江青说要与总理交心，希望邓颖超也参加。周只一人去了当时江青居住的钓鱼台10号楼。

毛如何解释他的高瞻远瞩？！江青谈到几个问题，让周倒吸一口凉气。她说：「我有三个要求，1、要主席亲自在政治局解释，毛说考察林彪30年，不会有偏，为什么既定接班人会外逃？2、主席不会万岁，也不会百岁，还要不要选定新的接班人，我坚持要。3、主席要作点自我批评，不要太霸道、太独裁，怀疑一切、肯定一切，反复无常。」江青谈到的这个不是个小问题，而是否定共产党政权的大问题。到今天为止，毛的尸体还占着天安门广场内一个很大的位置，躺在毛纪念堂里供人膜拜。这不是共产党真的搞什么个人崇拜，而是为了党的生存。这也是为什么毛的私人医生李志绥出书揭露真实的毛泽东时，中共让人来否定他是毛的医生，以至把他暗杀。中共不是怕抹黑毛泽东，而是若「红太阳」的真面目暴露了，中共非法建立的政权就有危机了。而毛的家属之所以要花钱把张玉凤的回忆录买下来，是怕毛倒台了，直接影响到毛家人的待遇。什么「为人民服务」，什么「辉煌60年」，中国共产党怕的就是说真话，说实话。中共的历史是一部谎言史，「毛泽东思想研究室」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谎言加工厂。

殃民祸国毛泽东(修订稿)

王葆琛

人平不语，水平不流。毛泽东已死，罪行

可以赦免，历史不能留白。中国共产党形象是美丽还是丑恶？既代表我，也代表你们！
——据陈正中三上胡锦涛、温家宝书增删改写。

淫枭毛泽东！南泥湾，种鸦片；谋倒蒋，联日伪；推销男盗女娼，坑害千万群众！无数优秀党员、知识精英，未死斗敌战场、被毁毛氏暴政；罪行罄竹难书，岂仅倍超秦始皇而已！

毛泽东生活糜烂，道德败坏。上井冈山后，抛弃 29 岁身陷缱绻之杨开慧，移情别恋 18 岁的贺子珍；到延安既与史沫特莱、吴莉莉勾搭，又与江青姘居。贺子珍时年 27 岁，承受不了毛泽东喜新厌旧，要枪毙这些“妖精”。毛说贺“疯了”，强迫送往苏联“治病”，并为此结怨周恩来。毛泽东说：无非是吃喝嫖赌；孙中山可以，为啥我不行？胡扯流氓腔，一派无赖相，简直无理可喻！

建国后，毛泽东做了皇帝想登仙，迷信采阴补阳；办公外加密室，在全国拥有 61 座行宫。“宠幸”女人不下百人。李玲师、孟锦云、张玉凤等，几乎都是孙女、曾孙女一辈；张玉凤还曾被列为是身后接班人之一。中纪委对毛泽东搞“三宫六院”，始终睁眼闭眼；有些人还甘充“太监”为毛“拉皮条”。于是，大贪小贪包“二奶”膀“小秘”，成了中国“特色”。反腐越反越多，根源全在毛泽东胡作非为！

毛泽东不是中共党的缔造者，更非党第一代领导人。为混充党的创始人，毛泽东谎报入党时间。毛分明是 1921 年 7 月“一大”以后入的党，偏要说是 1920 年。问他入党介绍人是谁？回答：没有！1920 年湖南成立第一个共青团小组，刘少奇是该小组团员，证明毛泽东连团员都不是，又何来这一年非同小可的关键党龄？

毛泽东没有参加过“南昌起义”。1927 年“秋收起义”打浏阳，彻底失败，6000 起义部队剩下不足千人；说明毛泽东原本不会打仗，也不善于排兵布阵。毛走投无路，经工农革命军二团团长王兴指点，低三下四可怜乞求，才被井冈山创始人袁文才、王佐收留。毛上山后篡党夺权，忘恩负义，恩将仇报，杀了袁、王，说是土匪；30 年代初，又借发动打 A B 团，杀了赣西南东固根据地创始人李文林。同期被杀 10 多万党群干部中，有 21 名是高级军职干部。

1931 年 11 月 7 日“十月革命”17 周年，中华苏维埃国在瑞金成立。斯大林认可毛泽东打 A B 团、残杀共产党有功，指名其为苏维埃主席。毛赖党人鲜血染红前程，就此在斯大林赏识中起了家。

“反 A B 团斗争”，大都由内部意见分歧而引起。东征期间，毛坚持打南昌失败，彭德怀打长沙两度占领。毛心胸狭隘，对彭不提供支援，并以此解释打长沙失败原因。无可替代的朱总司令，曾被毛置于单纯执行自己命令的地位，剥夺了他几乎所有的权力。朱德曾说，他不过是毛手中的玩物，毛泽东不拿他当回事，他什么事也干不了！气得彭德怀拍着桌子吼：你是懦夫！你为啥不斗争？这既使毛一度在宁都落选，也使毛一旦得势务必要以牙还牙！

长征结束，毛泽东利用青海“三马”反动骑兵，制造“碧血黄沙”，消灭四方面军 20000 余人，最终逼反了张国焘。1941 年“皖南事变”也是毛泽东给项英设置的陷阱——出发前突然改变过江路线，扣压项英给顾祝同的电报，将新四军军部万余人送入国民党三战区虎口。毛泽东最怕党内其他领导人的部队力量超过自己。惯用的手段就是借刀杀人，杀得不留痕迹，可谓是用兵如（瘟）神！

毛泽东嫉强妒能，嗜好同室操戈窝里斗，早在长征时期就建树非凡。1935 年 9 月进入陕甘根据地前，曾预演过一出“苦肉计”——先将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逮捕入狱，街上贴了布告，挖好了坑，准备活埋；就在这时，毛泽东来了，大喊刀下留人！于是，刘、高、习等有惊无险，被天神毛泽东解救了！党史说，这是左倾分子所为。其实，遵义会议后，张闻天任总书记，毛泽东是军委领导人，王明、博古、张国焘等均无实权，唯毛瘟神能指挥一切。谁是“苦肉计”作者？一目了然！关键还在于此计目的所在——

1936 年 2 月，毛泽东借机安排刘志丹率领红 28 军东征抗日，在汾河遭国民党阻击而牺牲，终年 32 岁。毛说这是“出于意外”。“意外”何在？唯毛自知！高岗则自杀于 50 年代的“高饶反党”。习仲勋因涉及《刘志丹》创作反党而坐牢 12 年。刘志丹胞弟刘景范坐牢 10 年，其妻李建彤（小说作者）等 7 人均被迫害致死。

朱德是人民和历史公认的“红军之父”。可多年来，在影视和文艺作品中，却始终唯唯诺诺、平平庸庸、人云亦云、无所作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是朱德最先提出的实战经验。可这些都被毛泽东剽窃为己有，公然在《毛选》中出版。有人为朱老总抱不平，朱德宽厚地说：只要有利革命，谁提谁说都一样。可毛泽东剽窃别人成果，贪天之功为己有，已属秉性难改，而且习以为常——

《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作者庄重，粟裕大将部下，70 多年党龄，92

岁离休。毛泽东审核该文，只把标题中的“劝”字改为“敦促”，在“杜聿明”后面加了个“等”字，作者也就成了毛泽东，收入1964年4月出版的《毛选》四卷。庄重57年被打成“右派”，64年出狱，“文革”期间被踢断腰椎，几乎被打死；直至毛泽东死后33年，才敢直言要将《敦促》一文收入他自己的文集。

据《党史文苑》记载汪东兴回忆说：1967年10月毛亲自查了自己的稿费存单，达570多万（相当于现在的3个亿左右），为当时中国之首富。而毛的文章却大多为胡乔木、田家英、康生等人所代写（90%以上是秘书所写）。《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都不是毛的作品，只是冠以毛的名字发表或成为毛的发言稿，稿费则全归毛。

“文革”中，有学生在作业中填写：毛泽东是南昌起义领导人。一位刚从北师院毕业的女教师，判作业时在“毛泽东”上打了个叉，被定为“现反”判刑10年。毛泽东死后，受害者戴之本老师平反获释。但因受刺激太深，神经分裂，不能上课，提前退休，至今尚在。这也说明：靠纸上谈兵，总结、剽窃别人经验、成果，是成不了什么家的。可毛泽东却据以认为：自己是“南昌起义”的大功臣！

毛泽东为确保大权独揽，善于指鹿为马，更善拔除眼中钉——指鹿为马，“反右”人皆知。取天灾代人祸则未必：低标准，哀鸿遍野人食人；瓜菜代，饿殍排空千万千！媒体谎称毛泽东脸面也出现浮肿，实际却是餐必鱼肉大虾，八珍俱全而尚需采阴补阳！

拔除眼中钉，众所周知刘、彭、贺。却有所未知：林彪折戟沉沙，并非是中国动用了什么神秘武器，而是毛泽东叫人在飞机上预置了定时炸弹；田家英一直误传是“自杀”，其实是他杀，也是毛泽东命令汪东兴捣的鬼；周恩来，信不过、打不倒、离不开，则在治病问题上做手脚，有意耽误治疗，把周推向死路后连追悼会都不去参加。周恩来不得不于临终惨呼：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以上“蒙太奇”，说明中共在山大王掌控下，党史无可足信。以下再增辑若干，略示中共因何至今未敢公布毛泽东罪行——

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罪行，未使苏共马上垮台，而是继续维持了35年。究其原因有三：1、罪行为斯大林个人所犯，与苏共关系不大；2、斯大林执政，高官有特权而为数不多，尚未引起公愤；3、赫鲁晓夫往后，苏共再未对人民大规模镇压或实施政治迫害。但苏共最后还是垮了台，根本原因在于政治经济体制不合理。

中共与苏共情况不同，毛泽东也有别于斯大林。斯大林杀人是在掌权以后才清除异己；毛泽东则是在掌权之前就开始杀人，无论时间、数量都超越斯大林。30年代搞“苏反”，大批红军将领死于毛的杀人命令。毛执掌大权后，杀人办法更为阴险。除了51年“镇反”直接下令杀人外，都是发动欺骗群众，从延安“抢救”到建国后“思想改造”“三五反”“胡风事件”“肃反”“反右”“大跃进”“反右倾”，直至10年“文革”，累计迫害摧残中国人，超过了一个亿（毛泽东死后，中共第二、三代领导人继续搞“阶斗”，还是大批量杀人）！

斯大林死后，苏联党政腐败并不严重，不存在百万、千万、亿万富翁；可现在中共党政，官商勾结瓜分国有资产，皇亲国戚，有多少不是百万、千万、亿万富翁？在此情况下，如若公布毛泽东一系列罪恶，势必引发爆炸性后果！不仅受害者及其后代会奋起索赔，而且连中共第二、三代领导人的罪错也不会放过；既会清算腐败官员及其亲属所获不法资产，也势必会要求绳之以法！在举国公愤之下，中共权贵集团，还能保得住统治地位吗？所以要加强“维稳”。

可是中国当前，经济领域已基本确立了市场经济地位，再在政治上坚持毛体制的一党专政，势必无法长期兼容所谓的“中国特色”悖论——既坚持“经济基础”市场化，又坚持“上层建筑”专制化。故所以，有人快言快语：不改革，等死；一改革，找死！这也就是中共目前“科学发展观”所面临的实际处境。

科学发展观的对立面是普世价值观。“普世价值”要求：人要活得有尊严。尊严离不开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文化自由化、分配元素化、社会平等化；之最则在于“政治民主化”。可吴邦国却公开宣布：决不照搬西方那一套，决不搞多党轮流制——既形而上学，也庸俗化了普世价值观；一派既得利益者之愚昧无知！

自由、民主、人权、博爱、平等和人道主义，是全人类共同追求的精神财富。不能把这些文明成果说成是“西方那一套”，世界上也没有“多党轮流制”。民主国家由谁执政，须通过民主普选。普选产生的政权要比一党专政进步得多。这是常识。

只有重新评价毛泽东，把他欠中国人民的血泪账、经济账向人民讲清楚，从根本上揭穿毛泽东是“人民大救星”的画皮，还他“人民大灾星”的原始本色，改革派才有话语权。

不批毛，改革开放只能两极分化变成空话；不批毛，中国不可能进入民主社会；不批毛，台湾和大陆统一非动用武力不可；不批毛，中国共产

党没有希望，只有死路一条！

把天安门上的毛泽东标准像卸下来；把纪念堂里的毛泽东“腊肉”烧成灰；把人民币上的毛泽东头像换成人民形象；把毛泽东的“稿费”和贪官污吏的赃款，用于“错划改正”而尚未获得赔偿的受害者。这些都是当代中国最重要和最根本的公平正义。

全面否定毛泽东时代，阻止复辟毛泽东罪孽，现在是时候了！

2010年中秋“五七老人”月圆人不圆

为什么说毛泽东是最大的反革命？

邵正祥

《论理学原理》批注中泄漏的毛氏丑恶的道德观

毛泽东二十岁时，在德国哲学家泡尔生所著《论理学原理》中译本上作了大量批注。在这些批注里，毛直言不讳地表述了他的道德观念。这些观念伴随了他的一生。

毛整个道德观的核心是“我”高于一切。毛在批注里写道“道德之价值，必以他人之利害为其行为之动机，吾不以为然”。“吾人欲自尽其性自完其心，自有最可宝贵之道德律，世界固有人有物，然皆因我而有。”

义务与责任毛概不承认，说：“吾人唯对于自己之义务，无对于他人之义务也。[[吾只对吾主观客观之现实者负责，非吾主观客观之现实者，吾概不负责焉。既往吾不知，未来吾不知，以与吾个人之现实无关也。]]吾自欲遂行也，向谁负责任？”这使人想到曹孟德的名言：“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

对毛来说，任何成就只有在现实生活中能享受到才有意义。身后名“非吾之所喜悦，以其属之后来，非吾躬与之现实也。”“吾人并非建功业以遗后世。”毛泽东完全不屑于追求“流芳千古”。

泡尔生说：“毋杀人、毋盗窃、毋欺诬、皆良心中无上之命令。”毛不以为然说：“此等处吾不认为良心，认为人欲自卫其生而出于利害之观念者。”照毛的意思，人干这些坏事，只是出于个人利害考虑，要是干了不受惩罚，那就要干。

毛的这种道德观，促使他在生前集中精力抓权，自然不可能也不愿拯救广大劳苦大众于水火，相反，毛反而置广大劳苦大众于万劫不覆的水深

火热之中。上自国家主席下至劳苦大众，都成为他抓权而利用和迫害的对象。所以毛的反革命罪行的由来跟他的道德观是分不开的。所以毛泽东的反革命罪证数不胜数。今择其主要罪证列举于后：

毛泽东反革命罪证举要

罪证一，毛泽东亲自主持领导的镇反和肃反运动，凡参加过国民党和三青团的一般党团员都打成反革命，有的甚至予以镇压、杀害。而毛泽东本人不但参加过国民党成为国民党正式党员，而且曾担任国民党的代理宣传部长和国民党第二届全国代表大会代表资格审查五个委员之一。并多次高呼“蒋委员长万岁！”所以根据毛划反革命的标准，毛泽东本人更具备反革命身份。

罪证二，1930年，毛泽东为了铲除异己，铲除不同意毛残忍行为的红军干部战士，用刑、讯、逼、供等手段，将10多万为革命而参加红军的干部战士诬陷为AB团予以杀害，比国民党杀害的红军都多。

罪证三，革命的目的是消除城乡、工农、体脑三大差别，而毛泽东1958年却制定了城乡有别的户籍制度扩大了三大差别，所以毛是个地地道道的反革命。

罪证四，鉴别社会变革是不是革命，主要就看它是否解放了生产力，保护和发展了生产力（反之就是反革命）。1956年第八届共产党代表大会，出席代表共1026人，作出两个决议：一、反对个人崇拜；二、将阶级斗争转入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解放生产力、保护和增加生产力。这两个决议被历史实践证明是革命的决议，可是不久就被毛泽东完全推翻了，所以毛泽东不仅反对了党的决议，也反对了革命的决议，其性质既是反党分子，也是反革命分子。

罪证五，马克思一直肯定无产阶级是由脑力无产阶级和体力无产阶级两部份人组成，而脑力无产阶级即是靠工资生活的知识份子，可是毛泽东却把脑力无产阶级诬蔑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以毛泽东是反马克思的，因而也是反革命分子。

罪证六，中央已定性四人帮和林彪是两个反革命集团，可是凡亲身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广大人民，都知道这两个反革命集团是由毛泽东亲自组织、提拔、培养而成。两个反革命集团每次行动都请示毛泽东，得到毛的批准后才行动。所以毛泽东是这两个反革命集团的黑后台，因而毛是个地地道道的反革命分子。

罪证七，被毛泽东残害致死的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德怀、陈毅、

贺龙、张闻天等人……已被中共中央定性为无阶级革命家，这些无产阶级革命家，国民党反动派都没能损害他们毫发，而毛泽东为维护自己错误决定和权位，而把他们都残害致死，害死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人顺理成章地可以定性毛泽东是一个反革命分子。

罪证八，经中央最高人民法院定性，江青和毛远新是反革命分子，而毛泽东生前还想将领袖位置传给江青和毛远新这两个反革命分子，所以毛泽东自然就是一个反革命分子。

罪证九，毛泽东生前全国人民平均存款不足 10 元，而毛泽东仅稿费存款就有 1.3121 亿元，经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党史研究室、党校三单位联合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的报告——《毛选四卷》真相，只有 12 篇是毛泽东自己执笔写的其他 150 篇稿费都是毛泽东贪污所得。1957 年 11 月毛泽东在莫斯科公开发表演讲反对改善人民生活：“有人说穷是坏事，我看穷是好事，越穷越要革命……”，反推回来中国当时最富有的毛泽东是最不革命的甚至是反革命的。

罪证十，三年大跃进，饿死了五千万农民，文化大革命打死了两仟多万无辜人民；历次冤假错案害死了二仟柒佰万无辜人民，总共被毛泽东害死了九仟万人民，相当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总和的 1.5 倍。毛泽东在饿死两千多万人的 1960 年，全国六亿多农民挨饿的情况下，在毛的授意下，在韶山、武汉、密云水库边、上海、庐山、济南等六处修建他的别墅，毛泽东共有 61 处别墅，仅杭州刘庄别墅就占地 800 余亩，折合 50 多万平方公尺。61 处共占地数以百万平方公尺计。当时全国城市人口平均每人住房面积都小于 3.6 平方公尺。毛泽东曾在 8 届二次会上说：“死人是喜事，是白喜事……”因为人是解放生产力和保护发展生产力的主体，毛害死这九仟万人，对生产力的伤害之大是可想而知。所以毛的行为完全是反革命行为。

82 岁老朽 邵正祥于 2010 年 12 月 25 日

打天下的光棍——毛泽东与中国史

余英时

今年大陆上传说全年都在庆祝毛泽东的“百年诞辰”，但到现在为止似乎尚未见到任何特别值得注意的报导。由于中共内部已隐然分裂成所谓“保守”和“改革”两派，而十几年来邓小平的改革和开放政策基本上是弃毛

泽东的浪漫乌托邦路线，中共官方对于毛泽东的态度已陷于褒贬两难的困境：一方面，毛泽东是中共王朝的“始皇帝”，如果不在此“百年庆典”中加以褒扬，则等于否定了这个王朝的合法基础。但另一方面，如果庆祝过于热烈则又恰是以助长“保守派”的气焰，而否定了现行政策的合法性。所以大陆的庆毛活动事实上是为了党内两派的斗争提供了一个意识形态的战场。

在中国大陆以外，我还没有听见有什么地方注意到这件事。“人间”副刊主编约我写一篇谈毛泽东的文字，当然部署于“纪念的性质”。毛泽东对于现代中国人“影响”之大是无可估计的。无论我们怎么看待这个“影响”，这一事实的本身毕竟无可否认。在台湾和海外的中国人当然也希望对毛泽东其人较深切的认识。但是我决定接受这项任务是颇费踌躇。首先，这几年来，大陆上虽出版了不少有关追忆毛泽东生平的作品，但其真实性都尚待考察，为可据为典要。到现在为止，我们还看不到可信的直接史料。其次，1949年以后，毛泽东的独裁真正达到了“联邦国家”的境界，谈毛泽东便等于谈整个中国。题目太大，简直无下手处。最后，今天任何中国人写毛泽东无可避免地会受到主观好恶的支配，完全客观的论断是不可能的。我不但不可能是例外，而且我的成见是牢不可破的。在中国史上，毛泽东具有秦始皇、明太祖的一切负面；在二十世纪世界史上，他则和希特勒、斯大林是一丘貉。抱着这种成见，我笔下的毛泽东是不可能“客观”的。

十几年前我曾写过一篇〈从中国史的观点看毛泽东的历史位置〉（收在《史学与传统》中，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民国71年。）这十几年来，因为读了不少有关毛泽东的传记资料，我的认识自然更详细了。现在姑借这个机会谈谈有关毛泽东的几个片段，以为知人论世之一助。我仍然将采取一种历史的观点，并且尽量自觉地不让成见歪曲历史事实。

壹、早期的毛泽东

毛泽东的一生明显地分成三个段落，通过这三个段落的历史背景，我们才能比较具体地说明毛泽东在中国现代史上所扮演的特殊角色。限于篇幅，本文对于每一个段落自然都只能作极其概括式的速写。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是第一段落，这是毛泽东决定他的人生方向的酝酿阶段。从1921年到1949年是第二个段落，这是他的革命时代，从湖南地区的党的组织者逐步取得了全党领袖的地位（以1934-35年的“长征”为转折点）。1949以后是他一个人独霸中国大陆的时期。

谈毛泽东的早期阶段，我们必须把握住一个重要的事实，即毛泽东既

不是什么“天才”，也不是什么“妖魔下凡”，而是一个十足时代的产儿。和他同一时代的无数中国青年一样，毛泽东早年也受到清末变法和革命运动的强烈冲击；在思想上，他则接受了一点西学，如严复介绍的“天演论”以及斯宾塞的社会进化学说。这里应该特别提及湖南的特殊历史背景。1897年阴历10月至次年2月梁启超应湖南巡抚陈宝箴之聘，到长沙主讲时务学堂。与梁氏同时任讲习的有谭嗣同、唐才常、韩文举等人。这件事的时间虽然很短，但因曾引起新旧思想的大冲突，在湖南的知识青年中留下了深刻而经久的影响。毛泽东这一代的湖南青年很多都受到梁启超、谭嗣同的激发而产生了救国的意识。戊戌政变失败后，梁启超在日本办的《新民丛报》（和继起的《国风报》）也特别对湖南青年具有莫大的吸引力（如左舜生记“清末民初之际的长沙”和“我的少年时期”，便提供了直接的证据）。毛泽东在“五四”前一年（1918年）所组织的一个半政治、半教育的团体，及定名为“新民学会”。这仍然流露出《新民丛报》的残存影响（毛泽东早年送还友人所借《新民丛报》的一张便条，足以为证）。

“五四”前夕出版的《新青年》对毛泽东的冲击更为直接、更为强烈；陈独秀和胡适逐渐取代了梁启超在他心目中的崇高地位。谈个人的气质上说，他自然更倾倒于陈独秀个人的激昂慷慨，但以思想而论，他在1919？1921年之间反而更接近胡适。1919年胡适和李大钊展？了一场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著名论战，当时毛泽东显然是站在胡适的这一边。因此他在这一年9月1日特别发起了一个“问题研究会”，并提出了一百多个问题向全国各地征求意见。大陆作者写毛泽东的早年往往极力避免或淡化胡适的影响。他们虽然不能不提到这件事，但却认为这是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前的思想状态。在毛泽东1920年再度到北京正式受到马克思主义的洗礼之后，他便完全摆脱胡适的实验主义的干扰。然而事实恰恰相反，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和胡适的交往更密切了。他不但在出不出国的问题上曾征询过胡适的意见（见他1920年3月14日给“新民学会”会员的信），而且还从胡适那里学到了“自修大学”的观念。

1921年8月毛泽东在长沙利用“船山学社”的社址，创办了“自修大学”。他当时曾明白承认：“这个名字是胡适先生造的”（见《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一集给周世钊的信）。三十年后，胡适对这一段经过有以下的回忆：

毛泽东依据了我在一九二〇年的“一个自修大学”的演讲，拟成“湖南第一自修大学章程”，拿到我家来，要我审定改正。他说，他要回长沙去，用“船山学社”作为“自修大学”的地址。过了几天，他来我家取去章程

改稿。不久他就回去了。（《胡适的日记》第十七册，1951年5月16日条）这是新出现的史料，可以澄清“自修大学”的来源问题。

我并不是强调早期毛泽东和胡适的关系。我只是要指出，毛泽东即使在加入中国共产党（1921年7月）以后，他的思想也仍然没有定型。这时他在理论也许接受了布尔什维克的暴力革命，但他的活动，如“自修大学”所显示的，则与同时一般热心于政治、社会改造的知识分子并没有什么不同。1918年李璜曾多次和毛泽东交往。据李氏回忆：“那时他已二十五岁了；因被环境所限制，故他读书不多，而中西学术的根柢那时都很差；但其头脑都欠冷静，而偏向于实行一面，这是给我印象很深的”（《学钝室回忆录》，页37）。1942年陈独秀谈及他和毛泽东的关系时则说：“以前毛和我私人无恶感，我认为他是一个农运中实际工作人员，政治水平则甚低”（见郑学稼着《陈独秀传》，页1355，原函影印本见卷首。）陈独秀的印象当然是在武汉时期形成的，比李璜所见的迟九年，但两人的观察大体相同。总之，早期的毛泽东主要是以“实行”、“实际”见长，无论在知识上或在思想上都处在摸索的阶段。他参加了共产党，也只是追随陈独秀、李大钊所选择的方向；这时他还没有任何引人注意的独特表现。

贰、逼上井冈山以后的毛泽东

毛泽东开始显露他的生命本质是在第二阶段，即1927至1949年，特别是中共从江西流窜到陕北以后。这里我们必须先交代几句关于中共初期的历史背景。中共自1921年7月建党、1924年加入国民党，到1927年8月以后各地暴动失败，每一次路线都是直接由莫斯科决定的。中共的最高领导人，无论是陈独秀、瞿秋白或李立三，也无不是唯莫斯科之命是从。但在每一次路线失败之后，责任都毫无例外地要中共的最高领导人承担。这一事实现在已是研究中共问题专家共同承认的。能明白这一点，我们便懂得中共在1927年以后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是莫斯科共产国际的决定逼成的，并不是毛泽东个人的主张。事实上，由于毛泽东不通俄文，在中共流窜陕北以前，他并没有受到斯大林的重视，因此他的影响力也达不到中共最高决策的层次。

毛泽东的霸业起点是井冈山，这是中共在1927年进行了一连串的城市和乡村暴动的结果；暴动的政策则是根据斯大林的指示而建立的。毛泽东依照中共中央的决定，执行暴动政策，在湖南发动了有名的秋收暴动。暴动失败之后，他率领了残余的七百多人，自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司令”，跑上江西井冈山去了。关于这一段经过，当年追随他上井冈山的龚楚（红

七军军长）有很生动的描写：

井岗山的地形，有无数座巍峨高耸的山峰，櫟岩峭壁，溪谷纵横，构成了井岗山的险要地势。通达井岗山的道路有三条……这三条路都是崎岖的山径，碎石嶙峋，步行非常艰难。只要凭险据守，很难攻破，即使有新式武器也难发挥它的威力，所以，这区域向来都是匪徒们最理想的根据地。

（中略）一九二八年二月以前，盘据在井岗山的一批土匪，数约六七十人。匪首王佐与岗宁县拥有步枪七十枝的土豪袁文才互通声气，并以井岗山这个险要的地区为凭借，作为他们抢劫行商和富户的根据地。附近各县人民，视为畏途，称王佐为“王老虎”。因为绅匪勾结，使地方团队无法征剿，遂令坐大，井岗山几乎成了王佐、袁文才二人的私产。

毛泽东明了井岗山的军事价值，当他从湖南茶陵窜入宁岗县城，便首先送了两枝手枪和一些礼物给袁文才，联络感情。再由袁文才介绍给王佐与毛泽东见面。王佐是一个头脑简单的土匪，袁文才又有浓厚的个人英雄主义思想，三个一拍即合，大块肉大碗酒的结拜为弟兄。

毛泽东利用其与流氓打交道的手法，是相当成功的，他满口仁义道德，哄得袁王两人贴贴服服，都接受了毛泽东委派的营长职务。从此，毛泽东便在井岗山立定了脚跟。（《龚楚将军回忆录》，香港月刊社，1987年，上卷，页136-137）

读了这个记载，我们几乎疑心这是《水浒传》上晁盖等七人上梁山泊落草为寇的现代翻版了。然而这却是事实，不是虚构。毛泽东的生命本质第一次得到了充分发挥的机会。尽管中共官方的宣传机器一直到今天还在塑造“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形象，实际上毛泽东的真本领是在他对于中国下层社会的传统心理的深刻认识。但这里所谓的“下层社会”并不是千千万万安分守己的农民，而是那些三教九流、痞子光棍之类。用价值中立的名词说，即是社会边缘的人物。大陆上写毛泽东生平的人往往强调他“好读书”，尤“好读史”。其实他早年和中年读得最有心得的是所谓“稗官野史”，如《水浒传》、《三国演义》之类。据我粗粗翻检他的作品，他引用得较多的是这两部小说中的典故。他的“史学”最初也是从蔡东藩所编着的《中国历代通俗演义》入门的。1936年在延安，他曾特别打电报给李克农：“请购整套中国历史演义两部（包括各朝史演义）。”（见张贻久《毛泽东读史》，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1年，页32）他读这些旧小说，自然不是为了消闲，而是为了从其中汲取如何造反、打天下的教训。我在前面说龚楚描述毛泽东上井岗山使人立刻联想到晁盖上梁山泊。事实上，他当时也未尝不是从这个故事上找到了怎样收服恶霸袁文才和土匪王佐的

办法。他晚年（1975年）评《水浒》说：“《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晁盖盖于一〇八人外”，正式以晁盖自许。很可能的，他这时又想起了初上井冈山的一幕。

据我平时阅览所及，和毛泽东有过交往的人，无论所知深浅，党内党外，几乎都注意到他熟读旧小说和善于应付社会边缘人物的特色。1945年重庆六位参政员访延安，其中傅斯年和佐舜生都不约而同的感觉毛泽东活像《水浒传》里的宋江，而且也都承认他旧小说读得非常之熟。傅斯年更为敏锐，他已察觉到毛泽东大量从后方收购各种旧说部，是为了研究中国下层社会的心理。在中共党内，周恩来便承认毛泽东最长于和旧社会各色人等打交道，张闻天在延安时更明白对张国焘说：“老毛懂得旧社会旁门左道的那一套，让他去干罢！”（见张国焘《我的回忆》，香港明报月刊社，1974，第3册，页1235）。

由于1927年中共“革命”的失败，毛泽东才被逼上了井冈山。然而对于他而言，这却恰恰如鱼得水，这也算是一种历史的狡诈吧。毛泽东可以说是集多种“边缘”之大成的一个人：他出身于农村，但早年也沾到城市的边缘；他没有受过完整的学校教育，但也沾到了知识界的边缘；他最熟悉的东西是中国的旧文史、旧小说，但又沾到了西方新思潮的边缘；他在政治上最独到的是传统的权谋，但又沾到了“共产国际”的边缘……。历史的狡诈把他送回了边缘人的世界，特别是他最熟悉的中国农村的边缘世界，他的生命本质终于能发扬得淋漓尽致，这恐怕是连他自己也是始料所不及的。他晚年对他的卫士长说：“毛泽东也是个普通人，他也没有想到他会做党和国家的主席。他本来是想当个教书先生，想当个教书先生也不容易呢？……”（见权延赤，《走下神坛的毛泽东》，台北，晓园出版社，1991，页224）这大概是真心话，中国史上打天下成功的“光棍”，到了晚年往往有这一类的感慨。例如毛泽东所认同的曹操，在有名的《述志令》中便承认，他最初只盼望做到“郡守”，后来他志向高了，也不过“欲望封侯作征西将军，然后题墓道言『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此其志也。”南齐创业之主萧道成，读书仅止于十三岁，此后便在行伍中，是当时社会上的典型边缘人。他在遗诏中也说：“吾本布衣素族，念不到此，因藉时来，遂隆大业。”此外如刘邦向他父亲炫耀：“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以及朱元璋手书“朱氏世德碑”，虽未明言“念不到此”，其意则未尝不是呼之欲出。毛泽东在这一点上却是继承了“打天下的光棍”的中国传统。

1927年以后毛泽东“革命”的社会基础主要是农村的边缘人，而不是普通的工人和农人。关于这个问题，我愿意略引当时人的观察，作一交代。

详细的论证在此不但可能，而且也无必要。伊罗生（Harold R. Issacs）的《中国革命的悲剧》（《The Tragedy of Chinese Revolution》，修订第二版，斯坦福大学出版，一九六一年）是根据当时调查而写成的一部书，在西方已取得“经典”（Classic）的地位，伊氏除直接得到刘仁静的协助外，又访问托洛斯基、马林及其它共党国际的政策执行人（如德兰，Albert Trient，法共总书记）。所以此书的史料价值是很高的。据伊罗生说，一九二七年以后的二十年间，中共的党主要是由“非城市的知识分子”和农民首领构成的，其基本力量则是枪杆子。这个党后来没有稳定的力量或一贯的“阶级基础”。（“class base”，页 308-309）他又指出，井冈山上的“红军”决不是从大规模的自发的农民运动中产生的。相反的，这支“红军”在很长的时期内都是孤立于农民之外的。在井冈山时期，“红军”中的农民逃散者很多。此后一两年中，农村中不但不支持“红军”，而且还把它当作土匪来攻击。（页 325？ 326）伊氏的话是以中共内部的文件为依据的。

下面引龚楚的话更是直接的供证：

我曾经组织并策动苏维埃运动，我深深地体验到，中共在苏维埃运动时的革命，并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中国的无产阶级，只是被愚弄、被欺骗的对象。中国的无产阶级口工人，及其同盟口农民，他们在数千年来的文化熏陶下，大家都是爱和平、重道德、敬业乐群、乐天知命的，对于中共的激烈斗争政策，并不感到兴趣。因此大多数的人们，都采取躲避观望的态度，只有地方上一般游手好闲的流氓地痞，却喜欢中共“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中共也看中他们，认为他们是贫苦工农成分。其实，这些人早已脱离了生产，趁着“打土豪、分田地”的机会，来满足他们的发财妄想。他们唯中共之命是从，并且还做得更为激烈以表示他们的忠实。于是，这些流氓地痞便被中共认为是革命的积极份子，更尽量的吸收到党里面来，不断的加以提拔，大胆地将他们捧上统治阶级的宝座。因此，这一批鸡鸣狗盗、好吃懒做的坏蛋，便一跃而为新统治阶级了。他们大多数成为苏维埃地方政府的重要人物，或农会工会的主席。一旦掌握了政权，或领导着民众组织，他们当然无法无天，胡作非为了。（《回忆录》下卷，页 566）

龚氏用的是常识语言，其中会有明显的道德谴责，这一点我们可以置之不论，但他的话正好可以注解伊罗生之说：中共的党并没稳定或一贯的“阶级基础”。（周鲸文《风暴十年》记所见 1950 年东北土地改革中斗争地主的情况，证明中共党的性格一直未改变。）毛泽东的最重要的成就便在于

他善于调动中国社会上各阶层，但特别是农村中的边缘份子。他能在极端艰困的情况下，反败为胜，最后夺取了“天下”，决不是偶然的、侥幸的。

但是毛泽东毕竟是二十世纪的人，在二十世纪“打天下”仅仅依赖中国传统型的边缘人还是不够的。尤其是他托身的共产党是直接受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口事实上是斯大林指挥的；他想取得党的领导权，便不能没有莫斯科的认可。这里必须提到中共党内另一个边缘人的集团：城市中的边缘人，主要包括知识分子和工人。在这个集团中占领导地位的大都到过法国或俄国，并得到共产国际的信任。陈独秀以后的中共领导人如瞿秋白、李立三、张国焘、王明、秦邦宪、项英、张闻天等人都是城市边缘人集团中的佼佼者。毛泽东和这个集团则格格不入。所以他自 1927 至 1934 年曾有过三次开除中委和八次严重警告的遭遇。怎样驾驭这个城市边缘人的集团是毛泽东生命第二部曲中的另一大课题。

1936 年西安事变以后，中共中央从荒凉偏僻的保安迁至延安，毛泽东才开始对城市边缘人集团进行收服的工作。毛泽东深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真理。遵义会议（一九三五年）之后，中共的实权已控制在他手里了。但是他还需要有合法性，而这必须由莫斯科和马列主义来提供。斯大林是一个彻底的现实主义者，这时已不能不默认毛泽东领导中共是既成的事实，尽管他对毛泽东并不信任。一九四九年毛泽东到莫斯科为斯大林祝寿。他们第一次见面时的对话是很有趣的。据当时翻译人的记述：

斯大林非常激动，对毛主席赞不绝口，说：“伟大，真伟大！你对中国人民的贡献很大，你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我们祝你健康！”毛主席回答说：“我是长期受到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毛主席言犹未竟，斯大林却把话接了过去：“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不能谴责胜利者，这是一般的公理。”（见师哲“陪同毛泽东访苏”，收在《毛泽东轶事》，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 年，页 366）

毛泽东在城市边缘份子手上所受到的委屈和斯大林赤裸裸的现实主义都在这一简短的对话中生动地表现出来了。

另一方面，中国边缘知识分子也开始在毛泽东的显赫霸业面前低头了，周恩来在这一方面起了决定性的带头作用。周恩来之于城市边缘人集团，正于毛泽东之于农村边缘人集团一样，是最为水乳交融的。以前毛泽东所受到的“打击排挤”，周也不能脱干系。（可看张国焘《我的回忆》第 3 册，页 1155-1156；《龚楚将军回忆录》下卷，页 549-550）到了延安时代，周显然已彻底臣服于毛。无论周内心的真实感受是怎样的——我们恐怕是已永

远无法知道了——他以身作则对毛泽东表现无限的忠诚是有着重大的象征意义的；这象征着城市边缘人的力量终于在中共党内降为从属的地位。1937年康生追随王明从莫斯科回到延安之后，很快地便背弃了王明而改投到毛泽东的门下。这也为边缘知识分子的见风转舵添了一个有力的例证。（可看 John Byron & Robert Pack, 《The Claws of the Dragon》, New York, 1992, Chapter VI）

也就在同一时期，毛泽东决定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身分出场了。他的《实践论》和《矛盾论》都是在 1937 年写成的，毛泽东早年究竟懂得多少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大可讨论的问题，据他自述，1920 年他在北京读过《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考茨基的《阶级斗争》和一本有关社会主义史的中译本。我们可以相信，“阶级斗争”这个观念确是从二十年代起已深深印在他的心中。但无论为何，至少在 1927 至 1937 这十年间，他没有时间和机缘研究马克思主义。所以，1937 年是他正式投入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年。这一年他有给艾思奇的一封信，信上说：“你的《哲学与生活》是你的着作中更深刻的书，我读了得益多，抄录了一些，送请一看是否有抄错的。”他的“摘录”有十九页之多，手稿保存至今。（见《中国哲学》第 1 辑，北京，三联书店，1979 年）。艾思奇是以《大众哲学》知名左派青年读者的，他的哲学造诣如何，大概知道的人不少，毋须多说。1949 年秋天，我曾经在燕京大学听过艾思奇的演讲，现在只记得他说“岳飞是一千多年前民族英雄”这一句话，其余都忘记了。

我们也不必斤斤计较毛泽东哲学水平的高低。值得指出的是：在延安时代毛泽东不但有枪杆子里面出来的政权，而且也有共产国际默认的党的领导权和马克思主义提供的“新天命论”。这是他第二阶段的三大成就。“『马』上得天下”的条件已完全具备了。

叁、最后的归宿

毛泽东的最后阶段是 1949 到 1976，也就是他在中国大陆建立了绝对性的个人权力的 28 年。毛泽东在这一阶段的历史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因此我们可以不必涉及事实。在这最后一节里，我将探讨他的精神和心理状态。

今天研究毛泽东的中外学人常异口同声的把毛泽东看作是二十世纪中国的“皇帝”。例如纽约时报的记者萨斯伯里（Harrison S. Salisbury）去年（1992）出版的有关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新书便干脆定名为《新皇帝——毛、邓时代的中国》（《The New Emperors, Chinese in the Era of Mao and Deng》）。在“登龙位”这一部分，他判断毛泽东是“马克思加上秦始皇”。

日本著名的中国现代史专家竹内实，在《毛泽东》一书的结论中也肯定毛泽东所拥有的是“皇帝型权力”；最后一节标题则是“始皇帝与毛泽东。”

（此书日文本出版于1989年，中文本由黄英哲、杨宏明合译，台北自立报系出版，1991年）把毛泽东和秦始皇相提并论是最自然不过的事，因为他自己便坦白承认过：他不但是秦始皇，而且比秦始皇还要“超过一百倍”。当然，他也说到：“主席不是皇帝，主席只是人民的一个服务员。”（《走下神坛的毛泽东》，页224），但这不过是玩名词游戏而已，传统的皇帝在理论上也未尝不是为了“便于天下之民”？（刘邦即位诏书之语）

然而进一步看，他和中国史上任何一个?国皇帝都不一样，传统的“创业之主”在“得天下”之后无不战战兢兢地寻求“治天下”之道，也就是如何建立和稳定秩序。毛泽东恰恰相反，它似乎最害怕“秩序”，而且越到晚年越对“秩序”越不能容忍。在1967年5月18日〈伟大的历史文件〉这篇社论末尾，毛泽东亲自添上了下面一段话：

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毛泽东同志近几年来经常说，革命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千万注意，绝不可丧失警惕。（引自华永烈，《陈伯达》，香港，1990年）

这段话反映了他1949年以后的一般心理状态，不过在晚年更急迫罢了。所以在他统治中国大陆的28年中，各种“运动”一个接着一个，从未停止过。这种心理也许可以看作是对“异化”的深刻恐惧；他总是觉得一生所追求的“革命”会随时离他而去。最初他担心党外的“资产阶级”在破坏他的“革命”，因此而整治工商界（“三反”、“五反”）和知识分子（“反右”）。在党外的斗争对象消失以后，他的疑惧便立即转向党内；19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首当其冲。他因批评“大跃进”而被毛泽东认为是“资产阶级份子、投机份子混在我们的党内来”（引自《陈伯达》，页217）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这个怪论便扩大到全党了。

研究毛泽东的人都注意到他自早年起便有好“斗”的本性，“阶级斗争”的理论更对他发生了如虎添翼的作用。但问题上不只此。我们必须更深入地去了解他所持有的“意志”。从好的方面说，他的坚强意志使他能从井冈山那种最艰苦的环境中一直坚持到打天下。这不是常人所能做到的。也正是这种坚强意志慑服了和他一同“打天下”的伙伴。早年由于受到杨昌济的影响，他最佩服他的同乡前辈曾国藩。他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取舍洪、杨之役，而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

（1917 年月 23 日给黎锦熙的信，引自李锐《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 年，页 28）其实他最有契于曾国藩的当是后者那种坚毅不拔的意志。曾氏有名的【挺经】便是这种意志的具体表现。但是他完全没有曾氏的学养和克己工夫。

他的浪漫和放纵则是时代潮流造成的。从谭嗣同的“冲决网罗”到五四的个性自由与解放都是鼓励青年不受一切传统轨范束缚。这种个性解放对于一般人自然有积极的意义，因为这是创造力得以自然发挥的基本根据。但是一个拥有绝对权力而又拒谅饰非的政治领袖任由他的浪漫意志横冲直撞、所向披靡，则其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然而这样的情况却恰恰发生在毛泽东的身上。韦伯所谓政治家必须适从“责任伦理”的观念在他那里是绝对不存在的。如果在进一步分析，毛泽东的意志和曾国藩的更一极端相反之处，曾的意志是有积极内容的，是为了建设某种正面秩序而服务的。毛的意志则是不折不扣的符合黑格尔所谓“否定的意志”（negative will）。

“否定的意志”本身无积极的内容，因为它并不是真的追求什么东西的实现。它也似乎在不断地追求什么，但所追求的永远是模糊不清的，一旦实现则又构成它本身活动的阻碍，因而必须再度加以否定。所以它只有在不断的否定、破坏中才能肯定其本身的真实存在。毛泽东所向往的“革命”正是一个模糊不清的乌托邦，而每一次实现了的秩序则都和他的“否定意志”格格不入，终于一而再、再而三地变成否定和破坏的对象。这是他所所谓的“文化革命”不是一二次、三四次便能“太平无事”的深层意义。这种思想也是拜时代之赐。中国在二十世纪早期，反传统的浪一次高于一次，终致使一般激进的人对于中国原有的传统无所肯定。毛泽东也常常讲“必须学好中国史”之类的话，似乎它很重视历史。但一按其实，他所重视的则是大规模破坏秩序的历史，主要是所谓“农民革命”。他在 1964 年写了一道题为〈贺新郎 读史〉的词。其下半阙云：

一篇谈罢头飞雪，但记得斑斑点点，几行陈迹。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有多少风流人物？盗拓庄？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歌未竟，东方白。

这里最可以看到，他完全不相信中国史上有任何“神圣”的事迹。只有盗贼和造反是值得歌颂的。毛泽东拥有“皇帝型权力”，但他真正认同的不是皇帝而是造反者。可见仅仅把他看作中国史上皇帝的延续还是不完全恰当的。中国史上打天下的皇帝，诚如吕留良所说，都是“光棍”或“世路上英雄”，但历史上的“光棍”做了皇帝之后便成“正果”了。毛泽东泽拒绝成“正果”，他要永远保持其“光棍”的身分。

前面曾指出，中共党内自始便存在着两种不调和的势力：农村边缘人集团和城市边缘人集团。这两个势力在延安时代暂时统一了，并且统一在毛泽东个人统治之下。1943年，中共中央政治局便已赋予毛泽东“最后决定之权”。但毛泽东基本上是农村边缘人出身，他对于城市边缘人从来没有信任过。这种不信任在1949年以后一天天在加深之中。在统治局面遽然扩大到整个中国之后，他日益感到他的意志已不能像在延安时代那样驰骋自如。而且他更感到：这种失控是由于他的政权已从农村取向转变为城市取向所造成的。他本来便讨厌城市取向的干部，现在他更把他们看成是使他的意志不能自由发挥的主要障碍。“资产阶级混入党内”的观念便这样形成了。毛泽东对于城市的恐惧不安，下面这个富于象征意义的真实故事可为说明：

毛泽东在万岁声中走进北京城。记得进城那天，毛泽东一脚车上一脚车下，对周恩来说：“进城赶考去！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希望考个好成绩！”（《走下神坛的毛泽东》，页86。并可参考萨斯伯里的访问，见《新皇帝》，页9）。

然而事实证明，这一场考试，毛泽东是彻底的失败了。

毛泽东时代对人进行控制的阴损招数

（博讯北京时间2012年1月20日 来稿）

一、信息闭塞

国际交流压到最低限度。国际新闻一律由新华社发通稿，有倾向性新闻选择新闻解释（按国内政治需要来任意取舍国际新闻）。再由各报一律转发，统一口径，舆论一律，形成“三人成虎”效应。

对国外形势报忧不报喜。对国内形势报喜不报忧。

媒体一律公费办，发行基本公费订，连读报也是单位安排（每晚二小时政治学习包括读报）。

一般读者无从比对选择，不怕你不信。所以老百姓以为“世界上还有四分之三受苦人等待我们去解放”。欧美百姓生活比我们苦的多。于是产生了幸福感，知足心。

但上层可通过各种文件简报内参资料了解真情。

作用：统治上形成了信息不对称的优势----上知下，下不知上；内知外，

外不知内。

二、行政控制

社会的行政化控制，达到有史以来最严密程度。

古代社会，政权不下乡，只到县一级，文革中，行政权力通过“单位”，一直落实到每个角落每个人头上。

工农商学兵，全国人人都属于一个单位（农民归公社管）。单位不仅在经济上控制了个人（农民是工分，工人是工资，外加户粮关系），在行政上也控制了个人（个人诸种自由如长途外出，结婚离婚，搬家迁移，调动工作，上学培训……等等，要经单位批准）。

在政治上思想上也控制了个人（如政治学习，思想汇报，尤其个人秘密档案）。

甚至，单位对个人的控制，还深化到了刑事治安领域。县团级党委有权对员工作出政治处理（轻则发动其他员工开你的批斗会对你进行殴打。中则关进“学习班”“牛棚”——单位设的变相牢房，剥夺你的人身自由。重则戴上“帽子”使你具有“阶级敌人身份”也即使你沦入贱民阶层从而不具有了生存保障权）。

由于全社会高度统一行政化，因此无论你到哪个地方，都有单位管着你，无论你换了多少单位，所有单位的管理模式都高度一致且前后衔接。

天网恢恢，密而不漏。

三、阶级斗争

“无产阶级专政”顾名思义，是阶级对阶级的镇压。

解放初期，土改是真正意义上的阶级斗争。后来全国“镇反”杀了上百万，也算阶级斗争的延伸应用。

此时，“阶级敌人”比较单纯，仅仅指地主富农资本家，新政权的原政敌（历届旧政权的骨干——警长、排长、保长、支部书记长以上——称为历史反革命分子）。

后来，罪名越来越随意，“阶级敌人”范围越来越宽：

从批判“清宫秘史”“胡风反动集团”开始，意识形态跟不上“最高”的思路的人员开始成为“反动分子”。

从“高饶事件”开始，党内政斗失败者成为“反党分子”。

从五七年“反右”开始，知识分子有各种异议甚或无心说错话者，成为“右派”。

从五八年“反右倾”开始，党内对政策有不同见解者，成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从六十年代“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口号提出后，是凡对党对毛对各级官员不满的人，是凡对社会现实不满的平民百姓，成为“现行反革命分子”。

而生活作风等被认为不检点（如通奸，不遵守纪律）的平民百姓，则成为“坏分子”。

文革中更为混乱，打派仗时各派均称对方为“三反（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思想）分子”。

解放前当过地下党或曾被俘的干部战士，多被打成“叛徒、特务”。

文革初期，绝大多数领导干部被当成“走资派”而被冲击打倒。

红卫兵与造反派在文革中期被压垮时，其中抓了百万人，罪名是“516分子”。

同时有效转移了民众对贫困生活现实的视线（民众以为，生活贫困是因为“阶级敌人”造成的）。

四、群众运动

阶级斗争是采用“群众运动”形式进行。通常分四阶段：

1 动员阶段：

先由掌权者（单位领导或上级派下工作组），进行大会宣讲，发放学习文件，群众学习讨论表态拥护，统一思想，形成氛围（把可能的反对意见先行压制处理）。

2 检查阶段：

每个群众都必须向上级写出汇报材料，坦白自己平时错误言行，并检举同事平时错误言行。换言之，人人检举他人，人人受他人检举，包括动员子女揭发父母、老婆揭发老公。（当时我们私下归纳为“人人过关，领导把关；群众互咬，领导观战；挑起矛盾，领导裁判”）。温和点的运动里，这种做法叫“批评与自我批评”。狠点的运动里，这种做法叫“阶级斗争时时有处处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3 斗争阶段：

掌权者根据群众汇报材料及平时掌握资讯，把群众分类（确定依靠对象、团结对象、打击对象）。再组织前者批斗后者。这样，本质上是领导者掌控一切，但表面上是群众在当斗争主力了。因为会上发言批判、出手殴打、执枪关押、破门抄家的，都是群众中的积极分子。甚至，这支积极分子队伍就叫“群众专政队”（专业公安机关不出面，只作威慑力量）。

4 处理阶段：

运动最后结果是提拔一批人（斗争积极分子们入党提干评先），处理一批人（被打击对象被戴帽、开除、判刑）。

一言以蔽之，此术为“挑动群众斗群众”“以群众制群众”。制造矛盾，利用矛盾，分而治之，驭下有术。从延安整风发明此术以来，屡用屡灵。

作用：

“群众运动”妙处一：形成群众人人自危的氛围，迫使大家欲求自保，互相提防，互相窥视，抢先告密，讨好领导。织成了一张互相监督互相制约的天罗地网。使大家“只能规规矩矩，不敢乱说乱动”。

“群众运动”妙处二：每场运动在产生一批受害者的同时，也产生了一批得利者——利益是发泄了内心施虐欲，利益是公报私仇，利益是火线立功入党提干（古称用别人鲜血染红自己顶子）。况且有专门政策规定：即便事后查明受害者中有被冤枉的，最多解脱受害者，但要“保护斗争积极分子的积极性”，也不会追究诬告、打人乃至杀人者的责任。（这样，“群众运动”始终有群众基础）。

“群众运动”妙处三：积极分子希望多整人——既可满足内心施虐欲，并使自己这类走运者物以稀为贵。妙在已倒霉分子也希望再多整些人下来——争取立功减刑，并使自己这类倒霉者有更多陪伴以分轻压力。（这样，巧妙发掘并利用了人性中恶的一面）。

补充：反右运动时，群众互咬尚未形成习惯，上级便往各单位硬压指标，规定被打击名额，达不到则拿单位领导人充数。由于毛时代“运动”每几年来一次，到文革时，中国百姓已习惯成自然，运动号令一下，群众便习惯性地互相撕咬起来]。

所以，现在为文革唱赞歌的，许多是当年斗争积极并以此为乐，“与人斗其乐无穷”的人。

客观地说，领导者玩弄平民于股掌中，有史以来，以此为最成功。

五、贱民阶层

运动中的倒霉者成为戴上帽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以及叛徒、特务、走资派）的分子。加上解放初期已划出的“地主分子、富农分子”。这一批人被打入另册，加上“血统论”政策使其直系亲属也沦入另册，于是，另册人口成为社会上倍受歧视的群体，成了贱民阶层。

当时习惯上称为“05%”。其实，若加上“血统论”拖进的直系亲属，该阶层占人口比例应在20%左右。

贱民阶层成员生存状况极恶劣。不允许入党当官参军上大学。工作要最累的，收入要最少的。平时大家都可以随意欺侮他们。甚至于打死打伤完全无生命保障。运动一来，有理无理也揪出来批斗一番，开会时要在会场前跪成一排。（当时有种说法叫“把监狱放在社会上”让“群众专政”）。

贱民阶层的存在有效保障了社会安定。通过发动“95%”打压“05%”，取得如下效果：

1 “转移视线效应”。行政管理上发生的罪责挫折都可以推到“05%”头上。转移了“95%”的视线。

2 “排泄渠道效应”。使“95%”可以通过施虐于这些贱民，取得心态平衡。

3 “杀鸡吓猴效应”。由于“95%”到“05%”之间并无一道鸿沟，县团级党委就有权给平民“戴上帽子”----即把你从“95%”划到“05%”中去。于是“95%”也人人自危，生怕自己由于触怒上意而被踢进“05%”。所谓“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表面是对“0.5%”的公开训斥，未尝不是对“95%”的暗示警告。

试想，除最高领导人外，连国家主席、开国元勋、元帅将军、省市领导、大学教授、劳动模范们都能从座上客翻为阶下囚，那还有什么人敢说自己就肯定不会掉进贱民阶层的深坑里去了

4 “地位比对效应”。从理论上讲，一个社会要稳定，社会阶层上最好形成两头小中间大，即有个强大的“中产阶级”。而设置了“贱民阶层”做垫底，在形式上把一般的工人农民抬升到社会“中层”地位。

设身处地，我是一般工农。那么，我通过（眼光向下的）比较、形成了优越感满足感。我通过（对弱者的）施虐，排遣了贫困劳累带来的郁闷感。我通过（亲身体验的）批斗，形成了恐惧感自律感。于是乎，我心态平衡了，我知足了（尽管我贫困劳累）。

补充：另有两个群体，名义上不是贱民阶层，但实际享受的半贱民待遇。

知识分子群体（五七年反右从政治上被搞臭，文革中批斗从业务上被贬低，称为“臭老九”，是“被改造对象”），

内控人员群体（通常是归侨。历届旧政权的士兵、警察、甲长、公务员。被发现曾有过对社会不满言论者。刑满释放者。历史不清者。特嫌）。内控人员表面与大家一样，但个人档案内秘密注明“内部控制使用”。他们不被信任而被时刻提防，但他们自己往往并不知道。

六、城乡二元结构

城市居民有户口、粮食关系。凭此发放粮票、布票、肉票、油票、火柴票、肥皂票、糖票、烟票等高达七八十种票证。在市面上，这些基本生活资料光凭钱是买不到的，必须同时凭票证。定量供应（份量在吃不饱也饿不死之间）。

农民无户粮关系（也即不发放以上票证）。于是，离开本乡本土不能生存，进城不可能。死死被捆在土地上了。（农民离乡背井，被称为“盲流”，轻则遣送回乡，重则被公安机关“收容教育”。连“暂住证”的机会都没有）。

城里人无批准，到处流动也不可能（因以上票证是由本地本单位发放。离开本地本单位就没有生活来源了）。死死被捆在单位里了。（文革中期，企业、学校内实行军队化编制——“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思想革命化、领导一元化”，上面对下面的管制更极端化）。

这就有效控制了人口流动。

人口流动凝固化，使社会闭塞，安定（呆滞）。顺便也阻绝了口口相传的讯流通，支援了第1点。

七、大锅饭式分配

单就平民的经济生活而言，消费较平均。但这是“等级平均”。

计划经济模式下，社会财富分配行政化。按官本位原则构建成全国统一的经济收入金字塔，经济收入与政治等级严格挂勾。官越大者钱越多，官越小者钱越少。中国有史以来，权力与财富的结合从来没有如此紧密。

同一等级，无论在全国何地，基本上工资收入相同。

但从等级间不平均上讲，比改革开放的今天更甚。毛时代，单从工资上讲，最高级与最低级相差三十余倍。况且，越往上，其生活私人消费变为职务公款消费的比例愈大。工资收入占消费支出的比例愈小。再何况，权力越大，调用公款合法为自己及家庭服务的途径越多。

在平民中大力提倡推行“一厘钱精神”，艰苦朴素。把追求消费丑化成为“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是“变修”了。也起到心理安抚作用。

当时有人归纳其规律：“荣华富贵由上面发出，艰苦朴素从平民抓起”。

八、个人崇拜

动员全部人文领域（新闻、文艺、教育、史学、哲学社科），长期突出两个主题（神化个人与妖魔化其他人）。也即一切功劳归于毛主席，一切错误归于别人。

个人崇拜的形式有许多首创：早请示晚汇报、语录舞忠字操、学毛著

积代会、“雷打不动”每天政治学习、创作歌曲百分之百是个人颂歌、小中大学教材一路颂歌，文艺与新闻充满颂歌。报刊上文章大量引用毛语录并且要用黑体字。

把毛之语录称为“最高指示”，高于宪法党章之上。

“爹亲娘亲不如毛亲”，“三忠于四无限”，“毛著，一天不学走下坡、二天不学问题多、三天不学没法活”。宣传媒体天天向人民灌输这种观念。

公安六条规定，对毛与林提意见，即为犯罪（恶攻罪。死于此罪名者不知凡几，如被割喉的张志新与被生取器官的李九莲）。把一切批评扼杀在萌芽状态，避免影响扩散。

“事实要为政治服务”，历史与新闻，不讲真实性，只讲倾向性。

妖魔化国内党内不同政见者（如十次路线斗争之观点，“大批判”充斥全部报纸版面）。

使百姓有一个盼头：我的日子再苦，本地形势再糟，要怪就怪本地官员没搞好，要怪就怪国外帝修反的破坏。但上面有个“大救星”，总会解救我们的。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南都揭秘:毛派整死高華

作者： 洪深

更新於：2012-01-11

金鐘按：當代中國最有影響力的歷史學家之一高華教授，在毛澤東生辰日以 57 歲的盛年早逝。毛派饒幸「毛生高死」，卻也反映高華在批毛大業上舉足輕重的史學地位。他的名著《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2000 年在香港出版，迄今仍是中共研究的里程碑之作。高華出身在右派之家，童年就感受到社會的殘酷不公與毛的統治有關連，並促成他思想的早熟，追索現實苦難的歷史根源。終於在完成史學教育之後，克服種種艱困，實現宿願，為批毛作出名垂青史的貢獻。12 月 30 日南京大學舉行追悼會，有 500 人出席，氣氛悲壯，預示毛被釘上歷史恥辱柱的一天，終將來臨。

（參與 2012 年 1 月 10 日訊）在連續十來天多次刊發痛悼“中共黨史專家第一人”高華文章後，《南方都市報》前天（2012 年 1 月 8 日）再次發表 兩篇悼高力作，再次揭秘高華其實死于毛派以多種詭計整死——先以

長期虐待造成其生活貧困而染病，再以限制藥費逼其死於毛澤東生日。

中山大學教授劉根勤《學者與體制之間的迷惘》和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張鳴《高華：一個學者的堅守》兩文，揭露了致高華於死命的直接原因——南京大學拒絕支付高華急需的藥費：“高華教授“治病”過程中，為使用“國產”還是“進口”針以及用藥量與學校產生衝突，學校當然只允許使用國產，儘量少用。”（劉根勤）這讓人明白：“當學者是具有自由精神獨立品質的人文學者時，有沒有可能與一個在所謂新形勢下愈發堅固強勢且自以為是的體制實現“和平共處”？從高華教授（被逼）去世這一事件上，我們得出的答案顯然是否定的。

長期虐待，生活貧困而染病

張鳴的遞進揭露是，毛派先以長期虐待造成高華生活貧困而染病：“他（高華）在南京大學讀了 10 年歷史，1988 年畢業留校任教後，在 2001 年前，一直只有一間單位宿舍，許多文章是在筒子樓裏的公用廚房的小餐桌上寫成的。一個在國內 985 大學做了十幾年教授的人，房子很小，走廊過道甚至衛生間都被書和資料塞滿。即使這樣的小房子，他也是得借錢才能買得起。”

接著，張鳴又以微博展示：毛派即使實現了其讓高華死於毛澤東生日，營造出“毛生高死”寓言後，仍然不甘休，還要讓高華的追悼會也不自由：“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系張鳴教授在微博上聲稱，南京大學黨委要求審查他準備在追悼會上致的悼詞。”高華就此又增添了失去在天之靈聽取張鳴致悼詞的痛苦。

這些揭露與控訴得到章詒和、許紀霖、楊奎松、何清漣等眾多學者的多篇回憶證實。

當局無理阻擾，不得調任華東師大

關於“毛派先以長期虐待造成高華生活貧困而染病的事實”——“猶記當年他出版那本集史識、史才與史德於一體的書《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之後，我到南京，他指著與他人共用的廚房小餐桌告訴我，那本書就是在那張餐桌上完成的——2001 年以前他一直只有一間住房，與人共用廚房。”

“他原來與系裏兩位副教授一起擠筒子樓的悲慘生活，到 2000 年搬到了龍江社區宣告終結。但卻一直‘貧’。……他這 10 年聲名鵲起，在海外學界、在國內的輿論界尤其是南方報系備受推崇，卻到最終因為治療問題還要乞助於學校。”“他在歷史系連讀書加教書待了 33 年，沒拿到系裏（課題費）一分錢。”

還有：高華是 1999 年評上教授的，是因為錢理群教授、楊振寧先生等知名人士多次對南京大學校長不滿的社會壓力才評上。

還有：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極想調高華，但高華最終沒有調入上海。因為“‘上面’說了，這樣的人怎麼能進上海呢？”

所以章詒和作的挽歌得到千萬線民的合唱：哭高華，哭高華，風起鐘山，哲人日萎。……哀君事業，中道崩殂。世間真相，何由得明？

更有線民懷疑，其實 2007 年 4 月 25 日，健康的高華被學校組織的“例行體檢”發現“疑似肝癌”，就是一個“錦衣衛陰謀”——因為當時高華的《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一書已對毛澤東形成了毀滅性打擊，所以毛派決心讓本來沒病的高華不斷在惡意檢查和治療中真的患病！從中共向來有以治病來暗殺叛毛者的傳統——連劉少奇、周恩來等元老都會遭遇毛的“病殺”，何況一個小小的高華？這從李慎之、何家棟等人離奇地病死，早以窺探出了蛛絲馬跡。

2012 年 1 月 9 日

为什么希特勒不如毛泽东？

2011-01-05 21:58:05

用希特勒和毛泽东做对比，是因为希特勒和毛泽东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比如：两人都曾拥有绝对权力；都曾指挥屠杀过千百万人；都实行社会主义政党的独裁统治；一个要统治世界，一个高喊要解放全人类；也都曾经受到过民众狂热的爱戴。希特勒遗嘱上说是“为人民服务”，而毛泽东也说“为人民服务”。

但奇怪的是，德国和中国两国民众，现在对两个人的评价真可谓是天壤之别。

现在的德国，希特勒的名字几乎就成了杀人魔王的代名词，被世人唾骂；而毛泽东在中国仍然不断被推崇；希特勒的画像在德国被禁止悬挂，传播，否则违法，而毛泽东的画像至今仍被悬挂在天安门城楼正中央；希特勒被德国人视为耻辱，而毛泽东被中国人捧为神明，很多出租汽车司机，都在自己的车里面挂着毛泽东的小头像，还说是能避邪。在德国，一部电影如《帝国覆灭》，里面稍微的有几个镜头把希特勒描写的拥有人性，就遭

到大批德国民众的如潮批评，而中国关于毛泽东的电影电视书籍铺天盖地，无一不把毛泽东描绘成一个思想家、诗人、军事家、战略家、政治家、革命家……。

众所周知，希特勒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屠杀了几百万犹太人。而毛泽东则利用各种运动饿死、害死了几千万的中国人，数亿中国人饱尝苦难。本来，两人所为相差无几，待遇就应该不相上下，但希特勒已经臭名远扬，而毛泽东仍是崇拜对象。对此，不得不承认，希特勒实在不如毛泽东。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距呢？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因为德国民众与中国民众的不同，才导致了对两人的评价和态度的不同。假如毛泽东生在德国，德国纳粹行举手礼，但喊的不是“万岁，毛主席！”，而是要喊“**Heil! 毛泽东!**”。但若希特勒生在中国，在天安门城楼接见无数激动地哗哗流眼泪、高举带希特勒头像的红色小本本的民众们，他将听到中国民众“希主席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的狂呼以及民众大合唱“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希特勒”的雄壮歌声。

其实抛开政治方面不谈，单论人的品质，同毛泽东相比，平心而论，希特勒这人还是挺不错的。比如说，希特勒一生没有烟酒嗜好，毛泽东则烟不离手。希特勒在战败前，他相爱了 15 年的爱娃能够为他放弃逃跑，舍身相随，两人在地堡举行婚礼后一起自杀。这两人对感情的忠贞，当代少有。但即使不算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史料被披露毛泽东个人生活糜烂，奸污玩弄妇女无数，就按官方资料，他一生中也明媒正娶 3.5 个人（原配罗氏就算半个）。毛泽东不但在井冈山怀抱新欢贺子珍，拒绝旧爱杨开慧前来投奔；后来在延安和江青乱搞，将在长征时“生孩子都生怕了”贺子珍以治病为由赶到了苏联。希特勒要自杀，爱娃就以身殉葬，希特勒“不仅赢得美人身，更赢得美人心”。毛泽东死后，江青则评价自己“我就是主席的一条狗”。

在使国家强盛，发展国力，搞经济建设方面，希特勒绝对是非常成功的国家领导人。在 1933—1939 年执政上台后的短短 6 年之内，一下子就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折腾得“一穷二白”的德国建成了超级帝国，创造了货真价实的“经济奇迹”。——这不是中国编造 GDP 连年增长数据，是真正的经济奇迹。1933 年 1 月，希特勒上任帝国总理的时候，德国有一百万失业人口，中国叫“下岗工人”；人民生活贫困，贫富差距极大。但短短的三年之后，德国就消灭了失业，德国人的贫困生活神话般的变成了富足。更奇妙的是，希特勒的从经济大萧条到经济繁荣的过渡，不是通过通货膨胀实现的，德国民众的工资与当时物价完全稳定，仅这一点，在世界上就

很少有国家领导人能够做到。

毛泽东在国家建设方面，不但没法儿和希特勒比，而且只能说是交白卷。单单一个大跃进就把国家经济闹得崩溃，非但没赶英超美，反而在和平时期饿死了几千万中国人。同希特勒的富国强兵相比，毛泽东就好像是打入中国内部的间谍，可以明目张胆地搞破坏。如果中国要想破坏某个国家，可以把毛泽东送给该国，那不论是哪个国家，绝对让它一边国破家亡，一边喊“毛主席万岁”。

有人说毛泽东在军事方面厉害。但要说起来，希特勒当年的如闪电战，装甲部队突击等许多战法，以及许多军事奇迹，仍然被今天世界上的军事迷们津津乐道。而被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武装的中国军队，在跨入新世纪之后才开始搞希特勒军队当年的机械化和信息化。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最大特点，就是人民战争和人海战术，不把老百姓的生命放在话下。

所谓的毛泽东军事思想其实很大一部分都是被神化了，其实回头看看，要不是日本侵华，单凭毛泽东的本事，毛泽东早就被国民党灭掉了。所谓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其实就是被迫逃跑。在关键时刻日本打过来了，国民党抗日救国，忙不过来了，才被迫和毛泽东“联合抗日”。也之所以，毛泽东后来在 1960 年会见日本社会党议员黑田寿男等人时，明确表示“日本不用为侵华道歉，而且感谢日本侵华”。周恩来也是对日本要求赔款表示一笔勾销。

还可能有人说，毛泽东的艺术气质不俗。要论这一点，希特勒的绘画艺术水平十分专业，本来是可以成为画家的，但人家从来没有刻意把自己包装成为艺术家。毛泽东的诗词也是良莠不齐，一首《念奴娇·鸟儿问答》极具争议：“不见前年秋月朗，订了三家条约。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读这种所谓“伟大”的诗篇，怎么也无法令人感到被吹捧的“豪迈、洒脱”。

说起杀人，希特勒从不矛头对内，从不杀自己人。希特勒的“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党内的革命战友，格林、赫斯和戈培尔等人对希特勒自始至终都忠心耿耿，戈培尔一家还为希特勒陪葬。而毛泽东是专门矛头对内，专杀自己人。毛泽东的革命战友没有一个有好下场的，均被悉数整治，无一幸免。即使是没有被毛泽东公开批判的“和稀泥高手”周恩来，最后也被毛泽东下令延误治疗癌症，死在了毛泽东的前面。

希特勒和毛泽东相比，希特勒爱国，而毛泽东卖国。希特勒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是一个为祖国而战斗的英勇战士。他受过伤、获得过勋章。与此相反，毛泽东从他参加“革命”起，就干尽了叛国投敌、分裂祖国的勾

当。早年的中国共产党是苏共的儿子党，是作为共产国际下属的中国支部。1929年，苏联为了维护它对中国东北和东北铁路的特权，悍然挑起中东路事件；7月18日，苏联与中华民国政府断绝外交关系，并调集88万军队集结于中苏边境，8月中旬开始向中国东北边境大举进攻。为了配合苏联的武装入侵，毛泽东加剧了它在“革命根据地”的武装斗争，公然提出了“武装保卫苏联”的叛国口号。1931年9月18日，日本鬼子偷袭沈阳北大营，用大炮轰响了全面侵华的序曲。在此国难当头之际，在苏联国庆日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全国临时中央人民政府”于江西瑞金宣布成立，毛泽东任主席。中国的国土上出现了国中之国——“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也就是从这一天开始直至今日，中国就再也没有统一过。所以，最先分裂祖国的不是汪精卫、不是溥仪，而是毛泽东。

在夺取政权之后，毛泽东当上独裁者，为了充当第三世界和国际共运领袖，毛泽东继续出卖国家利益，在人民连饭都吃不饱的情况下，不惜血本，输出革命，大力支援世界各国的共产暴乱。为了讨好周边国家，甚至拿祖国的神圣领土送人；比如为了中缅友好，他把中缅边境的江心坡地区7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一下子就划给了缅甸，相当于两个台湾！1962年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胜利之后，他又命令中国军队不但不巩固战果，反而单方面撤军，把中印边境麦克马洪线以南九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拱手让给印度。1987年，印度议会通过法令，正式在“麦克马洪线”以南中印争议地区建立“阿鲁纳恰尔邦”，陆续往那一地区移民700多万，造成既成事实，永久占据了这块相当与三个台湾的领土。为了讨好朝鲜，他把长白山脉的一半多送给了金日成。

但希特勒的“爱国”也不好。为了实现称霸世界的野心，他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把德国和全世界带进了战争的深渊。

希特勒和毛泽东都是战争狂人。他们都策划和领导了一系列非正义战争。但是他们的敌人却极不相同。希特勒的敌人是外国人，毛泽东的敌人是本国人。希特勒的军队一度几乎占领了整个欧洲大陆和大半个非洲，而毛泽东的丰功伟绩则是打跨了“800万蒋匪兵”。所谓“蒋匪兵”，和“解放军”一样是中国人，其中的绝大多数人和解放军一样是穷苦农民。

为了夺取政权，毛泽东在“10年土地战争”和“3年解放战争”中，让一部分穷苦农民的儿子攻打另一部分穷苦农民的儿子。只谈打跨了“800万蒋匪兵”，而不提自己的牺牲；毛泽东以“人民战争”（人海战术）自夸，牺牲得更多！为了毛泽东的政权，数以千万计的穷苦农民的儿子横尸旷野。毛泽东并不是没有机会打正义战争。1926～1927年的北伐战争是削除军阀

割据、统一中国的正义战争，但是毛泽东接受苏联顾问们的指示，认为军阀势力过于强大，北伐战争胜算不大，反对北伐。1937~1945年的全面抗战，是一场事关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卫国战争。毛泽东搞的却是“一分抗日、二分宣传、七分发展”，以抗战为名养精蓄锐，以抗战为名扩充实力，伺机夺取政权。毛泽东也打过一些对外战争，计有：抗美援朝战争、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珍宝岛之战、抗美援朝战争等。而这几场战争几乎都是没有必要进行或没有必要参加的战争。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打这些仗，没有给中国人民带来任何好处，只给中国老百姓造成了无谓的牺牲。希特勒和毛泽东这一对战争狂人所发动和领导的非正义战争，都给本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希特勒打的是对外战争，德国人毕竟只是战争的一方；而毛泽东打的主要是内战，战争的双方都是中国人。

希特勒推行种族主义，宣扬日耳曼民族优秀、亚利安人种高贵，对犹太人、吉卜赛人等“劣等”民族进行种族灭绝，杀戮600多万犹太人；罪恶滔天、令人发指。毛泽东倒是不搞种族主义，但他搞阶级路线，把自己的民族分裂成了两派势不两立的阶级敌人斗得你死我活。早在解放战争中，军队就开展阶级教育运动，通过忆苦思甜来煽动阶级仇恨。在夺取政权以后，又通过土改消灭地主、打击富农。从此，阶级斗争的弦始终没有放松过，阶级路线始终没有偏离过。1962年毛泽东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阶级斗争一抓就灵”。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人还在、心不死，必然要和我们捣乱”变相地鼓励群众组织从肉体上消灭“阶级敌人”。于是，“斩尽杀绝黑四类，永保江山万代红”的标语堂而皇之的出现在中华大地的大街小巷。在北京大兴县、湖南、广西、江西等地都发生了大规模的有组织的对“四类分子”进行灭门屠杀的事件。

毛泽东的阶级绝灭政策，比希特勒的种族绝灭政策有过之而无不及。毛泽东把实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将功赎罪、立功受奖”的政策，鼓励告密、鼓励背叛、鼓励揭发、鼓励反戈一击。上下级之间、同事之间、朋友之间，今天你揭发我、明天我揭发你，人和人之间再没有诚信和忠实可言。阶级路线甚至深入到家庭内部，毛泽东公然号召出身不好的青少年与家庭划清界限，背叛自己的家庭，争当“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子女不认父母、妻子揭发丈夫的事情司空见惯。毛泽东彻底败坏了中华民族的伦理关系，中华民族敬老爱幼、尊师重道、仁义礼智信等传统美德被搞得荡然无存。……

其他的还有很多，不再逐一列举。其实，这里并不是要给希特勒平反，目的也并不是如何评价希特勒这个人。只是通过对比，说明毛泽东获得了某些中国人的推崇，并不是因为他值得推崇；希特勒被世人唾骂，也并不是说他一无是处。恰恰相反，通过在各方面的对比，毛泽东根本就不应该获得比希特勒更高的推崇和评价。

假如毛泽东在德国进行了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大炼钢铁，饿死了几千万德国人；在德国发动了德国文化大革命，那德国人还会推崇毛泽东吗？德国人还会把毛泽东当成伟大的思想家、诗人、军事家、战略家、政治家、革命家吗？毛泽东还能够德国延续几十年的独裁统治吗？不会，德国人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

德国民众对于希特勒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罪恶，对“纳粹主义理论”的希特勒思想，都进行了充分的反省，赢得了世界的尊敬。希特勒即使为德国的经济发展、国力增强作出了卓绝的贡献，但是错了就是错了，杀人了就是杀人了，恶魔就是杀人恶魔，祸国殃民就是祸国殃民，什么人就应该受到什么样的评价。

德国人不会被所谓的“三七开、四六开”、“一切向前看”和所谓的“只是犯了错误、走了弯路”等等说法所糊弄。因为德国人热爱的是国家和民族，而不是在热爱某个党和某个领导人。

简而言之，对比希特勒和毛泽东的之间差异，并不在于评价这两个人本身，而在评价他们的两个民族，以期引起中国人对自己的反省。

我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

李国元

建国六十周年庆典的大游行中有一个方阵，抬着一个大标语“毛泽东思想万岁！”这条标语口号，很熟悉，又似乎久违了。

其实，说熟悉，也只有 50 岁以上的人才熟悉。40 岁以下的人，未必清楚“毛泽东思想”的演变。即使是 50 岁以上的人，如果不关心政治，也未必能把这个东西说清楚。本人蠢活了一又四分之一个甲子，不揣冒昧，向年轻人说一说我对这条标语口号的认识。

我在学生时代见到的标语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毛泽东思想”这个专有名词的原创者是刘少奇，后来在中共七大通过的新党章

中作了规范化的表述：“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并规定：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所以，也有的标语写的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那时对毛泽东思想的理解简单而具体，就是“毛泽东脑袋中的思想，毛主席的想法。”毛主席的想法当然是正确的、战无不胜的。

后来看到曾经被誉为毛主席的最好的学生、最亲密的战友、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最高的林彪这样说：“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强大的思想武器，是反对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强大的思想武器。”哇塞！我才知道毛泽东思想这么厉害，可以指导世界革命了。林彪还有更高的赞誉，他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顶峰，是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克思主义。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还说过：学习革命理论的“捷径”就是学习毛泽东思想，只要学好毛泽东思想就够了。

怎么样学习和掌握毛泽东思想呢？他又说了：“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这些都说明毛主席著作、讲话、批示，就是具体的、摸得着、看得见的毛泽东思想。

“文化大革命”期间，毛主席的一切讲话、批示、指示都称之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而且称其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的伟大贡献。诸如：“这次文化大革命对于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学校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占领”；“考试是突然袭击……考试可以交头接耳”；“马克思主义千条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过去好像没有公检法就不得了，我一听说公检法垮台了，我就高兴”；“形势大好，好的标志，就是乱了。有的地方乱得还不够……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共产党的哲学是斗争哲学。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七亿人口不斗行吗？”“为了世界革命的胜利，我们准备牺牲三亿中国人。”“人要不灭亡那不得了。灭亡有好处，可以做肥料。”“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读了几十年的书，越读越蠢”；……等等，这一切都是指导文化大革命的“圣经”。

所以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人人都怀揣一个小红本本——《毛主席语录》，又称“红宝书”。报纸也常宣传：某人工作中遇到困难，掏出“红宝书”，念念有词：“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于是

困难克服了，任务胜利完成了。连打乒乓球赢得世界冠军，也是靠毛泽东思想指导的。

林彪还曾经在 1966 年 5 月 18 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一个讲话,后来作为中央文件批转全国学习，该讲话说：“……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有了政权，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我想用自己的习惯语言，政权就是镇压之权……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他们占领我们的要害部位、电台、广播电台。军队和公安系统都做了布置。毛主席这几个月就是做这个文章。这是没有完全写出来的文章，没有印成文章的毛主席著作。我们就要学这个没有印出来的毛主席著作。毛主席为了这件事，多少天没有睡好觉。这是很深刻很严重的问题。”这说明即使毛泽东没有写出来，但是在日夜思考的东西，林彪都心领神会了。

所以，那时有人吹捧林彪,说他对毛泽东思想领会最深刻,不是毫无根据的。林彪把毛泽东思想抬高、神化到如此地步，自然就不许人们对其有一点“异议”，若有一点“异议”，就“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所以，刘少奇被打倒以致整死都是顺理成章的事儿。即便你刘少奇是“毛泽东思想”这个名词的原创人，只要与毛泽东有不同的意见，该诛、该讨还是免不了的。有趣的是倡议“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的林彪，也因此落得被诛、被讨的下场。

其实，林彪一背转身，却对他的死党分子们说：毛泽东是“一个行孔孟之道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阶级斗争理论、国家机器是“绞肉机”。

后来，林彪叛逃摔死在温都尔汗，毛泽东关于林彪的拍马屁也只是有一点否定，说：“一句就是一句嘛，怎么能顶一万句呢？”

“句句是真理”还是不能否定的。张志新认为毛泽东违背了马列主义，就被处死。处决前还要将其喉管割断，以防喊出对毛泽东不利的话语。

然而，真理不可能永远被暴力奴役。毛泽东一死，即便是他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也要把毛泽东宠信的“四人帮”抓起来。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全国乱糟糟的，怎么办？华主席可没有毛主席置八亿人民生死于不顾的“魄力”，只有把“人才难得”的邓小平解放出来，让他用“铁腕”来全面抓工作。

于是，问题产生了：毛泽东的话句句是真理吗？必须全部照办吗？如果说：“是”。那么，抓“四人帮”、起用邓小平都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甚

至可以说是反毛泽东思想。

为了解决这个矛盾。邓小平想出了一个说辞：毛泽东思想是一个体系，要完整的、准确的理解毛泽东思想。这显然太勉强了！理解得再完整、准确，也不可能把“要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理解成“要重用邓小平”。还是胡耀邦具有政治家的智慧，他组织了一支理论队伍，写了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引起了全国的大讨论大辩论。辩论的结果，当然是“真理必须经得起实践的检验”。毛泽东的著作、讲话、批示概莫能外。首先检验的就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谈话和指示以及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地指出：“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

“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人们概括为：“政治上伤害了近一亿人，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文化上倒退几百年的大浩劫”。

“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彻底破产了。

不但“文革”经不起检验，建国以后毛泽东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基本上都经不起检验。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伤害了100多万知识分子；1958年的三面红旗，饿死3700万农民（相当于挨了450颗原子弹呀！）。还有诸如“三反”、“五反”、“肃反”、反胡风、批胡适、批俞平伯、批武训等等，哪一个运动不是灾难？

这就给“毛泽东思想”带来了空前的危机。党的七大以来一直宣传“毛泽东思想是战无不胜的”。这该如何解释？

终于有人想出了这样的解释：毛泽东思想不是毛泽东一个人的思想，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凝聚着蔡和森、瞿秋白、高君宇、邓中夏、周恩来等人的杰出思想。在毛泽东思想宝库里最闪光辉的是“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它同样包含着恽代英、周恩来等的思想智慧。周恩来、朱德、刘伯承的军事思想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来源。陈云在领导社会主义经济的长期实践中，写了许多经济论著，为毛泽东经济思想作出了重要贡献。

注意：这里，毛泽东思想已经不是毛泽东一个人的思想了，是集体智

慧结晶；而且，把建国以后毛泽东的许多著述、讲话、指示都不提了。

于是就有人进行了归纳：毛泽东的思想不是毛泽东思想；不是毛泽东的思想也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不是错误的毛泽东的思想；毛泽东思想是正确的毛泽东的思想；早期的毛泽东的思想是毛泽东思想；晚年的毛泽东的思想不是毛泽东思想。

有点像“绕口令”吧？晕不晕？我想：不这样“绕”，是不好“万岁”的。

其实，1949年以前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的毛泽东思想，指导中国共产党夺取了政权的毛泽东思想，也不是没有问题的。

有资料披露，抗日战争时期，毛规定抗日战争的总方针是：“一分抗日，二分应付（应付国民党和苏联的批评责难）七分发展（发展根据地和军队）”。共产党打的有名的战役就只有“百团大战”和“平型关战斗”。其余就只有“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之类。即使是这两个战役也受到毛的严厉批评，甚至把此事当作彭的罪行而不断批判。在毛的心目中，抗日是有罪的。为此他告诫将领们：“你们不要以为抗日是爱国，那是爱蒋介石的国。我们共产党也是世界各国共产党的祖国是苏联。”他又发挥他这个思想说：“我们要让日本多占地，形成日、蒋、我三国志，这种形势对我们最有利；糟糕的是日本占领我全国，那也不要紧，可以借助苏联恢复失地嘛！”

当时在延安有一个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兼塔斯社记者——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在他的《延安日记》里写道：

“八路军、新四军事实上从1941年开始就停止了对日作战，百团大战是最后一次对日作战。八路军新四军得到指令，一律不准对日进行作战行动，包括受到攻击便撤退。”

“八路军不是主动开展军事行动来制止日本侵略者的入侵，而只限于有气无力的打局部的防御战。只要敌人发动进攻，八路军就退到山里，避开冲突。”

“不惜任何代价保存八路军的实力”

“毛泽东认为参加抗日战争是错误的，抗战只是发动内战计划的一部分。”

“毛泽东以对日作战的伪装，来占夺土地，为未来的内战扩张基地。”

“毛的一切活动，便是加紧准备内战，在侵略者正在蹂躏这个国家时发动内战。”

“毛泽东赞成民族统一战线，却用全力使统一战线解体，毛对抗日势力的分裂负有主要责任……国共分裂是一个不祥的现实，这自然有利于侵

略者。毛破坏全国联合抗日的政策，等于给日本增加了几十个师团的实力”。

“我到新乡贺龙部队去了一次，众多的贺龙部队包围了一个驻有少量日军的村子，我问士兵为什么不消灭这些日军，士兵们回答：上面叫我们不要惹他们，他们也不惹我们。八路军就这样与日军和睦相处着……八路军的宣传是针对国军，未来的军事行动也是针对国军，这样就使日军的作战行动几乎全部获得成功。”

“我到前线去后，深信中共领导阶层无意对日作战，他们把战争看成建立基地的良机。他们让日本人与国民党对抗，如果日军击败国军，中央政府的权力受到破坏，八路军便立即渗入到那里，如果必要的话，便干掉统一战线的战友来攫夺政权。毛泽东在来犯的敌军前退却，寻找机会使国军与日军冲突。”

因此，1937年共产党的军队总共不超过3万人，到日本投降时，发展到一百二十多万人；日本刚刚宣布投降，迅即派部队赶往各个敌占城市受降，抢夺胜利果实。但是毛泽东却说：蒋介石不为桃树浇水，“坐在峨眉山上观虎斗”，现在下山来摘桃子。

其实，从现在披露的很多资料可见，恰恰是毛泽东坐在延安清凉山观虎斗，积蓄力量等候摘桃子。

毛泽东抗日战争期间在延安做了什么？最有名的事是“抢救运动”和“整风运动”。前者是把大批（受到欺骗宣传）到延安的抗日青年打成特务、奸细；后者是批判彭德怀的百团大战，批判王明、周恩来接受国民党的抗日统一战线的领导……。

国民党的正面战场是真正在“浴血抗战”，真是“一寸山河一寸血”。毛泽东却在延安一边整抗日积极分子，一边玩女人。玩吴莉莉、玩史沫特莱，然后再抛弃贺子珍和江青结婚。

到了1959年批判彭德怀时，还再次算旧账，说“百团大战”是帮了敌人的忙。毛还说，“一些同志认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后来才统一认识：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

看到上述那些事，我们再看下面毛泽东的言论就丝毫也不奇怪了。

1961年1月24日，毛泽东会见日本社会党议员黑田寿男。毛说：“日本皇军过去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因此中国人民接受了教育。如果没有日本的侵略，我们现在还在山里，就不能到北京看京剧了。正是因为日本皇军占领了大半个中国，让我们建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为以后的解放战争创造了胜利的条件。日本垄断资本和军阀给我们做了件‘好事’，如果需要感谢的话，我倒想感谢日本皇军侵略中国。”（《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

社，1994 年。)

1964 年 7 月 10 日，毛泽东在北京接见日本社会党委员长佐佐木更三，毛说：“我曾经跟日本朋友谈过。他们说，很对不起，日本皇军侵略了中国。我说：不！没有你们皇军侵略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就不能团结起来对付蒋介石，中国就夺取不了政权。所以，日本皇军是我们中国人的好教员，也可以说是大恩人，大救星。”佐佐木表示歉意：“今天听了毛主席非常宽宏大量的说话。过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给你们带来了很大的损害，我们大家感到很抱歉。”毛立即回应道：“没有什么抱歉。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带来了很大的利益，使中国人民夺取了政权。没有你们的皇军，我们不可能夺取政权。这一点，我和你们有不同的意见，我们两个人有矛盾。”（众笑，会场活跃）。佐佐木表示感谢。毛回答说：“不要讲过去那一套了。日本的侵略也可以说是好事，帮了我们的大忙。请看，中国人民夺取了政权，同时，你们的垄断资本、军国主义也帮了我们的忙。日本人民成百万、成千万地醒觉起来。包括在中国打仗的一部份将军，他们现在变成我们的朋友了”（《毛泽东思想万岁》，533-534）。

1972 年中日建交，毛泽东正式会见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再次公然表示了这种思想。田中角荣代表日本政府正式向中国表示道歉：“啊，对不起啊，我们发动了侵略战争，使中国受到很大的伤害。”毛泽东竟然说：“不是对不起啊，你们有功啊，为啥有功呢？因为你们要是不发动侵华战争的话，我们怎么能强大？我们怎么能夺权哪？怎么能把蒋介石打败呀？”毛泽东竟然进而表示要感谢田中角荣，说：“我们如何感谢你们？我们不要你们战争赔偿！”（《田中角荣传》）。

不必多说了，究竟是抵御妄图灭亡中国的日本重要，还是共产党夺取政权重要？我想，凡是爱我中华的中国人，都是分得清楚的，爱国主义和卖国主义是分得清楚的。毛泽东思想是什么货色也就清楚了。

（2010-12-3）

贵州湄潭事件：一个县饿死 12 万人

刘兴盛

1987 年，笔者参加了《湄潭县志》的编纂工作。在查看史料时，阅读了“湄潭事件”发生的经过及历史面目。

当时湄潭县是由凤冈、余庆和湄潭三县合并而成的大县。全县总人口60.5万人，其中农业人口56.57万人。

事件主要发生在农村，从1959年11月到1960年4月初，历时5个月之久，全县共饿死12.451万人。死亡人数占全县总人口的20%强，占农业人口的22%。事件中，全县死亡绝户达2938户，遗下的孤儿寡崽4737人，外出逃生的农民4737人。最为惨绝、目不忍睹的是出现了人吃人的事件。这场祸及全县农村的大灾难，史所罕见，骇人听闻。悲剧已经过去47年，如今旧事重提，痛定思痛，把真实历史整理出来，供大家借鉴。

（一）

事件前，全县农村经过1958年大跃进、大炼钢铁、大兵团作战、大办食堂等的反复折腾，早已民力疲惫，财力、物力空虚，几乎山穷水尽了。许多生产队除集体饲养的几头耕牛外，其它六畜濒临绝迹，森林严重被毁，广大农民的吃饭问题面临绝境。食堂以人定量，长期缺少油水，农民普遍吃不饱，以瓜菜相添。时间久了，对长期体力劳动的农民来说，实在吃不消。1959年粮食只收了3.22亿斤，比上年减少32.6%，其它农作物减产更为严重。然而，1958年大跃进中膨胀起来的浮夸风，不但未止息，反而变本加厉了。当时，湄潭县委主要负责人把全县粮食总产定为8.462亿斤，虚报5亿多斤。数字虽可观，没有粮食等于零。为了兑现8亿多斤总产，一场骇人听闻的反对瞒产私分和反盗窃运动的斗争，就在全县展开了。

（二）

1959年11月，湄潭县召开五级干部大会，布置开展反瞒产运动。会上首先动员号召各公社、管理区、生产大队和小队干部自报粮食产量。报得多的就表扬，准其先回家；报得少的就是瞒产，瞒产就是“反革命”，不准回家，必须重新报“实”产量。会上穷追硬逼，气氛十分紧张，一直要等报的产量与县领导事先框套的数字基本吻合才放过关。树为“红旗书记”的绥阳公社××，开始就称反出瞒产1200万公斤，县领导派出专车将该社开会的干部送回公社。回社后就布置假现场，先在粮食下面堆满乱草、秸秆、糠壳、石头等，上面从国仓中运去粮食盖起来，让人参观。1959年12月初，湄潭县先后组织数千基层干部到该社参观学习，由该社领导进行经验介绍，又让该社事先训练好的10名反瞒产“标兵”到全县各公社介绍反

瞒产经验，大造声势。12月底，遵义地委又亲自在该社主持召开全地区反瞒产现场会议，介绍经验参观假现场。各公社回去后如法炮制，立即行动，在全县农村搞开了反瞒产私分的斗争。

全县农村停粮断炊以后，对长时间口粮标准低、瓜菜代，不见油荤的广大农民来说，真要命了，普遍浮肿，走路拄棍棒，东倒西歪。一些农民开始纷纷逃荒活命，更多的农民到处剥树皮、挖野菜来填肚子，时间长了就不行了，饿得连家门口都迈不出去，只有在家等死。1960年元、二月份死人最多，全县每天都有上千人死亡，许多农民全家死绝，床上地上摆满死尸。整个农村哀鸿遍野，饿殍满地，实在使人惨不忍睹，耳不忍闻，视者落泪，闻者伤心。

情况如此严重，并没有引起上级的重视，仍然一股劲地反瞒产，捉“鬼”拿粮，大喊大叫要坚决打退“资本主义”的猖狂进攻，彻底粉碎“富裕农民”的瞒产私分活动，把生产队干部当作集体瞒产私分的头子而横加折磨。各地成立搜查队、打虎队，闯进农民家里翻箱倒柜，没收财物。凡是能吃的东西全部收光，硬把群众置于死地，有的群众反抗，就遭毒打，有的被打伤致残，有的被活活打死。群众说：“国民党又回来了！”

有的群众不堪忍受饥饿之苦，到饭店抢饭吃，有的拦路抢东西吃，甚至偷宰耕牛，盗窃国家粮食。县委主要负责人不调查这一时期偷盗的原因，反而开展反盗窃运动。1960年元月，县里召开有关干部会议，布置反盗窃运动，开展大搜大捕，凡是平时犯有小偷小摸的人通通抓起来。在凤冈、余庆和义泉设立关押点，成立临时法庭，就地宣判，并采取先捕后批准，先出布告后判刑，判处10年以内徒刑由公社批准等违法行为。在下面设立“劳改队”、“教养队”，抓来的群众，白天由民兵持枪监督劳动，晚上开会斗争，一斗就动刑。被非法关押的群众达2794人（经批准的有65人），关死的就达200余人。这些被关押的群众，除极少数是惯偷外，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基本群众。在这场反瞒产、反盗窃运动中，动用的酷刑有：割手指、缝嘴巴、用铁丝穿耳朵和脚后跟、点天灯、猴子搬桩、吊鸭儿浮水，拖死猪、火钳烧红烙嘴巴、枪毙活埋等等。实在见所未见，闻所未闻。

（四）

在开展反瞒产的同时，决定从农村抽调10万民工（实际集中7万民工）大垦万亩茶园，万亩果园，大修万头养猪场，大修水利，大修街道，拆毁大量民房等建筑设施，使许多人无家可归，民工体力消耗大，又吃不饱，

在工地上拖死的不少。为了凑足 10 万民工，农村已经大量死人了，还继续征调，有的农民拿点树皮野菜，拄起棒棒上工地，还未走到就倒在路边死了。就是到了这种时候，许多群众对我们的党和政府并没有完全绝望，他们说：“这些事情党中央和毛主席一定不知道，要是知道了，是不会放过这些人的。”有的农民临死前还在念叨：“毛主席，你老人家赶快派人下来打救我们吧！”

1960 年元月，贵州省副省长吴实同志到遵义地区视察工作，发现沿途一带情况严重，在桐梓县召开了紧急会议，会上吴实同志骂开了：“先不要说党的原则，你们多少有点良心没有，人都饿死了，你们还不安排生活，还在反瞒产。”各县根据吴实同志的指示，先后开仓发粮，停止了事态的发展。而湄潭县委主要负责人却一直顶着，并对地委表态说：“湄潭没有死人”，仍不发粮食。遵义地委副书记×××忍不住了，对湄潭县委说：“你们县要赶快采取措施，开仓发粮。”县委主要负责人又顶了回去，并说：“情况不是那么严重，不会出死人事件，妖风刮到我们县委头上来了，我是不怕的，十二级台风也刮不倒我。”他这一顶，湄潭县多死了几万人。

事件中，县委主要负责人加强了邮政通信检查，凡是向上级反映情况或控告的材料，都被卡下来，把消息封锁得死死的。县委书记个人就扣住 51 封信件，两封未具名的交公安机关侦察。凡是反映情况的人都受到各种打击迫害。1960 年 4 月，省、地委派出工作组到湄潭调查，县里继续捂盖子。绥阳公社党委负责人重操故技，以保护首长为名，把群众赶上山去不与工作组接触，又把严重病号和孤儿集中关起来，在一间烤烟房里就关死 36 人，又组织人力把尸体丢在土坑消洞里。该社后面的两个大消洞里面，丢了几百具尸体，还有未断气的就往里面扔，扔下去还哇哇地叫，群众把这个消洞叫“万人坑”。

据统计，在这场反瞒产、反盗窃运动中，全县被活活打死的群众 1324 人，打伤致残的 175 人，关押死的 200 余人，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帽子、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撤销一切职务的 1680 人。

（五）

1960 年 4 月，“湄潭事件”暴露后，省、地委派出工作组，采取紧急措施全力抢救，做了大量工作：

一是开仓发粮，安排群众生活。粮仓一开，农村死亡基本停下来了。当政府开仓发粮的消息一传开，许多人泪流满面，泣不成声地说：“天亮了！”

老天爷睁眼了！我们有救了！”

二是抢救病号。全县成立临时医院 250 个，每个管理区至少一个，大的管理区 2 至 3 个，住院病号 6300 余人，免费治疗，采取营养、药物等方法医治，完全康复后出院。

三是收养孤儿。全县成立 23 所孤儿院，每个公社至少 1 所，把 4735 名孤儿集中在孤儿院抚养。

四是对失去儿女的孤寡老人，都接进敬老院，吃穿由集体包下来。

五是全县在事件中外出逃荒的农民 4737 人，由各公社通过亲朋好友打听下落，由公社派专人带钱带粮去接回来，帮助他们安排好生活、生产，重建家园。但也有些人至今音信杳无，可能永远长眠在他乡异地了。

六是全县 7 万多青壮年妇女，由于长期营养不良，有严重闭经、脱宫、腹痛等妇科病，组织医疗部门进行治疗，使她们很快恢复了健康，积极投入了生产救灾工作。

由于采取以上有力措施，劫难后的农村开始复苏了。许多农民说：“共产党又回来了，人民得救了！”

（六）

“湄潭事件”揭开后，为了平息民愤，挽回影响。省、地委工作组深入群众，调查研究，掌握了大量的材料，最后对“湄潭事件”作出了结论。查明公社党委被坏分子掌握领导权的 6 个，占公社总数的 33.3%；管理区党总支腐烂的 31 个，组织不纯的 51 个，共 82 个，占管理区总数的 60.3%；犯有严重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在职干部 377 人，等等。公社和管理区是当时县以下的两级主要政权组织，却烂掉了 50% 以上，情况当然是严重的。工作组向地委写出报告，提出八条处理意见。有了结论和处理意见，紧接着就号召全县干部和群众揭“湄潭事件”的盖子，开展“新三反”，不久又搞开了“整风整社”。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斗争的烈火越烧越旺。

1960 年 6 月，原县委第一书记×××被定为蜕化变质分子，依法逮捕判刑，公社领导也抓了几个。县里组织了庞大的专案队伍，把有问题的几百名干部集中审查定性办集训班。于 1960 年 8 月，公开枪决了副县长兼绥阳公社党委书记××（1983 年 3 月平反）；另外，还枪决了兴隆公社中华管理区大队支书×××。后来人越抓越多，在“整风整社”中，一次会议就抓了 30 几个干部。在这场斗争中，又处分了大批干部。

围绕“湄潭事件”进行的“新三反”、“整风整社”运动，本来是为了总

结教训，平息民愤，挽回影响，调整党群关系。而实际上是以“左”反“左”，不但于事无补，反而把事态重新扩大，并没有找出造成“湄潭事件”的真正原因，接受沉痛教训。而是把事件的全部责任一锅端给下面，让你吃不完兜起来。这种以“左”反“左”的做法，只能是抱薪救火，错上加错。

后来，党中央发觉了这一问题，指出这类事件，主要是总结接受教训，一般不要追究个人责任，才停止了事态的继续发展，“湄潭事件”才算真正结束了。

——原载 炎黄春秋

六十年代的牢狱往事 饥饿的政治犯

贾植芳

我得的不过是“饿病”

一九五五年“胡风事件”以后，我们夫妇都被扫地出门，先后被关押起来。我被关了十一年。五十年代后期至六十年代初期，即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由于监狱里饥谨成灾，我在长期的羁押生活中，也像大多数同监犯那样，得了浮肿病。大腿和小腿全肿得又粗又亮，差不多快要蔓延到腹部上来了。

一九六零年秋冬之际，监狱当局终于把我送到提篮桥监狱的医院住院治疗，那里的“人民医生”（因为在这里看病的还有“医务犯”，即犯法前的职业医生）略为检视了一下，便开了个“高蛋白”的药方，我被留下住院治疗。我吃的所谓“高蛋白”，其实就是黄豆芽、豆腐之类的豆制品，偶尔有几片油煎带鱼，但就是这样的“高蛋白”也有神效，我在病床上躺了不到三天，腿部的浮肿居然逐渐消退下去了。其实这病医生不看，我这个“医盲”也明白，那不过是“饿病”，只要能吃饱肚子就一切正常了。

因此三天后，在监狱病房服役的“劳改犯”（即判刑的犯人），就叫我下床劳动，打扫卫生，负责照料重病犯的大小便，并为他们喂饭、喂水。我曾向这位自称是病区负责人的劳改犯提出抗议：“我的病还未好利索，而且我快五十岁了，那些仍然躺在床上休养的年轻犯人身体的比我强，你为什么不叫他们起来劳动呢？”他理直气壮地训斥我说：“你怎么能和他们比？他们是普通刑事犯，你是一所来的政治犯、反革命，你没有公民权，叫你干什么你就得干什么，要不我报告管理员，说你对抗改造，那就要吃手铐

了，我劝你还是识相点！……”

这不啻是一堂政治课，使我恍然大悟：自己眼前的身份还不如那些年轻的阿飞流氓，因为他们是“普通”刑事犯啊。因此，怪不得当这位“头头”“教育”我的时候，那些懒洋洋躺在床上的年轻病犯个个挤眉弄眼，向我这个政治犯投来蔑视的眼光，嘴里还不干不净地奚落我……

彼此的肚皮咕咕地叫，倒也是一种奇妙的音乐

我在医院住了十三天，就给搬到称为“休养监”的八号楼监狱。在这里“享福”不到五天，我又被押回第一看守所，被收押在二楼的一个监房里。这在监狱生活里叫“调房间”，同“抄靶子”一样，是监狱生活的例行公事。我一脚踏进狱室的门，发现里面空荡荡的，只有一个体弱的老人蜷缩在一个角落里。当管理人员在身后锁好门以后，他抬起头看见我，呆滞的目光突然发亮。他小声对我说：“我们不是在韩侍桁家里吃过螃蟹吗？”我向他点点头，一边用下巴指着门口，要他不要再说下去。

开过午饭后，我同他各自坐在自己的铺位上闭目养神，虽然刚吃过饭，但至多 600cc（当时，犯人们习惯以“cc”为计量单位来衡量监狱给的饭食的含量之多少）的菜皮烂饭，仍不堪果腹，因此，饭后闭着眼睛静静听着彼此的肚皮咕咕地叫，倒也是一种奇妙的音乐。

这时，他忽然向门口走去吆喝“报告”，向管理员讨来钢笔墨水，说是要写交代材料。等拿到钢笔墨水后，他却从屁股下面的铺位上拿了几张草纸，放在膝盖上低头写着甚么。

过了不一会儿，我忽然被他撞醒，他把写好的草纸塞给我，我向门口警惕地看了一眼，才低头读他写的东西。原来是一首七言诗，题为《狱中遇甄兄有感》其中有“有缘幸识韩荆州”一类话，我含笑地向他点点头，表示我看过了，谢谢他的盛情；同时告诉他，这东西马上得撕毁，搁在马桶里，要不给管理员“抄靶子”时发现了，我们都得吃手铐。说着，我动手把它撕掉，起身掬在屋角的马桶里，又端起旁边的脸盆，把留下准备擦地板的洗过脸的脏水冲了进去……

1952 年的吃蟹往事

我说了半天，这里得交代一句：我在这个狱室里所碰到的正是邵洵美先生。我认识他，是在一九五二年。

韩侍桁一次在南京路新雅酒家请客，宴请司汤达的小说《红与黑》的译者罗玉君教授。被邀请的客人中，除了李青崖和施蛰存两位是我在震旦大学的旧同事外，余上沅、刘大杰又是我当时在复旦大学的新同事，都算

是熟人了，只有邵洵美、罗玉君两位却是初会。记得是在众人已入座举杯的时候，邵洵美才匆匆地赶来。他身材高大，一张白润的长脸上，一只长长的大鼻子尤其引人注目。他穿了一件旧的古铜色又宽又长的中式丝绸旧棉袄，敞着领口，须发蓬乱，颇有些落拓不羁而又泰然自若的神气。这就是我第一次与他相见时的印象。

一九五四年秋天的一个晚上，我们夫妇又应邀在韩侍桁家里吃蟹，也是吃到中途，邵洵美撞进来了，匆匆入座就食。这两次相会，大家都是天南海北的闲聊，我们之间并没有多少对话，但在事后，却引起我将他和自己印象中的邵洵美相对照。

他早年办过“金屋书店”，出版过《金屋月刊》，后来又是新月社重要人员之一；还主编过《十日谈》、《时代画报》等。他的诗集《花一般的罪恶》、《火与肉》等，更被目为中国唯美派诗歌的力作。

解放初，四川中路出现过一家时代书局，用突击的形式出版了不少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早期著作，因大半属于第二国际人物，如考茨基、希法亭等人的著作，而受到《人民日报》的严厉批评，这个书局也就昙花一现式地消失了。据传言说，它的出资老板正是多次经营出版事业的邵洵美。基于对他在文学界的旧印象，我当时不禁哑然失笑：他怎么忽然异想天开地要吃马列主义的饭了？可是我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这一生里会与邵洵美成为四个月的“同监犯”。

——原载 新闻午报

1962年中国饿死三千八百多万人民是毛泽东“反右派运动”造成的

——彭慕陶

毛泽东在1957年反右运动后说：“反右运动是无产阶级彻底打退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我们取得了绝对的胜利。”

反右以后，毛泽东更是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实现了他独裁专制，千古一帝“一个主义、一个思想”“一个声音”“家天下”，禁锢思想，钳制言论，奠定了统治全国政治思想文化全面专政的基础。

反右以后，全国均以右派为鉴，“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噤若寒蝉，失语禁声，万马齐喑，再无正直，忠言，唯物唯实，批评进谏反对之声，就在领导层的周围幸存者，也甘当顺臣，犬儒，惟命是从。阿谀逢迎，当时全是“真话绝迹，假话连篇”，“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自此，诺大一个中国再也听不到一句真话，正义直言，更没有人站出来维护真理，坚持原则。

民主主义者指出：“少数人的专政，个别人的独裁，总会给国家人民带来无穷的灾难”普列汉诺夫在他政治遗嘱中也指出：“党的专政将变为党的

领袖专政。维持领袖权力的起先是阶级恐怖，后来是全国的全面恐怖，布尔什维克不能给人民以民主自由，因为他们一实行民主自由，马上就会丧失权力。”

1958-1962年，正是由于毛泽东反右后罢黜百家，独尊毛术，权力欲达到顶峰，独断专行，好大喜功，违反生产自然规律，反科学，反人性，置人民生命于不顾。瞎指挥“大跃进”“公社化”高指标，高征购强迫命令无视人命横征暴敛造成，在中国正常年景下活活饿死三千八百多万人民的大饥荒。

共产党，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是给人民谋福利，造福祉、使人民安居乐业，国泰民安。知识是第一生产力，国家的兴旺发达建设社会主义是要靠先进科学技术人才。社会主义优越性就应该表现在民主自由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按照科学规律，自然法则，客观力量未有序完成。

经过反右毛把许多，有知识，懂技能，有品德，刚直不阿，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敢于正义直言，说真说，说实话的人统统打下去。

而上来这批人，正如胡跃邦所说“一个又一个莫名其妙的政治运动坑害了一批又一批优秀人材、剩下的多半是些庸才、奴才、鹰犬。”本来就是不学无术，自私自利，惯于投机取巧，平常对领导惟命是从，唯唯诺诺，阿谀逢迎，靠汇报讨好，告密得宠、是一批损人利己，奸佞之徒；运动一来就见风转舵，更是捕风捉影，无中生有，断章取义，裁头去尾，无限上纲、栽赃陷害，甚至卖友求荣，六亲不认，落井下石。成为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实际上是靠“整人起家”，“火线入党”“反右升官”，被称为立场坚定“又红又专”工、农、代表进驻各大专院校，文化领域机关单位主管无产阶级重要阵地，政治思想宣传的意识形态部门，难怪后来有人说是些“外行充博士，奴才作圣贤”！

当然这又和“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有关，毛在反右以后，自鸣得意，再无反对者，任所欲为。“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心血来潮想在十五年超英赶美，争当解放全人类世界领袖。“上一呼、下百诺”，这些趋炎附势之徒，竞相出现，把毛奉若神明，对毛“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全国一条心，一个样，一股劲，一盘棋，争相放卫星，夺高产，唯恐跟不上、争先恐后、甘当盲从。中国有五千多年的历史，只有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才是鼎立时期，欧、美经展也只是近二百年才逐步发展起来的，中国近百年史上由于闭关锁国夜郎自大固步自封，经济落后、导致丧权辱国。

经济建设工业生产农业增产、是要根据现有的生产能力设备条件和管理水平，以及各种数据进行科学分析，综合平衡，然后才能作出有计划，按比例切实可行的增产计划。

解放初期从国民党手中留下的破旧工业总产值不到 5-6%，虽经过几年的努力恢复也不到 10%，到了 1957 年全国钢产量才 535 万吨，粮食产量才 3920 亿吨。何况科学技术是国家世界公认的“第一生产力”毛已经把中国少得可怜的敢于为国出力献心的知识精英打下去，排斥在外、只能让这一批无真才实学，不懂科学技术，只会像吹虚“义和团刀枪不入可以打洋人”假大空之流一样来投其所好、迎合奉承领导、肩负起搞宏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重任，不出事才叫怪。

1958 年 5 月 26 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毛泽东想要在 15 年如超英赶美说：“钢铁产量 1958 年要翻一翻，粮食产量要增加一倍半。”

上海第一书记柯庆施就说：“钢的生产能力我华东五省一年可以达到八百万吨”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在会议上说“原计划十二年才能实现的河南增粮“四、五、八年计划”，他现在只要一年就能实现，“同时还把水浇地面积、虚报了二、四倍，当即受到毛的表扬，树为典型，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自己省内已是四处饥荒，还答应向中央支援调拨 147 亿斤粮食，毛说他顾全大局提为西南局第一书记进入中央政治局。

随即由中共中央书记处领导炼钢、增粮、并说：“主席提出了这个要求，明年粮食要再翻一番，1070 万吨钢一吨也不能少。全党要为这个任务光荣任务而奋斗。”《人民日报》也发表社论号召“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必须把领导钢铁生产当做首要任务”。

由中央书记处领导各省、市、自治区“钢铁元帅升帐”掀起全国钢铁“大跃进”高潮。

《人民日报》报导河南率先在全省建成 4 万 5 千座炼钢炉，动员 360 万农民，出动 40 万零 7 千辆各种运输车辆，日产生铁 18693 吨的大胜仗。接着湖南邵阳地区组织 93 万群众炼钢，他们说“把地球挖穿也要挖出矿来”河北省武安县三天之内高炉从 100 多个提高到一千多个。

全国在十月份就建起 30 几万座小高炉，十月底达到几百万座，但在 1958 年的 9 月份，现代化的正规高炉也只能完成 1070 万吨钢的四分之一，产量、剩下的四分之三，仅靠土法炼钢来完成，炼铁用的焦煤缺乏就用普通煤碳，煤碳不够就砍树木烧成木炭代替，高品位的矿石缺乏就用低品位矿石代替，找不到矿石就把农民家里的铁锅、铁锤、铁铲、庙宇里的铁香炉、铁鼎、铁门环搭上烧成烧结铁，作为生产量，放了“卫星”

到了 1958 后 12 月 22 日新华社向全国和全世界宣布 1070 万吨钢已超额 1108 万吨完成。

没有对外宣布的 416 万吨铁是凑数的废品，炼这些土钢铁国家亏损了 31 亿元。

而且当时农村正需要劳动力，该收不收“老少炼钢去收禾童与姑”造成损失浪费，据中央农村工作部最保守的估计 1958 年农业作物有 1090 因缺劳动力没法收回粮食就有 4 百多亿斤，还有人员损失未计。

在粮食方面：

全面开展不顾生产条件，发展规律，互相攀比，争先恐后的破坏环境，牺牲生态的夺高产、放卫星的“大跃进”。你左，我比你更左，你说谎我比你更说谎，提出一些反科学，荒诞绝伦的政治口号“只怕想不到不怕做不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一天等于二十年”，“要上九天揽月，要下四海捉鳖”，“天上没有玉皇，水里没有龙王，大吼一声我来了，要高山让路，要河水倒流”“敞开肚子吃饭，鼓足干劲生产”，“食堂能煮千家饭，公社解除万众忧”。

从 1958 年 6 月 8 日河南日报报导遂平县卫星农业社数产小麦 2105 斤起，全国各地由各地宣传机构<广播、报纸、文件>大肆渲染报导。

6 月 11 日 河北魏县小麦亩产 2394 斤<河南日报>

6 月 12 日 河南遂平小麦亩产 3530 斤

6 月 23 日 湖北谷城小麦亩产 4689 斤<湖北日报>

9 月 22 日 青海省蹇克什农场小麦亩产 8585 斤<人民日报>

8 月 22 日 安徽繁昌县峨山乡东方红三社亩产早稻 36956 斤<人民日报>

9 月 1 日 河南信阳县鸡公山公社水稻亩产 48925 斤

9 月 5 日 广东浦县田北社亩产中稻 60435 斤<人民日报>

9 月 18 日 四川郫县友爱乡第九农业社（后因毛去观察改为红光公社）82528 斤<人民日报>

9 月 18 日 广西环江县红旗人民公社亩产 130434 斤<人民日报>
这些粮食卫星是怎样放出来，下面有二个全面如实记录：

一是，河南信阳县鸡公山公社的水稻，八月下旬基本成熟。公社常委于八月下旬连续开会，研究如何放出水稻高产卫星。公社常委认为，能否放出水稻高产卫星，不仅取决于常委的信心，而且也取决于常委一班人的统一认识和统一口径（所谓统一认识、统一口径，就是对弄虚作假不能有

任何怀疑，上报公布后不能说三道四)。共同欺骗上级，欺骗舆论，这作为全体委员必须遵守的政治纪律。放水稻高产卫星，必须要内定一个标准，经过常委研究确定，不能低于四川八万二千斤。二十八日晚，公社常委在新集大队召开放水高产卫星动员大会。公社书记要求参加放卫星的全体社员，要统一组织，听从社队干部指挥，不该问的绝对不问，不该讲的绝对不讲，有说三道四者按右倾论处。二十九日早晨六时许，二百零五名社员，在社、队干部的组织下开始收割水稻。三十日下午，六亩六分三厘试验田及其周围四百三十多亩水稻都集中统一堆放在十三个打谷场中，日夜突击打场，九月一日中午十二点打收结束。然后过秤计算产量。过秤结果共打稻谷三十二万四千三百七十五斤五两。这本是四百三十六亩的产量，鸡公山公社常委将其认定为六亩六分三厘试验田的产量， $(324375.5 \div 6.63 = 48925)$ ，得出亩产四万八千九百二十五斤的卫星记录，迅速向县委报喜；然后，县委报地委，地委报省委，省委报中央，中央登报广播，宣布又一颗（卫星）上天。

二是四川郫县友爱乡第九农业社，后被毛去观察过改为红光公社，当时也是由公社主持将已经成熟的几亩水稻，全部移植拼栽，过几天出穗时，几十人上去踩踏，都无任何缝隙，收割过都由公社党委统一组织精选人员运送，入仓。出仓后又担着盖上草绕道从田里收割处走一道重计重量。当天还请有省、市、县领导莅临，新闻、广播记者拍照，赴宴留影，后来有三个知情者谢某闲谈此事经过，均被加以其他罪名判刑劳改。

毛泽东在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还说：“几亿劳动群众，工人、农民，他们现在感觉得心情舒畅、搞大跃进，这就是整风反右的结果。”今年粮食可以增加一倍……明年又能可翻一翻。就是一万五仟亿斤，明年也许不能搞这么多了，太多了除了人吃马喂之外，现在还没有找到用途本来就是因为毛泽东亲自倡导要在15年超英赶美，搞跃进，把农村主要劳力，抽出去，大炼钢铁。全民炼钢剩下一些老弱人员正如彭德怀所说：“老少炼钢去，收禾童与姑”。人民公社又把社员农具牲畜归公，自留地收交，锅灶全都砸烂、不准社员生火做饭，取走了农民赖以生存的物资和工具，家禽、家畜统由公社食堂包干喂养。加之，农业粮食生产，田间管理、收割、保管又能没有认真管起来，古人按照中国农村习俗，也说：“鸡豚狗彘之畜若入其室，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而公社化后把农民生活物资收拾净尽，家畜家禽个人都不能养，这就造成后来大饥荒找不到无可补救的办法，原始崇奉、独裁专制，既无民主可言，更无科学可辩，全由他个人说了算，下面这些鹰犬奴才，只能俯首听命，惟命是从，百般迎合，唯恐跟不上、有失前

程俸禄，根本不管人民生命疾苦，经济发展的法则、规律，你追我赶，你欺我骗，蒙上瞒下，弄虚作假“三高”（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五风”（浮夸风、共产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干部官僚主义风）。

上级对这些“三高、五风”浮夸虚报不分析调查，辨别真假严查事端制造者，四川有人上报李井泉，李还批说“气只能鼓而不可泄，以保留群众积极性。”结果造成四川人饿死最多、高达 1100 多万，河南、安徽、贵州、甘肃，饿死人就达 1400 多万。

当毛发现“卫星产量”都是假的，粮食根本没有增产的时候，他为了自己的面子决心仍按各省虚报的产量要征购粮，于是省委书记逼地委书记、地委书记逼县委书记，县委逼公社，公社逼各生产队长，县乡天天召开反瞒产，私分的“三级干部会”，“五级干部会”交不出粮食就说是伙同农民私分了，是“右倾分子”，是“瞒产私分”，天天斗，天天批，天天打，捆绑吊打足踢，拳打罚跪罚站、通宵不准睡轮番催逼，逼着交粮。村、队干部也只有带上民兵武装将社里留下的唯一口粮，种子粮，牲畜粮都拿去上交了，有些社队知道情况后出来阻挡就出现了不少的打死打伤社员干部。抗粮抗征抗暴的所谓“反革命事件”据河南信阳地区一个息县在反瞒产过程中全县共打死、逼死干部群众 1065 人，其中当场打死 226 人，打成重伤后致死 360 人，自杀的 479 人，打残的 46 人。

河南信阳地区光山县城关公社李堰湾大队，农民的口粮，种子粮，饲料粮全部征光了，公社食堂普遍断伙断炊。大队干部还规定“三大纪律”，不准社员家中冒烟，不准挖野菜，不准外逃。大队组织了一个 12 人组成的搜查队，对社员家三天搜查一次。这个大队 25 个党员中，有 21 个打过人，社员称大队办公室是“阎王殿”。全大队原在 346 户，全家死绝的 39 户，原有人口中 1496 人，死亡 555 人，其中，饿死 490 人被打死 55 人，逼死 10 人，遭受毒打的 435 人。

四川荣经县也是这样，在县委大礼堂由县委书记姚清主持“反隐瞒私分”五级干部会，先分区按原报高产计划逐社逐队算帐，照计算出来的数字征收，逼令公社，大队，生产队把粮食交出来，严重的不交的定为“右倾分子”集中在大礼堂开大会批斗，只要一点到名，拉上台去就是拳打足踢，罚跪，有的打得来受不了钻到主席台桌下拉出来又打，烟竹公社红九队会计毛成珠拉上台去拳打足踢把他耳朵撕开鲜血直流，只好乱说承认瞒产粮食，派人去查，没有查到又是一顿毒打，凤凰大队党支部书记范文秀，会上叫她交待如何策划私分隐瞒粮食，她一问三不知，说她顽固不化，当时她身怀有孕，叫她跪她不跪，一个打手从高处往地下夯血流满地。其余

人都是白天斗晚上斗，夜里罚跪在地上不准睡觉，派人继续斗，这没几天交不出粮就被活活折磨而死。

由于被强逼殴打批斗乡队干部被迫回去把所有的食堂社员口粮，种粮都交了，致使公社食堂没米下锅，无餐供应，停火断炊，人们生活在极度饥饿，恐慌之中，只有去山上挖蕨菜，剥树皮，吃糠，吃观音土，甚至吃死人，家家户户都死有人尸骨羸野、十室九空。全县从 1959-1962 非正常死亡 31759 人占四年平均人口中 38.04%。据四川井研县县志记载每八个人中就饿死一个人。

这里还须说明的是，由于中共当局一贯倡导“成绩是主要的”“报喜不报忧”各地干部人口管理部门深知死亡人多的后果责任承受不了，都是以少报为好。农民为了想多领一份救命粮，死了也不报，就无法计算，杨继纯老师《墓碑》和辛子陵老师《千秋功罪》提供的非正常死亡人数据 3870 万都还很保守的。实际上远不止此？。

更为严重的罪行是毛泽东写的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储粮方针，在全国人民每天饿死几千人民的关键时刻，国家粮食仓库里还有存 85% 的储备粮，据粮食部说 1960 年 6 月 30 日全国粮食库存为 301, 48 亿斤，毛不准开仓为自己人民赈灾放粮，反而要支援阿尔巴尼亚、朝鲜、越南柬埔寨和亚非拉。在灾荒年不要赫鲁晓夫提供的 100 万斤小麦，50 万斤食糖，拒绝美国进口粮食。1961 年 2 月国际红十字会秘书长宣布中国断然拒绝对中国饥荒的粮食援助，有人测算，只要开仓放粮和接受国外援助，中国至少少死 3000 多万人。

在封建社会，遇上真正的天灾，皇帝都还要以“民为贵”、“食为天”祈求苍天、下“罪己诏”为自己过失担责认罪，派身边大臣委以重托亲赴灾区赈灾，开仓放粮，拯救黎民百姓，并准许灾民四处流浪乞食，寻求生路。清朝更有县邑出现饥荒而不放粮的处罚条令，而国务院 1959 年 3 月发文制止灾民外出，不准灾民外出逃荒的指令。驻马店执行强制收容外逃的农民收容了又不给饭吃造成死亡 350 余人的惨案，注（见辛著 266 页）当全国人民处在生死存亡水深火热之中，他还在家乡建造几千万元的“滴水洞”和各地的行宫。

另据中国气象部门 1958-1962 年气象记录资料证实，三年中是正常年景，绝非自然灾害。

由此可见：这就是毛泽东为了他的极权专制，垄断思想、钳制言论、排除异己，扼杀知识份子而发动的 1957 年“反右派运动”。这个“反右”运动，不仅伤害了上百万爱党、爱国、爱人民秉承正义，敢于直言的知识

份子，而且还因言路堵塞，全国失语噤声，无真理正义可言而任他无法无天、随心所欲、倒行逆施，搞超英赶美、大炼钢铁、大跃进、人民公社、强迫命令、瞎指挥、弄虚作假、草菅人命，蓄意造成三千多万善良勤劳的农民兄弟饥饿死亡。

墨写的狂语、谎言、敌不过血写的事实。

根据联合国国际人权规定“任何一个国家的当政者，如果残害本国人民，就是犯有反人类罪，理应受到依法审理”。

2011年12月30日

我在夹边沟高台农场的饥饿岁月

前 言

高 仕 泌•

这里记叙的是四十年前我在甘肃省山丹军马场被定为极右分子、受到三开除（开除党{团}籍、开除军籍、开除工籍）处分，被送到酒泉以东的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的亲身经历。四十年前的往事，现在回忆起来依然历历在目，许多事情是今生今世至死也不会忘掉的。但在三年的劳教过程中，由于超强的体力劳动以及当时的特殊环境条件，不仅记日记是不可能的，即使是最简单最扼要的点滴记录也没有留下来。一则是不敢写，二来是没有时间和精力写。因而现在写的东西全部都是靠头脑记忆追述的。在时间的顺序上难免会有所颠倒，但在事实的真实上则没有一点虚假。

早在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的右派问题得到彻底平反后，就有和我比较亲近的同志、朋友建议我写回忆录，把我57年反右运动后的经历记录下来。对此我一直持否定的态度。其原因一则是怕事，怕再因此而惹是生非，二来那时我一心想努力工作，把失去的青春追补回来，因而始终没有动笔。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又越来越觉得，我有责任把这段悲惨的历史记录下来留给后人。酒泉夹边沟农场当时是集中了甘肃全省各地的大右派以及少数“历史反革命分子”劳动教养的场所。59年反右倾拔白旗运动之后，又送来了一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白旗”。总人数在三千以上，而在我60年12月31日从高台被营救出来时，高台农

场里的劳教人员总数已不足一百人。这剩余的不足百人的劳教人员中，究竟有多少被营救出来至今尚活在人间，被营救出来的人们中有没有人动笔把这段历史记录下来？作为中华民族历史中的一页，甘肃省的大饥荒、全国的大饥荒无疑会有人忠实地记录下来的。因为党内党外忠于历史忠于事实的忠义之士是不乏其人的。唯物主义，实事求是的中国共产党肯定也会如实地记录下这几年极左路线大跃进、大浮夸给党和国家带来的巨大损失的。但是作为亲身经历在严酷的劳动教养条件下的饥饿和强制劳动双重折磨的人们中，究竟有没有人把这段往事记录下来就很难说了。如果没人记录，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就将被泯没，而人类历史、民族历史中这样残酷的一段如果被泯没，那将是非常不公正，也是非常不应该的。大跃进、大浮夸给党和人民带来的不仅是损失而且是灾难。就甘肃而言则是一场惨绝人寰的灾难。这里有着许许多多值得认真吸取的教训应当引以为戒。特别是各级担负领导职务的同志，应当从这个事件中吸取教训，改进工作。然而事实上吹牛浮夸之风至今仍然是我们党的一个难以治愈的痼疾。那些善于吹牛编谎、报喜不报忧的人物总是在飞黄腾达，而实事求是如实反映情况的好同志，却往往只能得到上级领导的反感。我在甘肃这一段时期的痛苦经历，既可以做为千百万遭受苦难的同胞们的呼声，也可以供正直的共产党人从中吸取教训，改进工作、改善领导。从这个角度来看，它还是颇有积极意义的。

高 仕 泌

2000 年 10 月

自 序

我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受环境影响，自幼就一门心思读书，想将来当个科学家，回报社会、造福人类。对政治不感兴趣，认为那是政客们玩的骗人把戏。对共产党也很不了解。抗战时期生活在大后方陕西、四川等地。听到的也多是对共产党的污蔑之词。但看到的，却是许多亲友为追求真理而奔赴延安。这使我年幼的心灵感到十分困惑。

1946 年我正在龙海铁路办的扶轮中学读高中一年级时。暑假期间发生了一件事。同班的一个同学的父亲，在河南境内的一个名叫野鷄岗的车站任站长。他暑假期间到父亲那里度假。适逢解放军前来攻打，传闻他们

父子两人都已牺牲。暑假过后。开学时，班上的同学们在教室里，自发安排举办追悼会。墙上贴满了悼词，地上摆放了许多自制的花圈。人人胸前配戴一只自制的小白花。正当将要开会时，这位名叫苏仲飞的同学却出现在教室门前。他还活着，他的父亲却真的牺牲了。于是追悼会变成了控诉会。苏仲飞在会上痛哭流涕，表态要报杀父之仇。

苏仲飞和我在小学时是同班同学。在班上都属于低龄小个一栏。平时相处很好。有一天闲聊时他悄悄地告诉我说，共产党好、解放军好。他说，那天夜里解放军打来，他和父亲一起都躲进了国民党军队建在站台上的碉堡里。在解放军的猛烈攻击下。国军举起白旗表示投降。正当解放军安排几位同志前来受降时。国军却突然用机枪扫射，把前来受降的同志全部撂倒。解放军一怒之下，炮轰了碉堡，随后冲上来，怒吼着：“一个不留、为牺牲的战友报仇。”黑夜里，把碉堡里的人全部毙掉。他恰恰被压在碉堡的楼梯下，没被发现才免于一死。天亮后打扫战场，他才被发现。此时解放军的激动情绪已经平静。看他是一个青年学生。问清情况后，把他救出来，一面为他治伤，（他身上有许多迫击炮碎片伤）一面给他讲革命道理。还用担架抬着他随部队转移。待到伤痊愈后，又根据他自己的意愿，给了他四个银元做路费，让他回学校读书。他说，这次事件明明是国军不讲信用，先伤害了解放军。致他父亲于死命的，是国民党军队而不是解放军。而且共产党的革命道理也让人十分信服。苏仲飞的经历和他讲述的情况，使我对共产党有了初步的了解和信任。

1948年我高中毕业考入西北农学院（现西北农业大学，简称西农）畜牧系。西农地处农村，国民党特务统治相对薄弱。党的地下组织相当活跃。许多有志革命的知识分子，都是经由西农辗转投奔延安的。解放后我才知道，我所接触的许多为人正派的校友、朋友们都是地下党人。在他们的影响下，解放前我就经常参加学校里公开收听的新华社的广播，这些都使我对党加深了了解和信任。1949年5月20日解放军进驻学校。王震司令员亲自登台宣讲革命道理。在他的感召下，许多同学参加了解放军，北上解放大西北。我由于担心吃不了日行军百里之苦，更由于头脑里仍然充满着读书升学的思想，因而虽然也曾有一时的冲动，最终还是留了下来。但解放军官兵一致、纪律严明、秋毫无犯的作风深深地感动了我。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禁绝鸦片、改造妓女、平抑物价、制裁投机等等取得的伟大成就，更使我从心里敬佩得五体投地，坚信在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必将建成一个富强伟大的新中国。

解放初期我和家里断了联系，生活失去来源，靠给学校刻蜡纸维持。

尽管手头十分紧迫，我还是努力积攒了一些钱，订购了一套头版毛泽东选集。拿到书后我认真阅读。矛盾论、实践论、新民主主义论、为人民服务等每篇文章都使我非常激动。特别是毛主席关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论述，被毛主席称之为三大法宝之一。更使我万分敬佩。我真诚地把对党要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作为行动准则，身体力行。1952年我大学毕业，同年9月经国家统一分配在北京总后勤部马政局（后改称军马局）参军入伍，成了一名解放军。安排在生产技术处。当时还是供给制。虽然待遇微薄，但我的工作热情高涨，几乎不知疲劳，不顾休息。1954年组织吸收我入团，同时申请入党。1955年奉命下放到云南丽江军马场、1956年又奉命调往甘肃山丹军马场。无论天南海北我都毫无怨言、服从命令。

山丹军马场位于祁连山东麓，是一片海拔2000—3000多米的大草原。东西长100多里，南北宽70多里。自古就是军马养殖基地。国民党统治时期也是由军队掌控。全场养有马匹一万多匹。还有许多牛羊。除极少数种畜外，全部都是粗放放牧饲养。场里的负责人，除政委、场长和少数工作人员外，技术副场长和四个分场场长，都是起义的留用旧军官。我报到之后，暂住在招待室等待安排时，就有一些早先分配来的、高校毕业的技术干部，悄悄告诉我，那位留用的技术副场长杨林修军阀作风严重、霸气十足。场里的许多工作都是这位副场长，召集几个分场长商量决定的。也有原来的牧工向我反映，那位技术副场长原来是国军的中校，旧社会时期凶得不得了。曾亲手打死过牧工。马政局卜副局长在丽江和我谈话时，要我尽快出发，早日到职。到山丹后却住在招待室一等许多天，没有工作。我心里十分着急。政委、场长都出差在外。可能是我的情绪反映到那位杨副场长那里了。他派人把我叫到办公室对我说：到马号去要一匹马，驮上行李到二分场上班去。我和他商量说，我初来乍到，二分场在那里，路如何走我都不知道，我的皮箱和一大木箱的书籍，一匹马也无法驮运。是否可以安排一辆马车送我过去。没想到他竟然把桌子一拍，厉声喝道，不行，这是命令。我本年轻气盛，又听到人们对他的不良反映，如今又亲自体验了这位旧官僚的霸道作风。一怒之下我回敬了他一句：我不听你的命令。然后扬长而去。后来还是开会回来的田场长。安排马车把我送到了二分场。

二分场场长叶桢远也是留用的少校旧军官。他曾参加过马政局在牡丹江举办的、由我负责讲课的全军马政干部技术培训班。因而口口声声叫我老师。对我也很客气。但他对旧社会十分留恋，办公桌玻璃板下还公然压

放着他国民党时期全副戎装、少校军衔的大幅照片。思想又十分消沉，经常劝我和他一起喝酒，在他心目中，前途似乎十分渺茫，只想以酒浇愁。特别是上报报表时，把死亡的马匹都报成淘汰，使我十分不满。我把情况向书记汇报却得不到任何答复。这使我产生领导被这些旧军官蒙蔽的感觉。（后来才知道虚报成绩是政委的意见，这样可以要到更多的经费。）因而发牢骚说，山丹军马场实权掌握在国民党手中。对于我向政委反映的意见得不到答复，也很不满意。在反右运动中，挨批挨斗时，我总是据理力争甚至反驳同志们的批评。情绪低落时，在日记中也写了些不安心工作，想到高校教书、到科研单位工作的想法。不想这些都成了我的罪状，最终竟被定成了极右分子。而且几乎因此而葬送了性命。我算是不幸中的万幸者。那些抛屍酒泉、高台的，数千大大小小的右派们，他们的沉冤即使最终得到了洗雪，但他们的生命却无论如何也无法挽回了。

亲 厉 夹 边 沟

（一）劳教生活的开始

清晨，天上飘洒着细碎如沙的小雪，天空敷着一层淡黑色的薄云，雪落到地上，被风吹卷着，堆积在墙角、洼地和房屋门口的台阶下面。砖铺的，供人行走的突起的路面上，仍然是黑油油地裸露着道路的本色。本来就十分宁静的草原的早晨，今天显得格外宁静。我和张家骥起床漱洗之后，把行李捆好，到食堂去吃早餐，食堂里的十几张餐桌上，已有十几个先来就餐的人，散坐在那里吃饭。但是，除了炊事员盛饭菜时，勺子和碗碟碰撞的声音外，就只有人们喝稀饭时发出的唏嘘声。

今天是1958年的第一天。往年新年伊始，人们总要高高兴兴地热闹一番，以示庆贺。可是今天却是那样的静谧，静谧得有些使人毛骨悚然。

细碎的雪粒还在不停地飘洒着，大约九点钟光景，一辆苏制嘎斯69型敞篷货车开来，停在办公室门前，治保干事冯大信从车上下来，来到我和张家骥的临时住处，招呼我们把行李铺盖搬到车上。我是单身汉，行李本来就少，55年从北京调云南时已经经过了一次精简，56年夏从云南丽江调到山丹来时，考虑到长途跋涉，托运行李多了，将给国家增加许多开支，因此又将一些一时穿不上用不着的破旧衣服和零星杂物，在云南就地做了处理---赠送给了当地的农民百姓。所以除了一只小皮箱，一个铺盖卷之外，只有一个沉重的书箱。读书人，书总是不能轻易丢弃的。

张家骥是场里政工组的干事，山东人，年龄和我差不多，相当于高中文化程度。是个古诗爱好者。曾在连队担任文化教员。不久前才转到农场来，在场部搞政工工作。他已结婚，爱人也是山东人，也在场里工作，刚有一个不满周岁的小男孩。平时和我很少接触。一个多月前，我们俩在同一个会场上，一同被宣布为极右分子，同时受到三开除（开除工职，开除军籍，开除党籍，团籍）和劳动教养的处分，并一同奉命到第三分场的农场里劳动锻炼，这时才互相有些了解。我万万没有想到，像他这样一个解放战争时期参军的党员干部，竟然也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交谈中知道，他是地主家庭出身，因为喜欢读李白的诗“兵车行”而被定了罪。

当我们两人搭乘场里自备的马车，到三分场劳动锻炼时。一方面都因为能离开不停地挨批挨斗的场合，在精神上得到了一些缓解和休息而感到高兴。另一方面又都想用实际行动来向党表白自己热爱党热爱祖国，知错能改的心情。所以，我们每天都早早地起床，吃过早饭就到队长那儿去领工。西北高原上，收获大忙的季节早已过去。我们能做的只是扫场院，抖麦草，把残留在草堆里的粮食抖出来，扬净晒干，然后入库。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小秋收”。我们两人都是年轻力壮的汉子，又都抱着立功赎罪争取组织了解原谅的心情，那劳动的劲头自不待言。我们想，我们都没有犯什么不得了的过错，又都这样积极忘我地劳动，和农工们同吃同住，完全打成了一片。这些实际行动一定能感动领导和同志，能得到他们对我们的谅解和宽恕。带领我们劳动的农工队长，从我们投身到劳动中之后不久，就接连对我们进行了多次表扬，这更使我们的事情得到了不小的安慰。劳动教养这个名词我在报纸上见到过，还读过一些关于劳动教养的报道文章。因此，我和张家骥几乎都把在农场的劳动，理解成劳动教养了。12月31日接到返回场部的命令。我们两人真是喜出望外，以为一个多月的汗水没有白流，组织上终于对我们宽恕了。可是，一踏进场部的大门，就感到气氛和我们想象的完全不同。没有一个熟人敢和我们打招呼。更没有一个人敢和我们接触。和我们相遇的人都把目光转向别处，或者干脆把头低下假装没有看见。

治保干事冯大信走来，指定了一间空屋让我们住下，并嘱咐我们，明天早晨起床后就把行李捆好。老冯平时和我相处得不错，但是今天他是以公务身份和我们接触的，所以除了上面讲的几句话外，什么也没多说。

我把行李，书箱搬上了卡车。张家骥的行李更少，只有一个铺盖卷。他的东西都丢在家里，交给他的爱人小刘了。

不知是那个好心人给小刘带了信，她抱着不满周岁的孩子，急急匆匆地赶到车前。“让孩子再看一眼爸爸吧，让爸爸再亲亲孩子吧。”我们两人已经爬上了车厢。张家骥探身吻了一下小刘高高举起的孩子。汽车发动了。张家骥一手扶着车厢板，另一只手举起来向他的妻子和孩子招手“不要伤心，不要悲痛，我很快就会回来的，我很快就会回来的。”小刘哭起来了，越哭越伤心，随后情不自禁地嚷了起来。“天哪，他犯了什么罪呀，为什么把我这个家庭拆散，让这个不满周岁的孩子从小就失去父亲呀！天哪，他犯了什么罪呀，难道喜欢读古诗也有罪吗？天哪，这是那个没良心干的缺德事，这是打击报复，这是假公济私啊！”她喊得那么伤心，声音又是那样的凄惨响亮。

几个胆子大些的青年职工，听到小刘的喊声从自己的住室里走出来，站在屋门口远远地看着，两三个女职工可能是得到了命令，赶到现场来对小刘进行劝阻。

车子开动了，张家骥站在车厢边，再次举起一只手，朝着他的妻子大声地喊：“不要伤心，不要悲痛，我很快就会回的。-----”。是啊，我们没有做任何犯法的事，我们内心又是那样地对党尊崇和忠诚，我们坚定地相信，这一定是一场误会，我们不久一定会回来的。

车子一转弯上了公路，小刘的哭喊声渐渐地消失了。车速加快，拉起了呼啸的风，夹杂著细碎的雪扑打过来，身上顿时感到了寒冷。我裹紧了光板老羊皮大衣，扣紧了狗皮帽。紧缩著身体坐到货车前端我的行李上，背紧贴着木制的车厢板以尽量减轻狂风的吹袭。张家骥摇晃着从车厢边退缩过来，在我的身边紧贴着我坐下。眼里噙着的泪水禁不住流了下来。

忽然车子停住了，老冯打开驾驶室的侧门，站在脚踏板上探身向车厢里朝我们看看，对我俩说，你们好好地坐着，不要乱动，咱们是熟人，就不用这个了。说着把手向上一举，亮了一亮他手里拿着的一副铮亮的手铐。

我心地坦然地坐在那里，没有做声。我没有妻子儿女的牵挂，也没有做过任何违法违纪的事情，向组织和领导提意见尖锐了些，这也许就是我的过错。但是毛主席在他的著作中就明确地指出，对党对组织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而且说要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并且要求人们理论联系实际，做到对党忠诚，言行一致。难道按照毛泽东选集的要求做事还会有罪？眼前发生的一切，至多是一场误会，用不了多少时间就一定会得到组织的谅解。共产党是实事求是的，是讲求民主的，是唯物主义的，以前经历的一些运动也使我相信，共产党是不会冤枉好人的。我心里仍然充满著信心和希望。

雪越下越大了，车厢里和我们的衣帽上都积起了厚厚的一层雪。我和张家骥都卷缩着，坐在自己的行李上，默默地都不做声，他也许正在惦念着自己的妻子和不满周岁的娃娃，我则正在揣摩着究竟要把我们送到什么地方去。

中午车子到了山丹县城，在军马场驻山丹办事处停车。老冯招呼我们两人下车到食堂里胡乱吃了一餐午饭后，就立即上车，汽车开足了马力向北疾驶而去。

冬天，北方的白天是那样的短暂，不知不觉天色已经昏暗下来，汽车驶抵酒泉，司机停车向路人询问了几句之后，就调转车头向东驶去。大约经过半小时，车子开到一排平房前面，冯大信下车，踏着路上厚厚的积雪向平房走去。不久，带着一个干部模样的人来到车边。他们招呼我们两人把行李物件从车上搬下来之后，汽车就调转车头沿原路走了。

那个干部让人在我的皮箱和书箱上用墨汁编号之后，命令我把它搬到办公室附近的一间库房里寄存起来。然后分别询问了我们的姓名、籍贯、年龄、工作单位、职务、文化水平等，并一一做了登记。我刚想问一下能不能让我把书箱带在身边。还没来得及开口，他已经以一种不容商量的口吻，命令一个办事员把我们两人带走。

我和张家骥各自扛着自己的行李，手里拎着盛脸盆牙具的网兜，跟着这位办事员走了一段路，来到一座四面有围墙的大院。进入大门，办事员朝门口的一间屋子喊了一声，立即有两个30多岁、农民装束的人从屋里跳了出来，笔直地站在他的面前，毕恭毕敬地请示有什么吩咐。办事员把我和张家骥交待给他们，然后对我说：这是积肥组的田组长，你今后就在他领导下劳动。张家骥则被交给了另外一个大田组的负责人，并也做了类似的交待。随后又以命令的口吻对这两个组长说：你们给他两人安排一下住处。两个农工组长同时响亮地回答了一声“是”。就把我们两人分头向不同的方向带去。

58年元月一日对我来说是一个永远难忘的日子。这一天是我“新生活”的开始。从这一天起，我经历了整整三年人世间少有，人类历史上可能也属罕见的“改造思想，改造世界观，脱胎换骨，重新做人。”的劳动教养生活。

（二）开始饥饿的折磨

积肥组住在两间坐北朝南的小屋里，屋的深度大约只有三米，一横一竖砌了两张相连的土炕，只在门口留了一条宽不足一米，长约二米多的走道。屋里点了一盏用玻璃药瓶做的小煤油灯。昏暗的灯光摇摇曳曳。人们

杂坐在炕上，偎在被窝里。田组长推门进去。挤坐在炕上的人们立即安静下来。组长和大家打个招呼后，指着炕沿对大家说：给咱们组再增加一个人，就睡在这儿，大家挤一挤腾出点地方。在田组长的指点下，人们开始有气无力地挪动起来，在组长手指的地方腾出宽不足一尺的炕面。我把行李上的积雪扫净放上去，解开绳子。把军毯和褥子都折成细长的条形，铺到人们腾出的炕位上。看着我把这些做完，组长才转身离去。炕上不知是哪个人说了声：太挤了，组长。田组长一脚站在门里，一脚踏在门外，恶狠狠地扭回头看了大家一眼，没有追究是谁说的话，只是回答了一句：嫌弃？这才在哪呀，人还多着呢，挤的日子还在后头呢。

开饭的钟声响了。同样也是劳教分子的副组长——一个身材瘦削，个子高高的山西人，安排两个值班的组员到伙房去，帮我领了一副碗筷，并把全组人的饭菜领了回来。每人两个馒头一碗菜汤。大家挤到炕沿上，各自领了自己的那份馒头和菜汤，然后就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

我初到这个新地方，心情很不平静，哪有心思吃饭？只是乘了一天汽车，嘴里发干。我把菜汤里的汁水喝了几口就不再吃了。坐在我身边的一个，低声向我问了一声：你不吃了吗？说着就把我碗里的残菜连同剩汤一古脑儿倒到他自己的碗里去。但是，更引人关注的，是我那两个馒头。看到大家馋涎欲滴的样子，我拿起馒头打算分给身边的几个人吃。忽然屋角的一个人对我喊道，“馒头不能给人。”我被他这一喝怔住了。接着他善意地向我讲述了这里劳动强度之大和食物的严重紧缺，并劝我说，如果现在不想吃可以留着明天再吃。

我在山丹军马场已经劳动了一个多月。对劳动的消耗已经有所体会，但一则对这里的情况还不了解，二来也实在没有心思吃饭。因而还是坚持着把馒头分给了大家。“你明天就会后悔的。”在我分馒头的时候，那位好心而直爽的难友这样对我喊了一声。然后大家就又投入一天之中最为重要的活动——吃饭之中。

天色完全黑下来了。晚饭后还有不少时间，大家偎坐在被窝里，轻声交谈起来，互相询问着身世，年龄，籍贯，原来的工作单位以及家庭情况等等，除此之外其他都互不提及，特别是各人所犯‘错误’的具体内容大家都缄口不谈。

屋子里连我一共十一个人，来自甘肃各地。除了一位年纪较大的临洮人是“历史反革命”外，其余都是右派。

就寝的时间到了，在狭窄的铺位上，人们只好一人头朝里，一人头朝外象楔子一样脸朝上平躺在铺位上，稍有动静都会影响别人的睡眠。即便

如此，人们还是很快地都进入了梦乡。我挤卧在宽不足尺的炕位上，久久不能入睡。想着远在福州的父母弟妹，想着在北京工作时的首长、同学和曾经一起工作过的战友和同事们。担心着他们的前途和命运。我最担心的是弟弟仕贤。弟弟的性格和我不大一样，但他也是大学毕业的知识分子。对政治形势的认识，对党的要求和期望，特别是对人对事都主张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这些又和我十分相似。因此我对他特别地不放心。万一他也被打成右派，那就糟糕了。年迈的父母和年幼的妹妹们，生活上就将失去依靠。更何况我的境遇还将给家人带来多么沉重的精神打击和负担。

第二天大雪依旧下个不停。暂时还不能出工。当我得知农场门外就有邮局时，我立即把我改成薪金制以来的几百元积蓄，除留下一些做另用外，其余全部寄回了福州，并写了一封长信给爸爸妈妈，一方面告诉他们，今后我将不再有工资收入，这些钱留给家里维持生活，请家人节约使用。另一方面要他们告诉弟弟，说话要小心，千万不要也被打成右派。

雪止天晴，人们开始投入正常的紧张的劳动。积肥组的任务就是把人畜的粪尿收集起来，集中到指定地点，用土埋压起来，待其发酵腐熟之后，作为肥料施到田地里。

早饭后，我扛着新领来的铁锹，组里其他成员有的推着木制的独轮车，有的和我一样扛着铁锹，跟着浩浩荡荡的劳动大军，蹒跚着步子向工地走去。我们的工地就是厕所，马厩，牛圈和羊舍。我是个急性子，对出工时这种慢腾腾的步伐很不以为然，“走快一点不好吗？”我心里在想。但初来咋到，我没好开口说出来。可是没过多久，我就发现我完全想错了。从走到工地开始劳作时开始，那位田组长就像个恶煞神一样，吼叫着，咒骂着，不准许人们的手脚有稍许的停歇，连伸个懒腰都不行。谁要是拄着铁锹站一下，他马上就点着名吼叫起来，嘴里喷出一连串恶毒的咒骂声。他自己手里也拿着一把铁锹，但那是做样子的。只有当干部在场，或是有领导人从我们这里经过的时候，他才会生龙活虎般地动作一番，干部们一走，他马上就歇息。但是要求我们的，却是一分一秒也不准停歇。也许他是想给我一个下马威吧。他对我这个新来的成员，要求得特别严格，咒骂的语言也格外地不堪入耳。惹得我无比愤怒，几次要和他争辩，都被一起劳动的难友们以各种方式向我暗示、阻拦而没有发作。

田组长在我们面前耀武扬威地耍了一阵子威风，随后就悄悄地离开了。“靠墙坐下来吃袋烟吧。”一起劳动的副组长发了话。于是大家就如释重负地放下手中的工具，在向阳的墙脚边蹲下。一个个慢慢腾腾地从怀里摸出烟斗，火柴，烟叶包等，然后装烟，点火，一口一口地吧嗒起来。相互之

间互不相让，也很少有什么话说，只是偶尔议论几句烟丝的好坏。

肚子里已经饥肠辘转了，但我们上班才两个小时，离午饭开饭的时间还早着呢。这时我已经是腰酸背痛，浑身乏力，恨不得能马上躺倒睡上一大觉才好。然而现实却是，还必须实实在在地再劳动两个小时才能午休。能有一个馒头，一块饼，那怕只是一口吃的东西填填肚子也是好的。副组长像是看透了我的心思。把叼着烟锅的头扭过来，向我会意地瞅了一眼。这时我才体会到“你明天会后悔的。”这句话的意义和分量。

每天工作的顺序都是一样的。先打扫厕所，然后是马圈，牛棚，最后是羊舍。程序是，先把粪便，尿泥用铁锨铲起来，装到那个木制的独轮车上，送到附近的粪堆上堆积起来。然后把干土装车送回厕所或畜圈，再把干土均匀地撒开。最后再用土把粪堆压盖起来，并用锨背把它拍打得方方正正。羊圈不需要天天打扫清理，只要把干土送进去均匀地撒开就可以了。这些活儿，农民出身的干部们，干起来也许并不太吃力，但象我这样学生出身，从未参加过多少体力劳动的“三门”（三门是指家门，校门，机关门。）干部，由于干得不得法，所以感到特别吃力，特别辛苦。每天收工回来总是腰背酸痛，浑身就象散了架一样。往炕上一倒就恨不得能一觉睡过去。但夜间又总是因为浑身疼痛而辗转反侧不能入眠。尽管如此。组里许多和我差不多的难友，个个都咬着牙坚持锻炼，无人叫苦。大家都抱着一个相同的信念：用实际行动向党表白自己对党的忠诚和通过劳动锻炼，改造自己的思想和世界观的决心和毅力。

口粮标准据说是每人每月 45 斤成品粮，这个看来不算低的供给标准，在这种超强的体力劳动和副食品严重不足的条件下，显然是不够的。坦率地说，如果让人们放开肚皮吃的话，一天的口粮只能够一顿吃。饥饿，从进入劳教队的第一天起，人们就陷入了严重的饥饿的折磨之中。

（三）无奈的“精神会餐”

这个地方叫做夹边沟农场，据说原来是收容劳改犯的劳改农场。在新的形势下，劳改犯们被转移到别的地方，这儿就留给了我们。

大院门外的土路两旁和干渠、排碱沟的两旁，都栽种了不少沙枣树。大片的沙荒地里稀稀疏疏地长着不少红柳。这些乔木，灌木的小树，在寒风的吹袭下，只剩下光秃秃的枝干。平整过的土地被终年不断的风沙吹袭着，背风的凹地里，已经又积满了流沙。地面上由于水分大量蒸发，把地下水里所含的盐分留在了地表，形成了斑斑驳驳大片大片的盐碱滩。张家骥所在的大田组，就肩负着开挖沟渠，平整土地，引水洗碱，把沙荒地改

造成良田的艰巨任务。

这是一个相当宏伟的计划。按照科学的规律。在沙荒地里修渠引水，大面积地进行洗碱灌溉。流进碱滩的水把碱溶解之后，随水下沉，再经宽十余米，深度足有三米多，犹如一条大河般的排碱沟，把含有大量盐分的水排送到远方。这样一来，大片大片的荒地碱滩，就被改造成了可以种植作物的良田。再辅以植树造林、防风固沙等措施，几年之后，这里的面貌就将大大改观。一个沙漠边缘上的绿洲、果园、粮仓，不久的将来就将在这里出现。人们紧张地，忘我地劳动着。劳动的队伍也在不断地扩大着。总人数已经从元旦我刚到时的一百多猛增到近五百人。每到开饭的时候，伙房门前的广场上就密密麻麻地站了一大片人，各组排成长队，依次向前去领取属于自己的一份饭菜——一个大馒头和一碗菜汤。馒头由原来每人两个小的，变成了一个大的。据场领导说，份量没减少，只是因为人多了，炊事员忙不过来，所以做了些变动。但这在人们心理上却引起了不小的波动。本来就填不饱的肚子，这一下似乎更饿得慌了。场领导也发现了普遍存在的吃不饱的问题。但是，粮食供应是定量的，没有任何活动的余地，副食品也无从增加，减轻劳动强度更无从谈起，唯一可行的办法是改变粮食的加工方式。有人提议以稀代干，以为这样可以填饱肚子。于是一日三餐，每人每餐一个馒头一碗菜汤，变成了一日三餐顿顿都吃面条。每到开饭的时候，食堂按照各组的人数，把煮好的面条分别盛到一个个木制的大桶里，再由各组的值班人把热气腾腾的面条桶抬到一排排长队的前面，大家依次上前，由值班人给每人碗里盛上一勺面条，吃完了再盛第二勺。这样一轮一轮地分，直到最后，剩余部分再按全组人数平均分，那怕只是一汤勺的面汤，也要“寸土必争”，互不相让。分饭的时候，为了避免分配不均，营私舞弊。每队分饭时还专门安排两个非值班的队员，站在面桶两旁进行监督。往往因为谁的汤多面少或是汤少面多（一般都是认为自己吃了亏）而争得面红耳赤。然而谁能做到每勺盛的面条和汤的量都一样多，每人分到的面条和面汤都完全均等呢。于是，每到吃饭的时候，都是各组人们为分食而互相争吵的时候。我当然也非常关心自己的那一勺勺面条，同时也希望值班的人能对我手下留情，打饭时能给我多打些面条少盛些汤，而且在向碗里倒的时候能倒得干净些。但是，迫使我更加关心的，是如何能在打第二勺之前，把第一勺面条吃光。否则，盛第二勺时，由于我的碗里还残留着一些面条，值班人在向我碗里倒面条时就不可能倒干净，而这勺子里残留的这一点面汤对我们这些饿鬼来说，又是多么至关重要啊。

分饭的时候，人们排着长队，依次向饭桶走去，分到饭后就边吃边向

队尾走去，再排在队的后面。第一勺分完再分第二勺，大家手里捧着饭碗，一边吃一边一步一步地向前挪动。再有四个，三个，两个，一个人就又轮到我了，该死的面条还是那样滚烫滚烫的。我恨不得张开喉咙把碗里的面条一古脑儿倒进肚子里去。轮到我了，尽管我以最快的速度，一连抢吃了好几口，碗里还是剩下了一些，分饭时只好被勺子带走几根面条。而那些吃得快的人自然就不会吃这个亏。但有什么办法呢，谁让你怕烫吃得慢呢。也许不只我一个人在这方面吃亏。几百人当中肯定还有和我相似的人。不知是谁想出了好主意：弃碗用盆。大门外的供销社调进了一批中等大小的搪瓷盆，容量要比碗大得多。用它盛面条，一顿饭的面条，一口不吃也足能够盛下。于是人们纷纷调整装饭工具，没有几天功夫，大家就清一色地把饭碗都变成了饭盆。为了简便分饭，打饭的工具，也由小铁勺换成了大马勺，一人先分一大勺剩下的再用小勺平均分配，分起来又快又公平，减少了不少麻烦。然而半斤面蒸出的馒头和半斤面煮成的面条，形状体积尽管不同，所含能量和营养成分却没有两样。馒头变面条的结果，除了头一两顿，使人吃后感到肚子稍稍有些发胀之外，在减缓饥饿感方面没有任何效果。相反，人们的肚子还被越撑越大，饥饿的感觉反而更加严重。如何消除饥饿成了人们最最关心的大事。休息的时候，只要有些精神，比如因为气候恶劣无法出工，人们都留在宿舍时，大家闲聊的话题，不可避免地就一定是有关吃的事。红烧猪肉时，肉块应当怎样切，佐料都该放些什么，南方是怎样烧的，北方是如何做的。新疆的烤羊肉味道是如何的鲜美，火候应当怎样掌握。土豆虽然是最普通的蔬菜，但有一道名菜叫做拔丝山药，这山药可以用土豆来代替，加工时土豆应当怎样切，油炸时火候应当如何掌握，糖油的比例该怎样调配等等等等。总而言之，鸡鸭鱼肉，山珍海味，所有好吃的东西都被一一列举出来，从原料的选择到加工方法以及菜肴的滋味，都讲述得详尽细致。说得大家一个个都馋涎欲滴，而到头来又不免是远不可及的空中楼阁。尽管如此，人们对于吃的东西还是津津乐道，似乎议论一番也能解馋。大家给这种议论起了个颇为恰当的名称：精神会餐。其实那时口粮虽然不足，但欠缺的程度还并不像人们感觉的那么严重。如果每人每天能再增加一些粮食或者能多供些副食品，或者能适当降低一些劳动强度。情况就可能有所改观。然而这些在当时当地都是绝对办不到的。俗话说：“一顿不饱顿顿饥。”人们只好无奈地陷入长期持久的饥饿的折磨之中。

（四）一次严酷的考验

一批又一批被处分的人群，陆陆续续被送到夹边沟农场来，临近春节

时，这儿的人数已经猛增到近千人，而且每天还不断有新的成员被送进来，虽然各人的衣物被褥都是自己带来的，穿的盖的一般不存在问题。但是吃的却是要政府供应。上千人吃的粮食，烧的煤炭，以及最起码的副食品，都要从外面购买并运送进来。春节在即，为了让大家过好第一个春节，也为了兑现“重在改造思想，生活上不予企视”的许诺，有关领导在这方面，的确也做了很大的努力。

春节前几天，一个阴沉沉刮着大风的日子，忽然接到命令。全场人员集合，到农场附近的一条大河边，去帮助汽车渡船靠岸，好让船上载运物资的汽车登上岸来。数以千计的劳教分子立即集合，出发到了河边，列队待命。

风在呼啸着，河水湍急地流淌着。我们列队站在河边，只感到浑身透骨的寒冷。大田组的人们听从着命令，一批又一批地脱去鞋袜，甩掉棉衣棉裤，只穿着毛衣背心和短裤，赤着两腿一个接一个地走下河去。渡船已经从对岸驶到河边，只是由于水浅而无法和码头接拢。于是让人们下到河里去抬。把已经靠近岸边的船体抬高，一点一点地向岸边挪动。由于船上装载着载满物资的汽车，船体深深地沉在水下，即使是靠近岸边的地方，水深也接近膝盖，而船尾部的水深就接近了腿根。几十个人一批，跳下水去，围着船体两边，由一个人带头喊号子，大家一起哼哼哈嘿共同努力，两手扳着船体猛地向上一抬。抬上几下之后，再换一批人下去，重复着同样的动作。船体一点一点地向岸边挪动，终于和码头相接。汽车缓缓地驶上了河岸。船体浮了上来。于是调转头驶向对岸，再装载第二辆汽车过河。

站在刺骨的冷风里，看着人们一个个脱掉衣服、赤着两腿跳下河去，又湿淋淋地从河里爬上岸来，身上禁不住接连打几个寒战。

大田组的人多，因此一开始都是大田组的人先下去。我们集肥组的十几个人一直站在河边，缩着脖子静静地等待着命令。心里却在想着，如果大田组的人们能早点完成全部任务，我们也许就可以免受下河挨冻之苦了。

“集肥组的，脱衣服下去。”不知是哪个领导人，从什么地方发出了命令。我们这十几个人立即行动起来。脱掉鞋袜、脱去棉衣棉裤，模仿着大田组的人们那样，赤裸着两条大腿，扑通扑通一个接一个地跳下河去。没有一点犹豫，没有一点拖拉，大家齐刷刷地围在渡船周围，站在冰冷没膝的河水里，听着指挥人的口令，模仿着前面下河的人们的动作。说来也怪，下水之前心理上的恐惧这时都不知飞到那里去了。刚下到水里时，先是感到刺骨的寒冷，冷得膝盖和小腿的骨髓都感到一阵阵钻心的疼痛。可是在水里哼哼哈嘿地待上一阵之后，尽管身上连棉衣也没有，但身体里却产生

了一股热流，没过多久浑身上下就都暖热起来，连泡在冰冷的河水里的两条腿，也都感到热乎乎的，膝盖和小腿也不再感到疼痛。这大概就是一切生物，也包括人类适应环境的一种本能的反应吧。

我们站在河里，哼哼哈嘿地干了一阵，也不知道船体靠岸了没有，听到上岸的命令，便一个接一个急匆匆地跳上岸来。匆忙地擦干两条腿上的冰水，穿上衣服。尽管寒风依然在呼啸，我们身体里却流淌着一股股暖流，没有一丝寒意。

狂风怒吼的三九天，脱掉棉衣，赤着两腿，勇敢地跳进冰冷的河水里，我们认为，这无疑是党对我们这些右派分子的一次考验。我们一个个都像是考试得了一百分的小学生一样，心里真是无比的高兴。

（五）盗窃犯老莠

排队打饭的时候，邻队有一个小伙子，他身强力壮，满面红光。别人都老老实实排着长队，依次上前盛打属于自己的那一份饭食，他却不守规则，不时地各处走动，并且毫无顾忌地任意和其他队的成员搭讪讲话。我端着饭盆，一边吃一边排着队等着再次添饭的机会。小伙子端着饭碗朝我走来。他两眼直直地望着我看了一阵子，然后开口问我：你姓啥？听他说话的口音是河南人，我立即产生了一丝亲切感，因为我在高中读书的扶轮中学里，河南人居多，河南话在学校里几乎就是校园官话，因而我也能讲一口流利的河南话。我用河南腔回答了他的提问。然后胆怯地、悄悄地问了他的姓。他立即大大咧咧地回答我，他姓莠。听到他的回答，我误以为是姓常。他立即纠正说不是的，是草字头下面一个长短的莠。这是一个十分稀罕的姓氏，因而使我印象深刻记得十分清楚。

我们所有的劳教人员，个个都面黄肌瘦，而他却满面红光。但他确实也是一个劳教人员，这使我感到非常奇怪。于是我又悄悄地问他：你犯了什么错误，年纪轻轻也被送来劳教？他却毫无顾忌坦然地告诉我，他是小偷，因犯盗窃罪而被送来劳教的。当我问他为什么别人都饥饿难耐，身体瘦弱，他却身强力壮面色红润时。他告诉我说，你们劳动我不劳动，领导叫我干活，我就是顶着不干，领导也拿我没办法。你们肚子饿，我肚子也饿，我也吃不饱，吃不饱咋办？偷，到大食堂去偷，也到小食堂去偷。干部的小食堂伙食好，好吃的东西多，我就去偷来吃。开始偷时他们不知道，待到常偷被发现后我就抢，抢了就跑，抢的东西不多，他们追不上我，也就不追了。我本来犯的就是偷窃罪，再偷也还是这个罪，所以我不怕。我又悄悄问他，难道你不想早点改造好早点出去吗？他却说，我是小偷，什么改造不改造思想，我无所谓。以上这些对话，是许多天在吃饭时我和老

莠的交谈。由于劳教队规定，劳教人员不许互相交谈，所以这些谈话都是悄悄地进行。在我来说是悄悄地，而在老莠来说却是公开的，他毫不在乎，没有一点戒惧之意，他和我谈，也和队里的其他劳教人员谈，而且说得那样无拘无束，自由自在。

老莠的言行在劳教人员中吹起了一阵小小的涟漪。人们在晚饭后就寝之前，悄悄地议论起来。许多人不能理解，姓莠的小伙子犯的是盗窃罪，他是罪犯，犯的是法理不容的罪行。而我们只是说了些不合时宜，不合领导口味的話，充其量不过是思想上出了些毛病。我们至多是犯错误。错与罪相比之下，无疑错要轻而罪要重。但组织和领导上对老莠是放任不管，无可奈何，对我们却无比的严苛。真是没有道理，太不公平。议论中不知是谁发言说，思想问题是政治问题，什么事只要扯上政治，问题就严重了。所以和盗窃犯相比，我们的问题自然就更严重些。这个答案在今天人们看来也许会感到莫名其妙，不可理解。但在当时确实是非常正确，我们这些右派分子们不得不心悦诚服。

一天，吃饭时老莠告诉我，他要走了。我问他要到哪里去。他说他要出去。我以为他将获释，于是向他祝贺。他却告诉我，他不是获释而是要逃跑。逃跑对于我们这些劳教人员来说是严重的问题，搞不好将要受到酷刑。但老莠对我说这话时，仍然是那样从容不迫，无所顾忌。他甚至告诉我，他已经看好了逃跑的路线，并且告诉我说，那是一条绝对安全的路线。听到老莠的话，我害怕起来，从此不敢再主动和他搭讪，因为万一他真的逃跑了，搞不好我会受到牵连，至少可以算作知情不报。好在老莠在讲他要逃跑的话时，同样是在大厅广众之下，大大咧咧毫无顾忌地讲的，我听到了，许多在场的劳教人员也都听到了，万一真的出事，追究下来，有问题也不只我一个人。我想，我只要主动和老莠疏远，不再和他交谈，应该就不会有什么问题。

老莠依旧和往常一样，每到吃饭时，都在劳教人员的队伍中到处穿行。小队长，中队长，大队长以至管教干部们对他依然是放任不管，无可奈何。我们劳教人员自然更是听之任之不闻不问。

忽然有一天，吃饭的时候老莠的身影没有出现，他从我们的队伍里消失了。没有人追查他的去向，就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一样。事后有人说老莠逃跑了，按照他自己说的那样逃跑了。也有人说，估计是组织上把他送到别的劳改营地去劳动改造去了，究竟是何结局，至今我也不得而知。但他在我们劳教队伍中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形象，在人们脑海里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显然，在组织和领导的心目中，右派的问题要比盗窃犯的

问题更为严重。我们这些右派分子，不仅要在劳改释放人员的严酷管束下，进行超体力的劳动，而且我们的社会地位也远不如一个窃贼。

（六）罕见的北极光

春节快到了，每个劳教人员都以无比紧迫的心情，期待着假日的到来。期待的内容又是那样的简单，就是希望在这个中国人民古老的传统节日里，能够得到一些肉体上的歇息和较好地吃上一餐饭。从元旦到春节总共不过三四十天，平时这些日子在不知不觉中就悄悄地度过了。然而在这里，这三四十天可真是足足象三四十年一样的漫长。“度日如年”这句成语，在这里才真正有了切身的体会。

节日终于在人们苦苦的期盼中缓缓来到了。大年初一到初三放三天假，就地休息，不准外出。初一早晨食堂里准备了一顿“丰盛”的早餐：每人两个大馒头，一大碗面条，面条里面还有几片青菜和稀疏难辩的一点点油花。质量当然无法和平时在家和单位过年时相比，但至少吃后肚皮能有一些胀的感觉，虽然离吃饱还有相当的距离。这在当时当地已经是非常难得了。回想起来，这是我到农场三四十天，也是到农场三年以来唯一的、也是最好的一餐饭。其实我们的各项伙食标准都没有提高，春节没有任何伙食补助，只是食堂平时每天有意识地克扣一点，积攒起来，用来改善春节的伙食，同时春节放假不劳动，加之一天只吃两顿，三餐改为两餐，这一餐自然就比较丰盛了。

为了活跃假日生活，领导还组织了一场篮球赛。我平时喜欢打球，年纪轻，个头也不算矮，自然被指定作为选手上场参赛。我高高兴兴跑到球场，本想痛痛快快地玩上一阵子。谁知上场之后，我就发现，自己的两条腿竟然像灌了铅一样地沉重，不要说弹跳，就连跑动都十分困难。似乎自己已经无法掌控自己身体的重心和平衡。球场上其他几个球员也和我差不多，同样也是在艰难地移动着自己的躯体。比赛时，除了一个年轻的干部做裁判，在场地里前后跑动外，场外没有一个观众。我们几个人在球场上胡乱跑动了一阵子，那位当裁判的干部，看到赛事实实在难以进行，只好提前宣告比赛结束。

由于放假，人们不下田干活，牲畜也不出去拉车犁地，厕所畜圈里的粪便，反而比平时积攒得更多。为了使我们的积肥组的人也能得到休息，场领导把大田组的人组织起来，由积肥组的人带队，分头到厕所，畜圈进行打扫。“人多好干活。”平时要我们全组人从早忙到晚，费好大力气才能完成的任务。大家一拥而上，很快就清扫完毕。因此这三天的假日，我们多少还得到了一些肉体上的休息。

记不清是年三十还是年初一的夜晚。一个同室的难友外出解小便的时候，发现北面天空一片通红，犹如万道霞光，使得万里晴空满天的星斗都黯然失色。他情不自禁地喊了起来。人们被惊醒了，一个个穿上衣裤，跑到外面，仰望着北面的天空。宁静的夜晚。空气像是被凝固了一样，没有一点风，这在酒泉是十分少有的。但北面天空美丽的景色更为罕见。人们不约而同地背靠着北墙，蹲坐了下来开始议论。这里终究是知识分子密集的地方。很快就找到了答案：这是北极光，是地球磁场作用产生的自然现象。好在明天仍然放假，还是吃两顿饭，早晨可以晚些起床。人们一个个静坐在墙根 仰望着北方天空瑰丽的自然景色，禁不住心潮翻滚。春节，这是中华民族传统的，家人团聚的节日。我们这些无辜的“罪人”，却不得不在这荒凉的沙漠中，过着强制劳动，失去自由的劳改生活。同室的十多个人，除了我是单身汉之外，其余都是有家室，有子女的。不知是谁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大家一下子都静默了下来，不再有一点声息。寂静的夜色里，人们都陷入了深沉的思绪之中。

北面天空中的霞光逐渐地暗淡下来，最后终于完全消失了。人们一个个回到屋里，脱衣上炕，重新就寝。炕头墙壁上挂着的那盏用小药瓶制成的煤油灯，被人们脱衣掀被引起的气流拂动着，光线时明时暗，照着从门外走回来的人们，一个个眼角里都噙着闪光的泪水。

在这个劳教农场中已经生活了一个多月，这里我发现人们在交谈中，从来没有一个人提到自己所犯的具体错误。一说到这个话题对方都是简单地回答两个字“右派”，或者干脆把话题扯到别处。我自己同样也是如此。是啊，这话叫人怎么说呢？承认自己有罪，这与事实不符，不承认自己有罪，传到领导那里，就是不诚心改造，应该罪加一等的证据，因此还是避而不谈为好。

劳动教养按说应该是边劳动边学习，通过劳动和学习来改造人们的思想，改造世界观，达到“重新做人”的目的。而我们在这里所有的只是无休止的、超强的体力劳动。到场一个多月以来，没见过一张报纸，也没见过一份文件或学习材料。假日期间，场里召开了一次全体大会，会上，场领导讲了一些有关政策制度和对我们这些劳教人员的要求和希望，让各组讨论，实际上也只是做做样子，走走过场而已。

春节的三天假期一晃而过，迎接我们的仍然是超强的体力劳动和长期的难以忍受的饥饿的痛苦折磨。

（七）“吃袋烟吧”

我原来是不吸烟的，反右运动中，挨批挨斗，想问题，做检讨，经常

辗转反侧不能入睡。往往半夜里想到一些应该向组织交待、说明的事就立即起床，秉烛疾书。紧张而痛苦的思想斗争，促使我开始抽起烟来。到三分场参加劳动时，一来由于场地上到处都是作物秸秆，吸烟不利于防火，二来参加劳动，减轻了思想上和精神上的负担和压力，同时也考虑到自己的处境，如果吸烟，万一麦场上失火，我们将有口难辩。因而和张家骥两人商讨后，便把烟给戒了。到劳教农场时，本来是不打算再抽烟的，可是形势却迫使我再一次恢复了抽烟的习惯，而且不仅抽烟，还要抽烟斗，抽一种山西曲沃出产的烟丝。原来抽烟已经成了我们提议休息的代词。当你劳动得精疲力竭，渴望能得到一会休息(那怕只是一两分钟的休息)时，唯一可以找到的借口就是“吃袋烟吧”，而这个倡议只有抽烟的人才有权提出。我就曾经几次因为自己不抽烟，又倡议别人抽烟而被那位田组长冷嘲热骂地讽刺挖苦。抽起烟来，提这个倡议就理直气壮，心安理得了。那位田组长自然也找不到我的麻烦了。

我们中的一些烟民最初也都是抽纸烟，可是很快就都转变成了抽烟斗。我是后“上马”的，所以一开始就是用烟斗。不抽方便的纸烟抽烟斗，一方面是因为烟丝价格比纸烟便宜，可以节约经济开支，但更重要的，还是因为抽烟斗可以磨蹭更多的时间。一袋烟可以吧嗒好长时间，一袋吧嗒完了还可以再装一袋。劳动累了，大家蹲在墙根、坐在地上、或者坐在低矮的土墙头上，先用一节铁丝，把烟斗慢慢腾腾地清理一番。然后一袋接一袋地点火抽烟，有时一次可以磨蹭十来分钟，“醉翁之意不在酒”大家心照不宣。只有当远处突然出现人影，或者那个名为和我们一起劳动，实际上只是装模作样地舞上两铁锹后，就悄悄地溜走的田组长又来，我们才又紧张地动作起来。推起小车，挥动铁锹开始劳动。积肥组的活是包干活，规定每天应做的事都必须按时完成，所以即使没有人来，我们也不可能休息太长时间。

积肥用的车是木制的独轮车，车身、车轮、车轴全是木头制做的。车上放一个用柳条编成的簸箕。大家把畜圈、厕所里的粪便、尿泥用铁锹装到车上，然后把一车车粪便推送到畜圈、厕所附近的粪堆，再把干土装车，推到畜圈和厕所里均匀地撒开。从早到晚，除了“抽烟”之外，就全是这样的单调的劳动。虽然大家都认为，劳动教养就应该有些学习活动，例如读报、学习文件等。大家也特别希望领导能组织大家学习。因为通过学习可以知道究竟对我们有些什么要求，这将有利于找准努力方向，争取早日得到解脱。同时，学习可以坐下来，不劳动。可以使疲惫不堪的躯体得到一些休息。然而我们这里没有任何学习活动，有的只是无休止的、超强的

体力劳动。

经过两三个月日复一日的劳动锻炼，我们对这种艰苦的生活也逐渐适应、对这种特定条件下的生活和劳动的规律，也逐渐掌握。积肥组的工作是大包干性质，全场几个厕所、畜圈——马骡的、牛羊的，每天都要彻底清理。反正都是我们几个人的活儿。那个最初对我们恶狠狠的田组长，相处时间长了之后，态度也渐渐有所改变。我们也发现，原来他对我们大喊大叫，只是做给干部看、嚷给干部听的。目的在于向领导表白，他是多么积极负责、对我们这些劳教人员的管理又是多么严格、多么的不讲情面。因此，这种场面多半是在附近有干部出现时才会发生。当他发现领导人不在附近，或者在一定时间内不会光临时，他就溜之大吉，找地方尽自休息去了。后来我们又知道，这些担任小组长的人物，都是原来的劳改犯，劳改期满释放后，留在场里就地就业的。他们对我们这些在他手下的劳教人员气势凶凶，蛮不讲理，不可一世。而在干部们面前却是谨小慎微、小心翼翼。管教干部表示不满的轻声一哼都足以使他们心惊胆颤。这大概也是他们多年来在严格的管制下，劳改生活形成的条件反射。

春节以前，我和张家骥同住在一个院落里，虽然没有接触过，但在院子里排队打饭时，偶尔还会见上一面。见面时除了互相用眼神表示一下各自无可奈何的处境之外，没有说过一句话。说实在的，我们不敢交谈，即使是最简单的问候也不敢说，因为纪律规定，劳教人员不许互相串联，互相谈话难免有串联之嫌。因此只能从对方神情、体态的变化上，看到饥饿、劳累、和疲惫折磨的迹象。

张家骥所在的大田组主要从事农业生产。他们每天早饭后就立即扛起铁锹奔赴田野去开挖沟渠、平整土地。这里是一望无际的大沙漠。到这儿来的人们大多数都安排在大田组。他们凭着手中的一把铁锹、一根扁担和一副抬筐，在广漠的沙荒地上挖出了纵横交错的引水渠和排碱沟。最大的干渠深约一米，宽数米。高出地面，用来灌溉。而用来排碱的排碱沟，其主干宽近十米，深达两三尺。所有水渠和排碱沟都是配套的，有干、支、分、毛等几个等级。把流经附近的黑河水，经水渠引来漫灌到大片的田地里，水把土地里含有的大量盐分溶化后沉入地下。排入排碱沟，然后汇集到宽深的排碱干沟里。奔流到遥远的远方。大片的土地经过雪水的洗礼，盐分含量大大降低，居然从原来白茫茫的碱滩，变成了可耕的田地。人们在沟渠两边栽植了大量的沙枣树——一种耐干旱、耐盐碱、抗严寒的当地树种。结的果实和普通红枣相似，只是个头较小，果肉含糖少而含淀粉多。煮熟后的果肉呈沙粒状，苦涩而又略带甜味。它的得名大概和它果实的特

点不无关系。春暖季节，沟渠、树木、和绿油油的农田作物构成了一副十分美好的图景。但痛苦难耐的饥饿，使得人们根本无心欣赏。

58年是大跃进之年，随着形势的发展，我们每天须要完成的任务也越来越多、压力也越来越大。领导对广大劳教人员的要求也越来越苛刻。先是平整土地，随后开展了一场深翻土地的大竞赛，大高潮。每人每天深翻土地的定额从2—3分逐步提高到一亩、二亩以至五亩十亩。为适应新的形势，积肥组也必须抽出几个人去参加深翻地的大会战。我们十几个人，每天抽出两三个人到大田组去挖地。须要深翻的土地离住地较远，出工时要先走一段漫长的路程。我初次参加大会战时信心很高，很想干出点成绩立功受奖，争取早日解放。（场领导在动员大会战的大会上告诉我们，这是争取早日解放的大好时机，要我们好好表现。）我扛着铁锹，随着人流赶到工地后，立刻就按照组长要求的条件，把田地里的土，一铁锹一铁锹地挖出来。把上层的土埋入深层、把深层的土压在上面。傍晚临近收工时，组长和一个负责验收的人，拿着皮尺来丈量我深翻的土地，成绩大约是两三分。对这个成绩我自己感到很满意，因为我除了午饭后集体休息外，几乎没有停歇，而且是非常认真地，按照深翻的高质量要求进行操作的。但是。回到住地，列队公布成绩时。我却发现我的成绩是全队最差的一个。别人的成绩都在一亩以上，有的甚至达到两三亩。我深深感到吃惊，以为自己究竟是读书人出身，虽经几个月锻炼，但和工农出身的干部相比，自己终究还是略低一筹。第二天出工时，我力争在路上少耽一些时间，赶到工地后，我不顾肚子里面严重的饥饿感——虽然刚刚吃过早饭，但饥饿的感觉依然十分明显、非常严重。挥舞起铁锹，在组长指定的地块里忙碌起来。这一天没有专人来丈量，只是临近收工时，组长在地头看了一眼，成绩由每个劳动者自报。我迈步丈量了一下，自己挖地的长度和宽度，计算了一下面积，报给了组长。再听别人报的成绩时，我发现那些干活劲头比我差得多的人，竟然成绩都比我高得多。这使我感到非常纳闷。

劳动的定额仍然在不断地提高，深翻地的指标已经达到每人每天好几亩的高度。这是一个人凭借一把铁锹，无论如何也无法完成的。但每天出工之前，大队人马集中在操场上，场领导站在高高的土台上进行动员，当他高声问道：“大家能不能完成任务”时。大家居然都表现得信心十足，齐声高喊坚决完成任务。

在工地上，我拼尽全身的力气，不停地挖地，而且学着临近地块的人，采取隔一锹挖一锹的办法以增大挖地的面积。临近收工时，我丈量了一下自己挖地的成绩，结果仍然远远没有达到领导要求的指标。组长来了，他

询问我挖地的成绩，我如实以告，他冷着面孔命令我继续挖下去，说今天是硬任务，完不成任务不许收工。辛苦劳动了一天，这时已是精疲力竭、饥肠辘转，眼巴巴盼着收工回去，能吃上一口虽然远远不能满足需要，但终究可以补充一些体力的饭食。结果竟然连这个也不可能。我无可奈何地只好拿起铁锹继续劳动。

夜幕降临了。远处工地上稀稀拉拉还有几个和我一样的人在那儿挖地。我附近的几个人，由于呈报的成绩都相当可观，所以都已按时收工回去了。场部门外传来一阵尖锐的口哨声，接着是一阵严厉的批评责骂声，随后呼唤我们收工回去吃饭休息。在厨房门口组长又厉声警告我们，明天再完不成任务就要克扣饭食，把扣下来的，奖给那些干劲足、完成任务好的人。这可是一个比责骂可怕得多的惩罚。饭食对我们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吃得少了明天就更无力劳动，这将是一个严重的恶性循环。明天无论如何也要做得更多些，千万不能受到扣减口粮的惩罚。但是，无论怎样拼命地干，我始终完不成规定的任务。幸好克扣口粮的话，只是用来吓唬人的，尽管我天天都没有完成任务，我的饭食还是没有被克扣。几天后我被责令返回积肥组，组里的另一个成员替换我去参加挖地大会战。和大田组的活对比，我们积肥组的劳动强度确实还要轻松一些，难怪张家骥的脸色和气质都那么难看，我才干了几天就吃不消了，他们长期在大田里劳动的人，真不知是怎么过的。

田组长大概是从大田组了解到我在那边劳动的情况，对我又大肆批评起来，咒骂我是无用的废物。我对他辩解说，我在大田里干得并不差，而且力气比别人出得都多。他反而更加骂我无用，并且举出几个活儿干得少，成绩却报得很好的人做例子，这才使我领悟到，原来他是指责我不会吹牛、不敢撒谎。这使我精神上非常痛苦。我从来没有撒谎的习惯，更不愿向我所热爱的党组织撒谎。然而忠诚老实，实事求是却得到了这样可悲的下场。我想不通、无论如何也想不通。我不相信这些都是上级党组织对我们的要求。忽然我意识到，这么多人都都在欺骗、欺骗上级、欺骗领导、欺骗党组织。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出于对党组织的信任和热爱，我决定去向场领导汇报，把事实真相告诉他们。

第二天早饭后，我蹒跚着脚步走到场部办公室，以最简练的语言，向在场的领导干部们陈述了情况，并表达自己的看法。一个领导人对我说了几句慰勉的话，然后不置可否地说，你不是已经调回积肥组了吗，在那儿好好地劳动锻炼吧。我向领导陈述了自己的意见，虽然得到的只是一句不置可否的答复，但心中的窝囊吐出去了。精神上感到轻松了许多。我向领

导们致礼后，便急匆匆地赶回马号，去干自己本职的积肥任务。我万万也没有想到，这层层浮夸欺骗的洪流，竟然导致了一场难以言表的浩劫，夺去了人们数以千万计的生命。更没想到的是，这场严重浮夸吹嘘之风，竟然起源于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者。

（八）调到马号

春天来了，大自然的春天，撒给人们以阳光和温暖，但生活却依旧是那样的冷酷无情。到这儿来劳动教养的人越来越多，住处显得异常紧张。场领导决定安排一部分人烧砖瓦、烧石灰盖些房屋供人住宿。几个可能是搞工程建筑专业的知识分子，被抽调去烧砖、烧石灰盖房子。他们把遍地的砂礞石集中起来，烧成了石灰，又用自己亲手摔制的砖瓦坯，烧成了砖瓦。在我们居住的大院外面，兴建起了一排排新的宿舍。看来这里也在根据每个人的专长，安排适当的工作，以充分发挥人的积极因素来提高生产，改善生活。

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排队领早餐的时候，场领导宣布“高仕泌，早饭后到队部来。”当时正是队里人员调动频繁的当口，一个月前，一些身强力壮的劳教人员，被抽调去开采煤矿。听说那是极苦的差事，在深深的坑道里，煤层只有一尺多厚，人们趴在潮湿的坑道里，用洋镐一点一点地把煤刨下来，然后盛到柳条编的筐子里，像牲口拖爬犁一样，一筐一筐地拖出来。坑道里一片漆黑，只有头顶柳条帽上的那盏灯，闪烁一丝光亮。不过据说挖煤也有挖煤的好处，那里可以吃上饱饭，每月还可以得到几个零用钱。当然，这些话也只是传说，无人可以证实。领导点名叫我到队部去，无疑是工作将要变动。前程如何，不得而知。反正一切听天由命，我也无心多想，说实在的，想也没用。当时我是在积肥组，整天扛着铁锹、推着独轮车和粪便打交道。我没犯什么错误，一直勤勤恳恳埋头劳动，估计总不至于再让我去做更苦更累的差事。

饭后，我丢下饭盆，急匆匆地赶到队部门口，立正，喊了一声“报告”。一个干部把我叫进屋里，板着面孔问：你是高仕泌吗？验明正身之后，交待我说，回去打点行李，到马号去找某某人，跟他的马车到新添屯分场去。一辆三头骡子拉着的胶轮车，车前左侧坐着赶车人——一个和我一样的劳教人员，车厢里堆放着我的行李、脸盆、茶缸等零碎物品。我就坐在车厢右侧的支架上。马车缓缓地向前行驶着。田野里一片青绿，麦苗在茁壮成长。万里晴空，和煦的阳光照在身上，暖洋洋的，使我这疲乏之躯，不由得感到懒洋洋的。从接连不断、无休无止的超强体力劳动中暂时解脱出来，坐在车厢板上，极目向四周眺望，欣赏大自然的美景，这真是一个非常难得

的享受。看到大片大片的田野里，满布着麦苗，又不由得感到劳动的伟大，体验到“劳动创造世界”这一至理名言的深刻含义。这大片大片的土地，都是我们劳教人员一锹一锹、一筐一筐地平整开垦出来的。又是我们一块地一块地地，播撒种子种植出来的。今年秋收之后，我们就将吃到我们自己的劳动果实，我们也都将被改造成可以自食其力的新人。想到这些，我的内心里又多少感到有些许欣慰和自豪。

新添屯分场赵干事----一个个头不高、看起来十分精干的分场负责干部，把我叫到办公室，对我交来说，这里有四十多头大牲畜，除七头大黄牛之外，其余是三十九头骡子一匹马，那骡子每头的价格都值几千元，这么大的一笔资产交给你，说明组织对你的信任和期望。我当即表示一定好好工作尽职尽责，不辜负领导对我的信任和关怀，争取尽快改造好思想重新做人。

一个姓刘的中兽医把我带到马厩，安顿了住处之后，简单地带我在各个马厩和分场院落及周边浏览一遍，让我熟悉一下周围的环境。这里离总场大约二三十里路程，同样也是劳动教养的场所。全分场大约五六百人，场部由一个很大的围墙围成一个大院子。院里还有一个较小的院落，这个小院落里面就是喂养牲畜的地方。

畜圈是正正规规的瓦房，饲槽是用泥坯砌成的，槽边横架着一根根长长的木棒作为槽沿，用来防止牲畜损坏。槽前面竖埋着几根木桩，木桩上又横拴着几根木棍用来拴系牲畜。饲槽前面有一条狭窄的走道，走道尽头各有一个用土坯砌起的矮墙，把走道两端各隔出一个小空挡，这里是用来存放饲草的地方，土名叫草箱。白天有空时，预先把饲草堆放到里面，夜晚饲喂时，就比较方便了。

这里总共饲喂了 39 头骡子 1 匹马和 7 头大黄牛。我的任务就是要把这 47 头牲畜喂养好，保证它们每天正常出工。在大跃进的年代，这些牲畜也和它们的主人一样。每天从早到晚，拉车犁地，非常辛苦，难得休息。只有那匹老驢马，因为是作为通讯交通的骑马，所以一般情况下可以少做些重活。

喂马组一共四个人，一个姓徐，名字我记不起来了，甘肃人，张掖市文艺界的行政干部，年龄大约三十二三岁；一个姓郭，名叫郭大用，四川人，是山丹煤矿的工程技术人员，年龄和我差不多，也是 52 年毕业的大学生；还有一个姓刘的大个子，文化程度不太高，是个性情直爽的人物。另外还有一个姓曹的组长和前面提到的姓刘的中兽医。这曹、刘二人都是劳改释放后就地安排就业的人物。刘兽医负责牲畜的疾病治疗，并且对群众

饲养的牲畜门诊。姓曹的则是我们的顶头上司---喂马组的组长。按道理组长应当和我们一起劳动，但这位曹组长却高高在上从不动一下手脚，只是监督我们劳动。只要他在场，我们这四个人就少不了要不断地挨骂，他可以找出各种理由骂人，却不许我们做任何解释。

我52年高校毕业参加工作后，在东北、在云南时都是在军马场里，而且都是在生产第一线参加劳动，和牲畜打了不少交道。因此喂牲畜的工作对我来说并不陌生。但这里的牲畜和我在军马场喂的马匹又大不相同。以前喂的是种马，饲料是根据科学的营养标准，配制的配合饲料，数量和质量都是高标准。这里的条件则完全不同。除了大量的麦秸饲草之外，每头牲口每天只有几斤豌豆、麸皮、胡麻并或大麦青稞之类的粮食。精料少而劳动强度却大得出奇。领导对我们的要求则是，要在沉重的劳动条件和营养不足的情况下，养好这些牲畜，不仅不能掉膘，而且还要达到膘肥体壮。我们工作的难度可想而知

我们每天的工作程序是：早饭后铡草，午间喂牲畜，下午牲畜出工后，稍事休息。然后给每间畜圈送去一部分用于夜间饲喂的饲草。由于牲畜白天要做活，最主要的采食时间是夜里，因此夜间的工作就特别紧张也特别重要，这就是所谓的“马无夜草不肥”。

我是负责喂马的，早饭后要和老刘、老徐或老郭一起铡草，中午牲畜回到畜圈时，一般是先由使用牲口的人，把牲口的缰绳绕拴在牲口的脖子上赶到圈里，同时顺手投放一些饲草。待到牲口吃过一些草后，就要由我把一圈圈牲口赶到大门外面的一个大水塘去饮水。饮过水后，再把一头头牲口的缰绳拴到饲槽前的横木杆上，然后把饲槽里添满草、浇上水、再用一根木棒使劲搅拌，边搅拌边向草上撒麸皮。通过搅拌使每根草上都粘有一点麸皮。这样牲口就连草带麸皮一起大嚼起来。这件看起来十分简单的事，做起来也颇有讲究。因为撒麸皮的时候，牲口会趁人不备时朝着麸皮多的地方猛地大咬一口。这将会使一些草上的麸皮减少，从而影响总的饲草采食量。因此，拌草棒这时也变成了打牲口的工具。哪个牲口敢把头向前伸，就免不了要挨木棒猛地一捣。可怜的牲口也和我们一样，在严重的饥饿状态下，靠多吃些草来维持生命，却要付出大跃进所需要付出的沉重体力。

领导要求我们确保牲畜膘肥体壮，实际上他们自己也十分清楚，这是根本无法做到的口号，但我们作为劳动教养的人员，竭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在当时的条件下，尽可能把牲畜喂养得更好些，让它们尽量多吃些草，使之相对提高些体力，则是应当做到也必须做到的。

下午，牲畜被牵去拉车犁地，这时我才可以有大约一小时左右的时间，在炕上歪倒睡上一觉。天黑牲畜回来时，我又得一头一头地把它们接进畜圈，再重复前面所讲的一套程序，待赶牲畜喝过水、再把每头牲畜的缰绳都拴好之后，才能交给上半夜值班的人，由他们喂草、看管。夜晚 12:30，上半夜值班人再把我叫醒，这后半夜的班，天天都由我来值。这时畜圈里储存的饲草，早已被上半夜值班的人喂完。因此，我必须背着草筐到院子草堆，把白天铡好的饲草，一筐一筐地往马槽里送。由于这些牲畜也都是些饿鬼，一筐草倒进槽里，很快就被吃光。为了让牲口多吃些草，我就得像走马灯一样，从一个个畜圈到院里的草堆往返跑个不停。从 12:30 接班直到天亮，连坐下来小事休息的时间都没有。天快亮时，担水、拌草、投料，然后一圈一圈地赶着畜群到门口的水池饮水，饮过水后，东方已经露出曦微的曙光。赶车、犁地的劳教人员们纷纷来到。一头头喂饱的牲畜被他们牵去，套上车、挂上犁，开始它们一天新的劳动。牲畜走完，我往往在草堆上，走道里，身子一歪躺倒就睡着了。吃过早饭，第二天的铡草工作又周而复始。

到分场头一天上午，老徐老郭两人正在铡草。我来后就把正在手持铡刀的老郭替换下来，让他稍事休息。我本来身强力壮，两臂膂力也不差，经过这一段时间的劳动锻炼，虽然身体瘦了不少，但力气还是有的。因此，刚铡起草时，还并不感到吃力。按照我以往喂马的经验，已经铡好的那一大堆草，已经足够几十头牲畜吃一天了。所以铡了一阵子之后，当我感到有些疲乏时，我就提议是否可以休息一会儿。郭徐二人却对我说，这草还差得远呢，我们必须抓紧时间工作。否则上午完不成任务，下午就得加班，休息就会受到影响。看到我已感到吃力，老郭又主动接替我继续铡草，我则学着老郭被替换下来时那样，用草叉把草垛上的草扯下来，推送到老徐身边，这样，老徐就可以不必再站起来扯草，时间和体力就都可以节省一些。接近午饭时，老徐说了声：差不多了吧！于是三个人都停下手中的活计，背靠草垛坐下来稍事休息。三个人都闭目养神，谁也不说一句话。我刚从总场调过来，对人对事都很生疏，很想问问情况，看到他们两人都闭着眼睛不作声，我也只好做罢。

吃饭的钟声响了。听到这个信号，我马上兴奋起来，肚子早就饿了，我们喂马的人该到什么地方排队打饭呢？看看他们两人却若无其事般坐着一动不动，只是老徐漫不经心地对我说：坐下来，急什么。我摸不清头脑，只好听命坐下，继续闭目养神。

大约过了十几二十分钟，徐郭两人才站起身来，对我说了声：你在这

等着。随即提了一个担水用的大铁桶，从侧门向马圈前面的大厨房走去。老刘捧着大家的碗筷从宿舍那边走过来了。不一会儿，老郭提着水桶，老徐手里拎着用一块布包着的馒头，从厨房回来了。四个人在草垛旁围坐下来。老徐执勺给每人碗里盛一碗菜汤，然后打开笼布给每人分一个馒头。这时我才发现馒头下面还有一堆馒头条子。这是蒸馒头时残留在笼缝里的馒头，每根大约有小指或筷子粗细，长短不一，由于数量不少，所以四个人平分下来，每人所得几乎相当一个小馒头。这也就是说，大队的人每人每餐吃一份饭食，而我们这一餐吃的几乎比他们多二分之一。天哪！这在当时当地可真是非常非常难得的。看到我喜形于色的模样，老徐告诫我说，我们马号的人打饭，要么比大队早，要么比大队迟，无论如何不能在大队开饭的时候去，否则大厅广众，厨房师傅想照顾也无法照顾。大家都要注意和炊事组的人搞好关系，不能得罪他们。他们手下无情，我们就要倒霉。老徐年纪比我们三人都大，他说的又是关系到我们每个人切身利益的真话，我们三个人自然都唯唯诺诺，表示今后一定都会特别注意。由于我是才到的新成员，所以老徐对我又特别多叮咛了几句。

马号终究比大队自由些，分完馒头条子后，各人就捧着自己的一份饭食，背靠着草垛，半眯缝着眼睛，不声不响地仔细咀嚼，享受这吃的幸福。和以往相比，今天中午这一餐饭的确够丰盛了。但说实在的，离吃饱真的还有很大很大的距离。我们这些被饥饿长期折磨的人，想填饱肚子真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我已经接过了喂养牲畜的责任。吃完饭后，随即到各个马厩去给牲口添草、喂料。中午圈里的牲口不多，只有几头在附近做活的牲口被送回来，由我们饲喂。

老刘兽医来了，他指点我怎样拴牲口；怎样添草；怎样喂料。他告诉我，刚出工劳动回来的牲口，由于劳累往往食欲不振，这时该用什么方法提振它的食欲；怎样驱赶成群的牲口到大门外面的池塘饮水；哪头牲口有怪毛病，应当怎样注意；哪头牲口和另一头不能拴在一起，否则会互相踢咬，搅得整个畜圈不得安宁等等等等。我初来咋到，一切都十分生疏，听他讲的的确也句句在理，他又是我的直接领导、顶头上司，我当然句句记在心上，并照他讲的去做。在老刘兽医的指点下，我逐渐熟悉了工作，理出了头绪。又过了几天，老刘兽医就把饲料库房的钥匙也交给了我，并带我到库房里，当面交待了里面存放的各种精饲料——十几麻袋豌豆、高高堆起的一大堆胡麻饼、磨成碎块的几麻袋大麦和青棵，此外，还有好几麻袋麸皮。数量足有几千斤。这些牲口按规定每头每天供应 5 斤精料。在大

跃进的形势下，它们也在从事着超强的劳动，所以 5 斤精料也远远不能满足它们体力消耗的需要。因而这些牲畜也同样处于严重的饥饿状态。为了确保喂好牲口，每天喂给它们的精料都要反复斟酌，精心计算，劳动强度特别大的，譬如犁地的牲口就要多喂些豌豆、大麦之类的好料。劳动强度小些的，就多喂些麸皮。老刘兽医又特别关照我，每天每头牲畜还要适当克扣一些精料，留做机动，以防万一。此外，还要防人来偷吃。平时除了赶车、犁地使用牲口的人之外，其他人员一概不准进到马号来；还要防毒，防止坏人到畜圈来投放毒药；还要防火，万一草垛失火，后果也不堪设想。总之，一切坏事都要防患于未然，时时处处都得提高警惕，阶级斗争这根絃时时刻刻都得绷得紧紧的，丝毫都不能放松。在积肥组养成的吸烟习惯，到这里就非戒不可，不然万一什么地方失火，抽烟的人首先就是嫌犯，有嘴也难说清。

马号的工作虽然稍稍自由，但确实相当紧张。特别是我，由于我是专业搞畜牧的，又承担了饲喂牲畜、保管库房的主要责任，精神思想上的压力更是十分沉重。除了白天铡草、清扫之外，由于每天夜里从 12：30 到天亮这段时间，饲喂牲畜的活都是我的，所以除了劳累、饥饿之外，还增加了一个睡眠不足的折磨。然而，无论如何每餐可以得到一些额外的照顾，这就是比什么都可贵的补偿。再苦、再累、再晒我们也心甘情愿。

（九）经受一次下大田的考验

在马号里，我们的顶头上司就是前面说到的曹组长和刘兽医。这两个人都是劳改释放后的就业人员。他们在职领导和干部面前唯唯诺诺，说话时连头都不敢抬，大气也不敢出。可是在我们这些劳教人员面前，却完全是另一幅面孔。他们耀武扬威、不可一世，是我们的太上皇。他们的话对我们来说就是圣旨，不许你说半个不字，稍不称他的心意，就会大发雷霆，蛮不讲理地以极为粗俗的语言，骂你个狗血喷头。那个曹组长名义上是和我们一起劳动。实际上，他除了领导在场时装模作样地舞动铁锹、扫把，嘴里呼喊着，指挥我们干这干那之外，平时只要领导不在，他是什么活也不干的。诺大一个劳教农场，干部只有不多的几个人，而且在办公室和大队的时间多，很少有空到马号来。所以曹组长实际上就不干什么事。不做活也就罢了。反正马号的工作我们四个人得包下来，少干一点也不行。可恨的是他不但总爱指手画脚地瞎指挥，而且找着茬子给人小鞋穿。在外面被干部批评责备之后，回来也拿我们几个人出气，想方设法折腾你，让你不得安生。我们这些喂马的人，白天总得挤出些时间睡觉，否则夜里值班，一打瞌睡就会影响喂牲口。睡觉的时间一般都在下午牲畜打发走之后，也

是大队人马午间休息完开始出工的时候。我由于每天夜里都值后半夜的班，从半夜 12：30 直到天亮都不能歇息，所以这午后的一觉就更加必不可少。其他三个人也要轮流值前半夜的班，午后也须适当休息。他折腾我们的办法就是不让你睡觉。

下午两点左右，大队人马午休后开始出工了。赶车、犁地的人们来到马号，把牲口一批批地牵走，我干完中午紧张的喂马工作后，拖着疲惫的身躯，往炕上一歪就和衣睡倒了。朦胧中听到曹组长大声的吼叫：起来起来！大白天睡什么觉，别人都在紧张地劳动，你们睡觉像什么话？他也许是故意喊给大门外面的领导人听的，也许是存心要收拾我们这些失去自由，听人摆布的劳教人员的。反正他没完没了地吼叫着、咒骂着，从大门口一直冲向我们那个破烂简陋的住地。每当听到这无赖的吼声，我们就得无条件地从那个破烂的炕上爬起来，到院子里去干活。马号里的工作是永远干不完，也永远能够找到可以做和应当做的事情的。对付他的办法，就是等他进了屋，看不到我们时，我们在院子里、草垛旁，或其他任何地方就地躺倒再睡。但是，如果他不进屋或是在马号里到处走走看看，我们这午后的一觉就只得牺牲了。

到马号工作之后，我的整个身心就完全扑到牲口身上了。我每天每夜、无时无刻不惦记着这四十多头牲畜，唯恐它们吃不好、喂不饱。既使在上半夜，别人值班的时候，我的心也踏实不下来。他们三个人和我一样，劳累一天，到晚上总是难免会打瞌睡。而这些精料不足、劳动强度又超大的牲口，一旦草吃不足，第二天做活就没力气，使用牲口的人，回来时就会反映说，牲口今天没喂饱。而每当曹组长折腾我们之后，值班的人，白天没得到休息，入夜一磕睡，牲口就吃不好，第二天就必然有所反应。这些反映到领导那里，追究下来，首当其冲的责任人自然是我。赵干事是分管马号这一摊子的干部，偶尔也会到马号来看看，但是很少和我们直接接触。对马号工作有什么批评意见，都是通过曹组长和刘兽医向我们传达。这两个家伙在上面挨了批评，回来后，不是客观地分析情况，找出原因。而是蛮不讲理地一味责骂我们。一起劳教喂马的另外三个人，他们也许是在这里的时间比我长，对待这类事情比我老练，也许是因为没有直接担负喂牲口的责任，思想上的压力比我轻。曹组长和刘兽医没头没脸地责骂时，他们只是低头做活，一言不发，就像没那回事一样。我可受不了这个窝囊，被他们骂急了就要和他们争辩。但是，每当我要开口时，总是会被老徐老郭以各种方式向我暗示，叫我不要做声。然而忍耐终究是有限的。终于有一次我实在按耐不住，开口和它们争辩起来。结果是可以想见的。这两个

恶棍，变本加厉地对我实施起打击报复。

姓刘的中兽医在附近农村还小有名气。他擅长针灸，在医治大牲口的疾病方面也很有经验。我饲养这些使役的大牲畜，开始时也从他那里吸收了不少有用的经验和知识。他住在马厩东头的一个单间屋里。这里既是兽医室、药房，又是他的宿舍。屋里铺一张板床，摆放一张小木桌、一把椅子、一条长凳。此外就是靠东墙摆放的一个大大的中草药架。和通常药房里的中草药架一样，密密麻麻一排排的小抽屉，每个小抽屉里又隔成三四个小格。每个小格里摆放一种草药。抽屉口上贴着一张红纸，上面用毛笔写着里面存放的草药的名称。屋子的空挡里，放着一个生铁铸制的碾槽，槽里放着一个铁碾，碾子中心穿着一根圆木棍，碾槽底部、铁碾四周以及穿在铁碾中心的那根木棍的两端，都因经常摩擦滚动而变得光滑明亮。每当附近农民牵牲口来治病时，刘兽医就要抽调我们中的一个人去给他帮忙，而最常抽调的人就是我。理由也很简单，我是干这个行当的。

农民的牲畜的疾病其实也很简单，它们绝大多数都和我们这些人一样：营养不良、劳累过度。

病畜一到，刘兽医就拖着他那一瘸一拐慢腾腾的脚步，来到我们做活的地方：“高仕泌，到兽医室来一下。”我就只好丢下手中的工作跟着他去。剩下的工作就得由其他三个人来完成，或者是等我给刘兽医帮完忙后，再由我自己去做。如果牲口来的时间正赶上我们午睡的时候，这美好的一觉就只好牺牲了。所以，尽管给刘兽医帮忙的活都是些比较轻松、不大耗费体力的事。我们还是极不情愿给他帮这个忙。当然，不情愿归不情愿，让你做的事你还是只有乖乖地去做，既不能发牢骚更不能公开反抗。

兽医室门前有两根用来保定牲畜的粗木桩，一前一后深深牢固地埋在地里。病畜的头被紧贴着一根木桩拴牢后。再用一根比姆指还粗的麻绳绕着这两根柱子紧紧地捆起来。牲畜就被固定在里面。

刘兽医在病畜肛门里插进一根体温表，环绕病畜转上一两圈，上上下下打量一番，然后把手伸到病畜嘴里，把舌头拉出来看看，再把手按在病畜尾根号号脉膊，偶尔也用听诊器放在病畜的胸部和腹部，听听心脏跳动、肺部呼吸和肠胃蠕动的声音。一边诊断，一边询问畜主，病畜吃草、排便、饮水、劳役等情况。诊断之后，回到屋里开一张处方，再按处方从药柜里把草药一样一样地称出来，倒到碾槽里，然后他就拿起针灸的一套东西，出去给病畜针灸去了。碾药的活就是我的了。草药倒进碾槽之后，我就坐到那条板凳上，两脚踩在碾轴两端的木棍上，前后反复地蹬动，直到草药全部碾成细碎的粉末，然后倒进一个葫芦瓢里，再用滚开的开水往里面浇，

一面浇，一面用一个牛角壳制成的工具在里面搅动，待草药被搅成稠稠的糊状时就算成功了。下一步是给病畜灌药。先用一根细麻绳扣在病畜的上额里面，另一头穿过木桩上的一个铁环，再用劲往上一拉，把病畜的头吊起来，使它的嘴也被拉成半张开的状态。再把瓢里已经晾凉的草药糊，用牛角壳一下一下地挖出来，顺着牲口的嘴角直插到咽喉部倒进去，牲口就不得不一口一口地把药吞下去。这一切本来都是刘兽医自己干，以后就交给了我，慢慢地就变成了我份内的事情，所有这一切杂务事都要由我包下来。我们四个喂牲口的劳教，自然都有意见，但有意见也没用，大跃进的年代，让你做活，你就只有老老实实地去做，否则随便一顶什么帽子给你戴上，都够你受的，更何况我们是被管教的劳教人员。

碾药是个慢活，往往牲口的病已处理完了，我这边药还没碾出来。这时就有一段空闲时间。刘兽医和曹组长（他平时大多待在刘兽医这里）就会和我闲聊起来。“你是大学生，是专学畜牧的，你应当会给牲口治病”。刘兽医向我发话了。我告诉他，我是学畜牧的，兽医方面虽然也有一些基础知识，但不是主要课程，走上工作岗位后，也没有做过兽医方面的工作。

“中兽医也是一门学问，你拜我为师，我可以教教你，学会了兽医给我当个助手，可以不吃喂牲口的苦头。”刘兽医接着我的话茬说。说实在的，我确实认为中医中药是一门很有内容的学问，也真的很想向刘兽医学些这方面的知识。从刘兽医的言行举止来看，他的品德并不怎样，但他在中兽医这个行业上，确实有些学问，而且在针灸方面还颇有经验。然而我确实没有时间和精力，在繁重的、喂牲口的工作压力下，再挤出时间去学习。因此我坦诚地告诉他，我不是不想学，但我不可能一边担负着沉重的喂牲口的任务，一边向他学习。这些刘兽医自己应当也很清楚，人的精力有限，我不可能二者兼顾。曹组长在一旁发话了。“你好好地服侍我们。我们替你向上面请求一下，让你脱离马号喂马的工作，专门来干兽医。给刘兽医当助手。”能够脱离繁重的体力劳动来从事兽医工作，这对我来说当然是件好事。曹刘二人虽然无权直接安排我的工作，但他们如果到上面去做工作，这个机会也确实存在。但我对曹组长所说的“服侍”的含义并不十分了解。我回答说“我现在这样已经很不错了，喂马的活一点没丢，每次有病畜来，我都里里外外忙个不停地来这里帮忙。”“这只能算是你在工作上多干了一些，我们要的是你服侍我们，给我们打洗脸水、洗脚水、打扫卫生、铺床叠被等等等等，这才算是服侍。我们劳改那阵子，服侍干部们，什么活都干，把干部们服侍得舒舒服服的，这才能摊上做些轻松活。”曹组长说出了他的心里话。原来他们想让我也像他们当年劳改时那样做他们的生活奴婢。

这种不顾人格尊严的事，我当然不会同意。为了不把局面搞得太僵，我以沉默作为回答，只是用两脚不停地蹬动着碾磙，让碾磙滚动的声音来打破沉寂。他们从我的表情上得到了答复，从此再也不提这事，但对我不满意的程度则日益加深。

大跃进的年代，人们在不顾死活地蛮干，牲畜们也被迫饿着肚子跟着不顾死活地蛮干。终于那些不会说话的劳动力也支撑不住了。领导批评曹组长和刘兽医，曹刘二人就责备我们。我争辩说牲口的活太重、精料又不足，长此以往这价值数十万的牲畜将会全部倒下去。这本是实事求是的反映情况讲道理，但在当时当地却成了大逆不道。于是“右倾、保守”甚至对抗大跃进等诸如此类的大帽子就一顶顶地压下来。曹刘两人本来就对我不满意，借此机会他们向上面大进谗言。做为处分，我终于被调出马号，到大田组去劳动

在大田劳动，虽然是绝大多数劳教人员的工作，可是对我们这些喂牲口和做杂工的人来说，就是一种相当严苛的处分。在大田组里，每天从早到晚，劳动时间都在八小时以上，而且几乎是不许停顿、没有休息的持续劳动，尤其可怕的是在大田组的伙食只能吃到规定的那一份，想多吃一口都不可能。再棒的小伙子，到大田劳动三天之后就必然会变成精疲力竭的“懒汉”。这对我的确是个不小的打击。

早晨，我扛着铁锹，跟着迤逦的大队人马，拖着沉重的步伐，向大田走去。大田组的任务是挖渠、开沟、平整土地等沉重的体力劳动。从深达四五米的沟底，把土一筐一筐地抬到岸上。用于灌溉的主干渠，宽度一般在四至五米，而用于排水洗碱的排碱沟，深度大约4—5米，宽度在15米左右，就像一条中等的河流。

大田工地上热火朝天，人们尽管已精疲力竭，然而大跃进的形势，迫使人们还非得造出干劲十足的声势不可。队与队、组与组之间都在开展着竞赛。检查组的人们一到，那干活的劲头就非表现得无比十足不可。两人抬一大筐土，从沟底到沟顶，这在平时已经就相当吃力，而当检查组到来时，一趟就一定要抬两筐甚至三筐。我从马号调到大田，和队里原有的人相比，就算是身强力壮的头等劳力了。于是大筐大筐的土就轮到我来抬了。我也确实没有辜负众望，表现得还颇为出色。但我心里明白，出不了三天，我就会变得和他们一样的精疲力竭。

真是非常幸运，我在大田只干了两天就接到命令，要我重回马号喂牲口。原来在我离开的两天里，牲口接连两天吃不好，以至拉车犁地都没力气。车倌犁倌纷纷反映。领导只好决定再把我调回马号。这样一来，曹刘

二人整治我的坏事，反而变成了好事。我不仅经受了大田强劳动的考验，而且事实证明，我在喂牲口的工作上也是尽心负责颇有成效的。回到能够多吃几口饭的岗位，我在这数以千计的劳教人员中，不能不说是相当幸运的。

（十）一次斗争的小胜利

回到马号，我又操起了喂马的生涯。曹刘二人见到我时，讥讽地问：在大田劳动的滋味怎样？并告诫我说，这是你平时不听话、好争辩的后果。这两个家伙，他们在劳改时受到的就是惟命是从的训练，现在又原样地搬来用到我的身上。和他们这样的人实在也没有什么好说的，反正我已经回到了马号喂马的岗位，而且通过这两天我离开马号的日子，领导对我更了解、更信任了。这对我来说就是最大的收获。我心地坦然，不仅心地坦然，而且在他们面前多少还有些骄傲。我随便应付他们几句，然后就自顾干我的工作去了。领导把几十头大牲畜交在我手里，我总得尽心尽力把它们喂好，不能辜负组织对我的信任。

大约是在国庆节前后，当时正是全国都处于大跃进的高潮时期，到处都在放卫星、夺高产。我们在劳教农场里，由于看不到报纸，所以有关这方面的信息，都是听干部们传达，并且又从领导那里得到进一步鼓足干劲，把当前的指标再狠狠地提高一大步的指示。然而，有许多“卫星”放出来的成绩让人无论如何也不敢相信。譬如上面传达，某某地方土豆的产量达到每亩一千吨的天文数字。我们这些劳教人员尽管身不由己，而且当时的情况下我们是只有听的份儿，没有说的权利。我还是明确地表示认为这不可能。我说，每亩地 666.6 平方米面积，亩产 1000 吨的土豆地里，即使地下全是土豆，按每立方米土豆一吨重计算，地下一米深全是土豆也只有 666.6 吨。由于这个产量是口头传达的，我们不相信，领导和干部们也未必相信，所以尽管我说了些，在当时来说是极不合时宜的话，曹刘二人听到后可能也没有向上面汇报。也可能他们汇报了，上面没有追究。只是老徐事后悄悄地责备我说，人家放卫星报高产，别人明知是吹牛，但谁都不表示反对。我们做为被管教的劳教人员，你多这个嘴干什么。我一方面向他辩解说，我只是计算一下这样高的产量，这块地里的土豆该有多少。同时也感到老徐的话确实有道理。我们的身份不同，同样一句话，别人说了没事，我们说了可能就会惹来麻烦，甚至带来灾难。然而我从内心里，始终就没有把自己放在被管制、被改造这样的位置上。我总是认为自己是国家的一分子，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作为一个科技工作者，我应当实事求是，客观唯物地观察事物，认识问题。坦诚地、无保留地向组织表白自己的意

见和观点。所以遇到土豆超高产、放卫星这样的事时，我就不由得要表示自己的看法和意见。

一天中午，当我们几个人铡完草，在草堆旁正准备少事休息时。曹组长手里拿着一张“人民日报”从外面走来。他可能是在外面刚刚和别人争辩，也可能是其他什么原因，过来时一脸的不高兴。平时他在我们面前称王称霸，不可一世已经习以为常，今天的模样倒有些反常。他走到我们面前，把手中的报纸向上一扬，随后便喷出了一连串的咒骂：什么人民日报？人民日报也吹牛 b。半年多的时间，一头猪就养到六百多斤，这是胡说八道----。大概是想从我们这里寻找支持，他信手把报纸丢给了我们。

好长时间没看到报纸了。外面大跃进的形势，我们知道的很少。见到报纸，我们几个人赶紧围到一起，阅读起来。半年养成 600 斤大肥猪的标题，在报纸上赫然醒目。我们这些被管教的右派分子，尽管受到了党对我们极不公平的待遇。但是，热爱共产党、信任共产党的思想却是非常浓烈、非常一致的。“人民日报是党中央的喉舌，人民日报刊登的消息我们不相信，那还相信谁？这个曹组长对党的报纸如此仇恨、破口大骂，实际上是他作为受过劳改处分的劳改释放分子，在借故发泄其对党的不满。”老徐把曹组长的言行上纲做了分析。他接着又说“我们作为正在改造思想的劳教人员，对此事不能坐视不管，我们有责任向组织汇报曹组长的情况。”我们四个人开了一个短暂的小会，然后立即决定让老徐去向场部领导汇报。

几天后的一天，曹组长从外面来到马号。他一改过去耀武扬威的势头。垂头丧气、满面愁容，不声不响地进了兽医室。他到刘兽医那里去了。从曹组长的表情不难看出，这个平时张牙舞爪的家伙，这次吃了我们告发的苦头。他肯定是被场部领导找去狠狠地训了一顿。打从这次事件之后，曹刘两人在我们面前的态度比过去好了许多，这应该说，也是我们在劳教中一次斗争的小胜利，是劳教生活中的一个小插曲。

（十一）第一个国庆节

在伙食待遇上，这里被人们划分成四个等级。一等人是干部职工，他们吃的是小灶，副食品也比较充足，平时又不参加劳动，加之主食如果不够，还可以暗地里从大食堂克扣一点作为补充。因而这些人，包括直接管理我们的劳改释放分子刘兽医、曹组长等，他们的营养状况自然都是比较好的。第二等人是炊事人员。炊事人员手里直接掌握着食品，无论情况如何，总归饿不住他们。这些人也是劳教人员。他们能否在这个岗位上长期待下去，取决于他们的表现和干部、领导对他们的印象。因此，炊事人员个个都是身强力壮、干起活来也是生龙活虎、麻利利索。他们在领导面

前更是无比的小心谨慎，唯恐稍有不慎而被调离炊事岗位。第三种人就算是我们马号喂牲口的饲养员和赶车、犁地以及医务、坐办公室的文职人员。

（他们也是劳教人员。）这些人由于工作岗位比较特殊，上班时间和大队又不一样，因此在吃饭上多少可以得到一些额外的照顾，但这个照顾也是有限的。食堂情况好的时候照顾可以多些，困难的时候，照顾就会差些。然而不论怎样总比大田组的日子好过些。第四等人就是大田组的人。他们人数多，上班出工、下班收工都是统一行动，吃饭也是集体开饭，因而在伙食上就只有吃亏的份儿。

58年是大跃进的第一年，劳动强度是大的，生活上也是艰苦的，从年初到年尾饥饿的痛苦是始终如一的。但伙食虽差还没达到严重损伤人们健康的地步，所以人们的劳动生活基本上也是相对平稳的。

时间在一天一天地、艰难地度过。夏去秋来，国庆节和中秋节快要到来了。还没到九月份，人们就开始企盼，企盼中秋、国庆可以放一天假，让疲惫不堪的躯体能够得到一个小小的休息。企盼中秋节能够改善一下生活，让辗转的饥肠能得到一次较好的充实。但是更主要、更殷切的期盼，则是希望国庆大典，党和国家在政策上给我们以大赦，至少可以给予我们当中表现好的人员以赦免，放我们出去，让我们能够恢复正常人的生活。人们在悄悄地议论着：我们是人民内部矛盾，对于罪犯，国家尚且可以赦免，对于我们，无疑是会更加宽厚的。人们的劳动热情在逐日高涨，人人都期望，以自己良好的表现，争取国庆到来时能获得赦免的好运。有的人甚至断言，无论从矛盾的性质、从有利于劳动教养的开展，还是从促进劳教人员的思想改造等任何方面来看，国庆节解除一部分表现好的劳教人员的处分，都是必然会发生的事。

国庆节一天一天地迫近了，为了改善人们的生活，场部的确也做了很大的努力。刘兽医除了给群众喂养的牲畜治病之外，还负责打听哪里有牛马死亡的信息。一旦得悉有牲畜死亡，就立即安排人前去，以低价买回来供劳教人员改善生活。一头死牛、一匹死马，而且都是病饿交加而死的，身上残留的肉也是极其有限的。用来改善近千人的伙食，分到每人嘴里的数量，实在是微乎其微，但在当时食品十分匮乏的情况下，能嚐到一点肉味，确实也相当不容易了。

国庆节终于来到了，场部通知，全体人员上午在操场集合开会。喂马组的人也要参加。吃过早饭，我们四个人顾不得休息，匆匆地赶到会场，在杂工队后面，和大队人们一样席地坐下。

大会开始了。场领导在前面的一个土台上讲话，广场上鸦雀无声，人

们肃静地聆听着。但是从头到尾，除了要求大家好好劳动，脱胎换骨、改造思想、重新做人之外，没有提到半个有关赦免的字。人们最殷切的期盼落空了，但是还没死心。有的人估计说，大赦不一定非要放在国庆节这一天宣布。也可能过些日子，上面的批文才会下来。这个说法也不无道理，于是人们在国庆节以后的一段时间里，仍然在默默地企盼着，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企盼的念头也逐日消退。在有关领导的“启发”下，大家终于无可奈何地接受“思想改造是一个长期的、艰苦的过程，我们到这里来还不到一年，就以为自己的思想已经改造好了，这本身就是思想没有改造好的表现。”这样一个观点。于是不再想入非非，重新安心劳教生活，继续默默地承受着饥饿、疲劳和困倦的折磨。

国庆节前不久还召开过一次全体人员大会，这次大会我只参加了一半就被曹组长叫回马号去了，因而没能了解大会的全过程。走在路上，曹组长告诉我说，今天有人要“捆绳子”了。我不懂“捆绳子”的含义，他就对我解释说，“捆绳子”就是对犯有严重错误，譬如逃跑被抓回来，或是对现实不满，散布反动言论、恶意攻击三面红旗，反对党的领导等的劳教分子，但其严重程度还没达到判刑劳改的地步。为表示对其惩罚，就在大会上宣布其罪行之后，用绳索把他捆绑起来。这个处罚听起来并不可怕，不过用绳子把人手脚捆起来，岂知却是个伤筋动骨，甚至能要人性命的手段。

回到马号后，因为工作的原因，我没有再回到会场。大会还继续进行着。忽然我远远地听到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声。这一声就是被捆绳子的劳教人员发出的。原来这个绳子的捆法是有讲究的：把一根绳索的中部打一个环形死扣，从被捆者颈部后方向前，把死扣两端的绳索，经两个腋下把两只手臂绕捆起来，然后再把两手臂向后拉去，使两前臂在背后相向地平放在一起。再把两个绳头向上伸进脖子后面那个绳圈里。行刑者把穿过环扣的绳索用劲向下猛地一拉，把反捆在背后的两只手臂向颈部猛抬上去。这一招即使是身强力壮的汉子，也难以承受，何况是已被折磨得瘦弱不堪的劳教分子。经受这一捆绑的人，据说两个肩胛骨都会被损伤。被捆过绳子的人，即使不死也要变成残废。捆绳子，在大庭广众之下捆，其目的无疑是“杀鸡儆猴”。这一招的确也厉害。人们平时议论最多、也是最感痛苦的折磨是饥饿。有些人在给家人写信时就直截了当地说饥饿难忍，要饿死人了，或者干脆就说已经有人饿死了。大会捆绳子之后，人们不敢再公开议论吃不饱的事了，给家里写信也只能说粮食欠缺一点、劳动强度大了一些、体力消耗多了一些等等。暗示口粮不足，请求给以支持。各人家里一般也都尽其所能节省一些口粮，寄来几斤粮票。殊不知粮票在这里派不上

用场。这里没有粮所，食堂除供应每人应吃的一份饭食之外，也不能凭票购买。因而粮票在这里几乎成了一张废纸。我身上就带着几斤全国通用粮票，但什么也不能买。好在喂马的生涯能得到一些额外的照顾，所以粮票也就一直搁置在那里。

（十二）第一个“病”死的人。

58年是一个丰收之年，早在春播的时候，场里领导就向大家动员，要认真种好庄稼，秋后就可以吃到我们自己种植的粮食了。有国家按标准供应的每人每月45斤成品粮，再加上我们自己的收获，日子肯定会好过得多。人们的确也是信心百倍、干劲十足地开垦、种植、施肥、管理。希望靠我们自己的劳动成果，来缓解饥饿的痛苦。收获的季节到了。我们收打了不少粮食，此外还有蔬菜、瓜果等。但伙食充其量只是有几天增加了一些菜类，而且数量也非常有限。对于解决饥饿的痛苦来说，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可能是我们的收获被调走了，更可能是我们的收获在报产量之后，被抵充了应该供应我们的口粮。总而言之，生活没有得到任何改善，不但没有改善，而且情况还在不断地恶化。终于大田组里开始有人因为体力不支而倒下来了。

59年春夏之交，大田组的一个劳教人员“病”倒了。组织上让他留在宿舍休息。但当大队人马外出出工之后，他便拖着疲惫的身躯来到炊事房后面，挽起衣袖，把手伸进污水缸里去捞吃沉在缸底的残留物。在人们已经饿得皮包骨头、精疲力竭的情况下，那污水缸里还能有什么可吃的东西？但他还是不停地把手伸进缸里，再把捞到的东西送进嘴里。看到他衣着破烂、满脸污垢、一副骷髅的形象，加上他不顾一切地，把从缸底捞到的污物送进嘴里的姿态，真会让人误以为他是个精神病患者。炊事员奉命驱赶他，干部威胁他：“再不回去休息就让你随大队出工劳动。”他离开了厨房。但没过多久，人们稍不留意，他就又回来了。仍然是那副不顾一切的姿态。然而他能捞到的东西，无论是质量还是数量都差得可怜。

“病”人终于倒下了，他离开了人间，摆脱了饥饿劳累的折磨。人们再没见到他到炊事房后面的污水缸来捞吃的。他身边没有一个亲人，也没留下一句遗言，如果说他临死之前还有什么话要说的话，那就只可能是“我饿”这两个字。

劳教人员死了，死于饥饿和劳累。这在人群中引起了不小的震动。为了表示抚慰，场部给死者打了一副薄薄的杨木棺材，安排劳教人员在荒地挖了一个坑，掩埋了。这全场第一个死者是不幸的，但又是幸运的。他的幸运在于，死后还得到了一副尽管只是薄薄的棺木，并且还比较妥贴地

埋葬在了地下，虽然挖的坑也只是浅浅的，但终究还是埋在地下了

尽管已经有人病饿而死，然而大跃进的劲头却一点也没有减弱。人们每天劳动的定额丝毫没有削减，不但没有减少而且还在不断地上调。一方面是超强的体力劳动，另一方面是远远不能满足需要的营养水平，人们的体质不可避免地逐日下降。据场领导说，为了解决我们营养不足的问题，他们向粮食部门交涉，把供应我们的成品粮调整成了原粮。这里的主食是面粉。按 85% 的出粉率计算，调整成原粮之后，口粮的供应量等于增加了近 20%。没有去麸的面粉，又黑又粗。但数量增加了，这一点就比什么都好。然而好景不长，没过几天时间，粮食的数量就又恢复了原来的标准，而质量则已经毫不含糊地降下来了。人们的怨言逐渐滋生。领导上的解释也很简单：“你们现在的待遇已经很不错了，群众的生活还不如你们。”我们和外界几乎处于隔绝状态，农民百姓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我们不得而知，而我们自己的生活则确确实实已经到了难以忍受的地步了。

马号的日子也在逐日恶化，往日食堂对我们的优待出手都比较大方。而现在则非得苦苦商量甚至赖着不走，才能勉强多要到一点点。人的待遇下降，牲畜的待遇也在不断地下降。原来供应的豌豆、大麦、青稞等粮食都没有了，只剩下麸皮和少量的胡麻饼。然而牲畜的劳动强度同样也没有减少。相反，在大跃进的形势下，犁地、拉车的定额也在不断地往上调。为了满足牲口的营养需要，采取以粗代精。大量地供应麦草，并从其他地方搞来了一些谷草（小米的秸秆）。牲畜由于饥饿，吃草的数量也越来越多，而谷草的茎干比起麦草来要硬得多又粗得多。对铡草的要求则更严格了。领导明确提出要做到“寸草三刀”。草的饲喂量大大地增加，而过去铡两刀的草现在要铡三刀，铡草的劳动量几乎又增加了二分之一。我们这几个马倌的辛苦可想而知。老刘老徐开始采取软抵抗的态度了。他们不声不响，粗制滥造地铡了许多长草，然后铡些碎草撒在上面。这个办法瞒得了干部却瞒不了曹、刘这个两具体负责人。他们走到草堆边，把手伸到草堆里面抓出一把长草，接着就是一连串的咒骂。然而更严重的问题是，牲口对铡得很长的草缺乏食欲，饲槽里往往会留下许多，被牲口呼出的潮气搞得又湿又软的长草，加之麦麸的供应量也减少了许多，牲畜的膘情自然也迅速地跌落下来。情况反映到场部，领导考虑到这四十多头牲畜价值不菲，如果按照大跃进的要求搞下去，难免会全军覆没。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只好提出让我们安排一部分牲畜轮流休息。同时，根据有关科技部门的建议，把饲草铡碎后，全部用弱碱水浸泡，以提高其消化率。这个做法虽然有一定的科学依据，但效果十分有限。而我们这四个马倌的劳动量，却因此又

增加了许多。每天要挑几十担水，在水里适当放些生石灰，然后把全部饲草浸泡在水里，待其变成金黄色之后，再捞出来，放在支架上将水爽干。喂牲口时，这一筐筐湿淋淋又十分沉重的草，还要背着往饲槽里倒，劳动强度大了，人却不增加，食堂供应的伙食也越来越差，辛苦的程度可以想见。

草在水里浸泡后，草中的泥沙和少量残余的粮食，由于重量的原因全部沉到了底下。清理的时候，我发现了这些粮食。但是，从泥沙里清理出粮食，没有工具是相当困难的，用手一粒一粒地拣，效率实在太低，工作那样紧张，确实没有这种空闲。看着这些粮食我真的非常舍不得丢弃。（其实每天至多也不过几十粒小麦，只是在当时情况下非常珍贵。）趁没人看见的时候，我悄悄地、一粒一粒地挑拣起来。“你在干什么？这样一点点粮食值得一粒一粒地拣么？工作可以丢下不管吗？”曹组长突然出现在我的背后，恶狠狠地训起人来。“用簸箕盛了倒到后墙外面去。”曹组长的命令岂能不听，我只好把泥沙连同里面的一点粮食，一起送到后墙外面去。后墙外面是一片荒地，洗草的泥沙堆积在那里。天长日久积成了一个小土堆。一天，当我抬着洗出的泥沙到后墙外去倒时，看到曹组长和刘兽医，两人正在用簸箕、铁锹、筛子等工具，在那里用心地淘筛泥里的粮食。形势一天天恶化，他们在小食堂吃饭的人也吃不饱了。曹组长不许我捡的粮食，原来是要留给他们自己来捡的。

这里的纪律相当严格，曹组长、刘兽医等劳改释放人员，在我们面前尽管威风凛凛不可一世，但实际上他们也是阶级斗争的专政对象。他们在生活上，也很难得到多少特殊照顾。至于我们几个喂马的人得到的特殊照顾，也不只是我们和炊事员的关系好，而是因为我们喂牲口的人，手里掌握着牲口的饲料粮。我们吃不饱，难免就会偷吃马料。为了养好牲口，领导给炊事房打了招呼，我们才得以享受这有限的优惠待遇。

曹、刘两人在后墙外面辛辛苦苦地筛了半天。得到的也不过不足半斤的小麦。然而即使这有限的一点粮食，在当时已是非常难得，无比珍贵的了。

饥饿的威胁一天比一天加重。牲口虽然得到了有限的休息，我们饲养人员的工作反而加重了。许多牲口留在圈里，整天都要饲喂。食堂对我们的照顾越来越少，以至几乎没有任何照顾。为了维持体力，我们开始偷吃马料了。偷吃的方法既简单又原始：趁没有人的时候，伸手抓几粒粮食、一些油饼或一把麸皮。填进嘴里偷偷地咀嚼，一旦发现有人来就得迅速地咽到肚里去，表面上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不要以为这生粮食、生麦麸难以下咽。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每吃到一口饲料，都感到是无比的幸福，

它们的味道，实在比世上任何山珍海味都要好上几百倍、几千倍。即使连同麸皮里的泥沙一起下咽的滋味，也是人间难以比拟的享受。偷吃马料也是严重的违纪行为，因此，尽管饥饿难耐，偷吃马料也只是在确保不至被发现的情况下，吃上小小的一口。

食堂的饭食也开始“以粗代精”了。不知是从什么地方搞来的一大批一大批干白菜叶子、干萝卜叶子。食堂把它们简单地淘洗之后，放在大锅里煮熟，然后剁碎，掺和到面粉里，蒸成一个个菜团，食物的体积又增大了，但营养却进一步降低了。饥饿的恐慌笼罩着整个农场，不，不仅仅是农场，整个甘肃、整个国家都正在经历着一场饥饿的浩劫。

甘肃省是一个经济、文化都相对落后的省份。我 1956 年从云南调到山丹军马场，来时在山丹军马场驻山丹县办事处小住，等待托运的行李。在城里闲转时，看到一户人家门前张灯结彩、吹吹打打好不热闹。我以为是在办喜事。经打听才知道，原来这家人家，出了一个小学毕业生。县城里，一个孩子小学毕业，竟值得如此庆贺，当时、当地的文化水平由此可见一斑。

甘肃的农业也欠发达。多年来一直是粮食差进省。所谓差进，就是本省粮食不能自给，必须从外地调进补充。大跃进的年代，一阵阵的浮夸风，把领导干部们吹得晕头转向。一向缺粮的甘肃省，忽然变成了余粮省，不仅不需要外地支援，相反，还要调出大量粮食支援外地，支援国家建设。这一个调进变成调出，一字之差，可坑坏了甘肃老百姓，我们这些劳教人员自然更是首当其冲。在粮食极度匮乏的情况下，省委书记张仲良，不是想方设法为民排忧解难，相反还要打肿脸充胖子，硬是提出“宁可吃不饱，不让红旗倒”的错误口号。供应人们的口粮标准一降再降，牲畜的饲料粮也被大大地削减。59 年冬季的一个早晨，当我打开畜圈门，准备驱赶骡马到大门外的水塘去饮水时，一头骡子卧倒在地上爬不起来了。无论是用鞭子抽打，还是死命地拉着缰绳吆喝，都无济于事。它只是把头用力地往前伸，四条腿用力地挣扎。然而无论怎样，它就是站立不起来。老刘兽医闻讯赶来了。看看这瘦骨嶙嶙的牲口，他能做的，就只是责骂我们这些喂牲口的人，骂我们不负责，把牲口喂成了这个样子。但是，大家心里都明白，这绝对不是我们的罪过。我们挨训、挨骂已经成了家常便饭，由你怎么骂，我们只是默不作声。

“抬，想办法把牲口抬起来。”有人提出倡议。于是我们到马车上找来一根粗绳，从牲口肚子底下穿过去，在前腿和后腿腿根处拉上来再打成结。然后用一根大木棍从中穿过，一个人拉着缰绳，一个人扯着尾巴，两个抬杠子的人用力把牲口的躯体抬起来，加上牲口自己的努力，骡子站起来了。

它摇晃几下身躯，用力地抖掉身上沾着的泥水，然后踏着蹒跚的步伐，独自向大门外的水塘走去。它渴了，按习惯它每天早晨都要饮一次水。

一头高大的骡子，躺下去就站不起来了。这标志着整群牲畜的营养状况，已经下降到了一个危险的境地。它是一个信号，告诉我们第二头、第三头以至更多的牲畜都将步这头骡子的后尘。

老刘兽医告诫我们，从今以后，夜里要防止牲畜卧倒，只让它们站着吃草、休息，不许让它们躺下，以防再度发生需要人抬牲口的事件。为了保住这一批牲畜财富，领导上把犁地、耙地之类的重活尽量让劳教人员取代。牲畜除拉车之外，其他农活都暂时停止，以便让它们能得到一个恢复体力、恢复健康的机会。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出，在领导心目中，牲口的性命要比劳教人员的性命更值钱。当时劳教人员中已经有许多人因为营养不足而“病”倒，但得不到应有的合理的休息。

许多牲口不出工，留在圈里喂养。我们的工作量又大大地增加了。除了每天要多铡许多饲草之外，每天上午要把留在圈里的牲畜，一头一头地牵到院子里、拴在木桩上，以便让积肥组的人们到圈里清扫粪便。中午又要把这些牲口一头一头地牵回畜圈，再拴起来喂养。这些活是轻松的，并不费多少体力，但却要占去相当多的时间，更何况我们这些人的健康状况已经严重下降。体力的承受已经到了极限。增加一根稻草的重量都可把我们压垮。因此，增加这样一些工作，对我们来说，真的是一个相当吃力、非常沉重的负担。

1959年，农场又是一个丰收年。和1958年一样，虽然丰收，但我们的生活却没有任何改善。非但没有改善，相反伙食的水平还在不断地下降。我们的收成又被用来填补省委浮夸吹牛造成的粮食缺口了。

（十三）第二个国庆节

劳教人员中相当一部分是外籍人。他们多是响应党的号召，从内地到甘肃来支援西北建设的。甘肃是个非常贫穷的省份。听这些外籍人说，他们被动员到西北来的时候，组织上曾一再许诺，在生活上给他们以特殊照顾，保证为他们供应大米白面。初到西北时，这些承诺的确也兑现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在生活上的这些特殊供应也逐渐减少，甚至完全取消了。这就难免有些同志产生一些怨言。反右运动开始后，怨言被上纲成为对社会主义制度不满，不少人因此被打成了右派。

59年的国庆节又快来到了。国庆节、中秋节又引起了多少人的亲情、乡情。人们又开始第二次、也是更加浓烈的期盼，期盼国庆节可以获得赦免。59年可是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大庆啊。以往每到国庆都会给一批劳改

犯减刑，今年无疑也会对我们当中表现好的一些人，给以宽大处理。人们对此又一次充满了信心。

生活的艰辛在逐日加剧，劳动的强度仍没有丝毫减缓。获得大赦的期盼，又使多少人不顾一切、舍生忘死地投入到热火朝天的劳动高潮之中。人们的体质急剧地恶化着。一些劳教人员对外求救的呼声开始有了回音。一些食品包裹从外地寄到了农场。当时邮政部门规定，食品包裹每个不得超过一公斤。因此，最大的包裹也不过二斤重。然而严重的问题是，外面的人、特别是内地支援甘肃的人们的亲属们，他们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了解劳教农场里的生活真相。人们向外面的呼吁，只能表达食品不足、劳动强度大、伙食差、嘴馋等等这样一个水平。因而外面寄来的食品也多半是些南方生产的月饼、点心之类的食物。这些东西对劳教人员来说当然是非常珍贵、无上美好的食物。但是这里最最需要的却是普通的、数量可以更多些的常规的食物。

一天中午，大队里一个劳教人员得到通知，邮局里有他家里给他寄来的一个食品包裹。午饭后，他兴致勃勃地跑到邮局办理了手续，拿回一个两斤重的食品包裹。这是一包精致的月饼。在甘肃处于粮食严重匮乏的时候，江浙一带的食品供应还不十分紧张。一些江浙、上海籍贯的劳教人员，向家人呼救时，他们家里的人，想方设法给他们搞到了这些好吃的东西。这个劳教人员拿到包裹后，独自一人找到一个背风向阳的地方。背靠屋墙，席地而坐，打开包裹一口一口地吃起来。细细地嚼，慢慢地咽。好久没有吃到这样精美的食物了。他要尽情地享受一下吃的幸福，品尝一下月饼的美好滋味。一个月饼吃完了、两个月饼吃完了、三个月饼吃完了，终于寄来的两斤月饼，连同邮寄时因碰撞而掉落的碎屑，一点不剩地全部填进了他的肚子。月饼吃完了，他的饥饿感却一点也没有解除。如果还有，他还可以继续吃。这些被饥饿长期折磨的人已经不知道什么是饱了。

没过多久，不幸的事就发生了。这位猛吃一顿的劳教人员开始肚子疼。他的消化系统，由于长期没有接触油类，对月饼这样的精美的食品，已经失去了适应能力。加之他这一餐吃进的食物又严重超量。随后他就开始肚子痛、腹泻。更严重的问题是他非常瘦弱的躯体已经经受不起腹泻的折腾。还没来得及医治，他就已经闭上双眼，离开了人间。谁能想到，亲人的关怀，竟然成了致他死命的毒饵。

作为一次事故，场部向广大劳教人员广泛进行了宣传教育。要求大家引以为戒。千万不要再因饮食失控而发生类似的故事。然而，随着外地寄来包裹的日益增多，这种因暴食而致丧失性命的事，依然时有发生。一些

人在吃的问题上，已经失去了理智

国庆节在如饥似渴的期盼中，终于来到了。几乎人人都相信国庆十周年的大庆节日，我们一定能得到某种程度的赦免，至少对那些到农场来之后，一直表现良好的劳教人员，会给予一定程度的宽大处理。然而事实却与大家的设想完全相反。国庆节前召开的一次全体人员大会上，对一个“犯了严重错误”的劳教人员又狠狠地捆了一绳子。这个人犯的是什么错误我不清楚，开大会时，我又被叫回马号干活去了。牲畜和人一样，必须按时饲喂。据后来曹组长、刘兽医讲，还是对社会主义不满，和领导对抗，态度恶劣等等。总而言之是他不肯老老实实遵守制度，改造自己。但他瘦弱的躯体已经经不起这绳索无情的一捆了。两三天后，刘兽医告诉我，那个被捆绳子的劳教人员已经一命呜呼了。刘兽医对我说这件事，其目的并不是向我传递信息，而是告诉我说，你也得老老实实干工作，服服帖帖听指挥，不然也给你捆上一绳子，让你不死也丢半条命。对于曹、刘两人对我的这类恫吓，我从来都没放在心上。我对自己的问题十分清楚。我在工作上也一直表现良好，并且虔诚地按照党的要求，对自己的非无产阶级思想进行改造。我确信组织上不会无缘无故地处理任何人。更不可能以莫须有的罪名强加到我身上。然而国庆节的庆祝大会上，领导除了要求我们改造思想、脱胎换骨、重新做人之外，仍然没有提到半句有关赦免的话。更没有一个人得到宽大处理。根据 58 年的经验，国庆节庆祝会上没有宣布有关赦免的事，那么这一年就没什么指望了。人们的情绪又逐日地跌落下来。我们究竟犯的是什么罪呀？难道我们连劳改犯也不如，劳改判刑尚且有期，我们这思想改造真是遥遥无期。怎样才算改造好？这思想改造又以什么为标准，拿什么做尺度？怎样衡量改造好和没改造好的界限？人们再次陷入了惶惑、迷惘。悲观的情绪在暗暗地滋生、蔓延。佛教说：苦海无边，回头时岸。我们沉溺在这无边的苦海里，何处是岸？何日是尽头？有的人收到家里寄来的食品包裹后，不顾领导和在一起的劳教人员的劝诫，硬是把一包近二斤重的食品一口气全部吃下去。一边吃一边告诉近旁的人：我死也要做个饱死鬼。后果是可以想见的。没两天，他就离开了人们，离开了这无边无涯的苦海。他承受不了这严峻的“考验”。“背叛”了人民，“背叛”了党。死后还被戴上了一顶叛徒的帽子。然后被草草地埋葬了

（十四）刘兽医的示范动作

秋去冬来，萧瑟的西北风，给饥饿的人们带来了更多的痛苦，也给在艰苦环境条件下的牲畜带来了多少灾难。继第一头倒下去爬不起来的骡子之后，又有几头骡子晚间卧倒之后，第二天早晨再也无力自己站立起来。

老刘兽医一面板着脸训我们这些喂马的人，批评我们夜间不该让牲口睡下去，硬说我们把缰绳拴得太长，如果把缰绳拴得短些，牲口低头只能吃到草，想卧倒也卧不下去。一面招呼大家找绳子、扁担。大家七手八脚把一头头卧倒的牲口抬起来。有人出主意，把扁担从牲口肚子底下插过去，两头两人用力往上抬，一个人拉缰绳，一个人扯尾巴，这样可以减少许多麻烦。大家一试，果然不错。几头牲口很快就都抬起来了。于是我们这几个马倌每天早晨就又增加了一项抬牲口的任务。

和平时一样，刘兽医训我们的时候，大家都默不作声，由他乱吼。待到牲口都抬起来，赶出去饮过水后又从外面赶回畜圈时，我们请刘兽医给大家做个示范，看看牲口的缰绳怎样拴，才能使它们晚上既能吃到草又不能卧倒到地上。经过“人民日报”事件之后，曹刘二人对我们的态度较之以往已经缓和了不少。我们请他做个样子给大家学，他也不好推辞。只得硬着头皮亲手拴了几头病弱的牲口作为示范给大家看。然后我们也按照他做的样子，把牲口拴起来。但是第二天早晨那些病弱的牲口依旧还是睡了下去，而且由于缰绳拴得短，牲口的头还被高高地扯在槽沿上，给抬起牲口还增加了更多的麻烦。这些饥寒交迫的牲口，实在是因为体质太弱，它的四条腿已经无力支撑它的躯体了。刘兽医再也找不出更多的理由训我们，只有和曹组长一起来，大家共同努力把躺倒的牲口，一头一头地抬起来。并且如实地去向场部汇报情况，争取让更多的牲口能得到合理的休息。牲口们也已经到了危急存亡的关口，再不解救它们，它们这个冬天可能就难以度过了。这可是国家的一笔可观的财富啊。

遵照场部的指示，将近一半的牲口被留在圈里喂养，除必要的运输之外，其他农活都不再使用牲口。为了给牲口增加一些营养，场部还想法弄来了一些胡麻饼，连同原有的少量麸皮，牲口的日子好过了一些。卧倒爬不起来的牲口，经过休息和精心喂养，体力也逐渐有所好转。在大跃进的高潮一浪高过一浪的大环境之下，这些牲口能得到这样的宽容和待遇，实在也是相当难得的事。

（十五）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白旗”

1959年秋，不知从哪里传来的小道消息：农场又要增加新的成员了。这里所说的“小道消息”是相对于我们这些喂马的人而言的。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和外面很少接触，不要说外界，就是本场内部的许多事，我们也知之了了。要增加新成员的消息，可能是大田组那边，领导安排大家调整住地，腾出床位准备接收新成员而传出来的，但对我们马号的人来说，因为不是领导传达布置的，所以只能算是“小道消息”。两三天后，果然源

源不断地来了一批又一批的新成员。他们是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和“白旗”的帽子后，被送来劳动教养的。他们是一批基层干部。如果说我们这里原有的右派分子中，相当一部分是外籍人的话，这一批来的则大多数是甘肃省籍的地方干部。他们是一些生长生活工作都在基层的同志。他们和广大工农群众有着密切联系，时时处处体察着民间的疾苦。在大跃进、浮夸风吹遍中华大地、卫星、大卫星、超级大卫星遍地开花的狂潮恶浪中，他们是敢于坚持真理、坚持实事求是、如实反映情况的好干部。但在那个人们已被卫星搞得眼花缭乱，被浮夸吹得不知所云的年代，是非被颠倒了，善恶被混肴了。一些不顾百姓死活，一味奉迎拍马，乱放卫星的人，成了主宰社会、执掌政权的领导。而这些忠诚善良的好干部们反倒成了罪人。生活条件，首先是吃的条件已经相当恶劣。用粗糙的面粉和一些干菜做成的菜团是我们当时的食物。一天三餐，三个大菜团，此外再没有别的什么东西了。新来的这些成员们，和我们初到农场来时的心情一样，他们满腔革命热情。一到农场，放下行李后，就直奔工地，投身到紧张的劳动之中。他们也是一心想求得组织的理解、希望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证实自己对党的忠诚、对人民事业的责任感。这些体格健壮的中年汉子们，坚持了没有几天时间，就一个个地倒了下来。他们付出的体力太多，而得到的补充太少。很快，这一批新成员就变得和大家一样，面容憔悴，精神萎靡。更严重的是，这些新来的成员和农场原有的老劳教不同。老劳教已经经历了长期体力劳动的锻炼和持久的饥饿的折磨，他们生理上，对这种恶劣的环境条件，已经有了相对较强的适应能力。做同样的农活，老劳教人员付出的体力消耗，较之新成员要少，而对同样恶劣的食物，老劳教的消化吸收能力，又要比新成员好些。这是我作为一个畜牧科学工作者在当时的情况下，对事物做出的分析。一些新来的成员们，经受不住这恶劣环境的折磨而病倒了、躺下了。其中一些人在不长时间里就离开了人世。

“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白旗”们，应当说绝大多数都是党员，是基层的主要领导。是茫茫红旗的海洋中显眼刺目的“白色旗幟”。白旗被拔掉，敢于说真话、报实情的基层干部们被清除，层层向上反映的都是严重拔高的、浮夸虚假的数字。上面听到的全是“辉煌战果”和“伟大成就”。领导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又不可避免地产生出乱决策、瞎指挥。这一切导致了1960年，这个对甘肃人民和全国人民来说，都是无比残酷的灾难之年。

（十六）体温三十五度

60年元旦前，人们曾翘首企望新年的到来。企望的内容又是那样的简单、一致。大家都只想在元旦以及随后到来的春节这两个法定节假日里，

能使疲惫的躯体得到些微的休息，使辗转的饥肠能得到一点稍好的充实。58 年的国庆节，人们曾经翘首以待的大赦未能光临。59 年元旦、春节获释的可能看来更是微乎其微，甚至根本不可能。因此那时人们对他已经不抱多少幻想。然而更使人们大失所望的是，即使是这样一点只不过想多吃点东西，稍稍得到一些休息的愿望也未能实现。59 年元旦不但没有放假，而且还要加倍地劳动，为新年“开门红”再创高产、再立新功。而元旦的伙食和平时也没有什么两样，只是中午那顿饭的馒头由原来的一个大的，变成了两个小的，菜汤里面比平时多了一点点依稀难辨的油花。春节的三天法定假日，也是在大跃进的大干苦干的口号声，和实实在在的艰苦的劳动中度过的。人们不但没有得到休息，反而饱尝了更多的艰辛，付出了更多的劳累。在这两个节假日里，场部的领导以及各级管教干部们，包括曹组长和刘兽医等劳改释放的小组长们，个个都是生龙活虎般地舞锹抬杠，高喊着跃进的口号，奋不顾身地在生产第一线和大家一样地劳动。我们这些被管制的劳教人员，还有什么理由不投身到这热火朝天的，战天斗地的伟大斗争中去呢。我们喂马组的人，在这两个节日里，每天也抽调两个人去参加“开门红”创高产的运动。平时四个人的活改由两个人来做，夜间还要照常值班喂马，劳累辛苦可想而知。节日过后，参加劳动的干部、职工们可以有多少休息的时间和机会，而我们这些劳教人员，则只有连轴转个不停劳动。

59 年末，生活条件较之年初又差了许多。59 年元旦、春节虽然没能吃上饱饭，但至少馒头、菜汤还是有的。而 60 年元旦，我们的口粮已经由细变粗，又由多变少以至只能吃到菜团子这样的食物。改善生活已经绝无可能。加大劳动、再来一个“开门红”之类的运动，则是完全可能的。人们对元旦、春节不但不再寄予什么希望，相反，甚至还心存了多少疑惧。人们孱弱的躯体已经再也经不起多少折腾了。

生活水平在一天天地下降。干部职工们的伙食也降到了相当低的水平。供应牲畜的精饲料几乎下降到了零。可能是考虑到人们的健康状况，也可能是干部们自身也没有什么力气了。60 年的元旦、春节，尽管口号仍然喊得震天价响，但实际上并没有要求大家干太多的农活。节假日在平静中度过。

春节过后不久，我们喂马组就被解散了。原因是这些牲畜在超低的饲养条件下，不但精料已经没有，连饲草也无法供应了。于是场领导决定把这些牲畜分散交给各个赶车、犁地的人去喂养。他们在需要拉车的时候，赶着牲畜去拉车。不拉车时就牵着牲畜去放牧。这一措施对牲口应当还是

有利的。但我们这四个喂马的人，从此之后就失去了喂马组可以享受的那些优惠，尽管这时的优惠已经下降到了几乎没有的地步。但杂工组总归比大田组在劳动强度上要轻松些。喂马组解散后，我们四个人被分别编到几个大田组里去，开始和大队人马一起，投身到劳教农场里最艰辛的体力劳动之中。

刚到大田组的头几天，我这个从马号调来的新成员，和原有的队员相比就算是好劳力了。于是队长、组长们一个接一个地向我头上压担子。重活、累活都是我的。没过几天，我就变得和大家一样。健康状况迅速恶化。体重急剧下降。出工时步履蹒跚，收工时拖拖拉拉。青年人谁不想在劳动改造中做些突出成绩，争取立功以求得早日解放。然而力不从心。我们这个劳教队伍已经变成了一个庞大的病员的队伍了。

食物越来越紧张了。原来场里的后勤人员想方设法还可以搞到的干菜叶子、干萝卜叶子等。现在也搞不到了。数百上千人的队伍要吃饭，至少要把肚肠填起来。无奈之下，场部决定把劳教人员分成两部分，一部分体质较好的人照常劳动。另一部分体质较差的人，到野地里去挖一种野生植物——苦曲菜的根。食堂把这种草根洗净，在锅里煮熟，把水虑干后，剁碎，再加水煮开，然后把面粉加进去煮成菜糊，用来充饥。我当时体质还算好的。自然要留在劳动队伍里。

西北的风沙是出名的。当地群众戏说这里一年一场风，从大年初一刮到腊月三十。这个说法自然是夸张了一些，但风沙之厉害也可以想见。58年我初到农场时，就曾遇到过一场“大黑风”。大约是早春三、四月的时候，一天上午忽然北方天空腾起一片乌云，那乌云飞驰而来，迅速扩大，遮天蔽日、上下翻滚。刹时间已经来到头顶。有经验的地方干部，马上下令通知，叫大田组的人们立即收工回到营地。我当时在积肥组，工地就在场部附近。得到命令后，我们立即回到宿舍。

大队人马刚被召唤回来，黑风已经刮到。只听得外面狂风怒吼，石走沙飞。天空由阴沉变成了黑暗，以致对面看不见人。我们躲在屋里，紧闭门户。人们把那盏药瓶制成的煤油灯点燃。尽管是在屋里，近在咫尺，看到的灯火也只是豆粒般大小的一个黄斑。人们相互之间只能听到说话的声音，却看不到面容。这场黑风整整刮了两天。人们无法出门，只好都窝在屋里。只是每组抽调一两个人到食堂去帮忙。——无论刮多大的风，人们的饭还是非吃不可的。当时食堂的主食是馒头，由于风大无法加工，只好改吃面糊。尽管伙房的人想方设法把门窗都关紧。但吃饭的时候还是满嘴的沙土。两天之后，狂风息止，天又放亮。到外面一看，遍地落了厚厚的

一层黑土。原来那翻滚的乌云，不是水汽而是尘土。难怪漫天的乌云却一滴水也没降落。事后，领导告诉我们说，遇到黑风，如果不立即收工，风沙一到，当即不辨东西，大队人马就无法返回营地。

又是一个刮风天。怒吼的狂风卷起的沙尘把空气搅得昏昏浊浊，就像是天上布满了一层薄云、地面笼罩着浓雾一般。高悬在空中的太阳，看上去只是一个白色的圆盘。没有一丝光亮，没有一点温暖。

和平时一样，遇到这样的天气，大田组的人们还是要照常出工的。工作的内容是平整土地。我们每人扛一把铁锹，随着大队人马走到遥远的工地。在那大片的沙荒地上，根据每块土地的情况，把高出来的地方的土挖下来，抛到低处，使整块土地高低一致，以便于灌溉。这项工作说来算是轻活，但对于我们这些瘦骨嶙嶙的饥民来说，就是相当沉重是体力劳动了。约莫下午四点多钟时，经过一天劳累的人们已经疲惫不堪。借着朦胧的风沙，有的人已经不顾严格的纪律，找到一些避风的凹地或沟渠的一侧，躺倒休息了。我裹着老羊皮大衣，也选择了一个背风的去处，躺了下去。风还在怒吼着，吹起的飞沙一阵阵从头顶掠过。稍远的地方相互之间只能看见影影绰绰的人影。干部不会来了，组长也不一定会来了。于是大家放心地休息起来。睡是不敢睡也睡不着的，只能偎缩着闭目养神。

天色一点一点地昏暗下来。远处响起收工的哨声。横七竖八躺在荒地的人们，一个个慢慢腾腾地爬起身来，拖着沉重的步伐，迎着风沙向营地走去。

我随着人流步履艰难地一步一步向前走。远处营地的灯火在。

闪烁。天色已经全黑下来了。而我离住地还有好长好长一段距离。一些原来在我后面的人，一个一个地走到了我的前面。慢慢地我的前前后后已经都见不到人了。天黑以后，风刮得小了，但我的脚步仍然是那样的艰难。我已经耗尽了体力，再也抬不起脚步了。真想躺下去再睡上一觉。但是理智告诉我，这个时候如果躺下去，我将再也起不来了。我咬紧牙关，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走，一定要坚持走回营地，就是死也要死在场里。

终于我走进了农场的大门。医务室就在大门口。我顾不得到食堂领饭，就先进了医务室向医生求救。

“你怎么了？”

“我心里难受。”

医务室里一个医生从小窗口里递出一个体温表，嘱咐我放在腋下量量体温。

几分钟过后，我取出体温表递到医生手中。

“怎么只有三十五度？”医生看过体温表后惊叫起来。

“是不是没有量好？”另一位医生说着把体温表处理后又从窗口递交给我。“再量一遍。”他对我说。

我遵照医生的嘱咐，再一次把体温表夹到腋下，并把老羊皮大衣紧紧地裹起来。

几分钟后。当医生再次让我把体温表递进去时，听到的仍然是医生的惊叹。“还是三十五度。”为了再次证实我的体温。医生干脆把我叫进屋里，另外又拿了一个体温表来，让我左右两腋一边夹一个。然后看着我把大衣裹紧。几分钟后，两个体温表同时取出。查看的结果还是三十五度。

体温表没有问题，确实是体温只有三十五度。医生得出了结论。这是体质严重衰弱，能量极度缺乏，就像炉子里没有煤炭一样，已经到了将要熄火的地步了。必须立即抢救。两医生经过短暂的商讨后，从药架上取出一支 20cc 的葡萄糖注射液，给我静脉注射。

我吃力地脱去老羊皮大衣，褪掉半边棉衣的衣袖。把一只皮包骨的手臂放在一个白布枕上。医生小心翼翼地找到了血管，一面把针扎进，一面慢慢推进注射器。顿时我的浑身上下产生了一股热流。

20cc 的糖水很快就注进了我的身体。医生又把体温表递给我，让我再量一次体温。几分钟后，体温表上的读数已经恢复到了正常的三十六点五度。

“葡萄糖注射液只剩下四五支了。再有几个类似的病人我们就将抢救无术了。”两个医生互相喃喃地说。

我穿上皮大衣。向医生匆匆致谢后，赶紧就往食堂走去，去领取那维持生命所仅有的一盆苦曲菜面糊。

医生给我开了一张休息两天的病假条。这是我到农场两年多来的第一次病休。

鉴于我的健康状况已经严重恶化。组织决定把我调到挖菜根的小组，和一群病弱的劳教人员一起，每天提一个小篮子，手里拿一把小铁铲，到野地里去挖苦曲菜根。

苦曲菜根，这是当时当地我们这些劳教人员赖以维持生命的救命草。

（十七）蘑菇中毒

体温降到三十五度，这意味着我已经到了死亡的边缘。为了挽救性命，我向家人发出了紧急求救的呼声。利用病休的两天假日给在福州的父母、在呼和浩特工作的弟弟、在南平工作的妹妹以及在陕西宝鸡的舅父都发出了请求帮助的信函。然而，慑于“捆绳子”的威胁，我在信中尽管在措词

上动了许多脑筋，并且借医生的口说体温降到三十五度是严重的营养缺乏，如果不是抢救及时就有生命危险，必须尽快补充食品、补充营养等等。然而无论怎么写，家人都无法想象我的真实处境。加之当时全国已经都处在饥荒的笼罩之下，营养不良、吃不饱饭的情况已经普遍存在。因此，得到的答复大多也只是一般性的表示慰问的信函，以及鼓励我认真劳动、刻苦改造思想，争取早日恢复自由之类的话语。

时光在极度的艰苦中一天一天缓慢地向前捱着。生命靠少量的粮食和苦曲菜根艰难地维系着。所有的劳教人员都已经个个面黄肌瘦只剩下一副骨架。繁重的体力劳动已经无法开展。人们的全部精力都投放到寻找食物——野生菜根和保持生命的活动之中。各个劳教大队不时传来有人因饥饿而死亡的信息。这些当初曾经使人们震惊的事件，如今已经变得司空见惯，不足为奇了。

春天终于姗姗来到了。她带来了生机，带来了温暖。大地复苏了，野草萌生了。我们的饭食也逐渐由苦曲菜根变成了各种野菜。原先负责采集苦曲菜根的劳教大军，转而采集各种野菜，灰灰菜、苦曲菜、以及所有可以填肠塞肚的无毒的野草，都在采集之列。食堂里用来煮苦曲菜根的几口大锅，现在用来煮野菜、野草。附近田野里的野菜很快就被我们采摘一空。为了完成各自采摘野菜的任务。人们不得不向更远的地方扩展。采摘野菜的距离也越来越远。每天吃过早餐后，各个采摘小组就由组长带队、每人手提一个小筐，拿一把小铁铲向茫茫的荒野大地进军，去寻找一切可以填塞肚皮的植物。按照规定，采摘的数量如果超过定额，多余部分可以留下来自己享用。因此。绝大多数人在寻找野菜的工作上还是十分积极认真的。食堂后面烧锅的地方也经常有人利用余火在烧煮自己多摘回的野菜来充饥。

我所在的小组从场部出发，走了好长一段路，来到一片荒野。组长宣布，大家分头出去找野菜。于是人们一个个向外散去。两只眼睛不停地在地面上搜寻着。经过一段时间的采集活动，人们对哪种野菜可以吃，哪些野草有毒等都有了一定的知识。忽然我看到在一块低凹地里有一丛蘑菇。那一个个肥厚的顶盖下面长着雪白肥大的立柱。我在军马场时曾和战士们在草原上采摘过蘑菇。那些草原上生长的战士们，都懂得那种蘑菇有毒，那些蘑菇可以吃。眼前这一丛蘑菇，和我在草原上采摘的蘑菇的形状一模一样，只是色泽有些不同。草原上长的是白色，而这些蘑菇的顶盖是浅棕色。这些蘑菇能不能吃我拿不准。为了怕被别人抢先摘去，我不分青红皂白，先把它们摘下来用手帕包起来再说。

回到营地，我开始向别人请教：“这种蘑菇能不能吃？”我拿着蘑菇向队友们一个个地打听。特别是那些甘肃籍的队友们，他们生长在甘肃，这方面的知识无疑要比我丰富得多。

得到的答复是多种多样的，有人告诉我说，有毒，不能吃。有人告诉我说，能吃，味道非常好。又有人说，吃是能吃，但有弱毒，身体好的人吃了没事，身体差的人吃了就受不了

面对这十几个肥厚的蘑菇和人们不同的说法，我犹豫了。吃，万一有毒怎么办？不吃，实在有些舍不得。这可是难得找到的一点食品啊！经过反复思考。我最后决定先煮一点试吃一下。

我捡了一个中等大小的蘑菇，用水洗净后，放在搪瓷杯里，加点水，撒点盐。到食堂后面炉灶门口煮沸之后，就开始品尝起来。哎呀！真是鲜美无比。于是那清清的汤水，肥厚的蘑菇，一点一点就全进了我的肚子。吃完之后，我开始静静地等待，如果没有不良反应，剩下的几个蘑菇就可以安心地享受了。

出工的哨声响了。人们集合，列队，然后各奔自己的劳动岗位。我的任务还是提着筐子去摘野菜。

和队友们一同行进中，我忽突然感到头发昏，眼前的一切似乎都在旋转，肚子里也感到像要解大便。我赶紧向路边的僻静处跑去。蹲下来拉屎。但是什么也拉不出来。我站立起来，提起精神，瞪直两眼。眼前的一切又都是正常的。抬脚向前走，天地就又旋转起来。我猛然意识到我是蘑菇中毒了。一定是刚刚吃下去的蘑菇有毒。于是我向走在前面的队友们打个招呼后，就急急匆匆地回头向医务室赶去。

我如实地向医生讲述了我的病情和自己的判断。医生让我用手指伸到嘴里，按压舌根。想借此引起呕吐反射，把吃进去的东西吐出来。然而这一招无效。我这样已经饿扁了的人，吃下去的东西无论如何也吐不出来了。于是医生又采取了另一个措施。他让我在门诊室的长椅子上坐下，吩咐他的助手去煮了一大锅伏茶，用一个半大的瓷盆盛了满满一盆端到我面前，命令我喝下去。一盆茶水喝完又端来一盆。第二盆喝完，又端来第三盆。我实在不想再喝了。但医生还是严厉地命令我喝下去。

三盆伏茶喝下去之后，我的肚皮胀得就像吹足了气的皮球。只觉得头昏眼花，不久就躺倒在长椅子上浑然入睡了。

也不知道过了多少时间，睡梦中只觉得尿胀。昏昏迷迷中，我翻身起来就往医务室后面的野地里去小便。恍惚中听到隔窗屋里医生对他的助手说：有救了。

解过小便后。我回来躺倒在椅子上又昏睡过去。不久又感到肚子胀，又要小便。这样一连撒了几泡尿之后，医生对我说，你可以回去休息了。在医务室的长椅上睡了多少时间，离开时是什么时候，我都糊里糊涂。队友们已经不知去向。我的头依然昏昏沉沉。于是我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到宿舍，把压在炕头的一小包“美味”的蘑菇取出扔掉。然后歪倒在地铺上，不久就又昏睡过去了。

我被队友们走动和拿餐具的声音吵醒了。睁眼一看，已是吃晚饭的时间。赶紧翻身起来，拿起饭盆和大家一起排队去领取那只含有少量面粉的一盆野菜汤。这可是生命赖以维系的、绝对不能轻易放弃的、对我们来说是无比珍贵的一餐饭啊。

（十八）表弟来访

早春三月，在中原地区已是小麦抬头的季节。而在甘肃酒泉，春小麦还没播种。这里一年一熟。因此还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岁月，才能和新的一茬接上。人们依然在死亡线上挣扎着。为了生存，我们每天必须提着筐子，到野地里去挖我在前面已经提到的一种名叫苦曲菜的草根，来做为我们的食物。

春耕到来时，一些身体情况稍好的人们又被组织起来投入农业生产：耕地、施肥、播种等。我又被编到送肥组。任务是把一筐一筐的粪肥盛在背篓里，由人偕送到地里。规定每人每天至少要送若干趟。体质本来就非常虚弱的人们，劳动强度一加大，很快就一个接一个地又垮了下来。然而为了秋季能夺得好收成，为了幻想中的赦免，人们还是不顾一切地投入了劳动之中。

一个晴天的早晨，早餐后正准备出工劳动时，队部通知我不要出工，留在宿舍有事。我感到纳闷。又会有什么变化吗？从全场近期的情况看，没有什么人员变动的事。从我自身来看。我也是一直循规蹈矩没有任何违规的行为。因此，让我留下来的原因我怎么也琢磨不透。反正让我留下我就留下。一切听天由命。

大队人马出工了。务农的务农，挖草根的挖草根。浩浩荡荡的劳教队伍分散开来，各奔自己的岗位，场部顿时显得无比的宁静。我躺倒在地铺上休息，等待着既将发生的事情。

场部的一个职工带着一个青年人来到我住处的门外，朝屋里喊了一声：高仕泌，出来，有人来看你。

听到呼叫，我赶紧起来，走到门外。场部的人向那位青年说：这就是

高仕泌，你们谈谈吧。说完就离开了现场。

青年人两眼直楞楞地看着我，半晌才猛地扑过来，双手拉着我的手，两眼的泪水扑啦啦地流淌下来。

来看望我的是我的表弟。我在陕西宝鸡工作的舅父家的长子。他刚从西安石油学校毕业，分配到新疆吐鲁番，从宝鸡赴新疆途径酒泉。顺路下车来看望我。。

“怎么成了这个样子？怎么成了这个样子？”他嘴里不停地喃喃着。他已经认不出我了。虽然我 56 年从云南丽江调到山丹途径宝鸡时还曾和他见过面。

我当时的心情确实也非常复杂。我没有哭，没有流泪。只是拉着他的手告诉他，我的处境已经非常危险。我所需要的只有一样东西，就是食物。能够补充一些食物，我的生命就可以延续。否则前景将十分悲观。在当时的情况下，最适宜的食品是炒面。这是我作为畜牧专业的科技工作者，从“家畜营养学”的角度作出的科学判断。理由也非常简单。一般的食品正常情况下都含有相当比例的水分。即使是干燥的小麦，含水量也在 12-14%。炒干的面粉，把其中的水分除去，它的实际营养价值自然就提高了 12-14%。也就是说，同样是二斤食品，二斤炒面就可以相当于二斤三两左右的面粉。当时 邮政部门每次一个食品包裹只准许寄二斤。这二斤炒面，自然就比同样重量的其他食品含有的营养成分多一些。这多出的一点养分，对于我们这样因饥饿而性命垂危的人来说，真是太重要了。炒熟的面粉，随时可以食用，不需再加工，这是它的第二个优点。在当时的大环境下，人们除了面粉之外也很难再搞到别的什么吃的。因此这个要求在我看来也比较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

宝宝（我的表弟梁龙的乳名）一边听我说话，一边从他身边的提包里找出他随身携带的食物。当时的社会环境，外出还很难找到多少吃饭的地方。饭店都是国营的，营业时间也很短。因此长途旅行一般都要随身带些吃的。他把提包里的两块白面饼一股脑儿全拿出来让我吃。又倒一杯开水送到我手里。然后我们两弟兄坐到地铺边上聊起来。这可是一个非常难得的、让家人了解我的真实处境的好机会。事实上，表弟的看望，确实就是我的生命得以保存，在万分危难时能得到救援的极其重要、极其关键的转折点。我把我在劳教农场劳动生活的情况，概括地向表弟做了介绍，又把我的希望和要求告诉了他。我告诉他，出去的希望极其渺茫，死亡的威胁时刻存在。吃苦我不怕，劳动我也不怕，然而没有吃的，没有任何可以补充的食物，在如此恶劣的生存条件下，迟早是要被饿死的。因此要他务必

要把我的情况向家里的亲友尽快反映，以求尽快得到救助。这些，表弟作为一个自由人当然要比我容易做到。

农场里，即使是外地来客，每人午餐也只能凭粮票购买一份数量有限的饭菜。表弟挨到午饭时，到食堂买了一份饭菜留给我，然后饿着肚子离开了农场。

得到两块饼和一份干部食堂的午餐，我本来可以毫不费力地一下子全部吃光。但是我没有那样做。我把这些食物分成若干次，在两三天的时间里慢慢地吃掉。我在学校读书时，“动物饲养学”中讲到一个所谓“维持饲养”。它的含义是指，家畜在漫长的冬季期间，由于草料不足，往往会冻饿而死。为了维持家畜的生命，又尽可能节约饲料饲草的开支，每天只给每头牲畜少量的饲草饲料，以使家畜的性命得以维持。待到春暖花开，牧草萌生之后，这些保留下性命的牲畜，有了新鲜牧草，健康就可以逐步得到恢复，身体就可得到发育。这种以最少的饲料维持家畜生命的方法，成本低、耗料少、经济上也是高效益。我把家畜饲养学的理论运用到了自己身上。这的确是一个非常难以实施的方案。极其强烈的饥饿感、无比迫切的食欲、以及就在身边的食物的诱惑，使我恨不得坐下来一口气把这些东西全部吞下去。然而，另一方面，理智又在不停地警告我，如果我一口气把这些东西全吃下去，虽然其数量还远不会致我于死命，但明天怎么办？后天怎么办？这些东西一口气吃完肚子也不会饱。实在说，离饱还远得很。但消化吸收肯定不会很好。这将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浪费。在理智的干预下，我把这些难得的一点食物分成好几天，好几餐才吃完。达到了维持生命、充分吸收、最佳享受的目的。

当天下午表弟离开农场走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表弟的来访给我带来了生机、带来了生命。

（十九）“大检查”

表弟的来访，使我得到了一个把实际情况告诉家人的机会。表弟是自由人。他在通信中可以把我的处境以及生命垂危的情况，真实详细地告诉家人。这当然引起了家里的高度重视。但由于那时全国已经都处于严重的饥荒之中。家里也很难筹集到多少食物来解救我。福州方面，妈妈接到表弟的信后，自然是心急如焚。然而福州的供应也极其紧张。不仅主食供应不足，副食品也极其有限。成年人饿着肚子，把节省下来的一口食物留给孩子，以致大人因饥饿而浮肿。在这样的条件下，想筹集一些食物支持我，无疑也是非常困难的。六、七月份，我先后接到妈妈从福州寄来的两小包乳儿糕和一包果脯。乳儿糕是妹妹新生一个女婴，国家按规定供应的。妈

妈负责照应婴儿，从婴儿嘴里抠下来寄给我的。一小包果脯是托人从市场上高价买来的。此外再也筹不出多少可以吃的东西了。弟弟在呼和浩特工作。得悉我的情况后，他想方设法搞到了一些肥猪肉，炼成油后，用一个盛青霉素的铁桶装了寄来给我。这一斤多猪油倒解决了不少问题。每天吃饭时放一点在那野菜糊里，不仅改善了味道，更重要的是，油类所含的热量是淀粉类食物的 2, 25 倍。（这也是我从“动物营养学”里学来的知识。）也就是说，两斤猪油可以相当于四斤半面粉的能量。这对于延续我的生命来说，自然可以起到很好的作用。可惜弟弟那里食品同样也非常短缺，搞到这一些猪油，他已经使出了全身的力气。以后虽然也另星寄来一些吃的东西，但数量都十分有限。

住在宝鸡的舅舅从表弟信中得悉我的情况后，全家都动员起来。先是舅妈从供应的口粮中节省下来一些面粉，按照我的要求做成炒面寄来给我。大约每半个月寄来一次。这在当时已经是相当不容易了。有了每月大约四斤炒面的补给，情况自然比一般的劳教人员好些。后来有一次，可能是中秋节后，寄来的炒面里，竟然还夹杂着几小块红烧猪肉。这些都是舅舅、舅妈从家人嘴里抠出来的。舅舅家住在宝鸡。60 年最困难的时候，陕西由于领导干部作风比较实在，没有像甘肃、安徽等省份那样不顾百姓死活，一味地浮夸吹牛。因而城市供应的口粮标准还比较合理。舅舅家里孩子多，孩子吃得少而口粮标准比成年人少得不多，因而才有可能节省出一点食物。加之舅舅当时在宝鸡植物油厂工作，油厂可以额外供应一些油饼之类的东西。舅舅舅母自己多吃些饼粕类的东西。这样就可以省下一点面粉供应我。家里寄来的食物无论质量好差、数量多少，对我来说都是无比珍贵的。它意味着我的健康可以得到一些维护、我的生命可以得到一些延续。为了最合理、最充分地利用这些食物。我每次都是把食物严格地分成许多份，每天补充两三次，每次至多不超过一两。一个两斤重的炒面包裹，一般要分十天才吃完。弟弟寄来的那些猪油则几乎吃了一个月。劳教农场的情况越来越多地被外界了解。为了挽救亲人的性命。从外面寄来的包裹也一天天增多。有些包裹甚至是从香港、澳门、美国以及其他国家寄来的。劳教队伍中时常可以听到，某某人收到一个从香港寄来的食品包裹，里面的食物如何精美，某某人收到一个从美国寄来包裹，里面是什么样美好的食物等等。但是更多的还是从国内其他地方寄来的普通食物，至多不过是饼干、桃酥之类的点心。然而，绝大多数劳教人员还是得不到任何外援。他们或是家人不了解劳教队伍的真实情况，或是虽然了解情况，但心有余而力不足。自己已经自顾不暇，那有余力来支持他们。于是这些少数有外援食品

的人都成了人们眼红的对象。在集体生活中，人们的一举一动都在众目睽睽之下。大家劳动生活都在一起。喝茶可以相让，抽烟可以相让，唯独这吃的东西是万万不能想让，也绝对不肯想让。大家都饥肠辘辘、面黄肌瘦，唯独你一个人，一口一口地补充着食品——尽管这食品的数量少得可怜，质量也差得要命。但仍不免引得别人馋涎欲滴、眼热心动。一般劳教人员倒也罢了。尽管看着眼红，但明知想也白想，因而干脆闭上眼睛养精神。我在看到别人吃东西的时候，也是这个心态。但是一些担任大队长、中队长的劳教人员可就不同了。他们眼热嘴馋，就想着法子要把别人的食物搞到自己的嘴里。于是就运用起他们手中的那一点，只能用来管理和他自己一样的劳教人员的权力。

一天午饭后。大家正准备休息。忽然哨声大作。我所在的劳教大队的大、小队长，召集全体人员到门前院子里排队集合。说是要进行大检查。人们只好听命到院子里排队。队伍排好，点完名之后。三个队干部命令大家在院子里不准乱动。他们则从这排宿舍的一端开始进屋“检查”。在每间屋里都要把门关紧，并呆上好长时间。人们很快就猜到，他们是在偷吃别人的东西，但又都敢怒而不敢言。这些和我们一样的劳教人员，由于当了个大队长、小队长之类的“干部”，劳动中他就可以安排你干重活，也可以安排你干轻活。向场部汇报情况，他可以为你美言几句，也可以给你上点“烂药”。因此这些“中层干部”实际上就掌握着大家的生杀予夺之权。也是大家谁也得罪不起的人物。足足过了半个多小时，三个队干部把几间宿舍“检查”完毕。大家才解散，各自回到宿舍去。进屋后，凡是有家里寄来食品的人，首先关心的就是自己的食物是否安全。我在队伍解散后，立即扑向我枕边的铁罐。那里盛放着舅父从宝鸡寄来的炒面以及几小块红烧猪肉。这几块猪肉我一直没舍得吃。打开罐子一看，炒面还有一点，那几块红烧猪肉则踪影全无。这个损失实在是非同小可，但又有苦难言。只好忍气吞声。其他劳教人员，凡是有食物的，都不同程度受到损失。这个损失确实非同小可。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每损失一口食物，就是减少一天的生命，而当时我们这些劳教人员的生命，正是在以天为单位计算着的。自从这次“大检查”之后。人们对自己的食物开始高度地警觉起来。食物成了随身携带的贵重物品。无论到什么地方，那一小包吃的东西是万万不能离开身边的。

这次“大检查”是我到农场以来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那些劳教“干部”们，看到大家一个个高度警惕的神情，他们也知道，如果再搞第二次，他们将一无所获。

(二十)移工就食

报刊上不断传来粮食丰产的捷报。产量一个比一个高。花样也在不断翻新。我们劳教人员很难见到报纸。但口头的传达还是经常可以听到的。粮食单产从千斤扶摇直上，一直达到了万斤以致几万斤。然而浮夸的数字是不能当饭吃的。刚听到上面传达高产的消息时，我们也曾高兴过一阵子。对改善生活、吃饱肚子（至少不至于饿坏肚子）给予一定的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丰产”“高产”的数额一天天地膨胀。我们的信心也一天天地跌落了下来。因为无论产量多么巨大，我们的饭食却没有得到任何改善。不但没有改善，而且还在不断地恶化。注意，不是降低，而是恶化。秋天到了，北方一年一季的秋收季节来临了。我们寄希望于自己种植的土地，能收获一些食物来改善我们自己的生活。然而，即使是这个可怜的欲望也无法实现。我们收获的粮食全部被调走，去描绘省委吹嘘的甘肃不仅不需要外援，而且已经有余粮可以支援外省的神话。粮食没有了，我们的生活，不仅是生活而且是生命，又被推上了悬崖峭壁。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段更加险恶的路程。

60年秋，忽然有一天，场部召开大会宣布，为了让我们能够吃到饱饭，全场人员将立即执行一项被称为“移工就食”的大行动。“移工就食”顾名思义就是把人们移送到粮食丰产的地方去吃。什么地方有足够的粮食可以供应我们呢？高台。距酒泉大约100公里的高台县。那里据说粮食多得不得了，足够我们这些劳教人员吃饱吃足。只是由于交通不便无法运出，因而把我们转移过去，到那里去“就食”。听到这个消息，人们没有表现出任何一点兴奋的情绪，相反，还因为马上要长途跋涉而忧心重重。人们的健康、营养状况已经到了相当困难的境地。不搬迁，少劳动，还可以勉强支撑一些时日。如果搬迁，再徒步行走一百多公里。这对我们这些孱弱的躯体来说，实在是一个不小的负担。然而“军令如山倒”对于我们这些被管制的人来说，上面下达的命令，实在比山倒还厉害。我们只有听命服从，遵令行动的义务，没有任何反映意见、要求的权利。

第二天一早，全体劳教人员收拾好各自的行李以及面盆、牙具等。到操场集合，然后就开始了艰难的徒步搬迁。好在场部事前做了较为充分的准备。对人们的健康状况和体力，也做了较为客观的估计。可能是在命令下达之前许多天就采取了节约粮食、减轻劳动的措施。行军途中，一日三餐，每餐还能供应一个馒头、一碗菜汤。一百公里左右的路程足足走了好几天，每天至多走四五十里路。我们这些精疲力竭、瘦弱不堪的劳教人员居然也完成了这个大迁徙的壮举。如今回想起来，真的有些不可思议、难

以想象。

行军途中经过一个农村生产队时。时逢途中午餐。队伍接到命令就地休息，等待分发午餐。于是大队人马就地坐下休息。人们已经相当疲乏了。由于待不了多久就将吃饭。因而人们大多席地而坐，或把背包放在地上，坐在上面闭目养神。相互之间很少说话，没有什么话好说，更没有精神去说话。

路边不远处，是一个农业生产队，也可能是生产大队的队房和食堂。院里院外熙熙攘攘挤满了人。进进出出一派繁忙景象。只听得队干部大声地呼喊、照应着。不多久，看到人们不分男女老少，一个个从院子里走出来，每人手里都捧着一个硕大的、看样子将近有一斤重的大馒头。面对眼前的景象，我们的队伍躁动起来了。人们纷纷用羡慕的眼光，盯着那一个个又白又大的馒头。如果不是纪律约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这些人将一拥而上，把队里的馒头抢劫一空。偏偏这些百姓又不知趣，硬是一个个抱着大馒头站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直让我们人人看着馋涎欲滴，而又可望而不可即。

终于我们自己的饭食送来了。人们按组排成队，清点人数、核查姓名之后，每人分到一份饭食。大家就地狼吞虎咽又仔细品尝一番之后，没过多久就又开始了午后的行军。队伍开拔，人们就开始议论起老百姓手中的大馒头。感叹我们这些受处分的右派分子，连吃口饱饭的待遇也享受不到。真不如回家当农民，当农民百姓，起码还可以吃个大馒头，至少劳动与否还有人身自由。不像在这里食不果腹，还得被迫从事超重的体力劳动。此时此地，我们确实还不知道，那些农民手里捧着的大馒头，其实只是为了应付上级检查，做样子给领导看的。是只准拿在手里，一口也不许吃，而且日后是要充抵相当天数的口粮的。难怪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情景，确实是只看到人人手里捧着大馒头，却没看到有人边走边吃。我们这些与世隔绝的劳教人员，对外面的情况实在是知之甚少甚至是一无所知。队伍在拖拖踏踏的脚步声中缓慢地行进着。没过多久，人们就又陷入了沉默之中。议论不能当饭吃，还是少说两句，留点精神为好。

（二十一）五角钱一块的薄饼

转移前一天，场里开大会动员大家第二天出发，同时布置出发前的各项准备工作。我们这些劳教分子，本来就只有服从的份，没有说话的权利。因而也就无所谓动员。会上领导向大家宣布，高台今年粮食大丰收，丰收的粮食之多，令人难以置信。由于运输条件差，粮食运不出来，只好动员大家转移到那边去，就地吃粮。对我们这些长期挨饿的人来说，能吃饱饭

自然是天大的好事。然而很快大家就产生了疑问。高台到酒泉至多不过 100 公里。用汽车运粮食过来，其代价远比几千人徒步跋涉好几天要少得多。舍轻就重，这里必然有问题。开始人们把主要的疑点放在政治上，怀疑是否为了便于加强对我们这些人的管理，而把我们迁到新址去。但是，很快我们就发现不是这回事。原来是高台县浮夸其粮食产量，而实际上又拿不出来。说假话又要充硬汉，因而就以有粮食运不出来为借口进行搪塞。谁知上面认了真，运不出来就安排人去吃，于是就出现了“移工就食”这一场闹剧。说他是闹剧，实际上并不恰当。因为其结果确实是一幕骇人听闻的惨剧。

浩浩荡荡的劳教队伍出发了。新添屯分场和场部两处合并，足足有两千多人。在大路上排成了四人一排的一条长龙。刚出发时，队伍还稍稍整齐。没多久就乱了套。被饥饿长期折磨的人们，无论如何也振作不起来。队列变成了散兵。好在大家的步子都快不起来。因而尽管散乱，从总体来看，仍然还是一个长长的队伍。我把牙刷、毛巾和一双旧鞋用网兜兜起来，用手提着。把我的老羊皮大衣用一条旧军毯包起来，再用绳子扎成一团，揣在背上，就随着队伍上路了。九月的塞上，白天气温还很高，晚上却已是寒气袭人了。带上皮大衣，夜晚睡觉时可以暖和一些。其他的衣被等物件则一概捆起来，在外面用毛笔写上姓名、编号，丢在宿舍里，留待场里用马车转运过来。

队伍在满是尘埃的黄土大道上蹒跚地前进着。每天只走几十里就得停下来。疲惫不堪的人群，走这么长一段路后就再也抬不起脚步了。因而不得不停下来歇息。

我所在的位置在队伍的中间偏前。虽然出发时领导要求四个人排成一排以便互相照应、互相监督。但行进中早已乱了套。但同一排的人仍然还是前后相距不远。一天中午，途经一个村庄。行进中，我突然看到路边有一个中年人，手里捧着一个木制的方盘，盘里盛着食物在叫卖。看到有吃的东西卖。我实在是馋涎欲滴，心里立即就犹豫起来。去买吧，前面已经走过了那么长的队伍，难道他们都没看见，都不想买？他们无疑都看见了。毫无疑问，他们也都想买。但慑于纪律无人敢轻易离开队伍。不买吧，眼看着能吃的东西在眼前溜过，实在心有不甘。经过短暂而急促的思想斗争之后。我决定把这吃的东西买下来。我迅速地把随身携带的钱找出五元攥在手里。待到行进到离卖食品的人最近的时候，我突然窜出队伍冲向卖食品的人。

木盘里长长地排列着一排饼。是用极少量的粮食夹杂着野生的狗尾巴

草的种子制做而成的。并薄如纸，大小只有细瓷小碗的碗口一般。价格竟是每块五角钱。我在决定去买之前，已经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但是还是被这高昂的价格吓了一跳。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时间不允许，条件不允许，卖主也不允许。在当时的情况下，能买到吃的就是万幸。我丢下五元钱，抓起十块薄饼就急促地返回队伍。我身后的几个人见我冲出队伍，马上也跟着冲出来，小木盘里的薄饼当即被抢购一空。

队伍还在缓慢地、沉默地进行着。不同的是，有几个成员嘴里咀嚼着薄饼。

十张和纸一样薄，只有小碗口大小的薄饼，总重量不足二两，而且里面还参杂着可观数量的、带壳的狗尾巴草种子，其质量之差可以想见。然而它却成了难得的美味佳肴。当时正是西北高原的秋收季节，用狗尾巴草种子加工的薄饼竟然成了高价的佳肴。那时甘肃群众的生活可想而知。他们除了比我们多一点人身自由之外，其他方面大概也和我们差不多，甚至还不如我们。我一边嚼着薄饼，一边心里又考虑着，如果领导认为我离队去买东西是违纪，我又该如何应对。

太阳还高高地悬挂在西边的天空。队伍就接到就地休息的命令。几千人的庞大队伍，找到房屋是困难的。人们只好在荒野里露宿。睡前每人分到一个馒头作为晚餐。吃过饭，天还只是黄昏，疲惫不堪的人们便开始准备睡觉了。我和同组的另外两个人挤在一起，下面铺一层军毯和一条薄棉被，上面盖上我的老羊皮大衣。由于大家都非常疲劳，因而很快就都进入了梦乡。露宿的一夜，大家竟然都睡得香甜。次日清晨，当人们被起床的哨声喊醒时，嘴边大衣的皮毛上，竟然布满了点点的白霜。塞上高原之夜，即使在早秋也够凉冷的了。

（二十二）捡麦穗

大概是行军的第三天，晚上住在一个城镇的校园里。这里可能就是高台县城，没打听，至今也没搞清楚。这一天走的路程也不多。太阳还高高悬在天空时，领导就宣布了歇息的命令。晚上能睡在教室里，这比露宿自然好得多。人们就地铺好被褥后，有些人就悄悄地溜出去了。原来我们队伍来到时，看到大路上躺着一头死骡子。这可能是我们农场拉车的牲口，也是因为瘦饿不堪，加之承受不了沉重的劳动而在途中死亡的。溜出去的人们都是想在这头死骡子身上打主意的。他们身上暗藏着刀子，想从死骡子身上割些肉下来吃。看到人们躁动的情况，我也按耐不住，想出去看看。一头高大而又极其瘦弱的大红骡子横躺在道路中心。许多个想吃骡子肉的劳教人员，在这尸体旁边转来转去。大家互相悄悄地促动着：“上！上去割

一块下来!”“从屁股那里下手，割一块下来!”身上藏有刀子的人也在对没有刀而又想吃骡子肉的人悄悄地说，“来!刀子借给你，上去割一块下来，咱俩一块吃。”“割一块皮下来也是好的!”

我拖着蹒跚而又沉重的脚步也到骡子躺倒的地方转了一圈。心里也在打着吃一口骡肉的算盘。然而，尽管许多人都有这个心思，但光天化日之下，谁也没敢下手。我们究竟还是被管制的“罪人”，这可和离队买薄饼在性质上大不相同。我身上没有刀子，说实话，即使有刀，我也不敢犯这个错误。跑去看，只是想如果人们哄抢的话，我也许也能“趁火打劫”捞到一点。看到人们紧张而又胆却的气氛，我算了一下账，与其在这种氛围中耗费体力和精神，还不如回去休息合算。于是，我在死骡子附近察看一番后，就决定返回屋里休息了。

第二天早晨踏上行军路程时，还是听到队里人们传说着那头死骡子夜间被饥饿的人们抢劫一空。抢劫的人，有劳教人员，也有附近饥饿的百姓。记不清路上究竟走了几天。一天下午，我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我们的驻地是一个大农场。在一眼望不到边的广袤的土地上，看不到房屋，只见地里每隔不远便有一片低矮的突起，看样子像是平台一样的屋顶。这些低矮的突起下面，原来就是我们的住处，当地人唤它为地窝子。这地窝子也是人们为适应当地气候干旱、寒冷、风沙又厉害而形成的居住条件。它是在平地上向下挖成房屋大小的坑。坑的深度在两米左右。然后再在上面用土坯砌些矮墙，上面再架上横梁、椽子。再铺上当地盛产的芨芨草。草上再厚厚地压上一尺多厚的泥土。屋旁朝南开一个口子形成一个斜坡，作为进出地窝的门。人们住在里面就如同在窑洞里一样。冬暖夏凉。我们住的地窝。每个都有几间互相连通，而且间头都比较大。看样子不像是百姓人家。我猜想它原来可能是农场，如今场里的人员已经全部迁出，把散落在这大片土地上的无数个地窝子，腾出来留给了我们这些劳教人员居住。

每间地窝里都有一排长长的土炕，炕边空隙处有一个用土坯砌成的火炉，是冬天用来取暖用的。进到分配给我们居住的地窝后，刚把手里的杂物和行李丢到炕上，就听到人们兴奋地传递着到地里去拾麦穗的信息。我随着人们走出地窝往地里一看。哎呀!这一望无际的麦田里，竟然到处都散落着麦穗。有些是割倒以后丢在地上的，有些干脆原封未动地竖立在田地里。每个穗子里都饱饱地含着壮实的麦粒。人们大喜过望。不顾一切地奔向地里。争抢着捡拾麦穗。拾到后立即随手搓净，丢进嘴里。一边细细地嚼，慢慢地咽，尽情享受吃的幸福。一边又不断地在地里搜寻麦穗，一个一个地捡起来，装在自己的口袋里。

地里的麦穗实在多得不得了。差不多每平方米面积里就有五六个甚至更多。从麦穗饱满的程度，以及地里麦茬生长的情况看，可以说这是一个美好的丰收景象。同时也可以看出当时收割之粗糙。衣服上的口袋已经不足以盛装捡拾来的麦穗。于是人们纷纷把自己的枕套或其他可以盛装物品的大袋子拿来盛麦穗。

然而再多的麦穗也经不起这几千人的劳教大军的“清洗”。头一两天，人们在附近的田野里拾。随后就逐步向远处扩散。捡拾麦穗成了我们这些劳教人员的正常工作。领导也没再安排任何其他的活动。人们自发地从清晨一直拾捡到晚上。除吃饭的时候回来就餐之外，中间从不休息。天黑之后，人们一个个在地窝里那盏小药瓶制成的煤油灯下，用手把麦穗一把一把地搓散，轻轻地吹掉外壳，然后小心翼翼地把麦子一粒不丢地装到自己的口袋里。虽然才只是秋天。地窝里的那个小煤炉已经被人们点火烧起来。目的不在取暖，而是为了能用茶缸把捡来的麦子煮熟了吃。

初到高台的一段时间里，是人们最兴奋的日子。拾到的麦穗不上交，谁拾到归谁所有。于是一到天黑，低矮的地窝子里就开始热闹起来。有的人坐在炕上搓麦粒，有的人围着炉子烧煮自己捡拾到的麦子，有的人端着茶缸坐在炕上，背靠着墙壁细细咀嚼着麦粒。同时大家又都在热烈地议论着，议题就是每个人一天来的收获，以及如何享用这些“劳动成果”。

捡拾麦穗的队伍不断的向远处扩散。附近的，远处的。每一块土地都被人们反复地、细致地、一点不落地踩踏了许多遍。终于，在这广袤的土地上再也捡不到麦穗了。人们已经细致到，把散落在地上的每一粒粮食都不放过地捡拾回来。一些还不死心的人仍然还到地里去捡拾，但经过几天的无效劳动后，人们不再往外跑了。场里也没有安排别的什么工作。除了一天三顿饭之外。天气好时，人们爬出地窝，坐在地上，背靠着墙壁晒太阳。天气坏时就窝在地窝子里闭目养神。

天气一天天地冷下来。伙食也一天天地恶化下来。那干菜煮成的粥饭里本来就没有多少粮食，如今更变得更稀更薄了。更严重的是，场部还不时传来粮食供应不上，干菜叶、干萝卜叶也购买不到的恶劣消息。人们开始步入了一场更加残酷的饥饿的浩劫。

（二十三）吃“猪屎”

几千人的拾麦大军，像一阵强烈的旋风，把田野里的麦穗清扫得一干二净。干净得连地上的麦粒也难找到一粒。地里再也找不到什么吃的东西了。但是人们仍不死心。被饥饿驱使的人群，每天早饭后仍旧四处散开，两眼不停地在地里搜寻着，企望能再捡拾到几棵麦粒。然而，一切都是徒

劳。大地已经枯萎了。她已经把她所有的一切都奉献出来，再也拿不出更多的东西了。为了节省体力，人们大多留在地窝子里不再外出。这样至少可以减少一些消耗。秋收刚刚结束不久，人们就已经陷入到深重的灾荒之中。伙食的质量更是一天不如一天，连野菜之类的东西也不多了。每天三餐的饭食只是清汤寡水里面夹杂着少量黑色的、不知是从什么地方搞来的干菜梗叶之类的东西。场领导大概也感觉到形势的严峻，因而除了打扫地窝周围的环境卫生之类的活动之外，再也没有安排什么体力劳动。

天好的时候，早晨起床后，人们一并排地背靠着地窝子的东墙，一边晒太阳，一边议论着几天来捡拾麦穗的情况。有人说某某队的某某人专门背一把铁锹在地里寻找老鼠洞。一种棕色的瞎老鼠，会把大量的麦子收藏在洞里。挖到这样的鼠洞，一个里面少则几斤多则十几斤粮食，而且都是剥了壳的。比我们在地里跑好几天拾到的还多得多。这个话我前几天也听人说过。心里着实也非常羡慕。但是我在地里跑来跑去，始终没有发现一个鼠洞。因而只好还是捡拾麦子。这样终究还实惠些，能够有些收获。如今地里再也找不到任何吃的东西了。人们只好停留在地窝子里休息，养养精神。但是在我的头脑里始终有一个景象在浮动，使我久久平静不下来。这个景象就是，这几天我在地里拾麦子时，在离住地大约二三百米处的一个土堆旁，见到的一堆“猪屎”。它也可能是其他什么较大的动物的粪便，这里我姑且把它叫做“猪屎”。这泡猪屎之所以久久使我难以忘怀，是因为它是在麦子成熟期间猪在地里囫圇吞吃麦子之后排出的一泡屎。屎上密密麻麻镶嵌着一些未被消化的麦粒，每一截上大约都有十几粒。这泡屎在高原的早风吹袭下早已干透，形成了一种像丝瓜瓢一样的形态。这泡屎我已反复观察了好几次。总觉得它是一堆排泄物，不卫生，心理上难以承受。因而始终没有动手。现在地里已经是空空如也，肚子里也是空空如也。大家都饿得发慌，我如果不下手，可能就会被别人捡去。于是我打起精神，向组长报告一声，然后就爬出地窝子，朝着记忆中的方向走去。啊！还在那里。老远我就看到那泡猪屎仍旧安然屹立在土堆旁边。我走上前去用脚把它踩碎，又将它在地上揉搓了好一阵子。然后用手一粒一粒地把麦子捡拾起来，用手帕小心翼翼地包起来，带回了驻地。

地窝子旁边不远处有一条小河。干涸的河道里只有几处有水的地方。我把这几十颗从屎里捡来的麦粒，放在河水里淘洗一番，回到地窝里，倒进茶缸，放在煤炉上烧煮起来。麦粒煮熟了。我像往常一样，背靠着土墙，两腿伸进被窝，拿起勺子，一口一口地慢慢咀嚼起来。也许是猪屎在外面曝露的时间久了，也许是那麦粒的香味压倒了臭气。对于我们这些被饥饿

长期折磨、如今已濒临死亡的饥民来说，这几十粒麦子已是莫大的享受。唯一感到遗憾的是，荒野里只有这一泡“猪屎”。

（二十四）准确的死期判断

形势一天比一天严峻，除了刚到高台时吃到一些自己捡拾到的麦子之外。食堂供应的伙食只是一些清汤野菜。汤里几乎找不到一点粮食。人们无论如何都不敢相信，秋收刚刚过去，我们就面临如此可怖的饥馑。一些体质较差、年龄较大的老人，弱者。他们本来健康状况就欠佳，经过几天的长途跋涉，到高台后，在“小秋收”战役中又收获不多。没过多少时间，有些人就支撑不住倒下去了。劳教队伍开始迅速地减员。死人已经从不足为奇转变成了司空见惯。每天每个地窝里几乎都有被抬出去的尸体。我们睡的是通炕。一长排炕上睡着十几个人。人们早上醒来，第一件事是睁开眼，轻轻地活动一下肢体，确认自己还活着。第二件事，就是探头看看，或者用手轻轻推一下自己两侧睡着的人，看看他们是不是还活着。有人死了，就去报告组长，再由组长向上面报告。然后安排人把死者平放在一块薄板上，再由两个劳教人员抬着，另外几个人手里拿着铁锹，送到荒野去埋掉。最先死去的一些人由于当时天气还不十分寒冷，人们还有些力气，因而尸体抬到荒野后，还可能是认真地挖个浅坑掩埋起来。以后天气越来越冷，人们也愈来愈瘦弱无力，而土地则因上冻而变得坚硬起来。于是掩埋就成了形式，只不过是把地表的浮土铲掉一些，形成一个凹坑把尸体放进去，上面再盖些浮土就算了事。实际上尸体的大部分还露在地面上。入冬下雪之后，听那些参加埋尸的人说，他们只是把尸体抛到黄土沟崖下面被风吹卷而堆积起来的雪堆里，就算完事。

人员在不断地减少，使得原来挤得满满的地窝子变得空旷起来。为了便于管理，我们的住处也不断地调整。每调整一次，住处就向总部靠近一次。每个地窝里的人数，先是由少而多，然后又由多而少。少了之后再调整，于是又由少而多。这样一次次的调整之后，我的住处已经由原来离场部很远而变得很近了。

从酒泉到高台后的第一天。我就打听清楚了我们住地的通信地址、信件投递方法、以及寄出信件的途径等情况。晚上就着那盏小药瓶制成的煤油灯，赶紧就给家里写信。告诉他们我已经从酒泉迁到了高台。再寄食品来就按照新的地址投寄。之所以晚上写信，是因为白天要去地里捡麦子，这在当时是压倒一切的头等要务。信里自然还是向他们呼救，要他们竭尽全力给我筹寄食品，以期延续我这残喘的生命。

人们的体质已经衰弱到难以想像的地步。从地窝里爬出来，出口处是

一个小斜坡，有的还是由一个个不高的小台阶构成。每天早晨起来，人们都要花很长的时间，从地窝里扶着墙壁，一级一级慢慢地爬上来。腋下夹着那个用来盛饭的面盆，到食堂去排队，领取那一大马勺用干菜汤水做成的“饭”。

人们议论的话题也变了。原来是议论有关吃的话题，诸如谁家寄来些什么好吃的东西。这些话题当然还是没有被丢弃。只要有这方面的传闻，人们还是少不了要议论一番。但又新增了一个新的话题，那就是议论某某人大约还能活几天。由于几乎每天都要看到身边有人死去，大家通过观察，对于我们这类人的死亡规律已经了解一二了。

所有我们的成员都患着一种叫做饥饿浮肿症的疾病。每个人的眼皮、面颊都是水泡一样地浮肿着。每过一段时间，就会有些人的浮肿消退。于是原来看起来肿胖胖的人，一下子就变得又干又瘦，瘦得只有一副骨架。这个干瘦的形态，大约维持四五天的样子。随后就又浮肿起来。这消了肿（当然是指在我们当时食品极端匮乏的情况下的消肿）之后又再次浮肿起来的人，如果没有得到额外的食物补充，他的寿命大概就不会超过3-5天。重新浮肿起来的人，两三天后，浮肿会急速地消退，再次变得又干又瘦。这时他的死期就指日可待了。一般不会超过两三天，必死无疑。这些就是我们这一伙劳教人员，长期生活在这特殊的环境里，从实地观察中总结出来的经验。这个议题的谈论开始时是悄悄地、相互之间轻声地关照一声，某某人大概快了。果然没过两天，这位被议论者就离开了人间。

饿死的人们离开时都非常平静，没有呼喊，没有挣扎，甚至没有一点动静。我所遇到的死去的人几乎都是晚上入睡时和大家一样，平静地钻进自己的被窝，一夜过来，次日清晨他就没有再起来。他的床位上也是干干净净，甚至没有一点粪尿。人们在悄悄地议论着别人的同时，也在暗暗地计算着自己。计算自己在这人世间还能停留几天。算计归算计，但是没有见到任何一个人因为自己死期将至而悲伤、苦恼。更没见到任何一个人哭啼呼号。人们渐渐地从以往互相不大交往，而变得互相间悄悄地道别。告诉对方自己大概再过几天就该走了。对方则把他的观察判断告诉自己。一般都比自己的判断多一两天或两三天。一方面是鼓励他能坚持下来多活几天。另一方面也是一种精神上的安慰。人们对死已经没有惊慌，没有恐惧。真有点“视死如归”的劲头。这倒也不是说我们这些人有什么英雄气概，也不是说这些人真的不怕死。家庭、子女、亲友、前程•所有常人具有的感情，我们这些劳教人员都有。所有这些问题我们这些劳教人员都不知思考过多少遍，只是在这死亡逼近的关头，人们的思想已经麻木了。实在讲，

人们已经没有任何的精力去思考什么问题了。

调整住地时。开始还要求每个人把自己的被褥整理好，带到新的住地去。以后再调整，就只要求带上自己的牙刷、毛巾、和衣物。被褥不带了。这是因为人员不断地减少，每走掉一个人就留下一份被褥。靠近场部的一些地窝里，随着人员一次一次地集中，再一批一批地“走”掉。这里的被褥已经多得不得了。完全用不着再带被褥过去了。

我们的住处也随着人员的调整而不断变化。过去十几个人挤睡在一个炕上。以后每一条长炕上只睡五六个人。炕位之宽敞足以让人在上面打滚。每个人身底下都铺着厚厚的五六条被褥。身上盖的也是挑选出来的最轻、最柔的被子。一床不够就盖两床、三床。睡觉时的保温条件是大大地改善了。这对延缓死期多少可以起到一点作用，但肚子里得不到食物补充，这保温的作用实际上也就微乎其微。

地窝里那个小煤炉的煤炭供应也还算好，从早到晚整日都在烧着，只是蹲在炉边煮食物的人越来越少。小秋收时搞到的那些麦粒早已被吃得精光，只有极少数有亲人从外面寄来食物的人，才偶尔用炉火煮煮那少得可怜的一点食物。

（二十五）一副血淋淋的人心肝

大概是旧历十月中旬的一个夜晚。刚刚下过的一场大雪使空气变得格外清新。厚厚的、白皑皑的积雪覆盖着整个大地。蓝色的天空稀疏地分布着一些星斗。一轮不太圆、但十分明朗的月亮悬挂在天空。没有风、也没有一点声息。地窝子的周围像死一样的宁静。被饥饿折磨得奄奄一息、毫无生气的人们，拖着枯蒿的身躯，和衣躺在被褥上。地窝子中央那个用土坯砌成的煤炉上放着的那盏用小药瓶制成的煤油灯，和着煤炉中燃烧的煤炭，给地窝里投入了一片昏暗的红光。。

时间才不过晚上七点。睡觉还为时尚早。但是不睡又有什么事可做？我们这些濒临死亡的饿鬼们又能做什么？人们已经到了麻木不仁的地步，除了想吃以外，什么也不考虑。没有精力去想，更没有精力去说。因此，地窝子里也和外面一样，死一般的宁静。

“高仕泌,拿把铁锹到队部来一下。”猛然间我听到地窝门外有人在高声呼喊我的名字。我吓了一跳，但很快就平静了下来。我没有做任何坏事，心里是踏实的，要我拿把铁锹到队部去，大概是要布置我做些什么事。孱弱的身躯实在是一点力气也没有。因此承接这额外的劳动，心里实在很不高兴。然而队部的命令是必须服从的。我只好从炕上爬起来，抓一把铁锹向队部走去。心里揣摩着叫我去干什么。

队部离我的地窝不远。走到队部门口，我按规定喊了一声“报告”。里面一个干部模样的人把我叫进屋里。屋里一盏闪烁的煤油灯下，坐着四五个人，看样子像是在开会。喊我进屋的那个干部，用手指着一张小木桌下放着一个破旧不堪的白色搪瓷盆对我说，“把这个盆子端出去，找个背静的地方把它埋掉。”然后指着小木桌上放着的一个小馒头对我说“这是给你的，不许向任何人说，知道了吗。”我连声答应着是是是。随手把馒头拿起揣进怀里。然后弯下身子端起破脸盆，夹着铁锹就往外走。“不许向任何人说，知道了吗。”那个干部又叮咛了一遍，我赶紧又应答了几声是。随后就端着盆子出去了。

皎洁的月光下，我定睛往盆子里一看。哎呀！原来是血淋淋的一副心肝。是从死人身上挖出来的一副、还没经过清洗的人心肝。我急匆匆地端着盆子，走到一个偏僻的角落。把盆子放在地上。拿起铁锹在地上挖。地冻了。冻得像石头一样坚硬。怎么也挖不动。无奈我只好用铁锹在雪地上把积雪铲开。然后把盆里的东西倒在裸露的地面上，再用雪把它掩盖起来，算是完成了任务。

回到地窝子，我钻进被窝之后。才开始悄悄地啃吃那个至多只有一两多重的小馒头。吃得那样仔细，连一丁点渣子也不让他漏掉。吃得那样香甜。每一小口馒头都要在嘴里嚼好长时间，然后才舍得咽下去。这是最大的享受，最高的奖赏。是除了食物之外，任何其他东西都无法与之相比的，意想不到的额外收获。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至少可以使我的生命延长一到两天。至于那副血淋淋的人心肝。我没有再去想它，也没有精力去想它。

第二天早晨起床后，我想到我掩埋那副人心肝的地方去看看，因为我只是用雪把它复盖起来，没有也无力把它埋起来。但经过短暂的思考后，我还是没有去。原因是我担心，万一别的劳教人员看到我向一个莫名其妙的地方走去，出于好奇或者其他什么心理而尾随而来。看到那副雪淋淋的人心肝，岂不泄露了“天机”。违反了领导反复交待，不许向任何人说的要求了吗。果真如此，这个责任我可担当不起啊。不过我远远地向那里望去，看到的只是茫茫的一片，什么也看不到。估计可能是夜里被野兽或野狗叼去了。

早餐之后，人们开始悄悄地议论起来了。都说是昨天晚上有一个劳教人员，越过地窝子旁边干涸的小河，在对岸一个破窑洞里点火偷偷地煮吃偷来的东西，被队部抓获。食物被没收。被抓的劳教人员今天早晨也死去了。人们估计这大概是队部有意向劳教人员发布的情况通报。只说是偷吃东西，但偷吃什么东西却含糊其辞。在当时的情况下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偷

来吃？谁也猜不出来。说实在的，人们也没有心思去猜。我由于昨晚掩埋了那副人心肝，自然心知肚明。但昨晚干部们已经反复交待。我当然不敢把情况透露出去。

轻松地掩埋一些东西就得到一个馒头的奖励。这在当时当地可真是最难得的无价之宝。我真的希望队部还能安排我干一些类似的公差。然而除了这次之外，再没有遇到第二回。

那个可怜的、死去的劳教人员，如果不是饥饿即将夺去他的生命。他无论如何也不会去干这种事。他死去了，如果他不挖这副死人的心肝，也许还可能多活一两天。他是被逼无奈才铤而走险的。被抓之后，心理上的紧张无疑更加加速了他的死亡。但是即使什么也没有发生，这位劳教人员也难以逃脱死亡的命运。

（二十六）抓老鼠和煮羊骨

经过几次搬迁。我们已经住到紧靠场部不远的一个地窝里了。由于人员的迅速减少，诺大的一个地窝子里。只住了六七个人。住下来后不久。我看到一只硕大的老鼠从地窝一角的洞里爬出来。沿着两个地炕之间的夹道来回跑动。看到这样一个肥胖的动物，我立即想到如何把它抓住，用来填充饥饿的肚皮。老鼠是非常聪明的小动物，直接抓是无论如何也抓不到的，用东西打也不行。一则在狭小的通道里根本无法用东西投掷，二来我也没有投掷东西的力气。想来想去找不到一个可行的办法。然而强烈的饥饿感，又促使我总也舍不得放弃这个念头。终于我想到了一个自己设计的扑鼠办法：把一只高筒毡靴平放在地上，毡靴里放一个用炒面加水搓成的小面团，用来做诱饵。再找一块砖头、一根小木棒和一根拉绳。用木棒将砖头的一端支起来，架在毡靴口上，将拉绳拴在木棒上，绳的另一端由我牵拉。一旦老鼠闻到炒面的香味，钻进毡靴里，我就立即拉动绳子，使砖头倒下来压在靴口上。断掉老鼠的逃路。这样就可以将老鼠抓获。这个办法听起来的确可行，但实行起来却没有奏效。这只肥大的老鼠看来是一只饱经世故的“老油条”。它在炕道里来回跑动，却始终不接近我设计的机关。我趴在炕沿上，屏住呼吸，两眼死死地盯着炕道，深怕惊动这只老鼠。然而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老鼠始终不肯上当。我的精力实在也非常有限。相持一段时间后，我就撑不住了，只好放弃。我从靴子里把那个只有黄豆大小的面团摸出来自己吃掉。这点炒面团是想用来抓老鼠的，是想换取更大的收益。老鼠没抓到，这点炒面可万万不能丢失。否则损失就太沉重了。一连几天抓老鼠都没成功。我只好死了这条心。因为抓老鼠也要耗费精力，而我们这些濒临死亡的人，已经到了连这点精力也贴赔不起的地步了。

一天早晨到食堂打饭时，听同伴们说，场部的干部们刚从别处高价买来一只小羊。这只羊无疑是买来吃的。因而大家纷纷议论起来。按照当地的习俗，羊头、羊蹄、羊下水一般都不吃的。当地群众只有吃羊肚的习惯。于是大家立刻想入非非。吃过饭后就到食堂附近守候，想趁宰羊之机捞点吃的。大家守候的结果却是一无所获。连羊的小肠，甚至羊皮都没有看见。所有羊身上的东西一点也没有丢弃。看来那些管教干部们，除了比我们自由之外，饥饿的程度已经不比我们好多少了。午饭后。我在食堂附近的垃圾堆里找到几块羊骨头。是已经被啃吃得干干净净、上面连一点肉、一点筋也没有的、非常坚硬的羊骨头。我立即把它们捡起来，拿到小河边，把上面的污泥、煤渣清洗干净。回到住地，我把这几块骨头放进大茶缸，加上水后放在煤炉上煮起来。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长时间的煮沸。终于从骨头里冒出两粒油花。两粒只有米粒大的油花。我在沸水中加了几粒盐，然后把这半茶缸水一饮而尽。然后又加了半茶缸水，再放到炉子上煮。这次没有收获了。骨头把它仅有的一点营养成分都献出来了。坚硬的骨头无论如何也咬不动。只好丢掉。煮骨头的水则再次喝到肚子里，尽管这水已经没有一点味道，和白开水完全一样。我仍然舍不得丢弃。因为它里面也许还有一点可以溶于水的营养成分。

（二十七）徘徊在死亡的边缘

从酒泉刚一迁到高台，我就向住在福州的父母、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工作的弟弟、在广州工作的妹妹和在陕西宝鸡的舅父发出信函。虽然从酒泉出发时，领导宣布是到高台去“吃饱饭”。但没人相信，因此我在信中一点也没有放松求援的呼声。到高台后的实际情况也证实我的判断是正确的。除了初到高台时地里捡拾到的麦子，给了人们一点额外的补充和惊喜之外，场里的伙食一点也没有改善。不仅没有改善，相反还一天不如一天地直线下降。严峻的形势迫使我不得不一再发出紧急的求救信。由于在酒泉时表弟曾经来访，我发出的求救信，尽管在文字上还比较含糊，但家人仍然能够领会我的艰难处境。因而大家都十分重视。但家人的情况也非常困难。他们同样也已经陷入饥饿的严重威胁。我向家人要求提供的支持是炒面。因为炒面除了我在前面讲到的那些优点之外，还有取得制作方便的好处。尤其是到高台后还听说有些劳教人员家里寄来的好吃的东西，被人中途截留的谣传，使我更加担惊受怕。炒面是最普通的食物，邮寄途中被截留的危险也要小些。福州方面妈妈只寄来了几小包乳儿糕。另外还有大概二三十粒花生米。乳儿糕仍然是妹妹新生婴儿的特殊供应。其他再也拿不出更多东西了。后来听妈妈说，他自己也患了浮肿病。家里弟弟妹妹两家的两

个小孩也都已饿得骨瘦如柴。妈妈是把自己的口粮节省下来给了孩子。孩子们每人多吃不到一口东西。妈妈却因此而严重营养不良。尽管情况如此艰难，但仍然还挤出了这几小包乳儿糕和一丁点花生米来支援我。这的确也相当不容易了。对于我来说，这一点食物无异于杯水车薪，实在作用不大，但终究比没有要好得多。它至少可以使我的生命延长三至四天。

弟弟妹妹两处则更难给我什么支持了。他们都是单独一人在外地工作。在单位食堂就餐，在当时的困难情况下，维持自身已感艰难，支持我就更谈不上了。

唯一能给我较多支持的是在陕西宝鸡工作的舅父。舅父在宝鸡植物油厂上班。厂里多少可以照顾自家职工一些菜子饼、豆饼、花生饼之类的饼粕。陕西当时的生产供应情况也比其他省份好些。城市居民的口粮基本上还能按标准足额供应。舅父家小孩多，儿童供应标准和成年人差不多，每人节约一口就可以挤出一点粮食供应给我。特别重要的是舅父舅母都非常善良，而且和我们的感情一直都非常深厚。所以当 they 从表弟那里得知我的处境之后，便全力以赴地给我以支持和救援。然而尽管舅父家的情况稍好些。这也是相对而言。在当时的情况下，全国已经都处在严重的饥荒之中，吃不饱饭，营养不良已经是普遍存在的共同问题。我在家中排行老五。表弟表妹们从小喊我五哥。后来听舅父舅母讲，他们每到吃饭时，都要提醒表弟表妹们，每人少吃一口节省一点粮食救援五哥。而每当表弟表妹们听到这话时，他们就忍着饥饿不再吃了。所以舅舅家支援我的那些炒面，实际上也是从他们一家人的嘴里抠出来的。

前面已经讲到，我要求家人能供应给我一些炒面。这个要求只有舅父母尽力做到了。他们几乎每半个月给我寄一次，每次一包、一公斤。从在酒泉时开始，时间大约是六零年六七月份，并一直坚持下来。间隔时间一般是半个月，有时也拖延到二十天甚至更长一些时间，但从未中断。他们挤出这两斤面粉，实在也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舅舅一家是我的救命恩人，舅父舅母是我的再生父母。

舅舅家每次寄来的炒面。我都严格地控制每天的食量，至少要分成十天甚至十几天才吃完。每时每刻都处在强烈 紧迫的食欲和理智的矛盾之中。严重的饥饿感，使我恨不得一顿把到手的两斤炒面完全吃下去。实在说，即使全吃下去也远远满足不了吃的欲望。另一方面。理智又在不断地提醒自己。手里的这点炒面只要能匀开多吃一天，我的生命就可以多延长一天。而每多活一天都是至关重要的，这一天很可能就能决定生与死。

严重的饥荒和眼前不断倒下去的劳教人员。迫使那些一息尚存的人们

不顾一切地向各自的家庭、亲友发出紧迫的求救呼唤。我们开始经常看到外地来的劳教人员的亲属，在场部进进出出。听到某某已经死去的劳教人员的亲属前来探望，结果连尸骨也没见到的传闻。见到一些从穿着打扮上可以看出是从上海、江浙一带来的，劳教人员的妻子、家人，哭泣着由场部的人送出农场的凄惨场面。

劳教人员的数量在急剧地减少着。从酒泉过来时是两千多人。而到十二月份时，已经减少到只剩一百多人了。而这一百多人都是奄奄一息，随时可以撒手人寰的饿鬼。死人的情况仍然在不断地发生着。人数锐减，按说粮食供应情况，相对来说应当要缓和一些了。然而事实却是，局势依然在不断地恶化着。

我怀里揣着前一次舅舅寄来的一点炒面。这是我的救生面，是我生命赖以延续的唯一支柱。每天早晚。我拿起那把被炉火烧得黑乎乎的破茶缸，小心翼翼地挖出一些炒面放进去，加一点盐，然后再倒进去大半茶缸水。用手紧紧地握着，似乎一松手就会被别人抢去。放在炉火的边缘，慢慢地煨煮。一边煮一边用汤勺轻轻地搅动。水开了，炒面被煮成稀溜溜的糊状。然后拿起来慢慢地、一点一点地品尝、享受。诺大一个地窝子，里面只剩下不到十个人了。吃东西时是互不相让的。各人自顾自地吃。我吃时是这样，别人吃时也是这样。终于我那一点炒面被我吃完了。我立即陷入了一种孤立无援的境地。每天一两多的炒面，只能起到维持生命的作用。我那早已浮肿起来的脸庞，眼睑，即使在有额外补充的炒面时，也没有任何一点消减的迹象。如今炒面吃完了，浮肿就开始进一步地恶化起来。忽然一天早晨起来时，我发现我的水肿消退了。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是一个明显的不祥之兆。我心里明白，同室的难友们也明白，但谁也帮不了谁的忙，一切只能听天由命。唯一的希望和救星是家里能寄来食品，或家人能赶来相救。场里对我们的生命早就不闻不问，概不负责了。

浮肿消退后，没过几天我就再次浮肿起来。情况已经到了万分危急的地步，我的死期就在眼前了。我是单身汉，没有妻子儿女的牵挂。思想上的负担要比其他劳教人员轻松些。但到了这一地步，我也难免要想到父母弟妹，想到亲朋好友，想到一起来劳教的同类们，尽管由于精力已经消退到了极点，这想也只是短暂的，一闪而过的。

和我一起从山丹军马场来接受劳教的张家骥，打从进场之后我们就被分在不同的岗位，一直没再见过面。从酒泉向高台转移时，一天途中休息分饭午餐时，我曾见到他一面。两人相对苦笑一下，一句话也没说。劳教队里不允许劳教人员在一起互相诉说。到高台后不久，就听说他已经离开

了人世。我想，我大概也该随张家骥而去了两三天后，我的第二次浮肿又消退了。前面一个个倒下去的人们情况告诉我，我在人世间至多还能逗留两三天了。

早晨醒来，我缓缓地睁开双眼，轻轻转动一下平放在枕头上的瘦削的脑袋。意识到我还活着。看看睡在我左右两侧的两个同类。然后吃力地从被窝里爬出来。看来今天还可以再支撑一天，明天大概就要由住在同一个地窝的同伴去队部报告，让人把我抬出去，丢弃在山崖下的雪堆里了。想是想到了，但一点惊慌、紧张的心情也没有。可能是思想麻木了，更可能是身体里再也提供不出供大脑思考活动的能量了。我自己知道，我的生命已经走到尽头，很快就要结束了。同一地窝的同类们也很清楚地知道，他们即将和我告别了。但仍然还对我说些安慰的话，尽管他们自己也和我一样，离死期也不远，而且也已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

“高仕泌，邮局有你一个包裹。”地窝外面一个干部朝地窝里喊了两声。听到这个声音，我立刻兴奋起来。肯定是家人寄来了食物。好长时间没收到包裹了。我已经开始怀疑是否包裹被人中途截留了。

我艰难地爬出地窝子。脚下“生风”似地赶到邮局。办理了手续之后。工作人员递给我一个小布包。是舅舅从宝鸡寄来的两斤炒面。我已经到了死亡的边缘，明天，至多后天，我肯定要随着大伙一起到西天去。这个小包裹又把我留在了人间。这及时寄来的两斤炒面，确实是我的救命面、再生面。回到地窝里，我小心地拆开包裹，像往常一样，把一些炒面放在茶缸里，加些盐，加些水，放在火炉上煨开后，再慢慢地、一口一口地吃起来。一边吃，一边想，有了这点炒面我又可以多活几天了。然而这漫长的劳教生涯何时是尽头？什么时候才能逃离这无边的苦海？想到这些时，真又恨不得一顿把包里的炒面全吃掉，美美地“享受”一餐。明天去见马克思算了。想是想了，但强烈的求生的欲望仍然不断地提醒我，要理智地对待这些食品，尽可能地延长自己的生命，多活一天就多一线生的机会。

（二十八）获救

接连三年三个国庆节的情况告诉我们，劳动教养无异于无期徒刑。我们获救的日子遥遥无期。人们相互之间偶尔也在一起捣鼓几句：上面要求我们改造思想，脱胎换骨，重新做人。话虽这样说，但思想改造的标准是什么？怎样衡量我们是改造好了还是没改造好？从我们主观上检查，我们谁也找不出自己究竟是怎样反党反社会主义了。然而挨批挨斗做检查时，我们又都口口声声地批判自己这也不对，那也反党。如今经过近三年无比艰苦的劳动教养，实在说，我们的思想感情的确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懂

得了劳动创造世界，体验了工人农民的艰难困苦。我们从内心里更加热爱共产党，更加热爱社会主义。然而我们仍然没有改造好。上面对于我们提出的，希望能得到宽恕、给以自由的要求。回答仍然是：继续改造。我们这种苦难悲惨的日子哪一天才是尽头？看着一个个倒下去的同伴，我们的思想真是消极到了极点。确实感到不如死去还好。

大概是 60 年 12 月中旬时。忽然在劳教人员中流传开一个模糊的信息。说是党中央派人来甘肃视察，发现了问题。我们这些人快要得救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模糊的信息也逐渐地清晰起来。说是党中央派水利电力部长钱英（后来才知道是监查部长钱瑛）同志来甘肃检查工作，发现我们这些劳教人员已经被饥饿折磨得所剩无几。活着的一些人也已奄奄一息的严重情况。非常气愤。当场撤了张掖地委书记的职。并且下令把高台县委书记予以逮捕法办。同时命令通知各劳教人员所在单位或其亲属，立即进行救援。把我们这些还有一口气的劳教分子，接回家或原来所在单位进行抢救。以后的日子里，我们的确也时常看到外面有人到队部来，随后带着一两个劳教人员从场里离去。前面那个信息，无论其细节精确与否。外面来人接劳教人员出去，看来是真实无误了。我们这些尚存一息的“罪人”终于获救有望了。

尽管中央领导来人检查过了。我们这些劳教人员的伙食却依然如故，没有丝毫改善的迹象。看来实在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食物已经到了匮乏的极点，谁也无法马上就能搞到吃的东西。

死人的情况依旧不时地发生着。只是劳教人员已经急剧减少到了一个很低的数量。相对而言，死亡的绝对数也就少了。人们都把希望寄托在单位或家人前来救援上。每时每刻都翘首看望着 队部有无外面来人，希望自己能早点被救出去。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流逝着。眼前就发生着这样的事。早晨起来，一个劳教人员没有挺过来，在夜间死去了。恰恰这天他的家人闻讯赶来救援，但迟了一步。如果昨天来，他的这条命就保住了。他的亲人们只得带着满腔的悲戚和悔恨，哭泣着离去。同样也有劳教人员，眼看他明天就必死无疑，而恰恰这时他的家人赶到，带来了救命的食品，于是，他的这条命就保住了我到农场来之前是在山丹军马场工作。因而我在翘望队部来人的情况时，更加注意有没有军人来。因为军马场是总后勤部所属单位。估计来救援我的人，多半会是军人。

每天都看到，有外面来人把几个尚存的劳教人员接出去。听到有关劳教人员被救的信息。然而始终没有看到有军人来。和我同住一个地窝里的

几个人还没有一个被接走的，而在这里，我们每时每刻都面临着死亡的威胁。说不定那个人，明天早晨起床时，就会死在被窝里。

十二月三十一日早饭后，队部来了一个人通知我，单位来人接我回去。虽然多少天来我时时都在企盼着这一天，但听到来人这句话时，我还是犹如在梦中一般，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当我明确这是事实后，我那高兴的心情真是难以言表。我从怀里掏出仅剩的一口炒面急匆匆地吃完之后，立即回到我的炕位，整理出几件内衣，拿起毛巾牙刷，披上我那件已经破烂不堪的老羊皮大衣，向同住一个地窝的伙伴们匆匆道别后。就立即向队部赶去。

队部屋里两个身穿黑色棉制服的中年人，询问了我的姓名，核对无误后，就带着我上路了。他们看到我只拿着一个小包和毛巾牙刷，就问我为什么不把行李被褥带上。我回答说，只要有了性命，别的什么都可以不要了。

来接我的两位是山丹县政府的人。他们穿的是便服。昨天晚上来到农场时我也看到了。估计是来接人的，但真没想到竟然是来接我的。离开农场办公室时，我看到旁边一个窑洞里，一个中年妇女坐在窑洞门口的一张床边，手里拿着汤勺，正在给床上躺着的一个劳教人员亲切地喂食。我由衷地为这位难友高兴。他的家人在他万分危急的时候及时赶来。他的性命得救了。

火车站离农场并不太远，我们到车站时，从北方开来的火车还没到站。我打听了一下。离车到大概还有将近一小时时间。车站候车室一侧，有一个车站开办的食堂。我进去一问，竟然有面糊正在销售，一两粮票一碗。我立即掏出随身带着的粮票连同钞票一起递给营业员，随后就端起一碗面糊坐下吃起来。我一口气喝了五碗。营业员说什么也不肯再卖给我了。她说要留一些卖给别人。我也只好做罢。说实在的，如果她肯卖。我还会继续喝下去。即使再来五碗，也填不饱我的肚子，我们这些饿鬼的肚皮似乎永远也无法填饱了。火车缓缓驶出明水车站。我因为早晨喝了食堂供给的一盆稀溜溜的菜糊，又吃了半茶缸开水拌炒面，在车站食堂又喝了五碗面糊。上车后就总是往厕所跑。车上的旅客们，都以一种惊奇的眼光注视着我这个无比瘦削，而衣着又出奇地破烂的乘客在车厢里来回走动。我的衣服，确实已经破烂到难以想象的地步。在马号里喂马时，铡草时必须用膝盖顶着手里抱着的那一大把麦草。天长日久，棉裤的两膝以下和棉衣的两个袖管，就都被磨成了斑斑驳驳的长豁口，裸露出里面的棉胎。在工地劳动休息时，又总是躺在那饱含盐碱的土地上。因而我那件军用棉衣背上又积攒起一层碱土，看上去黄绿色的上面，泛着一片盐碱的白色，用手摸起来，

感觉就像铠甲一样。超强度的体力劳动使得人们一到休息时，恨不得立刻就能睡倒，那里还有精神去收拾衣着。60年最后两个月劳动少了，接近年底那一段时间，除了打扫地窝附近的卫生之外，几乎什么劳动也没有。但那时人们也已经奄奄一息，连思考的精力都没有，那里还有精力去收拾衣着。因而所有劳教人员都和我一样，衣着破烂不堪，体态极度瘦削浮肿。在农场里，随着大量的恶性减员，留下的被褥多得不得了，以致每人都可以铺着厚厚的许多层褥子，盖上两三床棉被。但衣服还是各人穿各人自己的，没见到、也没听到有什么人乱拉别人的衣物。

车到山丹后，两个工作人员把我安置在县委招待所里住下。这间屋里有两张木板床。生着一个铁炉子，只住我一个人。

第二天，来了一男一女两个看来是医务人员的人。给我送来十五颗叫做“消肿丸”的东西。说是领导关心我的健康，送些药品来为我治病。要我每天早午晚各服一粒，分五天吃完。

这个“消肿丸”个头比乒乓球略小一点，看来是用面粉、黄豆粉、糖蜜和油以及一些中药制作而成的。吃起来和月饼馅的味道差不多。我拿起一个放在嘴里，两下就吃完了。于是再吃第二粒，第三粒。没一会，十五粒药丸就全被我填进了肚子。我已安全获救，没有必要再把有限的食物，分成若干天慢慢地吃了。我找到医务室，再次向他们索要“消肿丸”，想再次品尝“月饼”的美味。医生却回答说，每人只有一份。说什么也不肯再给。无奈只好作罢。

刚到山丹没两天。舅舅就从宝鸡赶来。他是从甘肃逃难到陕西的灾民口中，得悉甘肃灾荒的情况，又从铁路上看到那些不顾生命危险，扒车外逃的甘肃灾民们的凄惨形象，以及我一再发出的紧急求救信函中，判断我一定已经处于万分危急之中。因而千方百计地筹集了一些菜子饼，连同平日节省下来的两斤面粉，急匆匆地从宝鸡赶来的。他先赶到高台。农场领导告诉他，我已于前一天被山丹县委派人接去，他那颗沉甸甸的心才稍稍放了下来。他在高台农场里住了一夜。晚上他说是和农场的干部住在一起。那个干部也被饥饿折磨得瘦骨嶙嶙。看到舅父提着的帆布包里装的可能是食物。他就要求舅舅可否分一点给他。听说我已经被救出去，看到眼前这位同志瘦弱的形象。好心的舅舅把两斤面粉留下来。把菜子饼分成两份，一份留给我，另一份给了那位困难的干部第二天，舅舅来到了山丹。在招待所找到了我。看到我那一幅皮包骨头、又干又瘦的干枯形象，他是又伤心又高兴。伤心是，尽管从表弟的信中，已经知道了我万分危急的情况。但无论如何也没想到，竟然会被饥饿折磨到了这种地步。高兴的是

我终究还是被营救出来了。无论眼前的困难有多少，性命终究是保住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舅舅在山丹招待所住了一晚，第二天就急匆匆地搭车返回宝鸡了。他是请假出来的，回去还要上班。

我在劳教农场期间，家里每寄来一次包裹，同时都发出一封信，告诉我寄来的是什么东西，以及寄出的时间。从收到的信函、收到的包裹、以及舅舅来到山丹后和我核对的情况来看。家里寄来的包裹我全部都收到了。没有一件丢失。听舅舅讲述，他在高台时，和他同住一室的那位干部的情况。虽然和劳教人员相比，他还要好些。但从他渴求食物的形象来看。同样也被饥饿折磨得浮肿、瘦弱、痛苦不堪。这里我估计舅舅说的这个人，也许也是一位劳教人员，只是他独自一人住一间屋。因为那时农场的住处已经非常宽松了。尽管那时我对食物非常渴求。但舅舅把带来的菜子饼分了一部分给他，我还是非常赞成。“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这几斤菜子饼，说不定就能救这位难友一条性命。

（二十九）饥寒起盗心

住在县委招待所里，一日三餐是食堂按标准供给我。不要钱也不要粮票。我只是到开饭时到食堂窗口领取我那一份饭食就成了。伙食标准不高，早餐是青稞面馒头，面糊和小菜，中晚两餐也都是青稞面馒头和一碟小菜。这个数量对我这个饿鬼来说无疑是远远不够的，但在当时已经是相当高的标准了。有这样一天三顿饭，我的性命是绝对可以有保障了。但是长期受饥饿折磨的人，肚子是极难填饱的。特别是像我这样骨瘦如柴营养严重不足的人，时时刻刻都处在紧迫的饥饿之中，几乎从来不知道什么是饱。因而尽管伙食相对来说已经改善了许多，我仍然还是处在高度的饥饿状态，无时无刻不在期望着能有东西吃。

住下几天之后，民政部门来了一位干部，手里拿一份表格交给我，要我填写、签名。然后随手递给我一丈五尺布票和几斤棉花票。他临走时对我说，你如有什么需要，可以到商业局去找业务股，请他们帮你解决。我有什么需要？食物，我迫切需要的东西就是食物。于是我立即跑到商业局找到业务股。办公桌前围聚了许多人，都是来批条子买东西的。我挤到前面，向股长诉说了我的情况，请他解决我一些食品。他抬头看看我，问过我的姓名，然后拿过一张便条在上面写道，请解决高仕泌同志猪肉二斤，落款处签上他的大名，写上日期，并告诉我到什么地方去买。

两斤猪肉，在食品如此紧张匮乏的情况下，竟然一次批给我两斤猪肉。这可真是非凡的收获。我欣喜若狂，赶紧跑到卖肉的地方。买了两斤冻猪

肉。回到住地，跑到食堂借把菜刀，把肉切成碎块，放到炉子上煨煮起来。三年了，三年来除了 58 年春节时，菜汤里有一点点几乎看不见的肉末，以及此后偶尔吃到一丁点死牛死马肉之外，再也没有嚐过肉味。这次一下批到两斤猪肉。这可真要好好享受一番。

肉煮熟了。它那浓烈的香味使我馋涎欲滴。我用筷子夹起一小块放到嘴里，细细地嚼，慢慢地咽，仔细地品尝猪肉的美味。

几天后，肉吃完了。从我的健康情况来看，我迫切需要肉类食品的补充，从我的食欲来说，那需要就更加迫切。我再一次跑到商业局业务股，请那位股长再批些肉类给我。他看看我，认出我是前几天才批过条子的那个饿鬼，于是不肯再批给我。万般无奈我只好走。走出门后，我的脑海里忽然闪现一个念头：凭这位股长的条子到食品库房里就可以买到肉，而让他批条子又是如此困难，把他的签名学下来，我自己给自己批，岂不是要方便得多了吗。想到这里，我返回头又来到股长的办公室，坐在桌旁的椅子上静静地等着，看着他给前来求助的人们一张张地批条子。

快下班了，要求批条子的人们也都走了，我站起身来，再次请这位股长批点肉食给我。我说无论多少只要批点给我就行，以后我就不再麻烦你了。耐不过我的死纠缠。这位股长终于提起笔来写了一张批给一斤牛肉的条子给我。

拿到这张条子后，我没有急于去买肉，而是把条子拿回住地，找来纸笔，比照着股长的签名演练起来。很快我就学会了他的签名，写得和股长的签名一模一样。

签名学会了，但要学会他的字体就困难得多了。为了在玩鬼的时候不致于露出马脚，我采取由我写报告只由股长签名同意的办法去试探。

拿着我自己写的条子，到卖肉的地方，我心里战战兢兢地递给买肉的老人。他看了看，二话没说就切了一斤冻牛肉卖给了我，过了几天，我又如法炮制了第二张，一举又获成功。于是每隔几天我就用假条子买一斤肉，卖肉的老人也没有对我产生怀疑。这些肉对我的健康无疑是会有帮助的，但我的身体实在是太差了，所以严重的饥饿感仍然没有丝毫消退。

春节前，县委召开大会，从规模上看，我估计可能是三千会。到会的人数足有三百人。所有与会的人都在食堂就餐，于是食堂里忙得不亦乐乎。那时会议的伙食也很简单，主食是白面馒头，副食也不过是菜稀饭或菜汤。几百人吃饭，馒头是要蒸许多的，只见伙房里面大蒸锅上，高高地架起了十几层方形的木制大蒸笼，蒸馒头的热气弥漫在炊事房里，形成厚厚的一片浓雾。

看到炊事员们制作那又大又白的馒头，实在惹人馋。恨不得伸手抓两块馒头坯子回去做饼吃。想是想得厉害。但众目昭彰，无论如何也不敢下手。我在食堂门口左右徘徊，不时向里面探望，始终找不到下手的机会。只好悻悻而回。

在宿舍里休息一阵之后，我又想起那案板上的白面馒头。肚子里饥饿的痛苦难以形容，尽管我已经在招待所休养了一个多月，而且还多吃了好几斤肉，但那饥饿的感觉却依然如故，没有丝毫减缓。于是我再次走到伙房门口，不停地向里面张望。

馒头蒸熟了。炊事员们把一笼笼馒头抬到炊事房门口的一个大案板上，一层一层地擦起来，最上面是那个木制的大笼盖。由于卸笼，蒸锅里大量的水蒸气蒸腾而起，整个屋子里被浓雾遮蔽得对面看不见人，这真是偷馒头的大好时机。我想来想去还是没敢下手。万一被人捉到岂不是太难堪了吗。然而想吃馒头的心情实在是太迫切了，他驱使我一次又一次地走向伙房门口，一再地向里面张望。浓浓的雾气依然如故，蒸笼卸下来后，大蒸锅里的水蒸气还在不停地散发，屋里是黑沉沉的对面看不见人，伸手见不到五指，但门口是亮的，从暗处看亮处应该是可以看见的。我如果伸手去拿馒头，会不会被里面的人看见呢。我闖进炊事房，一直走到最里面，然后朝着门口的方向看，能看到的只是迷迷茫茫的一片亮光，其他什么也看不清。证实伙房里的人不会看到我。于是我咬咬牙心一横，走到门口掂起脚跟，一手掀起笼盖，一手伸进蒸笼抓起两个馒头揣进怀里，然后就急匆匆地跑回住地。

院子里静悄悄，没有一个行人，人们都到会场听报告去了。回到住地，看看外面没有什么动静，我才放心地拿出那两个偷来的馒头尽情地享受起来。

在山丹县委招待所休养了一个多月。快到春节时，我到门外的街道走动，看到一个照相馆，我想进去拍张照片，把我那无比瘦削的形象留个纪念。在门外徘徊了好一阵子，最后还是觉得不拍为好。我担心拍了这张照片，将来万一被人看到，上纲上线一批判，我又将吃不了兜着走。被打成右派的教训以及因此而吃到的苦头给我留下的伤痕太深刻了，我不想再因为这些琐事惹是生非。照相馆门旁一家店铺门口放着一台磅称。我站上去称了一下自己的体重。我穿着一件又厚又重的老羊皮大衣，里面是硬如盔甲的破棉衣裤，里面还有毛衣、绒衣、绒裤，脚上还踩着一双厚重的毡靴，头顶还有一顶狗皮帽，我这横高竖大的汉子，穿了那么多的衣服，总重量才只有 86 斤。这还是在山丹县委招待所休养了一个多月，吃了五六斤肉以及

食堂正常供应的饭食后的体重，除去衣着，我的净体重至多只有六十几斤。我从高台被营救出来时身体情况之恶劣可以想见。

俗话说“饥寒起盗心”，听说各地被饥饿所迫的难民们，不顾一切、不择手段地抢夺食物，他们的心情、他们的处境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回顾我的一生，我从来都没有做过违法的事。这偷馒头和造假条两件事一直深深刻印在我的脑海中。是形势所迫万不得已，还是我自己修养不够意志不坚。

（三十）重现光明

中午开饭的钟声响了，我到食堂领取了我的一份饭菜，炊事房的工作人员对我的态度和往常一样，我悬着的一颗心才算真正地平稳下来。从蒸笼里偷拿两个馒头的事没有被发现。

尽管早饭后我又多吃了两个馒头，但肚子里的饥饿感一丝一毫也没有减轻。看来这一辈子也难填饱这个肚皮了。

午饭后，我在院子里随意走走，晒晒太阳。今天天气格外好，坐在院子里晒太阳比在屋里烤火还舒服。我在向阳的一排房屋前的台阶上席地而坐，背靠在墙上，微闭双眼沐浴着阳光。两个身着棉制服的同志走来，在离我不远处也就着台阶坐下来。他们是来开会的基层干部。上午开大会听报告，下午可能是讨论，他们两人看来是在研究下午开会发言内容的。只听其中一个人愤愤地说，我要如实地反映我那里的情况，我那里的群众死了八千多。言谈中可以听出，他可能是一位公社的领导人。在这场严重的饥荒中，他领导下的百姓，被饥饿折磨死了八千多人。这个严重的灾难，以前是不能说也不敢说的。如今形势发生了变化。作为一个党的基层领导人。他认为自己有责任、有义务如实地反映情况。然而他内心里又非常矛盾。仅仅一年前，那些说实话，讲真情的一大批基层领导人不是通通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被定为红色海洋中的一面白旗而被送到夹边沟劳教农场去劳动教养，其中绝大部分都已经折磨致死离开了人间了吗。共产党是唯物主义，最讲究实事求是，然而在那个年代，要说实话还非得鼓足勇气，甚至要冒着生命的危险才行。这两个同志正是处在是说实话，如实反映民间疾苦，还是闭着眼睛说瞎话，背着良心搞浮夸以求个人飞黄腾达的矛盾之中。他们都是好同志。是对百姓负责的好领导。共产党员实事求是的党性原则，战胜了个人安危的私利。在这次的会议上，他们终于要如实地反映灾情，为处于水深火热中的农民百姓呼吁求援了。

甘肃是地广人稀的高原。在 60 年，一个公社一般不过万人左右。一个公社死八千人，那就意味着除了青壮年之外，老弱妇孺已经死亡殆尽。据

我后来了解，山丹比之酒泉、高台还好些，酒泉高台等地，只有扒车外逃到陕西、新疆的一些青年人保住了性命，留在当地的农民几乎全都饿死了。

我还听到当地的群众说，山丹县委书记的老婆在大跃进年代在山丹办了一个养鸡场，喂鸡的饲料是菜子油拌麸皮。在人民群众处于严重饥荒、性命不保的情况下，领导人为求个人名利，取悦领导，竟然不惜一切代价。这种既缺乏科学性又不符合经济原理的饲养方法，只有那些媚上压下缺乏群众观念的领导者才会干得出来。难怪向我反映情况的老百姓讲述这些事时，饱含着激愤和痛苦的感情。

午后召开会议的情况我不知道。但是我为山丹县基层还有这些好干部而高兴，为 61 年出现的政治上的宽松形势而松了一口气。61 年以后各地都开始投入到救灾的活动之中。尽管形势仍然异常严峻，面前的困难依旧重重。然而不承认民间存在着饥荒，闭眼无视人民的苦难，和看到问题、承认错误从而积极地采取措施予以补救，这在本质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别。

苦难深重的甘肃人民，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终于获救有望了。

大独裁者的绝世秘籍

获取权力不容易，维系权力更不容易。所以人一旦获得了一定领域内至高无上的权力，如何保证权力的独一性就成了关键问题。由古至今，维系权力的方法千千万万，但真正有实用价值的却不多。除少部分大独裁者外，更多的人都是风光一时，不能潇洒一世。为了让各位怀抱天下九五之尊梦想的男人们、女人们能够真正做到大权独揽、万古长青，在下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写下大独裁者绝世秘籍供各位借鉴研究，但求对各位独裁生涯略有作用已足以欣慰。闲言少叙，当下开讲！在不对外发动战争，仅要求国内稳定的情况下，作为一名大独裁者，务必要保证做到以下四点标准：

一、让民众生活仅能维持在温饱水平

大独裁者统治下的民众生活，应该始终维持在温饱水平线上。不能过高，也不能过低。过高的生活标准会让民众逐渐产生心理优越感，特别是当基本食物、居住等问题解决以外，金钱、色情、艺术等高端物质享受也已经极大丰富的时候，对自由民主权力的追求就会在民众中逐步形成一种要求，这就迫使独裁者必须发动对外战争来缓解矛盾，否则独裁者就无法控制民众情绪。同样的道理，大独裁者也不应让民众生活标准过低。标准过低会造成民众对独裁者乃至独裁政权的不信任感，也会造成希望的丧失。另外，过低的生活标准会导致民众出现饿死、冻死等现象，这样会减少未来一旦发生战争时战场上的炮灰总量，也会减少大独裁者与其他国家就国

际争端问题讨价还价的人质筹码。

所以，作为一名大独裁者，要想方设法使民众生活达到这样一种状态——有各种食品，但是仅够充饥，无法吃得太饱。有各种房子，但是仅可以居住，不再提供服务。更应该将食品、居所等物质生活基础作为奖励来提供给民众。这样，民众既不会因为物质生活极大丰富而进行权力上的争夺，更不会对国家、民族等问题进行真正意义上的思考。同时民众还会对大独裁者及独裁政权抱有热烈的希望。这就是大独裁者应该做到的第一点标准。

二、利用一切手段对民众进行洗脑

作为大独裁者，必须要让自己的一言一行成为民众顶礼膜拜的对象，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把民众转化为奴隶，而奴化民众的关键就在于洗脑。大独裁者必须要调动一切可能的手段，严格控制民众思想、言论，并在民众产生独立思维能力以前就对其进行系统化的洗脑工程。与此同时，要全力开动国家宣传机器，将大独裁者自身打造成在世真神。人类的宗教性属于人性本能的一种，任何民族都有自己所持有的宗教信仰。作为大独裁者，一定要充分利用人类这种特性。使信徒从尘世到未来始终对大独裁者本人和大独裁者所领导的政权抱有希望和崇高的敬仰之心，甚至为之奉献一切也在所不惜。只有这样，才能有效的将民众与大独裁者捆绑在一起，也进而可以保证独裁政权的稳定。

三、大力提高核心阶层生活待遇

一个国家不可能只有普通民众，一个大独裁者也不能仅仅依靠自身的力量来控制所有民众。所以，大独裁者在做到维持民众温饱线以及对民众进行洗脑奴化教育的同时，要全力培养一个核心阶层来作为维持自身政权稳定的中流砥柱。这个核心阶层可以用党派、团体、组织的形式来建立，要尽可能的拉拢民众之中的精英分子。无论各个行业，无论各个民族、种族，只要是对大独裁者政权有利的人物，一律要拉拢进入大独裁者独裁政权之内。同时要给予这个阶层极高的生活待遇，包括物质与精神两方面都要达到或超过国外发达国家同时期水平。经过长期的培养，要将这个阶层完全、彻底地与独裁政权融为一体，真正做到荣辱与共，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良好状态。做到这个程度，大独裁者的政权基本可以确保高枕无忧。

四、树立长期敌对目标，充分利用民族主义（爱国主义）

一个大独裁者应该具备长远的战略眼光，特别是要学会利用民族主义情绪，或者说爱国主义情绪。要明白一点，并不是所有的民众都可以用上述三种手段予以拉拢的。肯定会有一些特立独行的人物要跳出大独裁者制

定的规则以外，并尝试反抗独裁政权。这些人乍看之下难以处理，实际上最好应对的就是这种没脑子的人。大独裁者只要设计一个敌对目标就可以彻底转移这批人闲散的注意力。这个目标必须是强大的，难以对抗的，又是有一定对抗的希望。如果没有这样的敌人，那就制造一个这样的敌人。利用这个假想敌来调动国内民族主义或者说爱国主义情绪。将民众多余的精力转移到对抗长期假想敌上面，这样就保证了国内独裁政权的稳定性和长远性。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又是最容易被煽动的一种情绪，最冷静客观的人也难免有一时糊涂，更何况从众性是人之本性，盲从更是国人特色。大独裁者利用手中掌握的国家机器调动国民一致对外应该不是问题。

五、始终挑起派性斗争

大独裁者还有一招，就是在各个层面挑起派性斗争，使独裁者稳居裁决的地位。例如，在核心挑起高岗和刘少奇的斗争，后挑起和彭德怀的斗争，等等。在民间，挑动人民对所谓四类分子的斗争，使社会处于不和谐状态，独裁者处于仲裁地位，稳居宝座。

以上为大独裁者绝世秘籍中的一小部分，大家散会以后就分组讨论，然后回去认真抓好贯彻落实工作，一定要把秘籍的精神掌握好、理解透。如果还有不明白的同志，可以随时联系希特勒、墨索里尼等同志，他们负责解答后续问题。

动物庄园：专制极权的精髓和不传之秘

作者：动物庄园

宇文泰是北周开国的奠基者。当他模仿曹操，作北魏的丞相而“挟天子令诸侯”之时，遇到了可与诸葛亮和王猛齐名的苏绰。宇文泰向苏绰讨教治国之道，二人密谈三日三夜。其中到底说了些什么。在下有幸得到一部千古不外传的秘籍，是专门讲述治国之道的书，其中就有一段说到二人的谈话，现节录如下：

宇文泰问：“国何以立？”

苏绰答：“具官。”

宇文泰问：“如何具官？”

苏绰答：“用贪官，反贪官。”

宇文泰不解的问：“为什么要用贪官？”

苏绰答：“你要想叫别人为你卖命，就必须给人家好处。而你又没有那么多钱给他们，那就给他权，叫他用手中的权去搜刮民脂民膏，他不就得到好处了吗？”

宇文泰问：“贪官用我给的权得到了好处，又会给我带来什么好处？”

苏绰答：“因为他能得到好处是因为你给的权，所以，他为了保住自己的好处就必须维护你的权。那么，你的统治不就牢固了吗。你要知道皇帝人人想坐，如果没有贪官维护你的政权，那么你还怎么巩固统治？”

宇文泰恍然大悟，接着不解的问道：“既然用了贪官，为什么还要反呢？”

苏绰答：“这就是权术的精髓所在。要用贪官，就必须反贪官。只有这样才能欺骗民众，才能巩固政权。”宇文泰闻听此语大惑，兴奋不已的说：“爱卿快说说其中的奥秘。”

苏绰答：“这有两个好处：其一、天下哪有不贪的官？官不怕贪，怕的是不听你的话。以反贪官为名，消除不听你话的贪官，保留听你话的贪官。这样既可以消除异己，巩固你的权力，又可以得到人民对你的拥戴。其二、官吏只要贪墨，他的把柄就在你的手中。他敢背叛你，你就以贪墨为借口灭了他。贪官怕你灭了他，就只有乖乖听你的话。所以，‘反贪官’是你用来驾驭贪官的法宝。如果你不用贪官，你就失去了‘反贪官’这个法宝，那么你还怎么驾驭官吏？如果人人皆是清官，深得人民拥戴，他不听话，你没有借口除掉他；即使硬去除掉，也会引来民情骚动。所以必须用贪官，你才可以清理官僚队伍，使其成为清一色的拥护你的人。”

他又对宇文泰说：“还有呢？”

宇文泰瞪圆了眼问：“还有什么？”

苏绰答：“如果你用贪官而招惹民怨怎么办？”

宇文泰一惊，这却没有想到，便问：“有何妙计可除此患？”

苏绰答：“祭起反贪大旗，加大宣传力度，证明你心系黎民。让民众误认为你是好的，而不好是那些官吏，把责任都推到他们的身上，千万不要让民众认为你是任用贪官的元凶。你必须叫民众认为，你是好的。社会出现这么多问题，不是你不想搞好，而是下面的官吏不好好执行你的政策。”

宇文泰问：“那有些民怨太大的官吏怎么办？”

苏绰答：“宰了他，为民伸冤！把他搜刮的民财放进你的腰包。这样你可以不负搜刮民财之名，而得搜刮民财之惠。总之，用贪官来培植死党，除贪官来消除异己，杀贪官来收买人心，没贪财来实己腰包，这就是玩权术的艺术。”